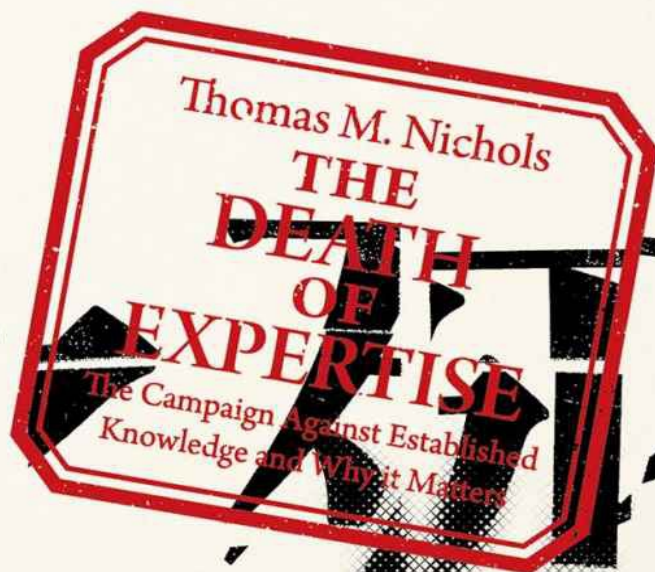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专家之死



[美] 托马斯·M. 尼科尔斯——著　舒琦——译

中信出版集团

专家之死

——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 著

舒琦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谨以此书献给

专家夫人琳恩·玛丽·尼科尔斯

(Lynn Marie Nichols)

和天下无双的女儿霍普·弗吉尼亚·尼科尔斯

(Hope Virginia Nichols)

序

“专家之死”这种说法一出现，一种傲慢自负的感觉已经呼之欲出。启用这样的标题简直是勇气可嘉，很多人还没翻开书，光看标题可能就已经产生了疏离感；有些人读了，可能恰好发现书中的错误，拿来杀一杀作者的威风。我理解这种反应，因为当我看到这种一刀切的论调时，我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文学生活就是习惯于把一切重要的事物过早地埋葬：羞耻感、常识、男子气概、女人味儿、好品位、智识等等。而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再去讴歌那些尚未消亡的事物。

比如专家。专家未死，但岌岌可危。有些事真是错得离谱。美国这个国家，现在沉浸在对无知的崇拜中。诚然，普通人对科学、政治或地理知之不多，这是个老问题了。而且，说实在的，放在当今社会，这都谈不上是个问题了，因为在现代生活中，社会分工明确，人们无须通晓一切，飞行员开飞机，律师打官司，医生开药方，各司其职。我们谁都不是达·芬奇式人物，可以早上画《蒙娜丽莎》，晚上设计直升机。社会理当如此。

但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以无知为荣。美国人已经到了一种境界：把无知当美德，尤其是对公共政策领域的无知。拒绝专家的意见，就是在维护个人的自主权，美国人用这种方式来保护日渐脆弱的自尊心，隔绝外界的纷扰，再也没有人能告诉他们：你错了。这是新的“独立宣言”[1]：我们不再认为一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所有真理都是不言而喻的，甚至包括那些错误的理论。一切都是可认知的，关于一个主题的所有观点都是不分伯仲的。

美国人一向不喜欢知识分子和所谓的万事通，但这和专家是两码

事。我是一个教授，我知道，大多数人不喜欢教授。大约30年前，我刚刚开始教书生涯，在一个离家乡不远的大学任职，所以我会时不时顺道去我哥哥的一个小酒馆，跟他打个招呼。有一天晚上，在我离开之后，一个顾客对我哥哥说："他是个教授，哈？嗯，不管怎么说，他看起来像个好人。"如果你是我的同行，应该对此已经习惯了。

但这并不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有些知识分子听到别人挖苦知识分子无用就怒不可遏，那你们应该换个行当了。我当过教师和政治顾问，给政府和企业做过主题专家，也在多个媒体担任过评论员。我习惯了别人与我意见不一，事实上，我鼓励大家有不同的想法。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一个民主社会智识健全、生机勃勃。

我写这本书是因为我担忧。我们失去了有原则、有见识的争辩。现在普通美国人的基础知识储备很低，已经撞破了"无知"的底线，越过"错知"，一路下行，干脆到了"错得理直气壮"的境地。人们不只是相信一些愚蠢的事情，他们还积极抵制进一步的学习，抓住错误的信仰不放。我没有活在中世纪，所以我不能说这是前所未有的，但在我的有生之年，真是闻所未闻。

这并非是我第一次想到这一点。回到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我在华盛顿工作，我就发现人们有多好为人师，即使只是闲聊，在谈到很多话题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教导我应该做什么，尤其是在我自己的领域——军备控制和外交政策。（人们习惯性地会说"他们应该……"）我当时还年轻，还不是个经验丰富的专家，但还是对此感到瞠目结舌，这些人没有第一手的资料，却信心十足地告诉我，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美苏之间的和平。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政治是欢迎论辩的，尤其是在冷战时期，全球毁灭的可能性都是有的，人们想要发出自己的声音。我以为这是在公共政策领域做事所要付出的部分代价，我接受了。久而久之，我发现很多其他政策领域的专家也有同样的经历，总有外行读了为数不多的关于税收、预算、移民、环境或其他课题的研究，就要

把自己的一知半解灌输给专家。如果你是一个政策专家，这种事情如影随形。

然而，再到后来，我听说一些医生、律师和教师也有同样的经历。而且，有很多专家的建议明明不易反驳，但也未能幸免。最让我震惊的地方不是病人或客户会问到敏感问题，而是这些人有多积极地告诉专家，为什么那些专家建议是错的。他们几乎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想过，专家其实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诚然，人们排斥专业知识，但他们在诸多问题上皆是如此，而且三天两头这样，还带着一腔愤怒，这就让我觉得异乎寻常了，这才是更糟糕的地方。由于互联网无处不在，社交媒体上的聊天不受约束，或是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需求，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就更为明显了。但是，这股排斥专业知识的新兴风潮里透着一股自以为是和狂热，而且，至少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怀疑或质疑，或为了寻求替代答案，而是一种自恋，伴随着对专业知识的蔑视，还美其名曰自我实现。

所以，专家想要还击，要求人们恢复理智，就难上加难了。不管涉及什么主题，所有的争辩都会随着一颗愤怒自大的心付诸东流，最终人们还是会坚持己见，有时候还殃及职业关系，甚至朋友关系。现如今，专家不应争辩，而是接受这种分歧，大不了，就当是坦诚的意见相左。我们应该“求同存异”，这个词现在充其量就是个争吵的灭火器，而且已经到了滥用的地步。如果我们坚持认为并非所有事都是见仁见智的，有些事就是得分对错……那我们简直太蠢了。

我想，我可能见证了世代交替。我成长于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那个时候，人们对专家敬若神明。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国际关系，美国都是执牛耳者，那真是个让人陶醉的时代。我的父母都是知识渊博的，但没受过什么教育，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认为，一个把人类送上月球的人，很可能在其他重要问题上也是对的。我并非成长在一个绝对服从权威的环境里，但总的来说，我的家庭就是典型的美国家庭，对那些从事专业领域的人，从足部医疗到政治，都是深信不疑的。

正如一些批评家对专业知识所指出的，那个年代，我们既相信把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送上月球静海（the Sea of Tranquility）[2]的人，也相信把众多无名的美国人送到越南溪山（Khe Sanh）[3]和德浪河谷（Ia Drang valley）[4]的人。公众对专家和政治领袖的信任，不仅是错付了，还被滥用了。他们说得对。

但是，我们现在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们对专家不是抱着一种善意的怀疑，而是积极的憎恨，很多人认为专家是错的，仅仅因为他们是专家。我们对这些“书呆子”嗤之以鼻，我们告诉家庭医生该开什么药，或是跟老师争辩，就算孩子在测试中的答案是错的，也坚持说是对的。我们不仅认为谁都不比别人更聪明，还都认为我们是最聪明的一代人。

这简直是大错特错。

很多人为本书提供了帮助，我深表感激，同时，还有更多人可能与本书的观点和结论有交集，也请见谅。

早在2013年的时候，我在个人博客“作战室”（The War Room）上写了一篇题为“专家之死”的博文。《联邦党人》（The Federalist）的西恩·戴维斯（Sean Davis）注意到这篇博文，并与我联系，让我整理出一篇文章来。我很感谢西恩和《联邦党人》给这篇小文一些版面，让它很快走入了世界各地100多万读者的视线。随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戴维·麦克布赖德（David McBride）看到这篇文章，遂与我联系，要把此文的主旨思想编纂成书。他在编辑上给予的指导和建议令我受益匪浅，让我能用更详细的内容来充实论证，我很感激他和牛津，以及为书稿做审校的人，是他们让这本书得以问世。

我很幸运能在美国海战学院（Naval War College）工作，我的很多同事，包括戴维·布尔巴赫（David Burbach）、戴维·库珀（David Cooper）、史蒂夫·诺特（Steve Knott）、德里克·雷维隆（Derek

Reveron）和保罗·史密斯（Paul Smith）等，都提供了意见和资料，但本书的观点和结论都是我本人的，不代表任何其他机构或美国政府部门的观点。

还有很多行业的朋友和记者也很好心地给我提出意见，阅读其中的章节，或是在我专业以外的领域为我解答疑惑，包括安德鲁·法西尼（Andrew Facini）、罗恩·格拉涅里（Ron Granieri）、汤姆·汉格威尔德（Tom Hengeveld）、丹·卡泽塔（Dan Kaszeta）、凯文·克鲁泽（Kevin Kruse）、罗伯·米基（Rob Mickey）、琳达·尼科尔斯（Linda Nichols）、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威尔·塞尔坦（Will Saletan）、拉里·桑格（Larry Sanger）、约翰·辛德勒（John Schindler）、乔希·希恩（Josh Sheehan）、罗伯特·楚毕什（Robert Trobich）、迈克尔·韦斯（Michael Weiss）和塞琳娜·齐托（Salena Zito），尤其要感谢丹·墨菲（Dan Murphy）和乔尔·恩格尔（Joel Engel）。我还要特别感谢戴维·贝克（David Becker）、尼克·格沃斯德夫（Nick Gvosdev）和保罗·米都华（Paul Midura）为初稿和几番改稿提供的建议。

我很感激哈佛继续教育学院（Havard Extension School），他们不仅给我机会授课，还为教职员配备了很多优秀的学生担任研究助理。凯特·阿利纳（Kate Arline）就是我这个项目的助理，她的作用不可估量：她迅速应对了一些最古怪的问题，而且镇定自若，游刃有余。（想知道美国从1959年起开了多少家快餐店吗？凯特会找到答案。）不过，书中如果有任何事实性错误或误解，都是我个人的责任。

写书对于作者来说是一段美妙而愉悦的经历，但对作者身边的人却不然。我的夫人琳恩和女儿霍普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对我总是很有耐心，对她们的无限容忍，我感激不尽。谨以此书献给我爱的她们。

最后，还有一些给我提供帮助的人要求匿名，当然，我也要感谢他们。感谢诸多医学专家、记者、律师、教育家、政策分析师、科学家、学者、军事专家等分享他们的经历，给我提供了素材。没有他们，就没

有这本书。

我希望这本书多少能在工作中帮到他们和其他专家。不过，说到底，所有专家的顾客都是这个社会的一分子，所以，我特别希望此书能帮助我的同胞们更好地利用和理解我们所依赖的专家。最重要的，我希望此书能为弥合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嫌隙略尽绵薄之力，长期看来，这样的嫌隙不仅威胁到亿万美国人的福祉，也会殃及美国民主试验的存续。

---

[1] 美国《独立宣言》中说：“我们认为以下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让与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中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利，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授予的。”——译者注

[2] 静海，是月球上众多“月海”中的一个。所谓的月海，并非月球上的海洋，而是指肉眼看到的月面上的暗淡黑斑，其实是月球上广阔的平原。人类在静海最早的探索于1965年开始。此地区是乘坐“阿波罗11号”的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首次登陆月球的地点。——译者注

[3] 溪山战役，美军代号为“苏格兰行动”和“飞马行动”，是越南战争中爆发于南越广治省西北部的一次大规模战役，时间为1968年1月到4月。——译者注

[4] 德浪河谷，德浪河谷战役是越南战争中美越第一次交锋。——译者注

引言

专家之死

美国沉湎于对无知的狂热崇拜中，且由来已久。反智主义的压力就像坚韧的针线一般，缠绕在我们的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支撑它的是一种错误的观念，即民主便意味着“我的无知与你的博学一样优秀”。

——艾萨克·阿西莫夫（Isaac Asimov）[1]

整个医学界的权威人士几乎都认同，人类免疫缺陷病毒（艾滋病病毒）就是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即艾滋病）的成因，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个名叫“艾滋病否认派”的小团体却提出质疑，而加州大学教授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也是成员之一。科学就是乐见这种反常理的挑战，不过迪斯贝格的观点并没有证据，所以结果也只是无稽之谈。一旦研究人员发现了艾滋病病毒，医生和公共卫生部门的官员采取措施防止病毒传播，就能挽救无数的生命。

迪斯贝格这件事可能已经翻篇了，又一个离奇的理论被研究打败。在科学的历史上，走进死胡同的情况屡见不鲜。不过，在这次事件中，一个不足取信的观点却成功抓住一个国家领导人的眼球，招致了惨痛的结果。时任南非总统塔博·姆贝基（Thabo Mbeki）正好利用了这个观点，即艾滋病不是由某种病毒引起，而是由其他原因造成的，比如营养不良和健康不佳，从而拒绝提供药物和其他形式的支持，帮助南非人民抗击艾滋病病毒感染。到21世纪初，他的政府态度软化，但在此之前，由于姆贝基痴迷艾滋病重估运动，已经付出了惨痛代价。据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医生估计，有30多万人因此死亡，还有大约3.5万名艾滋病病毒阳性儿童出生，这些孩子的感染原本是可以避免的。[2]时至今日，姆贝基还认为自己在做有意义的事情。

很多美国人可能会对这种无知的行为嗤之以鼻，但他们切勿过于自信。2014年，《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对美国人展开一项民

调，问题是：2014年俄罗斯、乌克兰冲突，对此，美国是否应该军事介入。美俄（苏联）在冷战时期互为敌人，各自持有数百枚远程核武器。在欧洲中部掀起一场军事冲突，而且就在俄罗斯（苏联）家门口，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只有1/6的美国人——不到1/4的大学毕业生——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乌克兰是全部国土都在欧洲的最大国家，但是受访者的平均认知却偏离了乌克兰2880公里左右。

地图测试很容易让人失望。更令人忧心的是，认知不足并不妨碍民调对象表达偏激的观点。事实上，这么说还算是含蓄了，美国民众不仅强烈表达了意见，他们对军事介入乌克兰的热情与他们的认知不足还是成正比的，换句话说，越是认为乌克兰在拉丁美洲或大洋洲的人，越是希望美国发动军事干预。[3]

这是个危险的时代。人们有最便捷的渠道获取大量知识，却有那么多人抗拒学习任何知识，这是前所未有的。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连知识分子也在诋毁智识的成就，拒绝专家的建议。基础知识匮乏的普通民众越来越多，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接受基本的证据规则，拒绝学习如何进行逻辑论证。如此行事，自然是要担风险的：他们不仅会一手丢弃积累了几个世纪的知识，还会毁掉我们得以开发新知识的那些实践和习惯。

这不只是对专家的简单怀疑，恐怕我们正在目睹的是专业知识理想国的消亡，专业人士和外行、学生和老师、知者与疑者之间的那道界线在谷歌、维基百科和博客盘踞的世界里日渐崩塌，换句话说，一边是在某个领域有所成的人，另一边是一事无成的人，他们之间的界线在模糊。

前有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后有公众信息匮乏的一连串事件，轮番上演，间或让人发笑，有时甚至是滑稽。这种场景已经被晚间脱口秀主持人发展成小型产业了：通过询问民众一些问题，暴露出他们其实对自己坚信的观点一无所知，不过是盲目跟风，还不愿意承认自己与时事的脱

节。比如，人们振振有词地说他们在避开谷蛋白，随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根本不知道谷蛋白为何物，这样的事多半无伤大雅。说实在的，抛出一个荒唐的情境设定，比如“就朝鲜决定发射核武器而言，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缺席科切拉（Coachella）音乐节是有益的”，然后看民众信心十足地即兴发表看法，永不过时。

不过一旦牵扯到生死，就没那么好笑了。不可否认，像演员金·凯瑞和珍妮·麦卡锡这种搞笑的反疫苗接种斗士如果做出什么滑稽举动，那对电视来说就是个大噱头，或者读读相关的推文，也能乐上一下午了。但是，市面上总有一些宣扬疫苗危险的讹传和虚假信息，如果被这一阵营的其他名人和公众人物利用，那遭殃的将是数百万人，一些原本可以预防的疾病，比如麻疹和百日咳，会再次让人们陷入危险境地。

固执的无知在这个信息时代野蛮生长，如果简单说是因为人们彻头彻尾的无知，恐怕不足以解释清楚。很多抵制专业知识的人，把自己的日常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比无知更糟糕：这是没来由的傲慢，是从日渐自恋的文化中迸发的愤怒，一丁点儿不公平的迹象就让他们浑身难受。

我所说的“专家之死”，并不是指实实在在专业能力的消亡，各行各业里能将业内人士与外行区分开的知识死不了。世界永远需要医生、外交官、律师、工程师和许许多多其他行业的专才。日常生活中，没有他们世界就不转了。我们骨折了要找医生，被捕了要找律师。我们出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认为飞行员知道飞机如何操作。要是我们在海外遇到麻烦，我们会找领事工作人员，我们觉得他们一定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这种对专家的依赖，是把专家当作技术人员。这不是专家与更广大群众之间的对话，而是把专业知识当作一种现成的便利工具使用，需要的时候用一下，而且不要越界。缝合我腿上的伤口，但不要对我的饮食说教。（全美超过2/3的人有超重问题。）帮我解决税务问题，但不要提醒我应该写一份遗嘱。（大约一半有孩子的美国人都没有费心立下遗嘱。）保卫祖国的安全，但不必告诉我维护国家安全的成本

以及相应的计算，这会把我搞糊涂的。（大多数美国公民对美国在军队上的开支毫无概念。）

所有这些选择，从营养饮食到国防，都需要民众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但民众似乎越来越不想进行这样的对话。对民众来说，他们宁愿相信自己已掌握到足够的信息能自主做出这些决定，当然前提是他们在意做这些决定。

而另一方面，很多专家，尤其是学术界的，已经放弃与公众互动的职责了。他们退守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愿意和业内人士打交道。同时，位于中间地带的那些人，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公共知识分子”——我倾向于认为自己也是一名公知——也与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感到遭受挫败，并且两极分化。

专家之死，不仅仅是抵制现有的知识体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抵制科学与客观理性，而这两者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础。这是一个信号，正如艺术评论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s）曾经描述的那样，20世纪末的美国是“一个沉迷于疗法、充斥着对政治不信任的政体”，习惯性地“怀疑当局”，“深受迷信戕害”。我们等于从近代开始兜了一大圈仍回到原地：在近代，民间智慧填补了人类知识上的空白，随后，专业化和专业知识催生了一段快速发展的时期；现在，我们到了一个后工业化、信息化的时代，所有公民都认为自己是一切问题的专家。

同时，如果有专家出来维护专业知识，就会招致某些美国民众怒气爆发，他们即刻就会控诉说，这些专家的主张不过是“向当局发出的荒谬恳求”，是面目可憎的“精英主义”抬头，是明目张胆地利用资历来扼杀“真正”的民主所需要的对话。美国人现在普遍认为，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也就意味着对任何事物的观点也应是平等的。虽然这明显是无稽之谈，却被相当一部分人奉为信条。他们坚定主张的事实上的平等，往往是不合理的，有时甚至是滑稽的，通常还是危险的。那么，本书的核心就是专业知识。或者，更准确地说，这本书谈的就是民主社会里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种关系正在瓦解，以及我们所有人，包括平

民与专家，该如何应对。

大部分人听到“专家之死”，第一反应就是归咎于互联网。尤其是专业人士，他们在遇到一些自以为是的客户时，喜欢指责互联网是罪魁祸首。我们后面会了解到，这种说法并没有完全错，但用来解释这个问题，还是过于简单了。攻击专业知识的问题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而互联网，不过是给这个反复出现的问题祭上最新的工具，跟过去遭到滥用的电视、电台、纸媒和其他创新产品的角色一样。

那又何来大惊小怪？究竟是什么深刻的变化驱使我写下这本书，又让你们正阅读着这本书？真的有“专家之死”这回事吗？还是这不过是知识分子的一贯抱怨，因为他们自诩为屋子里最聪明的人，却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或许，这仅仅是每一次社会或技术变革后都会触发的专家对大众的焦虑。又或者，这只是像我一样接受过度教育的精英主义教授，在虚荣心受挫、怒火中烧后的典型表达。

事实上，“专家之死”也许正是进步的信号。毕竟，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不再占有知识的制高点。生命的秘密不再藏在巨大的大理石陵墓下和伟大的图书馆里，那些图书馆的大厅令人望而生畏，就连有机会光顾的少数人也不例外。在过去那样的条件下，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关系没那么紧张，但这也是因为平民没有能力向专家发起实质性的挑战。而且，在大众传媒时代到来前，民众缺少公共平台来发起挑战。

直到20世纪初，人们才开始参与政治、知识和科学生活，而且圈子非常有局限，只有受过教育、爱舞文弄墨的男性圈子里才会就科学、哲学和公共政策展开辩论。而且，这也不是什么被历史尘封的美好往昔，事情没那么久远。在很多美国人的记忆中，大多数人没念完高中，只有极少数人能上大学，最后一小撮人进入专业领域，那样的时代仍是鲜活的。

近半个世纪所发生的社会变革最终打破了普通美国人之间种族、阶级和性别的藩篱，也消除了未受教育的公民和精英专家之间的屏障。辩论的范围越广，知识就越丰富，但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摩擦更多。普及教

育，为妇女和少数群体赋权，中产阶级壮大，社会流动性增强，受这些因素影响，占少数的专家和占多数的平民，近两个世纪没有交集的两个群体，一下子要去直面彼此。

但是，美国人并没有因此更加尊重知识，而是滋生出一种荒谬的想法，他们坚定地相信，所有人都一样聪明。这与教育的初衷背道而驰，教育是为了让人们成为终身学习者，无论这个人多么聪明，或是多么成功。然而，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里，掌握一丁点儿知识，就成了教育的终点，而非起点。这是很危险的。

全书提要

在接下来的章节，我会提出这个问题的若干原因，其中一些植根于人性，一些是美国特有的，还有一些是现代社会和财富积累的必然产物。

在第一章，我会讨论“专家”的概念，以及专家和平民之间的冲突是否值得大惊小怪。当一个专家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你要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里做出艰难决定时，你会向谁寻求意见？（如果你只信得过自己，你可能就是激励我写这本书的那群人。）

在第二章，我会探究一下，为什么专家和普通人，甚至人与人之间的对话会变得如此让人精疲力竭。如果我们够坦诚，我们就会承认，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谈论对自己很重要的事情时，尤其是当这些事还牵扯到我们坚定不移的信念和思想时，都会是惹人厌烦的，甚至是令人恼火的。专家与客户在工作关系上的很多障碍都源自人性的弱点，在这一章，我们会先看看有哪些天然屏障阻碍人们增进理解，然后再细细思考一下21世纪初期的具体问题。

我们都会受着一些问题的煎熬，比如“确认偏误”，就是指人在遇到一个命题时只会倾向于接受支持这个命题的证据。我们都有个人的经历、偏见、担忧，甚至恐惧症，阻碍我们接受专家的建议。如果我们认定某一个数字是幸运数字，没有哪个数学家能改变我们的主意；如果我们认为飞行是危险的，就连宇航员或战斗机飞行员的再三保证也无法消除我们的恐惧。这样说可能有些无礼，不过我们当中有些人错了却不自知，就算意图再好也无济于事。有些人唱歌会跑调，有些人画不出一条直线，大家能力不均，这是现实。同样，很多人就是无法认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差距，或是不明白自己没有逻辑论证的能力。

教育本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确认偏误”这样的问题，填补知识上的空白，从而让自己成长为更好的公民。不幸的是，当今的美国大学，还有学生和家长把大学当作普通产品的态度，已经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在第三章，我会探讨一下，为什么大学教育的普及让很多人自认为变聪明了，然而，他们以为的智识成长其实只是鸡肋的学位营造出的假象。当学生成为重要的客户，而非学习者，他们的自尊大大见长，但宝贵的知识却鲜有长进，更糟糕的是，他们没有养成批判性思维的习惯，也就是说，他们缺失了继续学习的能力，当他们遇到需要深思熟虑并作为选民投票的复杂问题时，他们不知如何衡量。

在现代社会，得益于科技与通信，人类知识突飞猛进，但人性的弱点也日益凸现出来。虽然“专家之死”不能完全归咎于互联网，但互联网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至少在21世纪是这样的。在第四章，我想谈谈，自从古腾堡（Gutenberg）[4]发明了活版印刷以来，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知识来源如何沦为专业知识攻击者与捍卫者交锋的平台。互联网是一个宏大的知识库，同时也是错误信息疯狂传播的源头和推手。互联网不仅让我们当中很多人变得愚昧，也让我们变得刻薄：人们各自隐藏在键盘后面，相互争吵而非讨论，彼此辱骂而非聆听。

在一个自由社会，当无知与求知撕扯着人类，记者就是，或者说应该是最重要的调解人之一。然后，当公民想要的是娱乐而非知情，又会怎么样？我会在第五章探究这个令人担忧的问题。

我们依靠媒体获取信息，区分事实与虚构。世界纷纷扰扰，有些人没有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跟进每一个动态，也有赖于媒体把复杂的事情通俗化，端上易懂的资讯大餐。不过，在这个信息时代，职业记者面临新的挑战。和半个世纪之前相比，现在的新闻播出时间和篇幅几乎没有限制，而且客户期望的是无缝链接，只要一有空间，立马填补内容，并且持续更新。

在这样一个过度竞争的媒体环境中，编辑和制片人不再有耐心——或者宽裕的资金——让记者去深度挖掘一个话题。而且也没有迹象显示

客户想要这种细节。即使记者咨询了专家，最后的播出版本也简化为采访的原声摘要或“重要引文”。新闻行业的每一个人都知道，如果报道不够吸引人，不够夺人眼球，或者不够娱乐化，浮躁的观众就会“移情别恋”，他们只需轻点鼠标或者按下电视遥控器的按钮，就能看其他不那么费神的同类报道。

专家并不是永远正确的。他们也犯下过严重的错误，招致了可怕的后果。要想替专家在现代美国历史上扮演的角色辩白，就要先翻开连篇累牍的灾难和失误：沙利度胺[5]，越南，“挑战者号”[6]，多食鸡蛋会导致胆固醇摄入量超标的警告。（现在可以好好享用鸡蛋了，美国已经撤销膳食胆固醇的警告。）可想而知，专家会反驳说，打个比方，人们容易记住一次坠机事故，却忽略了数十亿安全的飞行里程，道理是一样的。这样说也许没错，但飞机有时候的确会坠毁，而且坠毁的原因恰恰就是专家搞砸了。

在第六章，我会探讨一下，当专家出错了会怎么样。专家犯错的形式多种多样，从明目张胆的欺诈，到因为自负而弄巧成拙。有时候，他们就和普通人一样，会犯错。不过有一点很重要：普通民众要搞清楚专家是怎么错的，为什么会错，这不仅能让民众成长为听得进建议的好客户，还能让公众了解专家是如何进行自我监督的，从而消除他们心中的疑虑。否则，专家的错误正好给断章取义的争论提供了素材，这是两败俱伤的结果：专家因为职业受到攻击而愤懑不已，普通人因为不知道专家在做什么而忧心忡忡。

最后，在结尾部分，我会提出“专家之死”最危险的一面：它是如何破坏美国民主的。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人民指定一些人代表他们做决定。当选的代表不可能事事精通，他们就要仰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帮助。不管大多数人怎么想，专家和决策者就是两种人，美国人习惯把他们混为一谈，但这样会侵蚀专家、普通民众和政治领袖之间的信任。

专家负责出主意；当选的领袖做决定。为了评判专家的表现，评估人民代表投下的选票和做出的决策，普通民众必须熟悉手头的问题。当

然，这并不是指每一个美国人都要深度研究政策，但是，面对与他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果他们都不愿意费神去了解基本情况，那就等于放弃了对这些问题的掌控，无论这样的结果是否是他们想要的。当选民对这类重要决策失去了控制权，那他们的民主可能就会被愚昧的煽动者劫持，或是民主机构悄无声息地走向衰败，最终沦为奉行技术专家治国的威权主义。

专家在民主体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责任，不过近几十年来，他们一直在逃避这个责任。过去，公共知识分子（通常与记者配合）努力把重要的问题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公众，但是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却退回到小圈子里，只和自己的同人交流。而民众又不去询问，只是争论——注意，这个区别很重要——的确会让这种沉默更甚，但这并不代表专家的责任解除了，他们还是要服务社会，要把自己的同胞们当成客户，而不是恼人之事。

专家有教育的责任；选民有学习的义务。无论专家提供多少建议，最终只有公众可以决定重要国家政策决策的方向。只有选民可以在攸关家庭和国家的各项选择中做出决定，也是由他们来为决策担责。

但是，专家有义务帮一把。所以，我写了这本书。

---

[1] 艾萨克·阿西莫夫（1920年1月2日—1992年4月6日），美国著名科幻小说家、科普作家、文学评论家，美国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之一。阿西莫夫一生著述近500本，题材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许多领域，与儒勒·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并称为科幻历史上的三巨头，同时还与罗伯特·海因莱因、亚瑟·克拉克并列为科幻小说的三巨头。同时也是著名的门萨学会会员。曾获代表科幻界最高荣誉的雨果奖和星云终身成就大师奖。——译者注

[2] Pride Chigwedere et al., “Estimating the Lost Benefits of Antiretroviral Drug Use in South Africa,” Journal of Acquired Immune Deficiency Syndromes 49(4), December 1, 2008.

[3] Kyle Dropp, Joshua D. Kertzer and Thomas Zeitoff, “The Less Americans Know about Ukraine’s Location, the More They Want U.S. to Intervene,” *Monkey* Cage Blog,*Washington Post* online, April 7, 2014.

[4] 古腾堡，也译谷腾堡、谷登堡、古滕贝格，德国活版印刷发明人。——译者注

[5] 沙利度胺，是研制抗菌药物过程中发现的一种具有中枢抑制作用的药物，曾经作为抗妊娠反应药物在欧洲和日本广泛使用，投入使用后不久，即出现了大量由沙利度胺造成的海豹肢症畸形胎儿。——译者注

[6] “挑战者号”，“挑战者号”航天飞机是美国正式使用的第二架航天飞机。1986年1月28日，“挑战者号”在进行代号“STS-51-L”的第10次太空任务时，因为右侧固态火箭推进器上面的一个O形环失效，从而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在升空73秒后，爆炸解体坠毁。机上的7名宇航员都在该次事故中丧生。——译者注

第一章

专家与平民

华盛顿电——美国各领域顶尖专家周一集体辞职，因为他们的建议多年来被误读、曲解，甚至视而不见，令他们备感挫折。

——《洋葱新闻》[1]

人人都是解读者

这些人，我们都见过。他们是我们的同事、朋友、家人，有老有少，有贫有富，有些人受过教育，有些人则靠着一台笔记本电脑或一张图书证行走天下。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虽身为普通人，心里却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知识宝库。他们相信自己比专家更深刻，比教授更渊博，比轻信的大众更有见地，他们是解读者，非常乐意向其他人阐明一切事物，从帝国主义的历史到疫苗的风险，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我们接受这样的人，容忍他们，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内心深处的出发点是好的。甚至，我们对这种人还有一点儿喜爱之情。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情景喜剧《欢喜酒吧》（*Cheers*）就成功塑造了这样一个经典角色——克里夫·克莱文（Cliff Clavin），波士顿的一个邮递员酒鬼，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克里夫成功还原了现实中这一类人，他每次发表一番言论前，都会用“研究表明”或“众所周知”作为开场白。观众喜欢克里夫，是因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克里夫式人物：假日晚餐派对上的一个怪叔叔，读大一放假回家的大学生。

我们会觉得这样的人可爱，是因为在这个尊重和依赖专家意见的国家，他们是一群特立独行的人。但是，几十年过去，物是人非。各种各样才疏学浅之辈占领了公共空间，日益鱼龙混杂，他们当中很多人自学成才，对正统教育不屑一顾，对经验嗤之以鼻。“如果经验是当总统的必要条件，”漫画家兼作家斯科特·亚当斯（Scott Adams）在2016年大选期间发推文说，“那随便选一个话题，让我接受顶尖专家一个小时的指导，我就不信我拿不下。”说的好像与专家交流多简单，就像把数据从一台电脑拷贝到另一台电脑一样。一种知识界的格莱欣法则（Gresham’s Law）方兴未艾：曾经这个法则是“劣币驱逐良币”，现在

却是误导信息把知识学问拍倒在沙滩上。

这是很糟糕的。没有劳动分工，不依靠专家、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我暂且会交替使用这三个词），一个现代社会就无法运转。没有人样样都是行家。无论我们志向如何，我们不得不承认，每个人的时间和才能都是有限的，我们逃脱不了这个束缚。我们繁荣昌盛，是因为我们进行专业化，因为我们发展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和实践，让我们信任彼此在各自专业领域的能力。

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写了一句“只有昆虫才搞专业化”，自此这成为名言，常被人引用。他写道，真正有能力的人应该上天入地，无所不能，从换尿布到指挥战舰，都不在话下。赞美人类的适应力和弹性，是一种高尚的情怀，但这是错的。曾经有一段时间，几乎所有的宅地所有人都自己伐木建屋，低效不说，成屋也很是简陋。

我们不再沿用这样的模式，是有原因的。我们现在建摩天大楼，需要懂大梁熔铸的冶金学家，会搞设计的建筑学家，能安装玻璃的玻璃工，但我们不会寄望一个人身兼数职，而是大家各司其职。这样，我们才能在百层高楼上眺望城市，将风景尽收眼底。每一个专家，就算彼此的知识偶有重叠，还是会尊重他人的专业能力，精耕自己最擅长的领域。他们精诚合作下的作品，是单打独斗之所得望尘莫及的。

事实上，如果我们不承认自身知识的局限性，不信任他人的专业素养，那一切都无从谈起。我们有时候会抗拒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会破坏我们独立自主的感觉。我们唯愿自己有能力包揽所有的决定，如果有人跳出来纠正我们，或是指出我们是错的，或在我们不懂的事情上予以指点，都会令人恼火。这是一些个人的本能反应，但如果这种反应演变成整个社会的共同性格，那就危险了。

这是个新问题吗

相较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以前，知识是否面临更多危险？对话和辩论是否更难开展？知识分子总是抱怨同胞的愚钝，不满普通民众对知识阶层和专家的不信任。这个问题有多新？我们该多重视这个问题？

发生在公共广场上的冲突能制造出多大动静，原本都是可预期的，但现在却被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放大了。互联网收集一些半真半假的故事和尚不成熟的想法，然后把所有不良信息和劣质推理在电子世界里大肆扩散。（想象一下，在20世纪20年代，如果所有小镇的每一个怪人都有自己的电台，世界会变成什么样。）今时不同往日，或许不是因为今人比百年前的人愚蠢，或不像先人那样听取专家的话，而只是简单地因为，今天的我们能听到所有的声音。

另外，普通人之间也会有冲突，大家所知领域不同，意见不合也是在所难免。想想看，第一批狩猎者和采集者也可能会因为晚餐吃什么而争论。人类成就的各个领域都被专业人士把持着，分歧必然愈演愈烈。随着专家和平民渐行渐远，社会鸿沟不断扩大，不信任持续加剧。各类社会，无论多先进，都潜藏着一股对精英不满的暗流，以及一种割舍不掉的文化依恋：面对现代生活的错综复杂和扑朔迷离，人们还是会诉诸民间智慧和城市传说，或是做出其他非理性但正常的反应。

尤其是在民主国家，公共空间嘈杂，人们喜欢挑战现有的知识体系。实际上，他们喜欢挑战一切既有的东西：这是“民主”的其中一个属性。即使是在古代，民主体制也以迷恋改革和进步著称。例如，修昔底德（Thucydides）描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度下的雅典人时，说他们是“沉迷创新”的躁动不安的人；几个世纪后，圣保罗（St. Paul）发现，雅典人“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谈论和打听最新观点”。这种孜孜不倦质疑

正统的行为，在民主文化中备受推崇和保护。

美国是一个重视个性自由的国家，比其他民主国家更推崇抵制知识权威。当然，说起“美国人是怎么想的”，就一定要向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2]致敬，不然一切讨论都是不全面的。这位法国观察家在1835年指出，新美国的居民其实并不迷恋专家或他们的聪明才智。“在大多数思维活动中，”他写道，“每个美国人都只会相信自己的理解和判断。”托克维尔推理说，这种不信任知识权威的现象根植于美国民主的本质。当“人人平等，大众可以密切注视彼此”，他写道，他们“常常会回想起自己的推断，还把这番推断当作最显著和直接的事实来源。消失殆尽的不只是大众对某个人的信任，而是对任何权威人士的信任”。

这样的观察不只适用于早期的美国。自从苏格拉底被逼饮下毒堇汁，各国的教师、专家和专业人士都在发泄不满，说社会不尊重他们。近代时期，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3]在1930年批评了“大众的反叛”以及这个现象的典型特征——在智识上无端的傲慢：

> 从本质上来说，智识生活的前提是要具备某种资质。因此，我们注意到，在智识生活中，“伪知识分子”的势力正在抬头，所谓伪知识分子就是指那些不合格的、低劣的以及照智力标准来看不具备此种资质的人。
>
> 或许我的看法是错的，但是，当今天的作者准备就一个深入研究的课题提笔撰文时，他必须要考虑到一点：那些从不关心这个话题的普通读者如果读这篇文章，其目的并不是要从作者这里学到点儿什么，而是去评判作者的观点与自己的一贯认知是否相符。[4]

奥特加·伊·加塞特把公众权势日盛却越发无知的现象归咎于很多因素，包括物质富足、社会繁荣和科学成就。很显然，这样的结论就算放

在当代也毫不违和。托克维尔笔下美国人对智识独立的痴迷存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最终在内外夹击下谢幕。工业技术的发展、中学教育的普及、专业技能的扩散以及美国崛起成为20世纪中期的世界大国，所有要素合力动摇了一个观念——或者更准确地说，神话——也就是普通美国人具备充分的资质来应付日常生活的挑战和管理一个大国的事务。

半个世纪前，政治学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写道："面对现代生活的复杂性，普通民众能够明智而得体地为自己履行的职能在逐渐流失"——

> 在美国人最初的民粹主义梦想中，普通人的全知全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根本条件。一个普通人会认为，就算不做大量的特别准备，他也有能力在各行各业大展拳脚以及管理政府。
>
> 现如今，他明白，如果不借助一些设备，他连早餐都做不了，这些对他来说多少还有些玄妙的设备就出自专家之手，他只是个使用者。当他坐下边吃早餐边看早报，他会读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他坦诚以待，就会承认其实他无力判断其中大部分的问题。[5]

回溯到1963年，霍夫施塔特曾指出，这种难以应对的复杂性让公民感到无助和愤怒，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只能任由更聪明的精英阶层摆布，而且这情况会愈演愈烈。"昔日，大众对知识分子和正规培训的嘲弄是玩笑式的，而且往往是和善的，现在，他们对知识分子的专家身份心怀敌意，满腹怨恨，"霍夫施塔特警告说，"过去，知识分子遭遇温柔的嘲笑，是因为人们不需要他，如今，他承受强烈的愤恨，是因为人们太需要他了。"

50年后，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Ilya Somin）尖锐地指出，这样的局面几乎没有改观。正如霍夫施塔特一样，索明在2015年写道，"政府的规模和复杂性"让"知识有限的选民更难监督和评估政府的许多行为。这样一来，人们通常无法负责任和有效地行使主权"。更令人忧心的

是，几十年间，在这个先进民主体制中，尽管自身知识与参政所需的信息水平相去甚远，美国人却没有采取什么行动去弥合这一鸿沟。“美国选民的政治知识贫乏，”索明正确地指出，“仍然是社会科学最毋庸置疑的发现之一。”[6]

不是新问题，那这算是问题吗

钻研某些课题的人总是倾向于认为别人也会和他们一样对这些课题感兴趣。但是，说真的，谁需要无所不知呢？大多数国际事务专家可能都很难通过他们专业领域外的一个地图测试，那么，普通人不知道怎么准确定位哈萨克斯坦，又有何妨？毕竟，当卢旺达在1994年爆发种族屠杀，之后的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就必须知悉卢旺达的位置。所以，我们这些普通人平时又何必劳神把这些琐事装在脑子里呢？

没有人能掌握那么多信息。我们尽力而为，当我们需要一些信息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触手可及的最佳信息源，向他们请教。我还记得我曾当面问过我的高中化学老师（当时我认为他什么都懂）一个元素的原子序数，一方面是想挑战他，但主要还是因为我太懒了，不愿意自己查。他抬了抬眉毛，说他不知道。然后，他转过头指了指挂在墙上的元素周期表说：“所以科学家要用图表，汤姆。”

毫无疑问，有些专家对普通民众的抱怨是不公平的。即使是最周到的父母，消息最灵通的店主，最有公民责任心的选民，也无法紧跟从儿童营养到产品安全再到贸易政策的海量信息。如果普通公民都能吸收一切信息，那么他们从一开始就不会需要专家。

然而，相较于普通人信息贫乏这一历史事实，专家之死完全是另外一回事。问题的本质不在于大众对现有知识体系的漠不关心，而是掀起了一种敌意。专家的观点或现有知识日薄西山，一股进击的力量取而代之，主张关于任何问题的一切观点都是平等的，没有高下之分，这在美国文化中是前所未有的。在我们的公共话语空间，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种变化不仅是空前的，也是危险的。对专家的不信任以及更为普遍的反智态度非但没有好转，反而进一步恶化。当索明教授和其他人提到公众的无知莫过于半个世纪前的水平，这样的话就算不带来恐慌，至少也应该敲响警钟。守住这条线还不够。事实上，这条线可能根本没守住：专家之死实际上威胁到了那些高估自身知识水平的人，让他们多年积累的知识成果面临倒退的危险。而民主社会中的物质财富和公民福祉也岌岌可危。

如果把大众对现有知识的怀疑看作是乡民的本性作祟，从而不加以理会，倒也很容易，在我们的刻板印象中，乡民多疑且没受过教育，抵制大城市里的知识分子，认为他们神神叨叨、故弄玄虚。但现实却严重得多：带头抵制现有知识体系的是那些本应有些见识的人。

比如疫苗，实际上，文化水平低的小镇母亲中并不存在儿童疫苗项目参与率低的问题。由于公立学校有要求，她们不得不让孩子打疫苗。结果反而是圣弗朗西斯科郊区马林县（Marine County）那些受过更多教育的家长抵制疫苗的概率更高。这些父母不是医生，他们的教育水平不见得多高明，但刚好足够让他们有底气去挑战现已确立的医药科学。所以，违背常理的现象出现了：受过教育的父母做的决定比那些没上过什么学的父母更糟，还把所有人的孩子置于危险境地，真是讽刺。

事实上，无知已经成了一种潮流，一些美国人现在把抵制专家意见当作是文化多层次的徽章。比如美食家中兴起的生乳运动，他们提倡人们有权摄入未经加工的乳制品。2012年，《纽约客》（*New Yorker*）对此做过报道，提到“生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激发了美食爱好者的享乐主义”：

> 因为生乳未经加热或均质化，而且通常取自牧场畜养的动物，所以会更醇厚香甜，而且有时候还保留着农场的气息——一些微让人不舒服的味道，行家称之为“牛屁股”。“巴氏灭菌法剥夺了丰富的口感和芳香的层次。”主厨丹尼尔·帕特森说。帕特森在旧金山有一家米其林二星餐厅，他曾经在那里用生乳制作欧式卡仕达和美

式费城冰激凌。[7]

主厨帕特森是料理的专家，和他或任何主厨争论口感是没有意义的。就算巴氏灭菌法可能影响了牛奶的味道，但同时也杀死了会致命的病菌。

生乳运动不是一场由少数外来主厨鼓动起来的边缘运动。生乳拥趸者不仅认为未经处理的乳制品味道好，还主张生乳更健康，更有益于人类。既然生鲜蔬菜对我们更有益，那不是应该一切生鲜食物都这样吗？为什么不以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方式进食呢？为什么不回归更单纯、更简单的时代呢？

那个时代可能是更简单，但那个时代，人们也会时不时死于食源性疾病。不过说到底，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美食家们都是耳聪目明的成年人，如果他们不惜冒着进医院的风险，也要品尝一下咖啡里面牛下部的味道，那是他们的选择。而我也不宜对他们做出太尖刻的评价，因为我最爱的美食包括贝类海鲜和鞑靼牛排，这些菜品所附的免责声明总让我觉得我在点一个违禁品。不过，就算生肉和贝类海鲜有风险，这也不算主食，尤其是孩子不会拿它们当主食，而生乳对孩子会造成直接的危险。

很快，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的医生试图介入，但徒劳无功。疾控中心在2012年发布了一份报告指出，生乳制品导致食源性疾病的风险是灭菌乳制品的150倍。一名食品药品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的专家更是毫不客气地把饮用生乳制品比作食品界的俄罗斯轮盘赌。但生乳拥趸者丝毫没有动摇，他们不仅自己继续摄入未经处理的乳制品，还坚持要把这种产品拿给那些没有选择或没有能力理解这场论战的消费者——他们的孩子。

为什么要听医生关于生乳的建议？要知道，他们在其他一些事情上出过错的。比如食品，几十年来，美国人被告知要限制鸡蛋和某些脂肪

的摄入。政府专家告诉民众要减少红肉的食用，增加谷物在饮食中的配比，大体上而言，就是要远离任何口味好的东西。（我承认，最后一点是我对官方建议的个人解读。）几年后，研究发现，鸡蛋不仅无害，可能还对身体有益；人造黄油反而比黄油更不利于健康；每天喝几杯红酒可能比滴酒不沾更有好处。

所以说，医生是错的。是时候从储藏室取出培根芝士汉堡，再添上一杯马提尼了吗？

并不尽然。关于鸡蛋的论战已经结束，但只关注美国人饮食的一个方面，就是本末倒置了。关于鸡蛋的具体影响，医生可能搞错了，但他们也有对的地方，比如经常吃快餐、猛灌含糖苏打水或六罐装啤酒对身体不好。一些人就是抓住鸡蛋的新闻（就像之前，他们抓住一个关于巧克力是健康零食的假故事大做文章一样）替自己辩解，把从不听医生的话说得多么合理，但很显然，就帮助人们拥有健康饮食和健康体魄而言，医生比超重的普通美国人更有发言权。

追根溯源，就是因为普通民众没法认识到，专家偶尔会在一些问题上犯错和专家始终在所有问题上犯错是两码事。事实上，专家正确的概率要大得多，尤其是在一些重要的事实问题上。但是公众不断地寻找专家在知识上的漏洞，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无视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专家意见。

人的本性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后面我们会看到——人们就是喜欢寻找一切事物的漏洞。另外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如果算不上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专家和专业人士犯错的时候，后果是灾难性的。比如，一旦提到医学建议的问题，你会发现，几乎一定会有人抛出“沙利度胺”这个词，好像只要说出这个词，都不用详加解释，就已经是最有力的反驳了。几十年前，医学界引入沙利度胺当作镇静剂，并且一度归为孕妇可以服用的安全药物。当时没有人意识到沙利度胺会造成那么可怕的先天缺陷，但此后多年，那些四肢缺失或畸形的儿童照片就一直像阴云一样笼罩在公众的心头，挥之不去。时至今日，这个药品的名字

已经成了专家失灵的同义词。

不过，并没有人说专家不会出错（我们在后面会讨论这个话题）。准确地说，专家犯错的概率比非专家低，这才是关键所在。那些人，一边急不可耐地从历史中翻出沙利度胺的灾难，一边习以为常地把几十片药塞进嘴里，从阿司匹林到抗组胺剂，有成千上万种药物经过专家几十年的临床试验和测试证明是安全的。怀疑论者只看得到那一次严重的错误，却想不到有无数的成功案例在延长他们的生命。

有时候，事后怪罪专业人士可能会让人深陷其中无法自拔，还会带来悲剧性的结果。2015年，马萨诸塞州的一个会计斯蒂芬·帕塞里（Stephen Pasceri）的母亲因为心血管病去世，终年78岁。帕塞里太太长年受到疾病困扰，包括肺气肿，最终在一场修复心脏瓣膜的手术后去世。而帕塞里就坚信是医治他母亲的其中一位医生迈克尔·戴维森（Michael Davidson）忽视了有关某种药物的警告而把这种药物用在了他母亲身上。戴维森是波士顿一家顶尖医院的心脏血管外科主任和哈佛医学院的教授。这名会计跑去医院，开枪打死了戴维森医生，还原了专家之死的字面意思。帕塞里在犯案后饮弹自尽，留下一个优盘，里面存着他关于这种药物的“研究”。

显然，斯蒂芬·帕塞里本来就精神失常，他母亲的病故更是让他错乱了。其实和任何领域的专业人士聊几分钟，都会听到类似的故事，只是情节上可能没那么戏剧化而已。医生和病人因为药物发生龃龉是家常便饭。律师会描述一些客户怎么不听劝而损失金钱，甚至有时候锒铛入狱的事。老师会讲一些家长怎么固执，明明孩子的考试答案是错的，还坚持说是对的。房地产经纪人会说一些客户买房子的时候罔顾他们的忠告结果掉入金钱陷阱。

专家之死已经浸染到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美国大众的科学和数学能力不断下滑，给了从肥胖症到儿童期疾病的多种公共健康危机滋长的温床。同时，在政治和公共政策的世界里——要想在这些话题上进行有理有据的辩论，至少要熟悉历史、公民学和地理，这是很关键的

——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已经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低信息选民的崛起

政治辩论和公共政策制定不是科学。两者都植根于冲突，有时候是有礼有节的争论，但更多时候像一场没有裁判的冰球赛，观众手中握有长期有效的邀请函，随时可以冲上冰场。在当今的美国，政治辩论日益演变成低信息群体间的争吵，他们苦心孤诣，却不谋而合地站到错的一面。而终于修炼到才智过人的政治领袖们（后来这样的领袖越来越少）则会猛然介入大混战，甘冒自食苦果的风险与他们的选民对垒。

在被专家学者和分析师婉约地称为“低信息选民”的这群人之间，争吵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无论是关于科学的还是政策的，他们身上都有一个令人不安的特点：沉浸在自我幻想中，敏感而坚决地主张每种观点都应被视为正确的。美国人已经分不清“你错了”和“你很蠢”这两句话。表达异议就等于表示不敬。纠正别人就是在侮辱别人。不承认所有观点都应受到同等重视就是思想封闭，无论这些观点多么不切实际和愚蠢空洞。

无知在公共政策辩论中的盛行已经对所有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和福祉产生了实质的影响。比如，2009年，美国掀起一场针对《平价医保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的论战，前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萨拉·佩林（Sarah Palin）称这个法案包含一个“死亡委员会”，委员会将决定谁可以获得医保，而判断的依据是政府认为一个病人值不值得活下去。（4年后，依然还有差不多1/3的外科医生相信这番言论。）[8]近乎一半的美国人还认为《平价医保法案》建立了一套统一的政府医保计划。喜欢也好，讨厌也罢，这些都不是事实。在法案通过的两年后，至少40%的美国人不能确定这个计划是不是现行有效的法律。

立法是复杂的，要求普通美国人去掌握连他们的代表都不得要领的

法案细节，可能有点儿强人所难了。2011年，时任众议院议长的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面对各种合情合理的问题轮番轰炸，她显然也不知道《平价医保法案》有哪些内容，招架不住之下，佩洛西不假思索地说出了此后被广为引用的一番话，她说国会应该通过这个法案，来搞清楚法案的内容。其他复杂的倡议也造成过类似的困惑。

税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说明公众的无知是如何影响全国论战的。税是人民公敌。人人都对纳税颇有微词。美国税法复杂得令人发指，每年春天都会让那些诚实的公民相当焦虑，但他们平时并不会去探究，也就是在努力偿付各项税款的时候，会去猜测一下税法里的条款。

但悲哀的是，普通美国人还是搞不清楚政府怎么花纳税人的钱。民调再三显示，美国人普遍认为政府开支太大，征税太高，不仅如此，对于谁缴税、缴多少以及税款流向哪里，他们的认知也是一贯错误的。时代是变了，放在以前，政府需要邮递一个厚如煤渣砖的文件给少数想了解预算的选民；现在，美国人了解政府预算信息的方式便捷多了。可即便如此，大众对此还是一无所知。

再来看看对外援助。对于一些美国人而言，这是个敏感话题，他们讥讽对外援助就是浪费金钱。美国人通常认为，平均算起来，超过25%的国家预算都以对外援助的方式慷慨赠予了其他国家。事实上，这样的猜测不仅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对外援助只占预算的一小部分，不足美国全部开支的0.75%。

只有5%的美国人知道这一点。同时，1/1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每年会拿出一半以上的预算来援助其他国家，也就是几万亿美元的金额。[9]而大部分人则认为，无论对外援助的金额是多少，都是以现金的方式赠予其他国家的。这也错了。事实上，对外援助还算得上是一个创造就业的项目，因为大多数对外援助给的是产品，从食品到战斗机，由美国政府购买后赠予其他国家。

有些人说对外援助是浪费金钱，这是他们的一种政治立场，可以理

解。在我和其他专家看来，就这样一棍子打死虽不明智，但还算不上事实性错误，最多只是由政治理念生发出的一种个人立场。但是，如果人们反对对外援助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笔开支占了美国预算的1/4，这就是个错误认知了，那么任何理性探讨都无从谈起了。

无知到如此地步，有可能会付出高昂代价。比如，美国人普遍支持利用导弹防御系统来抵抗核武攻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很多人相信美国已经拥有导弹防御系统了（倒回到几十年前，美国还没有在阿拉斯加部署少量拦截导弹之前，这就是公众的一个误解。）。导弹防御体系是否会发挥作用，美国是否应该部署这样的系统，时至今日，这些问题已经不重要了。印刻在人们脑海里的是20世纪80年代旨在针对苏联的计划，这个计划得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两党的支持，耗资数十亿美元。

总体来看，问题并不在那些真正关心疫苗可能产生副作用的人身上，也不在那些争论要不要构筑防御体系来抵抗核武攻击的人身上，合理的怀疑对科学和健全的民主都至关重要。问题在于，专家之死更像是一段坏脾气发作的时期，人们幼稚地抵制一切形式的权威，心中还有一股执念，以为强烈坚持的观点就等同于事实。

专家本应消除这样的困顿，或者至少承担起向导的角色，带领大家走出困顿的丛林。但谁是真正的“专家”？接下来，我们会探讨抵制专业知识运动的源头，以及在这样一个本应民智更开化的年代，我们却为何陷入困境。但在此之前，我们需要先思考一下，我们是如何把“专家”或“知识分子”与其他人区分开的。

毋庸置疑，“专家”是一个被滥用的标签：专家遍地都是，什么“庭院护理专家”“地毯清洁专家”，但其实这里面大有文章，外科医生和地毯清洁工不是同一种专家。而且，现在在美国，“知识分子”和“学者”成了嘲讽的字眼，而且更甚以往任何时候。所以，我们先来理清“专家”这个概念，再往前推进。

专家和平民

那么什么人算是专家？“专家”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很多人声称自己是专家或知识分子，有时候的确是。但是，这种自我认定不只误导他人，结果可能更糟。有些声称自己是专家的人，就像一些认为自己吻技一流的人一样，不过是自以为是。

字典并不能给我们太多帮助。在大多数字典里，专家被定义为掌握了“全面”和“权威”知识的人，这样的定义其实可以颠来倒去地理解，按照字典的定义，掌握了某个学科的人，提供给他人的信息是真实可信赖的。（我们怎么知道这些信息值得信赖？因为这是专家告诉我们的。）这里套用大法官波特·斯图尔特（Porter Stewart）描述色情作品的话再合适不过：专家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你一看就知道是。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专家。有些很容易辨识：医生、工程师和飞行员是专家，电影导演和钢琴演奏家也是专家。运动员和他们的教练是专家。但水管工、警察和木匠也是专家。这样一来，你们当地的邮差也算是专家，至少是邮递领域的专家。如果你需要有人帮你解释验血结果，那你需要询问医生或者护士；如果你想知道一封信究竟是怎样从你巴西的朋友那里邮递到你密歇根的家里，你可能就要问问多年来负责邮递的人了。

每个行业都有固有的专门知识，本书中，我会交替使用“专业人士”“知识分子”和“专家”这几个词，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指代那些掌握了特定技能或知识体系的人，并且在自己的人生中践行这一技能或把这一学科的知识当作终身职业的人。这就能帮助我们区分开“职业飞行员”和周末去开一下飞机的人，甚至能把“职业赌徒”和那些偶尔送钱给

赌场的倒霉蛋区分开。

换句话说，专家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对某一学科所掌握的知识远超我们普通人，当我们在人类知识的某一领域需要寻求建议、教育或解决方案的时候，我们会把目光投向他们。注意一下，这里并不是说专家对某一领域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事实上，专家是为数不多的一群人，他们只是对某一学科的观点可能比其他人更“权威”，也就是准确或精确。

即使在专家当中，也还是有专家的。要说诊断和治疗疾病，一个刚拿到博士学位的医生比任何外行都更有资格，可是一旦面临疑难杂症，他/她可能就要听从专科医生的意见了。一名执业律师和一名最高法院法官都是律师，但就宪法问题而言，在华盛顿身穿黑色法袍的律师就比为小社区打遗嘱和离婚官司的律师可能更专业。当然，经验也很重要。2009年，全美航空的一架航班在纽约市起飞时撞上一群鸟而严重受损，驾驶舱里有两名飞行员，但是机长飞行时间更长，更为专业，他说着“我的飞机”，并操作飞机在哈得孙河上迫降。机上人员全数生还。

在一个民主国度自称专家是令人恼火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专业化必然是排他的。当我们学习某个领域的知识，或者终生从事某个职业，我们不仅要放弃其他工作或学科的专业知识，还要相信这个社会上的其他人对自己的领域也是熟谙于心，就像我们在自己的领域一样专业。当飞机的引擎突然熄火，尽管我们可能很想去驾驶舱给飞行员一些有用的小建议，我们还是会假定——当然我们也不得不这样——飞行员比我们更懂得如何应对这个问题。否则，我们这个高速运转的社会就会分崩离析成支离破碎的小岛，我们不再彼此信任，只能把时间花费在信息不足的胡乱猜测上。

所以，我们如何区分人群里的专家，如何辨识他们？真正的专业知识，也就是其他人所信赖的那种知识，是教育、才能、经验和同行肯定的综合体，虽然无形，但可辨认。这里面的每一项其实单拿出来都是专业知识的标志，只是大多数在决定要听从谁的建议时，还是要看所有这些因素是如何在某个学科或专业领域集合的。

正式的培训和教育是专家身份的最明显标志，也是最容易辨识的，但这只是个开始。对于很多职业来说，证书只是进入这个领域的敲门砖：教师、护士和水管工都需要证书才能从业，证书就像一个信号，告诉其他人，他们的能力得到了同行的检视，并且达到胜任这一职业的基本标准。尽管有些坚决反对专业知识的人会讥讽这是一种“文凭主义”，但这些学位和资质证书却是对过往成就的有形证明和重要标签，能帮助其他人区分开业余爱好者（假充内行的骗子）和真正的专家。

说句良心话，有些资质证书是新产物，有些可能根本就不重要。有一些资质证书就是州和地方鼓捣出来骗钱的玩意儿，还有一些只是让人通过一次考试，并不能认定这些人有相关技能，并且考一次终身有效。在当今的美国，律师需要获得法律学位，但在早些时候，年轻人只需要“读读法律书”，然后就获准进入这个行业，拿到律师执照。这个不那么正式的系统造就了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的伟人——综合各方面来说，他算不上一个出色的律师——也造就了亨利·比林斯·布朗这样名气稍逊的人，他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在普莱西诉弗格森（Plessy v. Ferguson）“隔离但平等”裁决一案中，他做出了主流判决意见（布朗在哈佛和耶鲁都读过法律课程，但都没有毕业。）

但是，证书还是个敲门砖。证书承载了学习机构授予获得者的认可，是品质的象征，就像消费者品牌想要提升（并且可望保护）产品的质量一样。仔细看看大学文凭上的字眼，你们会发现，大多数文凭上都写着：证书持有者经学院考核，准予授予学位；反过来，这个学位证书也得到了本地区学校联合委员会或是这个行业机构的支持。认可证书持有者学习课程的学院和协会事实上在证明毕业生对某个学科所掌握的知识。学校或机构的名字，和证书持有者一样，至少都算是对能力的初步肯定。

不可否认，好学校也会培养出庸才，差学校也同样会培养出人才。正如一句老话所说，跑得快未必就能赢得赛跑，但你还是必须尽全力去跑才有希望。麻省理工学院或佐治亚理工大学培养的人才明显比那些竞

争力弱的学校或自学成才的发明家要多。但是，麻省理工学院也有一些毕业生不仅无法平衡收支，甚至连好的工程师都算不上。究竟是什么造就了专家，尤其是那些行业里的翘楚，是如何在一群持有类似证书的人当中脱颖而出的呢？

一个区别就是天资或天赋。要成为一名专家，天赋是不可或缺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曾经这样谈道："认真严肃地对待写作是作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品质之一。而第二个品质，很遗憾，是天赋。"］在大学学习乔叟（Chaucer）的人会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英国文学，但也只是知道更多事实性的知识。而真正有中世纪文学天赋的人不仅知道得更多，还能融会贯通地讲清楚中世纪文学，甚至很可能会创造出关于这一学科的新知识。

天赋能把那些对某个领域的专业知识有更深层的感觉和理解的人从一众有相关文凭证书的人当中区分开来。每个领域都有一些成绩出色、敏于解题的人，结果在工作中却表现平平。有一些杰出的法律系学生在陪审团面前就像冻住了一样。一些高分学霸在警察测试中完全没有街头生存智慧，也永远获取不到这些实战经验。相当一部分顶尖大学的博士应届毕业生除了费力通过的毕业论文，就不会写其他逻辑推论的文章了。这些人也许是拿到了一个行业的入场券，但他们其实并不擅长这个领域，其专业知识也不太可能突破自身能力的局限。

这时候就该经验上场了。经验能帮我们区分开专业人士和不称职的人。有时候，市场本身也会淘汰掉奢望成为专家但天赋不足或缺乏技能的人。比如，虽然职业股票经纪人也会犯错误，但大多数都能维持生计。反观那些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几乎都不赚钱。美国网站《商业内幕》（*Business Insider*）首席执行官兼前华尔街分析师亨利·布洛杰特（Henry Blodgett）曾经说业余的日内短线交易员是"最愚蠢的工作"，绝大多数从事这个工作的人"去汉堡王打工会赚得更多"[10]。他们最终会穷困潦倒。同样，在时间的考验下，糟糕的老师会拿到差评，差劲的律师会失去客户，天资不足的运动员会无法达标。

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试炼，不是每个人都经得住考验，这就是为什么长期待在某个领域或行业并积攒下来的经验都是成就专家的合理要素。的确，问一个人“经验”，就等于在问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你最近做了什么？”专家浸泡在自己的领域里，持续提高自身的技术，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且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日渐精进，或者至少维持着高水准，并与时间赋予他们的智慧——又一个无形的要素——相结合。

要举例说明经验对于成就一个专家起到什么作用，可以说不胜枚举。经验丰富的执法人员凭直觉就能嗅出的问题，年轻的同事就会忽略掉，要怎么解释这种直觉呢？他们也只能说感觉到有些东西“不对劲”。在手术室遇到各种复杂问题并成功渡过危机的医生，或是在驾驶舱陷入各种困境并渡过劫难的飞行员，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会比他们的后辈更加镇定和沉着。资深教师不会被故意挑战或刁难的学生吓退。做过很多巡演的脱口秀演员不会害怕质问的人，甚至还懂得如何利用质问者作为素材制造更多的笑点。

还有一些技能是无法量化的。从我自己接受教育的经历和研究的领域就能找到活生生的例子。

大学毕业后，我到哥伦比亚大学的哈里曼研究所深造，学习苏联政治。我自己想追求更高的文凭，因为我想从事苏联事务的教学和研究，而哥伦比亚大学当时是这个领域的翘楚。研究所所长是马歇尔·舒尔曼教授，知名的苏联问题专家，曾经在吉米·卡特总统手下担任白宫苏联问题顾问。

就像所有的苏联问题专家一样，舒尔曼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苏联媒体，从中洞悉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策立场。这个过程就像对犹太教法典《塔木德》进行文本分析一样，对于我们这些从未接触过的人来说，唯神秘二字可言。我们这些学生就会问他，究竟是如何弄懂苏联报纸上的生硬文章，怎样从这些晦涩的段落中解读出一二？苏联是当时地球上最封闭的体制之一，这些千篇一律的文章，清一色描写集体农场英勇抗争

的故事，而且套话连篇，怎么揭示出这个体制的秘密？舒尔曼耸耸肩说：“说真的，我也无法解释。我就是读《真理报》（*Pravda*），读着读着，直到我的鼻子开始抽搐。”

那时候，我觉得这是我听过的最蠢的事情了。我甚至开始怀疑，投入大量精力去深造是不是一个糟糕的人生决定。但是，舒尔曼的意思是，他多年来一直在阅读苏联的报刊，所以他已经非常习惯苏联人的传播方式，当这些文章摆在他眼前，任何的变动或不寻常的地方都逃不过他的火眼金睛。

虽然满腹怀疑，但我在上学期间和职业生涯的早些年也都是这样做的。我几乎每天都会读苏联的材料，试图去发现以前对我而言不存在的模式。终于，我懂了舒尔曼的话。我不敢说，我的鼻子抽搐过，或者我的耳朵蠕动过，但我意识到，用外语阅读外国的东西是一门专业技能。这种技能很难被提炼成一门课程或一项测试。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培养出这种技能，这需要时间、实践和同领域资深专家的倾情指导。

真正的专家身上还有另一个标志，那就是乐意接受其他专家的评价和指正。每个行业组别和专家群体都有监察人员、委员会、认证机构和证书颁发机构，他们的职责就是监督其成员，不仅要确保成员达到专业标准，还要保证专业技艺不会被不懂行的人滥用。

自我监督是专业主义概念的核心，同时也为我们辨别专家提供了另一个线索。每个专业群体都会设置行业门槛。这些门槛参差不齐，有些相对更合理实在，但通常出发点都是为了维护这个职业的名声，防止一些不称职或欺诈的行为有损声誉。我也能聚集少数几个同事到我家，在家门口挂一个小招牌，上面写着“托马斯·尼科尔斯高能物理研究所”，但事实上我对高能物理一窍不通。所以，真正的物理学家永远不会认可我这个不切实际的研究所，他们也不会仁慈到给我印一个假的学位证书，反之，他们会立即查封我，来保护“物理学家”这个词的神圣含义。

专家群体依赖同行运作的机构来维持标准和提升社会信任度。像同行评审、委员会认证、行业协会和其他组织等机制都有助于保障质量，

并向社会保证，也就是向专家的客户保证，专家的能力是值得信赖的。当你乘搭电梯去一栋高楼的顶层，电梯证书背后的含义并不是“电梯上行，祝你好运”，而是表示有一个民间机构已经检查过这个电梯间，并且尽最大可能地了解到，你乘搭这个电梯是安全的。这个民间机构也是依托高素质工程师的，并且受到其他工程师的审查。

经验和行业认证很重要，但有一句中国古话也蕴含了丰富的智慧，这句话是说，一个手艺人号称有20年的经验，实际上他就是把一年的经验重复了20次。有一些糟糕的牙医，刚从牙医学校毕业的时候拔牙不行，到了退休的时候还是没什么长进。有些老师上第一堂课的时候让学生听了犯困，到最后一堂课还是这样。但是，关于专家，哪怕是那些不拔尖的专家，我们也应该记住两个重要的事情。

其一，就算我们这个笨拙的牙医可能不是镇上最出色的牙医，他或她也比你强。我们不是都需要牙医学院院长来帮我们处理齿冠或者一个简单的蛀牙洞。你可能某一次比较幸运，自己拔掉了一颗牙齿，但你没有接受过相关教育，也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这样做的时候还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大多数人甚至都不会给自己理发。（毕竟美容美发师才是负责这些化学制剂和尖利物品的，他们是另外一群需要培训和执照才上岗的人。）我们很少有人会冒险给自己或至亲至爱的人拔牙。

其二，还是和相关专业技能有关的，专家可能会犯错，但他们犯错的概率比外行要低得多。这是专家和其他普通人之间的关键区别，对于本行业内的陷阱，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正如知名物理学家维尔纳·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所说的，所谓专家，“就是知道在自己的学科中可能犯下的最严重的一些错误并且知道如何避免这些错误”。［他的同事、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有不同的看法：“所谓专家，就是把一个狭小领域内能犯的错误都犯了个遍。”］

这两种观点都应当能帮我们理解为什么“人人皆可成专家”这样的有害思想是非常危险的。的确，相对来说，几乎任何有特定技能的人都能拓展专业知识，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他人都要听从这个人的意见。但

是，当人们开始相信，懂一点点就等于“专业知识”，危险就开始抬头了。有些军事爱好者通过读《简式战舰大全》（*Jane’s Fighting Ships*）了解了战舰的大量知识，但在业余爱好者与真正研究世界海军舰艇能力的专家之间还是有一条细线，虽然细，但无论如何都是存在的。

知道并不等于理解，理解也不等于分析。专业知识不是消遣的游戏。

虽然世上有一些自学成才的专家，但这些人是极少数特例。更多情况下，一些想要迅速进入一个复杂领域的人，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是多么的苍白。他们就像一些在KTV里唱得还不赖的人，以为自己有机会成为下一届《美国偶像》（*American Idol*）[11]的冠军，或是无须让杆优待的高尔夫球爱好者就以为自己可以打出职业水准一样。把一件事情做好，并不代表就有能力提供这方面的可靠建议或学习指导。（注意一下，就算一些人认为自己可以成为歌手，但从来没想过能成为声乐导师。）

缺乏自知之明和智识上的局限会给专家和普通人之间的互动制造尴尬。例如，几年前，我接到一位先生的电话，他执意说自己有一些重要的研究，可能会对我们美国海战学院的课程有帮助。他是我在另一所学校的前学生引荐的，他非常希望我能读一读关于中东的一篇重要文章。我问他这篇文章是谁写的，他说是他写的。他是一名商人，“读了很多相关资料”。我问他是否接受过这个学科的培训，到访过这个地区，或是读过以中东某种语言撰写的文章。他承认自己没有这方面的背景，但他接着说：“但不管怎么说，只要每个月读一本书，你就能成为一名专家，对吧？”

错！

美国文化就是这样，很容易让人对普通人的智慧或自学天才的头脑产生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并且推波助澜。紧接着，一种令大众感到满足的社会幻想就应运而生，在这个幻想里，普通人靠着坚韧毅力和才思

敏捷就能超越古板的教授或书呆子科学家。

在美国的通俗文化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尤其是一些电影，刻画天赋异禀的年轻人用头脑去战胜商人、大学甚至政府。比如，1997年，本·阿弗莱克（Ben Af f leck）和马特·达蒙（Matt Damon）共同创作的电影剧本《心灵捕手》（*Good Will Hunting*），讲的就是学校的一个清洁工其实是一个隐藏的天才。电影里有一幕至今已成经典：达蒙操着一口浓重的波士顿工人口音朝着一个扎着马尾、软弱的常春藤毕业生怒吼，常春藤毕业生败下阵来——

> 你是一年级学生，你刚读完一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书，也许是皮特·加里森（Pete Garrison），所以不奇怪，这就是你信的。到下个月你读到詹姆斯·莱蒙（James Lemon）的著作时，你就会开始谈论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在17世纪40年代已经有强大的企业化规模和资本的积累。
>
> 到第三学年，你会反复思考戈登·伍德（Gordon Wood）对革命前乌托邦和军事动员对资本的形成所产生的作用，然后开始大谈特谈……你准是在维克斯（Vickers）的《在埃塞克斯县的调查里》（Work in Essex County）看到这些的，98页，对吧？没错，我也读过。你是要为我们背诵整本书吗？你对这个问题有没有自己的见解？
>
> 你花15万美元学费得来的东西，其实可以在公共图书馆为过期还书补交的1.5美元中得到。

之后，这个年轻人又用霍华德·津恩（Howard Zinn）和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著作来搪塞他的心理治疗师。这些对话其实很生硬愚蠢，但在当时很能抓住电影观众的心。达蒙和阿弗莱克把奥斯卡原创剧本奖捧回家了，毋庸置疑，他们至少让一些观众相信，博览群书就跟上学的效果一样。

最后，专业知识是很难定义的，有时候，专家和业余爱好者也是很难区分的。但是，我们还是应当能够分清对某学科略知一二的人和掌握了权威知识的人。没有谁的知识是完备的，对于这一点，专家比任何人都清楚。但是，教育、培训、实践、经验和同行的肯定应该至少给我们指出了一个大概的方向，帮助我们区分专家和其他人。

专家和普通人常常会把彼此逼疯，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大家都是人。生而为人，他们在吸收和解读信息的时候，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即使是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也会在推理的时候犯低级错误，而没那么聪明的人则容易忽略自身能力的局限。无论是专家还是普通人，我们大脑的工作原理是相似的（有时候也不）：我们只听自己想听的话，拒绝相信我们不喜欢的事实。这些问题将是下一章的主题。

---

[1] 《洋葱新闻》，美国讽刺性刊物。《洋葱新闻》所提供的新闻是对时事的评论，而这些时事既有真实的也有虚构的。它以真实新闻事件为蓝本，加工杜撰假新闻。虽然故事都是假的，却绝非胡编瞎造，而是用夸张的想象表达对世界的观感，是另类的社会评论，因此有不少读者追捧。它模仿了传统新闻的特点，所有新闻均以美国联合通讯社规格报道。——译者注

[2] 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1805—1859），是法国政治思想家，他的政治社会学思想表现在《论美国的民主》和《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中。——译者注

[3] 何塞·奥特加·伊·加塞特，西班牙哲学家、报业从业人员及评论家。其哲学思想主要是存在主义、历史哲学和对西班牙民族性的批判。——译者注

[4]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 (New York: W.W. Norton, 1993),16-18.

[5] Richard Hofstadte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 Vintage, 1963),34.

[6] Ilya Somin, “Political Ignorance in America,”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eds.,*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 163-164.

[7] Dana Goodyear, “Raw Deal: California Cracks Down on an Underground Gourmet Club,”*New Yorker*, April 30, 2012.

[8] Olga Khazan, “27% of Surgeons Still Think Obamacare Has Death Panels,” *Atlantic* online,December 19, 2013.

[9]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13 Survey of Americans on the US role in Global Health.

[10] Henry Blodget, “Here’s What Day Traders Don’t Understand,” Business Insider, March 29,2010.

[11] 《美国偶像》，美国歌唱真人秀电视节目。——译者注

第二章

沟通这件事，怎么就变得如此累心

几个世纪前……人类还能清楚地辨别出一件事情是已经证实，还是有待查考。一经证实，他们就会真信。

——C.S.路易斯，《魔鬼家书》

没错，嗯，那不过……好像……是你的看法吧，伙计。

——“督爷”，《谋杀绿脚趾》

到了21世纪，有时候沟通起来真是让人疲惫不堪，而且常常让人抓狂，不仅专家和外行之间如此，就连普通人之间也不例外。如果说从前人们过于听信专家的话，那今日可以说谁也不服谁。普通人在日常交往中会有分歧和辩论，无可厚非，但局面每况愈下，现在人们见面就会相互驳斥，说着随意编造的故事和来源不靠谱的消息，那些内容连当事人都无法理解，对彼此都是折磨。按理说，多年来教育不断改善，信息渠道更加便捷，社交媒体井喷式发展，进入公共领域的门槛降低，这些因素综合起来应该会提升我们思考和决策的能力。然而，一切似乎背道而驰。

一切的公开辩论都会沦为壕沟战，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证实别人是错的。理性的意见分歧演变成拙劣的高中辩论，目的就是要赢，而事实就像棋盘上的棋子——还没有上升到国际象棋的高度——主要是为了击倒别的事实。就像巨蟒剧团（Monty Python）大名鼎鼎的幽默小品《论点诊所》（*Argument Clinic*）中的客户一样，我们发现自己仅仅是习惯反驳上一个人刚刚说过的话。（“这不是一个论点。”愤怒的客户告诉职业辩手。“不，这是的。”他回应道。“不，这不是的！这就是个反驳！”“不，这不是。”“不，这是的！”）

在此，我们需要从一个显而易见、无处不在的问题开始：你和我。或者更准确地说，你和我的思维方式。为了理解彼此，我们在打一场从

生物学到社会心理学的艰苦卓绝的战役。

我们与生俱来就会去寻找与自身信仰相契合的证据。实际上，我们的大脑就是被设置成这样的运作模式，所以我们在不该争论的时候也会争论。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社会层面，只要我们感受到威胁，都会争论到面红耳赤。（或许在这个网络时代，在社交媒体上应该这样说："争到我们的手指麻木，无法打字。"）在这一点上，专家也不例外，像所有人一样，我们会相信我们愿意相信的东西。

在个人生活中，我们可能会稍微更宽容一点儿，因为我们是社会性动物，想要被最亲近的人接受和喜爱。在我们最亲密的社交圈子里，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是称职和可靠的，我们希望别人也这样看待我们。我们都希望被人重视和尊重。也就是说，我们不希望被任何人当作笨蛋，所以我们都要假装更聪明。久而久之，连我们自己都被自己骗了。

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一些人并不是很聪明。我们会发现，那些最笃定自己是对的人，往往正是最不应该有如此自信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只把当今对话这种恼人的特质归咎于他人愚笨，而一笑置之，恐怕也太过轻率了。（不可否认，有时候他人愚笨确实是原因。）大多数人的智识还没有那么堪忧，至少如果用一些基本的指标，如识字率和完成高中学业来衡量的话，还不算智力低下。

事实的真相就是，不是只有那些智力最低下的人困于商讨和辩论的陷阱里，我们都深受其扰，包括我们选取的解决问题和回答问题的方式，都是令我们对自己和朋友感觉更良好的。影响专家之死的因素有很多，包括高等教育、媒体和互联网，人性里的这些特征，都与之脱不了干系，或者说这些就是背后推手。如果我们有良好的教育、缜密的思维和坦诚的态度，妨碍专家和平民增进沟通的这些拦路虎是可以克服的，不过前提是，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这些拦路虎是如何困扰我们的。

或许我们都是愚蠢的

首先，让我们来直面最令人痛心的一种情况吧。专家与外行在交流上有隔阂，或许是因为普通人不够聪明吧。也许，现在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大众之间的智识差距之大，已经让他们没有共同语言了，顶多就是互相表达一下蔑视。也许，他们之间无法对话或理性辩论就是因为一方——或者双方——很愚蠢。

这些都是挑衅的言论。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愚蠢，这种冷嘲热讽的话很难听，暗示这个人不仅智商低下，还顽固无知，几乎到了道德缺失的地步。（我就滥用过这个词，所以你们很有可能也是。）遇到和你意见不一的人，你可以说他们信息有误，搞错了，不正确，或任何其他的话。但是别说他们愚蠢。

幸亏，使用“愚蠢”这个词不仅粗鲁，而且通常也是错误的。无论从哪个方面衡量，美国人都比几十年前要聪明，或者说至少不比以前笨。20世纪初也不是一个文化和学习生活璀璨的时代。1943年，即将进入大学的新生还以为林肯是美国第一任总统，说林肯“下放（解放）了黑奴——其中只有6%的新生能历数出最初的13个殖民地”。《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见此情景，在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还拨冗哀恸美国年轻人的“无知已经到了令人震惊的地步”[1]。

至于在21世纪，人们的教育能不能赶上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又是另当别论了。1910年和2010年的小学生都要学习如何计算三角形边长，只不过，今天的学生必须用这些知识来了解一个常设国际空间站的存在，而他们的曾曾曾祖父母可能连汽车都没见过，更别提飞机了。在任何时代，你永远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只要一个人自己漠不关心，无论多少教育和口舌，都无法教会他/她国会成员的名字。

说了这么多，我们不可否认，还是有一些自以为聪明其实并不是很聪明的人。我们都曾被困在一个聚会或晚宴上，听一个毫无见识的人在那里高谈阔论，还丝毫不怀疑自己的智识，信心满满地对我们说教，其实内容错误连篇，漏洞百出。有的人在自己知之甚少的领域里打转，而且还盲目自信，别不相信，这种事情真有发生，当然，科学最终让一切水落石出。

这种现象就叫作“达克效应”（Dunning Kruger effect）[2]，是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的两名心理学研究者戴维·邓宁（David Dunning）和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的名字命名的，由两人在1999年里程碑式的研究中提出来。总而言之，达克效应告诉我们，越愚蠢的人，越是会高估自己，不觉得自己无知。邓宁和克鲁格措辞更加温和，他们称这些人“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但这并改变不了最核心的发现：“这种人不仅会得出错误结论，做出不当选择，而且能力不足还会蒙蔽他们的双眼，让他们无法认识到这一点。”[3]

这里也要为“技能不足的人”说句公道话，我们其实都容易高估自己。如果你让大家给自己的才能打分，你听到的答案会是“平均水平以上”，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嗯，高于平均水平。幽默家加里森·凯勒（Garrison Keillor）在自己的广播节目“草原一家亲”（A Prairie Home Companion）中，依照平均水平以上原则，虚构了一个小镇乌比冈湖（Lake Wobegone），这里的“所有孩子都在平均水平以上”。

邓宁后来解释说，我们都会高估自己，但能力越低的人，越是对自己认识不足：

> 我和其他人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得出结论，在给定一组认知能力、专业能力或社会能力测试的时候，能力低者会严重高估自己的能力和表现，包括语法掌握、逻辑推理、枪械护理和安全、辩论或理财知识。在考试中得D和F的学生，会认为以自己的努力应该得更

高的分，国际象棋下不好的人，桥牌打得差的人，成绩不佳的医科学生，申请驾照续期的老人家，都无一例外地会大大高估自己的能力。[4]

为考试而学习的学生，努力保持独立的老人，憧憬职业发展的医科学生，一般都会比较乐观估计自己的能力，而不是低估自己。只有在体育竞技场，能力不足是显而易见、不可否认的，除此之外，人们一般都不会说自己哪里不行。

不过，技能不足或能力欠缺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高估自己，究其原因，更具体地说，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关键的"元认知"能力。这种能力使个体在表现不佳的时候能退一步思考，看清自己表现得怎样，从而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好歌手在唱出一个不和谐的音符时，心里已经清楚；好导演在看到戏剧中的一个场景不佳的时候，已然知晓；好的营销人员在广告战要"扑街"的时候，已了然于心。相反，那些力有不逮的同行就没有这种能力，反而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可想而知，把这样的人和专家凑到一起，肯定没有好结果。缺乏元认知会带来一个恶性循环，比如一个普通人对某学科知之甚少，当他/她与这个领域的专家交谈时，明明已经疲于应付，顾此失彼，却还不自知。一场争辩在所难免，一个完全不懂逻辑论证的普通人，在强词夺理的时候却全然不觉。简而言之，专家很受挫，外行很受伤。结果每个人都拂袖而去。

更让人恼火的是，面对这些拿不准就会胡编乱造的人，教育和引导都是行不通的。邓宁说在康奈尔做的实验就像"朴实版的'吉米鸡毛秀'[5]"，并且证实了喜剧演员的一个观点：人们就算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也还是不会停下来。

在我们的研究中，我们向受访者询问是否熟悉一些物理学、生物学、政治学和地理中的名词概念。这些名词中包括类似"向心

力”和“光子”之类的专有名词，相当数量的人表示熟悉这些概念。不过有意思的是，这里面还有一些研究人员凭空捏造的名词，诸如“视差板”“超级脂肪”，甚至cholarine（并没有这个词），结果他们也声称熟悉这些概念。在一个实验中，大约90%的人表示对其中至少一个概念感到熟悉，但事实上这9个名词都是虚构的。

更糟糕的是，“越是表现出精通的受访者，越是会宣称自己对这些虚构概念十分熟悉和了解”。这就使得我们很难与这些“低能个体”争辩，因为和专家比起来，“他们是有眼不识泰山的”。

换句话说，越是低能的人，越是无法认识到自己是错的，或别人是对的，也越有可能试图去掩饰伪装，越是学不进去任何东西。

邓宁和克鲁格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多番解释。总的来说，人们不愿意去伤害彼此的感情，在一些职场上，普通员工甚至上司可能都不愿意去纠正不够称职的朋友或同事。有些事情，比如写作或说话，明显都没有办法得到即刻的反馈。打棒球的时候，只要你有几次挥棒落空，你就得承认自己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击球手，但是就算你每天都搞错一些语法和句法，可能都不会意识到自己的口语表达多么差。

对于专家和外行的交流而言，“能力有高低”是横亘其中的一个迫切挑战，不过对于这样一个根本的人性弱点，我们其实也无能为力。不过，再普通的人也不是一无是处的。而才思更为敏捷的人也会犯错，他们在试图理解更加错综复杂的问题时会犯什么错误？所以说，普通人会面临的困境和偏见，专家照样也逃不脱，不足为奇。

证实性偏见：因为你早已知道

“证实性偏见”是开展有效对话最常见的也是最让人恼火的障碍，而且不局限于专家和外行之间。这个术语是指当我们在主观上认为某种观点正确的时候，往往倾向于寻找那些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信息，只接受那些能够加强论证这一观点的事实，而忽略那些能够推翻这一观点的信息。我们都会这样做，可以肯定的是，你、我、他，甚至每个人都曾经因为“证实性偏见”在争论中激怒过他人。

例如，如果我们认为左撇子是邪恶的[6]，每个左撇子凶手都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我们总是能在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情节，因为我们选择去记住这一类故事。无论死囚牢房里的数据显示惯用右手的杀人犯多出多少，我们都不为所动。每一个左撇子凶手都是证据，每一个右手惯用犯都是例外。类似的，如果我们听说了波士顿的司机很粗鲁，下次我们去波士顿的时候，就会记住那些对我们按喇叭或挡道的司机，至于那些给我们让道或是挥手表示感谢的司机，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索性忘掉。［有记录显示，道路救援服务公司利车公司（AutoVantage）把休斯敦列为粗鲁司机最差城市，波士顿排第五。］

在1988年的电影《雨人》（*Rain Man*）中，自闭症患者雷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完美例证，不过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雷蒙是一个白痴天才，他的大脑就像一台计算机，能够高速进行复杂的运算，还储存着大量互不相关的事实数据。但是，鉴于他的情况，他还不能把这些数据与现实情境相结合，而雷蒙所记住的东西，就比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事实更重要。

因此，当雷蒙和他的弟弟不得不从俄亥俄州飞往加利福尼亚州，雷蒙惊慌了。每一家美国航空公司都曾经遭遇过严重空难，而雷蒙记得这

些数据和每次空难中的遇难人数。因为雷蒙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这些可怕的例外上，怎么都不肯上飞机。弟弟恼火了，问雷蒙相信哪一家航空公司，雷蒙悠悠地说出了澳大利亚国家航空公司。“澳航（Qantas），”他说，“澳航从来没有空难事故。”当然，澳航并没有美国国内航班，所以雷蒙和他弟弟就动身驾车穿越美国，这其实比坐飞机危险得多。但是，因为雷蒙的脑子里并没有车祸的可怕数据，他就欣然上车了。

我们都有一点儿像雷蒙。无论我们是心怀恐惧还是希望，我们总是会把注意力放在那些证实自身想法的数据上。我们会记住那些印象深刻的事情，而忽略稍显平淡的事实。当我们与人争辩或是咨询专家建议时，大多数人都很难不去理会这些记忆，也不管这样做多么让人恼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不是一般智力的问题，而是教育的问题。人们根本不懂精算、风险或概率，要说有什么让专家和外行在交流的时候备感挫折，几乎没什么可以和“数学盲”相提并论了。“数学盲”这个概念是数学家约翰·艾伦·保罗斯（John Allen Paulos）明确提出来的。对于相信坐飞机危险的人来说，无论多少次的安全着陆，都无法抹去一次坠机带来的恐惧感。“安全着陆的数字很庞大，而空难事故的概率相应比较小，即使面对这样的数据，”保罗斯在2001年写道，“数学盲还是会不按常理出牌，‘没错，但如果你刚好就赶上空难那一次呢’，然后会心地点点头，好像他们已经用自己的真知灼见驳倒了你。”[7]

人类总是能把“但如果我刚好就是不幸的那一个呢”这句话发挥得淋漓尽致。回到20世纪70年代初，我去拜访住在希腊乡村的一个叔叔。他是一个结实强健的人，但他害怕坐飞机，所以得了重病也不敢去伦敦求医治疗。我父亲试图用宿命论来劝说他：虽然每个人注定都是要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他的时候未到。就和很多害怕坐飞机的人一样，我叔叔很简单地反驳道：“没错，但如果这个飞行员的时候到了呢？”

没有人是完全理性的，对于自己无法掌控的事情，我们大多数人是会感到恐惧的。我叔叔在19世纪末出生于希腊的一个乡村，没受过什么教育。我身处21世纪，受过教育，精通统计学和历史——即便如此，有

那么几个晚上，我坐在飞往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的飞机上，扣好安全带，飞机在接近终点的时候颠簸得厉害，我也不比叔叔好过多少。在那样的时候，我会努力去想，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的飞机在接近终点，我乘坐的这架飞机中“空难头彩”的概率小得惊人。但很不幸，通常我都失败了：那些从温哥华飞往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的飞机可能是安全着陆了，但都与我无关，当我乘坐的飞机掠过罗得岛（Rhode Island）的屋顶时，我还是下意识地抓紧了座椅的扶手。

已故科幻小说家兼医学博士迈克尔·克赖顿（Michael Crichton）在20世纪80年代初用艾滋病流行早期的一个例子说明，人们总是相信自己会抽到最短的签，是最倒霉的那一个。那个时候，人们对艾滋病知之甚少，一个朋友给克赖顿打电话想听一些安心的话，结果却被克赖顿的逻辑说理惹恼了：

> 我努力解释风险这回事。因为我最近注意到，人们其实真的不太了解他们所面临的风险。大家在家里放着枪，开车不系安全带，吃容易导致动脉堵塞的法国菜，还吸烟，但他们从来不担心这些事，反而去担心艾滋病，这简直有点儿疯了。
>
> “艾伦，你有担心过自己会死于车祸吗？”
>
> “不，从来没有。”
>
> “担心被谋杀？”
>
> “没有。”
>
> “其实，你死于车祸或是被陌生人杀害的概率，比得艾滋病的概率要高。”
>
> “真是谢谢你了，”艾伦说，她似乎有些生气了，“我怎么那么高兴给你打电话了呢。你还真是让人安心啊，迈克尔。”[8]

10年后，艾滋病没那么陌生了，那股子歇斯底里也褪去了。但是，

后来诸如埃博拉（Ebola）、非典（SARS）和其他罕见疾病还是会触发类似的非理性反应，让数学盲的美国人寝食难安。比起在酒吧喝了几杯之后酒驾还一边打电话，反而是一种外来病更让他们担心。

还有一点，这种偏见几乎都是偏忧不偏喜。如果大家认为自己是那个特例，很少有人会把这个特例往好的方面想。如果我们买彩票，的确会有那么一瞬间幻想自己中了，但很快就会收到口袋里，然后就忘了这回事。没有人会拿着第二天要开的强力球（Powerball）号码冲进一家车行或房屋中介。

我们会沉浸在非理性恐惧中，但不会沉浸在非理性乐观中，那是因为证实性偏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生存机制。好的事情转瞬即逝，死亡却是永恒的。谁坐飞机没出事，谁一夜情后安然无恙，这些都不是你关心的，因为他们不是你。你的大脑在根据有限或错误的信息运转，发挥作用，拼尽全力降低你生命中的风险，无论多小的风险都不放过。当我们对抗证实性偏见的时候，我们在努力修正人类大脑的一种基本功能，这不是在修正漏洞，而是改变特性。

不管是致命危险还是日常困境，证实性偏见会起作用是因为人们必须依托自己已知的东西。他们不可能在大脑清零的情况下处理问题。人的大脑不是这样工作的，说得更确切一点儿，如果每天早上试着对一切问题归零思考，实在称不上是有效的方法。

科学家和研究者始终都要与证实性偏见角力，这也算是一种职业病。他们在设计实验或解答难题的时候也要先做假设，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给自己的项目加了料。就像其他人一样，他们得做出猜测，利用自己的直觉，因为如果每个实验项目都要先假设诸事无人知情且此前无事发生，会浪费大量的时间。[9]任何调查，只要仔细设计，都会遇到“做时尚未知”这个普遍问题：毕竟，若所寻之物乃未见未知之物，我们又如何得知当下求索为何物？[10]

在一开始接受培训的时候，研究员就要学习认识这种困境，但他们

并不总能战胜它。证实性偏见甚至会让最有经验的专家迷失方向。比如医生有时候会执着于某个诊断，并且怀疑患者身上已经出现一些相关症状，他们就会寻找这些症状来佐证自己的诊断，而忽略其他疾病或损伤的迹象。（美剧里一个虚构的诊断专家豪斯医生总是对自己的医学生说："绝对不是红斑狼疮。"结果有一集里，病患真的得了红斑狼疮，这位全世界最傲娇的医生一开始却没诊断出来。）虽然每个研究员都知道，"否定的结果也是一个结果"，但没有人真的愿意到最后发现自己最初的假设化为泡影。

例如，2014年一项针对公众如何看待同性婚姻的研究严重走偏，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一名研究生宣称自己找到了无懈可击的数据证明，如果反对同性婚姻的人与同性恋者讨论这个问题，他们很有可能改变观点。他的研究结论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名资深教授的背书，教授署名为共同作者。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发现，基本上足以证明，理性的人是可以接受劝服改变对同性恋的仇视。

但唯一的问题就是，这名野心勃勃的年轻研究者篡改了数据。其实，他声称自己所分析的讨论从未发生过。这项研究以外的人在审阅的时候发现端倪，并提出了警示，哥伦比亚教授撤回了文章，而那名学生，本来有着大好前途，即将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教师，最终却失业了。

教授和其他评审人员本应对这名学生严格把关，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欺诈行为？因为证实性偏见。记者玛利亚·柯尼科娃（Maria Konnikova）之后在《纽约客》的报道中说，这名学生的导师承认，他其实想去相信这个结论。他和其他学者都希望这个结果是真的，既然得出的结果是他们喜闻乐见的，其间的推导方法，他们就不太可能去质疑了。"简而言之，证实性偏见——当我们考虑社会问题的时候尤其有影响力——可能让这项研究站不住脚的地方很容易被忽略。"柯尼科娃在这个事件的述评中写道。[11] 事实上，正是因为"对这项研究的大量热情暴露了研究本身的问题"，这项研究得出了其他学者乐于见到的结

论，他们都希望以此为基础开展研究，结果当他们开始钻研细节的时候，却发现所依托的研究结果作假。

这就是为什么科学家都尽可能重复进行实验，然后才会把结果提交给其他人进行“同行评审”。同行评审这个程序要求专家的同事（同行）扮演善意但严格的魔鬼代言人，对结果吹毛求疵。通常同行评审都是“双盲评审”，也就是说研究者与评审人都不知道彼此是谁，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或机构的偏见影响评审结果。

这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程序。即使是最诚实、最有自知之明的学者或研究者也需要别人来进行真实性核查，而且核查之人必须与这个项目的结果关系不大。（你们正在读的这本书的提案就经过了同行评审：这并不是说读过的学者都同意书中的观点，而是说他们会认真考虑书中的思辨，如果有任何反驳之处或建议，都会提出来。）能担当审阅人的，通常都是高级专家，因为找到一个证据，并意识到这个证据足以挑战甚至推翻一个假设，这种能力的养成非一日之功。学者和研究者在职业生涯中都花费相当大的精力来掌握这种能力，使之成为自身的核心技能之一。

外行看不到这些互审和修正的过程，因为一切都发生在成品问世前。只有当产品出问题了，公众才会意识到这些程序的存在——而当同行互审行差踏错，那就会是可怕的错误。整个项目不仅失去了专家对质量的保障，还有可能为弄虚作假、互施恩惠、秋后算账、相互偏袒和其他一切人类容易犯下的卑劣行为大开方便之门。在同性婚姻研究的这个案例中，虽然没能及时阻止论文的最初发表，但所幸弄虚作假还是被发现，这个系统是有效的。

但是，在现代生活中，除了学术界，争论和辩论是没有外部评审的。事实来来去去，人们想记住什么就记住什么。所以，谁想进行理性辩论的话，只会被证实性偏见搞到筋疲力尽，因为这种偏见使得论据和理论不可证伪。证实性偏见的本质就是视一切反对的证据为无关紧要的，所以我的证据总是铁律，你的证据总是错误或例外。这样一来还有

什么可争辩的，因为按照定义来看，这一套解释永远不会错。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多数外行从来没有学过或者已然忘记了“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科学方法的步骤就是从一个笼统的问题推导出一个假设，然后进行检验和分析。虽然人们习惯使用“证据”这个词，但他们使用得太过随意，对他们来说，“证据”就是“我认为的事实”，而不是“根据达成一致的规则对其事实性进行检验后确认的东西”。

此时此刻，外行可能会提出反驳说，这都是知识分子的噱头。普通人为什么需要这种学者型的自省？很多东西都是常识，这还不够吗？

大多数时候，普通人的确不需要这种学者模式。在日常事务中，常识已经够了，而且往往比不必要的复杂解释更好用。比如，我们不需要知道一辆汽车在暴风雨中开到什么时速轮胎就会打滑。一定是有一个数学公式可以计算出精确的答案，但凭着常识，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公式就知道天气差的时候要减速，这样就足够了。

但是，如果要解开更复杂的问题，常识就不够了。因果关系、证据属性和统计频率错综复杂，远非常识可以处理的。很多最棘手的研究问题通常都会得出违反直觉的答案，这一点就决定了常识无济于事。（说到底，古时候，简单的观察告诉人们，太阳绕着地球转，而不是地球绕着太阳转。）像常识这样的简单工具会误导我们，让我们被大错小错带偏，这就是为什么外行和专家在迷信和民间智慧这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也会势不两立，各执己见。

民间传说、迷信和阴谋论

“民间传说”和其他迷信是证实性偏见和不可证伪论据的典型例子。很多迷信多少都建立在生活阅历基础上。比如，不能走在梯子下是一种迷信的说法，但走在梯子下面的确是危险的。惹恼一个油漆工是不是会一整天都不走运，这是另一回事，但走在他的梯子下面，就是很蠢的行为。

迷信尤其倾向证实性偏见。迷信能够流传下来，就是因为常识和证实性偏见有时候是相辅相成的。黑猫代表不幸？猫，无论黑猫还是什么猫，天性就喜欢待在人的脚下，但我们可能只记住了绊倒自己的黑猫。我家里就有一只叫卡拉（Carla）的可爱的黑猫，我可以肯定的是，它有时候就会在我上楼梯的路上碍事。一个迷信的人这时候可能就会会心地点点头。事实上，卡拉是家里唯一的猫，当然，别的主人家是否被斑猫绊倒过，可能对迷信之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最极端的证实性偏见其实不在民间传说和无知迷信里，而是在阴谋论里，相信阴谋论的往往是一些教育程度或知识水平更高的人。迷信的内容很简单，而阴谋论就极为庞杂。说实话，构想一个有趣的阴谋论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这个人一定是相当聪明的，因为阴谋论的确是一套高度复杂的解释。无论是相信阴谋论还是反驳阴谋论，都是对智商的一项挑战。要驳倒迷信一般都很容易，任何一个统计学家都能证实，我的猫和其他花色的猫在楼梯上的危险系数是差不多的。所以，在内心深处我们都知道，迷信最多不过是一个无害的习惯。

相对来说，阴谋论令人沮丧恰恰就是因为其复杂性。每一个反驳都只会触发一个更复杂的理论。阴谋论者操纵一切存在的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解释，但更糟糕的是，他们会把没有证据当作更有力的佐证。在这个

世界上，完全无迹可寻，才最能说明阴谋论的成立。有证据，没证据，相互矛盾的证据，一起都是佐证。这种潜在的想法无人能敌。

这种过分复杂化的解释违反了著名的“奥卡姆剃刀”原理。“奥卡姆剃刀”原理是以一个中世纪修士的名字命名的，他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概念：看到一个现象，我们应该先选择最简单的解释。除非必要，我们才逐层递加到更复杂的解释。这也被称为“简约律”，意思就是说，逻辑层次最简洁或假设最少的解释最有可能是正确的。

比如，想象一下，如果我们听到声响，接着听到隔壁有人大声骂脏话。我们跑到隔壁房间，看到一个男人，孤身一人，抓住自己的脚，表情痛苦，在房间里跳来跳去。地上有一个空的啤酒箱，啤酒瓶碎了一地。发生了什么？

我们大部分人都会得出一个简单的解释：这个男人手中的啤酒箱掉到地上，砸到他的脚，他喊了句脏话。我们听过摔碎东西的声音，也见过有人受伤的时候会骂骂咧咧。我们也清楚一个人痛苦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很明显这家伙受伤了。我们不需要做太多假设就能得出这样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个解释可能不全面，但鉴于现有的证据，却是个合理的第一反应。

但是，等一下。也许这个男人是个酒鬼，他骂脏话是因为箱子掉地上了，啤酒全洒了，他很生气。又或者，他是个戒酒主义者，他故意把啤酒摔到地上，诅咒酒是邪恶的存在。又或者，他抓着自己的脚跳来跳去是因为他来自加拿大北极地区，那里有一种鲜为人知的文化：因为人们的脸通常都埋在带兜帽的风雪大衣里，所以他们就用抓住脚跳来跳去表达悲伤（或开心或愤怒）。又或者，他是一个外国人，不懂英语，还以为他说的那些难听的盎格鲁——撒克逊单词是表示“救命啊，我不小心把一箱啤酒砸到脚上了”。

这时候简约律就该登场了。任何一种古怪且可能性极低的情况都可以是真的，但是，如果明明有更直接有用的解释摆在面前，我们还舍近求远，跳到一个极为复杂的理论，那就很愚蠢了。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

是禁酒主义者还是个醉汉，他是来自加拿大还是克利夫兰（Cleveland），也不知道他的母语是不是英语。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些调查，看看上述情况哪些是真的，但无论是从哪一种假设出发，都是违反逻辑和人类经验的。

既然阴谋论如此复杂和愚蠢，为什么在很多社会中都大有市场呢？我还想说明一点，阴谋论其实很受欢迎，而且长达几个世纪。现代美国也不例外。比如在20世纪70年代，小说家罗伯特·陆德伦（Robert Ludlum）就是这方面的佼佼者，他在一系列广受欢迎的小说中炮制了阴谋论，其中有一部小说里的人物是刺杀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几名政治杀手。（但是等一下，你会说：富兰克林·罗斯福不是被暗杀的。没错。）陆德伦的书卖了几百万册，他还虚构了一个超级杀手杰森·伯恩（Jason Bourne），杰森·伯恩是21世纪一系列卖座电影的主角。从20世纪60年代的《谍网迷魂》（*The Manchurian Candidate*）到30年后的《X档案》（*The X file*），这一类书、电影和电视剧的粉丝千千万万。

在现代美国政治中，阴谋论俯拾皆是。奥巴马总统在非洲出生，是一个隐藏的穆斯林。布什总统是炮制“9·11”恐怖袭击阴谋的一分子。英国女王是个毒贩子。美国政府通过喷气式飞机的排气口在空气中喷洒控制意志的药物。犹太人控制一切——沙特和瑞士银行家控制一切的那段时间除外。

一部好的阴谋论惊悚小说受人喜爱，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迎合了我们的英雄主义情怀。英勇的个人遇上一个大阴谋，不惜与强大势力对抗，拯救普通人，这与很多古老的英雄传说如出一辙。一个智勇双全的非科班人士（这里与专家和精英相对）能够与整个政府甚至更庞大的组织较量，并最终获胜，这个思路尤其对美国人的口味。英国作家伊恩·弗莱明（Ian Fleming）的小说要搬上好莱坞的大银幕给美国观众看的时候，他意识到需要给小说主人公安排一个强大的敌人，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才遭遇了邪恶组织幽灵党（SPECTRE）的超级阴谋。

但是，阴谋论之所以和专家之死有重要的联系，是因为阴谋论对这

样一群人有很深的吸引力：他们很难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又没耐心去听一些平淡的解释。阴谋论还迎合了一些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如果自身的境况令他们百思不得其解，或者就算问题有了结论，以他们的智商也理解不了，又或者一切都是他们自己的错，那他们宁愿去相信一些绕来绕去的废话，也不肯接受这些现实。

如果有些事件让人们感到害怕，阴谋论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解释事件的方向。为什么无辜的人会遭遇可怕的事情？如果没有一个条分缕析的解释，他们就不得不接受这些都是随机事件，是冷漠宇宙或高深莫测的神伸出的残忍之手。这是痛苦的选择，即便只是想到这些，也可能会诱发出某种生存绝望。19世纪经典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The Brothers Karamazovz*）中的一个人物就被生存绝望逼到说出一番关于悲剧的名言："如果真相的代价是无尽的苦难折磨，连孩子都不放过，那我断言，真相不值得这样的付出。"

要想摆脱这种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去想象这样一个世界：我们的问题都是权贵阶层造成的，他们本来有能力避免这些悲剧。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你深爱的人得了不治之症，不是一个自然事件，而是企业或政府的不轨行为造成的。一个名人的可怕行径被揭露，也不能证明我们所敬爱的这个人就是恶魔，这是一桩阴谋，目的就是抹黑这个人。就连我们喜欢的体育队输了也可能是个局。［"我不想看到布法罗比尔队（Buffalo Bill）赢得超级碗（Super Bowl）比赛，"《X档案》1996年的一集剧情里，头号大反派说，"只要我还活着，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不管怎么说，一定要有人为此负责任，因为如若不然，我们就只能怪上帝，怪造化弄人，或者怪我们自己。

个人在陷入悲伤和困顿的时候，即便没有原因，也还是想要找寻原因，整个社会也是如此，当社会集体遭受了可怕的经历，就会偏向一些稀奇古怪的理论。正如加拿大作家乔纳森·凯（Jonathan Kay）所说的，"当任何一个社会集体承受了无法估量的创伤"，这些古怪理论背后的阴谋论和破绽百出的推理就变得格外有吸引力，"创伤之后，数百万

人就会想方设法去寻找一个古老问题的答案：为什么好人不得好报”[12]。这就是为什么“二战”之后，阴谋论激增，诸如俄国革命、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遇刺、2001年的“9·11”恐袭和其他历史事件。

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阴谋论的对象大多是战争的后果与高速工业化的出现，现如今，满篇几乎都是全球化造成的经济和社会紊乱。内容变了，阴谋论不变。这对专家与大众的交流造成了不小的障碍，比如，将近30%的美国人认为“有一个神秘的精英利用全球化议题密谋最终统治世界”，还有15%的美国人认为媒体和政府在电视广播中秘密添加了一种“洗脑”技术。（还有15%的人对电视问题半信半疑。）还有大约一半受访者认为，至少英国戴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na）很有可能是被阴谋杀害的。“看到这样的比例，”正如凯所指出的，“我们不能说阴谋论的想法只是一种边缘现象，或者认为其对公民和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这种说法合情合理。

阴谋论不是无害的。最糟糕的情况下，阴谋论会制造道德恐慌，让无辜的人受伤。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很多父母相信孩子的日托中心在推行邪恶的性崇拜，顿时一股歇斯底里的情绪席卷美国。假“专家”还煽风点火，做出相应解读，学步儿童说话不清楚的，就被说成受到了最怪异的虐待。毋庸置疑，虐待儿童的确存在，但这样一个不切实际的浮夸理论，可能因为恰好反映了上班族父母的担忧和愧疚，就迷惑了美国人的心智，对许许多多的生命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也在短时间内让人们一叶障目，没能寻找更好的策略，来解决这个虽真实存在但远没有那么可怕的问题。[13]

要应对证实性偏见很难，要解决阴谋论根本就不可能。如果有人相信石油公司在打压一种以海藻做燃料的新型汽车，这个人一定不会对你的新普锐斯（Prius）或沃尔特（Volt）另眼相看。（这是工业巨头允许你拥有的节能汽车。）如果有人相信51区（Area 51）[14]里藏着外星人躯体，那他们即使参观了基地也一定不会改变想法。（“你看，外星人

研究实验室在地下。”）

和阴谋论者争辩到底，不仅无果，有时候还很危险，所以我不建议这么做。就算你费劲唇舌，还是要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废话，就连最锲而不舍的老师恐怕也只能败下阵来。这种理论是针对专家的最终堡垒，因为任何一个专家只要上来反驳，事实上就等同于参与了阴谋。作家杰夫·劳恩纳（Jef Rouner）曾经这样写道：

> 你得记住，那些打算拜入阴谋论门下的人，已经开始担心有庞大强势的力量恶意结盟，意图损害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生活领域。任何对威胁的否认，只会助长威胁的力量，因为这样一来，邪恶势力就能暗中发展，不为人察觉。[15]

谁也不想在对话中被人这样指摘。

所幸，这种大规模非理性案例还是屈指可数的。相比之下，拒绝接受专家意见就显得平淡多了，但也更为普遍，究其原因，其实如出一辙，都是因为平民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比大众更聪明、受过更高教育的人心生怀疑。这种现象的伤害值可能小一些，却是切实存在的，有时候还是代价高昂的。

刻板印象与一概而论

“你不能那样一概而论！”当话不投机，甚至只是稍有争议，大概出现频率最高的就是这句话了。人们拒绝一概而论——男孩子一般会这样，女孩子一般会那样，因为我们都希望自己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不能接受这样被轻易归类。

但是，人们反对“一概而论”的时候，其实大多数人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应该概括，而是不应该有刻板印象，这两者有云泥之别。在日常对话中出现的问题是，人们往往不懂刻板印象与概括的区别，这就使得对话，尤其是专家与外行之间的对话变得费劲伤神。（当然，我这样说其实也算一概而论。但希望你们能容忍我。）

这里面的区别大有文章。刻板印象是一个社会陋习，但概括却是任一科学的立身之本。概括是基于概率、基于观察事实的陈述。另外，概括本身算不上一种解释，这是概括与刻板印象的另一大区别。概括的陈述是可以测量和验证的。有时候概括还会引导我们去假设因果关系，有些时候，如果观察充分，我们有可能会创造出一种理论或法则，这种理论和法则在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总是正确的。

例如，你如果说“中国人通常比美国人矮”，这就是一种概括。这句话有可能对也有可能错。如果有人误把这句话当作刻板印象，就会立刻去找例外的情况，对话很快就要变成唇枪舌剑了：“我认为中国人一般比美国人矮。”“你不能这么一概而论！中国篮球运动员姚明身高七英尺半（2.26米）！”

有一个格外高的中国篮球运动员证明不了什么。我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去美国和中国，量一量人们的身高，看看我们的假设是不是

对的。如果中国人总体上的确比美国人矮，那只能说已经有足够概率证明我们所注意到的现象，所以我们做出这样的概括不会错，但这不是一条永远正确的法则。

真正艰巨的工作在概括之后。为什么美国人比中国人高？是基因造成的吗？是饮食不同造成的吗？还是环境造成的？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答案，但无论答案是什么，也无论你能找到多少姚明这样的特例，我们说美国人一般比中国人高，这句话不会错。

但是，如果说所有中国人都矮，这就是一种刻板印象了。刻板印象的关键在于其对事实检验的结果无动于衷。刻板印象不受任何现实的干扰，而且能巧妙利用证实性偏见把一切特例变成无关紧要的东西。（种族主义者已经把这个争辩模式发挥得炉火纯青："罗马尼亚人都是贼，除了与我共事的这位女士，但她不一样。"）刻板印象不是一种预测，而是一种结论。所以我们把刻板印象称作"偏见"：预先所做的片面见解。

如果我们概括的内容是负面的，或者是基于一个值得商榷的标准，争论就会出现。关于身高的概括是不会引起争论的，身高很容易以我们都能接受的方式进行测量。我们也不会把任何道德或政治特征归咎于身高。在1939年的小说《夜长梦多》（*The Big Sleep*）中，一个蛇蝎美女对文学侦探菲利普·马洛（Philip Marlowe）说："你很高，不是吗？"马洛回答说："我不是有意的。"这个回答很风趣，因为我们知道，高矮不是我们能控制的，我们也无须为此道歉。

但是，负面的概括会引发愤怒，尤其是当这个概括是建立在有争议的概念之上。例如，说"俄罗斯人比挪威人腐败"是对的，但前提是我们对"腐败"有一个共同的定义。按照西方的定义，俄罗斯被腐败拖累，但有一句话叫"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以此来反驳这个概括也是很在理的。所以，如果你的概括是要为将来的研究打基础，那一定要深思熟虑、字斟句酌。"相比挪威官员，俄罗斯官员在办理政府事务的时候，更愿意打破成文规定"和泛泛地说"俄罗斯人比挪威人更腐败"，截然不

同。

如果我们在措辞的时候更加严谨，最终的表达就不会那么令人激愤，也会明显更准确。但是，我们还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大体上是对的。我们只知道，如果我们一贯采取相同的标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观察相同职位的俄罗斯人和挪威人处理相同的交易，而且重复观察足够多的次数，我们会把事情搞得更准确。可能是俄罗斯的法律已经过时了，即使是最廉洁正直的官员也难照章办事。（这样说可能有点儿牵强，但的确有那么回事，现在的俄罗斯人经常拿这一点来辩解。）这里就需要更多的研究了：先确定“是什么”，再确定“为什么”。

当然，在日常对话中，这些都不太重要。如果要追求精准，这样说没错，但问题是，谁想去听这些话呢？如果没有上下文，这些话反而让人容易动气。普通人之间的对话，普通人与专家之间的对话，之所以很难开展，就是因为人会带入情绪，尤其是当讨论的内容大体上是对的，但可能不适用于某一个案例或情况的时候。

所以专家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要能平心静气，即使遇到最有争议的问题，也保持淡定。从癌症到核战争，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专家都必须能冷眼旁观，然后用超然、客观的态度去解决。与这些话题保持距离感，才能进行自由辩论，并且考虑各种替代方案，这样才能不被恐惧这样的情绪所控制而产生偏见。这样的要求高得离谱，但如若不然，对话起来不只费劲，有时候争吵可能会一触即发。

我好，你也好——差不多就这个意思

还有一些社会和心理现实成了我们交流的绊脚石。不管证实性偏见或达克效应的强大影响力让我们饱受多少煎熬，我们都不喜欢告诉别人，我们知道或在乎他们错了。（至少不会当面说。）同样，也许我们很享受自己是对的那种感觉，但是我们有时候并不愿意去提自己的专业性辩护。而且，错也好，对也罢，有些信息就是奠定了我们的政治和社会信仰，但总体而言，我们还是很难撇开自我印象和自我认知来处理这些信息。

例如，2014年的一项国际研究得出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人们会不遗余力地去寻求一种公平感，对所有观点平等视之，即便参与对话的人知道他们彼此能力相差悬殊，也是如此。这项研究的作者（包括中国人、伊朗人和丹麦人）认为，这是我们融入血液里的一种“平等偏见”，因为人类有被集体接纳的需求。当两个人反复进行讨论和决策——这项研究的关键是要在参与者之间建立起联系——研究者发现，能力差一些的人会比预期的更加倡导自己的观点，而能力强一些的人会听从前者的意见，即使这些意见明显是错的。[16]

起初，这听起来不过是一方的礼貌和另一方渴望被接受。大家都希望维护彼此的关系，谁也不想冒险破坏这段关系。能力差一些的人总想被认可，不想被认为是错的或无知，以此来获得尊重和参与感。能力强一些的人不想因为自己总是对的而让场面尴尬，彼此心生嫌隙。

这可能是一个和颜悦色的下午，但却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决策方式。正如《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科学版撰稿人克里斯·穆尼（Chris Mooney）指出的那样，这种社会动态也许会加速人际关系的车轮，但当事实至关重要的时候，其损害也是真切的。他写道，这项研究

凸显出“我们需要更加认可专家，尊重他们，听从他们。但也显示出社会群体的发展是如何把我们牢牢捆绑在一起，强化了集体准则，但是，当我们需要认识并接受一些让人不悦又难以忽视的真相时，发展的脚步又乱了套”。[17]

人们为什么就是不能接受彼此在学识和能力上的差距呢？这个问题有点儿不讲理了。这就等于在问“为什么人们就是不能接受别人比自己聪明呢？”（或者反过来问“聪明的人为什么就不能解释一下别人比自己笨的原因呢？”）现实就是，无论聪明还是笨，我们都被社交不安全感禁锢住了。我们都想被别人喜欢。

同样，我们也不愿意承认自己在一段对话中摸不着头脑，尤其是现在，获取信息如此便捷。在社会压力的裹挟下，就连聪慧机敏、见多识广的人也萌生念头想要假装更有学识，这个念头在信息时代被放大。小说家和撰稿人卡尔·塔罗·格林菲尔德（Karl Taro Greenfeld）就苦思冥想过人们为什么试图“假装有文化”，他这样描述这种焦虑：

> 我们现在总感觉有一股压力在，一定要懂得足够多，唯恐被人识破自己是文盲。这样一来，我们才能在电梯游说、商业会议、办公室茶水间和鸡尾酒会上挺过来，这样我们才能写博客、发推特、聊天、评论和发信息，并且表现得好像我们真的见过、读过、看过、听过一样。在这样一个被海量数据淹没的时代，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不是咀嚼过原始的内容，而是知道这个内容的存在，并且有一个立场，能够参与相关的谈话。我们正在危险地滑向一种无知浅薄的新形态——把东拼西凑的见闻包装成博学。[18]

人们扫一眼标题或文章，就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但他们并没有细读。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因为人们希望自己在别人眼里是聪慧的、有见识的，所以他们不遗余力地去伪装。

但似乎这样的挑战还不够大，政治因素的介入让事情变得更加错综

复杂。普通人和专家的政治信仰发挥的作用与证实性偏见一样，区别在于，关于政治和其他主观问题的信仰更难撼动，因为我们的政治观点植根于自我印象，以及我们最珍视的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

柯尼科娃在复盘同性婚姻研究学术造假的时候写道，当引发证实性偏见的问题与“自我认知”息息相关，就更容易造成“根深蒂固的错误信仰”。这样的观点不容反驳，而且我们会无原则地为之辩护，就像邓宁所说：

> 我们的一些最固执的错误信仰不是来自原始天真的直觉或粗心大意的错误，反而恰恰是塑造我们个性本色的价值观和哲学观。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基础信仰——对自己的判词，关于社会秩序的想法——根本不可侵犯：否定这些就是在怀疑自我价值。就这一点而言，其他观点都要服从这些信仰。

换句话说，这些信仰是风向标，对我们如何看待自己做人做事有指向意义。如果我们认错了刚刚在后院看到的鸟类品种，或者搞错了第一个环行世界的人，我们可以接受。但如果有人指出我们搞错的概念和事实对我们的生活方式举足轻重，我们是无法容忍的。

就拿一个相当普通的美国餐桌辩论话题——失业原因——来举例子。几乎任何一群普通人，只要一碰到失业问题，什么样的智识问题都会冒出来。成见、证实性偏见、半真半假的话、不谙统计学，都会出来骚扰这场对话。

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坚定相信失业的人都是因为懒惰，而失业救济更加助长了这个风气。其实很多美国人都是这样想的。就像很多证实性偏见的例子一样，这种想法可能也是源自个人经历。或许这是因为一生都没有失业过，也有可能是刚好认识一个人真的逃避工作。每一个“招工”的牌子——这就为证实性偏见提供了弹药——都是失业即懒惰的进一步佐证。一页招聘广告，或者一个不负责任、积习难改的外甥，

都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说明失业是个人的失败，而不是一个需要政府介入的问题。

现在，再想象一下，如果餐桌上有一个人认为是美国经济的性质迫使人们失业的。这个人可能也会拿个人经历说事：他或她可能认识一个人，这个人搬到另一个地方去创业，结果破产了，还远离家乡，或者有一个人被腐败或渎职的上司非法解雇了。每一个裁员的公司，每一个带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的老板，每一家破产的公司，都证明了这个体制对那些绝对不会主动选择失业的无辜百姓不利。失业救济，没有助长懒惰之风，而是一棵救命稻草，或许是一个老实人被彻底击垮前的最后一线生机。

当然，真正讲道理的人会讨论这两个观点在多大程度上是对的，但这两个人——我承认，我在这里有意使用了夸张的手法——不会这么做。失业救济的确会打消一些人工作的念头，这一点无可辩驳；还有一点不可否认的就是一些企业的确沿袭了冷酷无情的传统，会牺牲自己的员工，那些被裁的员工不得不暂时依赖救济。这场对话可以无限制循环，因为工作勤勉派和好心办坏事派都能举出各种例子，当然这些例子都是经过他们的证实性偏见小心筛选后的，虽然是真的，但说明不了什么。

这样的争论没有赢家，因为最终没有一个答案会让所有人满意。普通人希望听到专家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但这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而是有很多答案，视情况而定。什么情况下救济会助长懒惰？人们多久会不得以失业一次？持续多久？这些只是大问题的小细节，一旦问题涉及自我印象，细节是派不上用场的。大多数人看不到自己的偏见，他们不会接受与自己先入为主的观点相斥的答案，所以只会让对方更疯狂地争辩。通过观察，社会心理学家乔纳森·海德特（Jonathan Haidt）简洁地总结道，当事实与我们的价值观冲突时，“几乎每一个人都会设法坚持自己的价值观，否认证据”[19]。

这种倾向很强烈，以至于很多人，无论政治信仰如何，宁愿杀死信

使也不愿意听自己不喜欢的话。2015年的一项研究测试了自由派和保守派对某些新闻故事的反应，研究发现“保守派会贬低违背自己世界观的科学理论，自由派也是这样”[20]。更让人忧心忡忡的是，研究发现，如果某项科学研究挑战了他们的世界观，那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第一反应不是去怀疑自己，而是怀疑科学。“人们对科学的感觉，光是在读到那些两极分化的话题时，”其中一位作者提到，“就已经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所以，我们在书的后面会看到，要想解决政策选择方面的争论，唯一的办法就是他们从研究领域搬到政治和民主选择的舞台上。如果民主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让专家和平民共同解决复杂的问题。不过，首先他们要克服彼此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提高教育水平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但在下一章，我们会看到，教育，至少大学这个层次的教育反而是造成问题的一个原因。

---

[1] 参见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2014。

[2] 达克效应，是一种认知偏差现象，指的是能力欠缺的人在自己欠考虑的决定的基础上得出错误结论，但是无法正确认识到自身的不足，辨别错误行为。这些能力欠缺者沉浸在自我营造的虚幻的优势之中，常常高估自己的能力水平，却无法客观评价他人的能力。——译者注

[3] Justin Kruger and David Dunning, “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 How difficulties in Recognizing One’s Own Incompetence Lead to Inflated Self-Assessmen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7(6), December 1999, 1121-1122.

[4]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5] “吉米鸡毛秀”，又名“吉米·坎摩尔现场”，是吉米·坎摩尔在ABC（美国广播公司）主持的深夜脱口秀节目。——译者注

[6] 古代欧洲使用的拉丁语中有一个sinister的单词，这个单词包含两个意思，其一是“邪恶的”，其二就是“左”。——译者注

[7] John Allen Paulos, *Innumeracy: Mathematical Illiteracy and Its Consequences*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1), 9.

[8] Michael Crichton, “Panic in the Sheets,” *Playboy*, December 1991; archived at MichaelCrichton.com.

[9]　统计学中有一个分支学科——贝叶斯统计分析（因18世纪英国数学家托马斯·贝叶斯而得名的）专门处理这一问题。

[10] Social scientists, no less than any other, are aware of this problem. See Charles O. Jones,“Doing before Knowing: Concept Development in Political Research,” *American Journalof Political Science* 18(1), February 1974.

[11] Maria Konnikova, “How a Gay-Marriage Study Went Wrong,” *New Yorker* online, May 22.2015.

[12] Jonathan Kay, “Has Internet-Fueled Conspiracy Mongering Crested?” in Mark Bauerline and Adam Bellow, e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Templeton, 2015), 138-139.

[13] 事实上，学者罗斯·E.凯特（Ross E. Cheit）曾经说过，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处理不善的问题造成了悲剧性的反弹，由于公众摇摆不定，一会儿相信小孩子受到虐待，一会儿又高度怀疑任何虐待的指控。但是，人们终究还是相信这股邪恶势力的存在，歇斯底里的狂潮席卷美国，后来学者和执法机构的调查研究没有找到证据，证明在日托中心或其他地方有这种网络存在。见Ross E Cheit, *The Witch Hunt Narrativ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4]　51区，指的是两个位于美国内华达州南部林肯郡的一个区域，距离拉斯维加斯市中心西北方130公里（37°14′06″N　115°48′40″W），有一个空军基地在此，此区被认为是美国用来秘密进行新的空军飞行器的开发和测试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因为许多人相信它与众多的不明飞行物阴谋论有关而闻名。——译者注

[15] Jef Rounder, “Guide to Arguing with a Snopes-Denier,” *Houston Press*, April 2, 2014.

[16] Ali Mahmoodi et al., “Equality Bias Impairs Collective Decision-Making across Culture,”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March 24, 2015.

[17] Chris Mooney, “The Science of Protecting People’s Feelings: Why We Pretend All Opinions Are Equal,”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rch 10, 2015.

[18] Karl Taro Greenfield, “Faking Cultural Literacy” ,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24, 2014.

[19] Quoted in Chris Mooney, “Liberals Deny Science, Too.”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28, 2014.

[20]　其中一个区别就是，保守派对那些与之信仰相冲突的数据反应更为强烈，但研究者认为，这是因为“对保守派构成挑战的问题在当下社会更两极分化。”作者在俄亥俄州立大学（Ohio State University）的一篇题为“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会对科学有偏见”（Both Liberals, Conservatives Can Have Science Bias）的新闻稿中写下了以上这些话。新闻稿发于2015年2月9日。

第三章

高等教育：顾客永远是对的

受上天眷顾已兼具天赋与美德的人，应当接受相称的自由教育，并且有能力捍卫同胞们神圣的权利和自由。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布拉多克先生（Mr. Braddock）：你能跟我说说你这四年大学是为了什么？那么努力学习的意义是什么？

本杰明：你问住我了。

——《毕业生》（Graduate）

美妙的七年

高等教育本应纠正我们的一个错误观念，即认为大家都是一样聪明的。可惜，21世纪高等教育的普及却适得其反：许许多多上过大学或几乎同等学力的人都认为自己与最有成就的学者和专家受到同等教育。大学不再是一段专注于学习和个人成长的时光，年轻的美国人潮水般涌入大学，随之而来的是大学争夺他们的学费，这就造就了一种顾客至上的氛围，学生从中最大的收获竟然是：顾客永远是对的。

“二战”之前，大多数人没有读完高中，很少有人能上大学。在那段时期，尽管一些年轻男性和极少数女性也能攒够学费或争取到奖学金，但顶级学校的大门主要还是为出身上流社会的人打开的。上大学是少数人享有的，起决定性作用的不仅有社会阶级，也有成绩，而且重要性不相上下。还有，能进入大学代表有潜力，大学毕业代表了一项成就。大学文凭是凤毛麟角的，就像一个指示牌，把专家和有学问的人与社会上其他人区分开。

现如今，上大学是很普遍的事情。高等教育的普及，让“大学”这个词失去了本来的意义，至少不能区分开有没有受教育。“大学毕业生”在今天代表了很多意思，可惜，“一个明显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在其中。

抨击大学是美国的一项传统，抨击和我一样在大学教书的教员也是一项传统。各种成见比比皆是，比如古板的（或者激进的/滥竽充数的）教授在学生面前讲课，学生都听得百无聊赖了，这些孩子来学校有很多目的，但除了接受教育。“大学小子”曾经是一些长者一针见血讽刺年轻人的话，意思就是教育替代不了成熟和智慧。

但是本书并不会去讨论为什么大学变成这个样子。我没有足够的篇

幅。我想讨论的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不尊重学识和专业知识，而本章要讨论的是一个看似很矛盾的问题：本应是解决之道的大学怎么就成了问题本身呢？

我这么说的时候，仍然是美国大学系统的捍卫者，包括饱受指摘的人文学科。我个人就受益于20世纪普及高等教育及其带来的社会流动性。美国大学机构的成就还是无可辩驳的：美国大学仍然是世界顶尖的教育机构。我仍然坚信美国的高等学府能够出产知识，输送有识之士。

然而，不得不承认，美国很多高等学府没能传授给学生专业里的基本知识和技能。更重要的一点，走出校门的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却识别不出专业知识，无法与专家及其他职业人士进行有效的沟通。在诸多心智能力中，最重要的一项，也是美国大学最受人诟病的一项，就是批判性思维：一种冷静评估新的信息和对立的思想的能力。

这是因为上大学不再能保障“大学教育”了。现在，大学只是提供了一种“上大学”的全方位体验。这完全是两码事，现在的毕业生都自以为懂得很多，其实不然。现在，当一个专家说“嗯，我上过大学”，你也不能怪公众会说“谁不是呢？”有大学学历的美国人现在广泛认为自己“受过教育”，而事实上很多人只能说是在高中之后延续了一种课堂体验，至于结果，因人而异，各色各样。

大量学生涌入美国的大学，让教育变得日益商品化。当今的大学不再把学生当作学生对待，而是给予客户的待遇。甫出高中校门的年轻人，尚未养成自律这个在追求高等教育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习惯，到了大学，受到物质和理智上的双重诱惑，学习上的一些坏毛病不断强化。现在的大学倒像是一个多年假期套餐的商品，而不是与教育机构和教职员签订的一场求索知识教育的契约。大学教育的商品化，不仅严重破坏了学历的价值，也摧毁了大学在普通美国人心中的意义。

校园里时不时会冒出来一些诸如作秀、随波逐流、智商堪忧的问题，引人浮想联翩，但相比起来，商品化是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大学生活总免不了一些傻里傻气的成分。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教授

丹·德雷兹内（Dan Drezner）曾经写道：“大学的目标之一就是用愚蠢的方式阐述愚蠢的观点，然后通过与同学和教授的互动，知道自己有多蠢。”[1]大学生活，尤其是在最精英的学校里，是与社会隔绝的，当年轻人和知识分子生活在象牙塔里，奇怪的事情就会发生。

有一些只是高价买来的无知浅薄，本身无害。例如布朗大学的学生家长会花一大笔钱让孩子参加像“校园裸露周”（Campus Nudity Week）这样的活动。（一个布朗大学的女生参加过这个活动，在2013年说关于这个活动的“负面反馈”“让她为毕业后的生活做好了准备”。但愿如此吧。）不过，我也不是那么担心普罗维登斯大街上有学生裸奔。大学让我忧心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如何加速了专家之死，更多在于课堂里发生的事情，或者应发生而未发生的事情。

在最好的情况下，学校应该有志于培养学生的专业知识背景，培养他们终身学习的意愿，让学生成长为有才干的公民。然而，用加州一个著名的“派对学校”毕业生的话说，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学已经变成了“高中和在仓库的第一份工作之间的美妙七年”。大学不再是一条通往智识成熟的道路，而仅仅是推迟步入社会的缓兵之计，不光是学生，有时候对教职员的意义也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部分原因在于学生太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学生其实并不适合上大学。美国新的教育文化就是人人都应该并且必须上大学。这种文化上的转向对专家之死很重要，为了符合要求，学科专业激增，学校成了文凭工厂，这些文凭最多只能说明你接受了培训，而非教育，教育和培训是两个迥然不同的概念，但在公众眼里，已经越来越重叠了。最糟糕的情况就是，文凭既不能证明你接受了教育，也不能证明你接受了培训，最多就是出席。最不堪设想的情况就是文凭只能证明你按时支付了学费。

这是很多教授出于礼貌不会说的话，但却是事实。有的年轻人适合做生意，却跑去读了大学，也没多想怎么毕业，或者毕业之后该干什么。四年变成五年，五年变成六年，甚至更久。有限的学习过程最终变

成了重复吃昂贵的教育自助餐，提供的大多是垃圾知识菜品，在缺乏成人监督的情况下，学生难保不会去选一些无用之菜，却对营养料理不闻不问。

最有竞争力的精英院校在这方面不那么令人担忧，因为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挑选学生，把他们的课堂里塞满出类拔萃的学生。这些学生会得到全面或近乎全面的教育，通常也能在毕业后找到一份回报丰厚的工作。但是，其他的教育机构就陷入逐底竞争的局面了。不管学校怎么样，这些孩子总还是要上大学的，所以那些无法在教育质量上异军突起的学校，只好另辟蹊径，在餐饮上提供更好的比萨饼，豪华的宿舍，更多的活动，让饱受上课折磨的学生多点儿欢乐。

多的不只有学生，还有教授。最好的州立大学，过去是培养大学教职员的基地，现在输送了一大批水平参差不齐的博士，远超学术就业市场的饱和度。无权授予高级学位的院校是越来越少，其中有很多其本科学历的含金量只能算是拔高的高中学历，就这样的学校还培养博士，质量之低，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意雇用本校毕业生。找不到工作的博士如过江之鲫，揣着质量平平的论文，研究的课题还不是一般的深奥难懂，游荡在学术圈子里，不夸张地说，他们教书就是为了混口饭吃。

就连“教授”这个词也因为滥用而变味，失去了原有的分量。过去教授是个稀有的称谓，现在美国高校随意使用。只要是在高中以上的教育机构，无论教什么都算个教授，上至重要研究型大学最好院系的系主任，下至社区学院的兼职老师。每个老师都是“教授”，同样，每个小学院现在也都是“大学”，这种现象已经到了荒谬的地步。一些小规模地方院校，过去就是为了照顾本地区的居民而存在，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大学”，就好像现在它们的食堂后面真有粒子对撞机一样。

这些高仿大学的出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迎合了当下的文凭文化：人人都认为自己应该上大学，对文凭的需求成了无底洞。这样一来就制造了文凭膨胀的旋涡。院校制造文凭膨胀和政府制造通货膨胀的方式如出一辙：拼命印文凭和拼命印钱。过去，一纸高中毕业证书是进

入职业技术学校或从事某一职业的必需品。但现在人人都有高中毕业证书，其中有些人甚至都不识字。结果，高校的作用就是检验一个人是不是读完了高中，而本科学历对毕业生的要求，就由硕士学历来填补。在这样一个追逐学历的仓鼠转轮里，学生被榨干了钱，却没学到多少东西。[2]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对美国教育未来的发展至关重要。2016年，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说，今天的大学文凭含金量就相当于50年前的高中毕业证书，所以，人人都应该上大学，这就像上高中一样，再普遍不过了。事实上，高中不足，大学来补，这种念头是我们沦落至今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更重要的原因是太多“学生”、太多“教授”、太多“大学”和太多“学历”的叠加效应，上了大学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

高校耗费几个世纪创造出来并传授给一代又一代学子的知识，现在却饱受攻击，而且现代大学的失败更是授人以柄，让攻击的炮火变得更加猛烈。知识自律和成熟的进程被打断，不得不半途而废。传授重要的文化学习理念——从搭建逻辑论证思路到美国文明的根本基因——已不再是客户至上型大学的使命了。

欢迎光临

大学生活本不应该是一段舒适的经历。大学生要抛弃孩提时代死记硬背的学习方式，开始吸收更高深的知识，幸运的话，可能受用一生，所以其复杂性可想而知，他们就要接受由此带来的焦虑、不适和挑战。一张大学文凭，无论是物理学还是哲学的，都应当表明持证的人真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不仅掌握了某一个学科，而且对自己的文化历史有了一个广泛的理解。这绝非易事。

但今非昔比，无论是从高校还是从大学生的角度来看，现代美国大学都已经不是这个样子了。大学提供的是客户至上的体验，去迎合青少年，而不是陪伴他们长大成人。学生的智力唯我论非但没有在大学得到解惑，反而最终被加强。他们离开校园的时候，还是不会承认其他人比自己聪明，无论这个人是同学也好，老师也罢。（这里也假设他们不会去费心区分同学和老师。）他们的学历证书成了一张付款收据，证明他们和家人为几年来很多有趣的人提供的服务埋了单，而学生们也乐于接受这一点。

这并不是说当今的学生智识不足。美国大学的水平有高有低，申请竞争激烈的大学，大多数年轻人已经对考试流程、推荐、课外活动和入学需要的荣誉奖章熟谙于心，所以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可惜，一旦他们走通了入学的迷宫，踏入学校大门，接下来的四年就会在教育不足却被过度赞誉的状态中度过。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甚至会带着和入学时一样多的疑虑，结果，一旦他们离开父母的怀抱，走出学校的院墙，他们身上可能会携带着不安全感和傲慢，这种结合就像毒药，会让他们吃尽苦头。

另一边，申请竞争不那么激烈的学校，学生就无须担忧申请程序

了。经济类撰稿人本·卡斯尔曼（Ben Casselman)在2016年指出，大多数高校申请人“都不需要写一篇入学申请文章，填一张简历，或是花言巧语找人代笔”，因为3/4以上的美国本科生上的大学至少会录取一半的申请人。只有4%的学生所上的学校门槛比较高，只录取25%的申请人甚至更少，不到1%的学生读了精英学校，这样的学校只录取不到10%的申请人。[3]进入了竞争不那么激烈的高校，想要完成学业顺利毕业就得费一番功夫了，只有一半的学生在6年内完成了学士学位。

很多准大学生都还没到上大学的水平，还需要大修大补。学校明知道这一点，还是录取了这些应付不了大学的大学生，就把他们都安置在入门课程大课堂里（经济高效），然后怀着美好的愿望，让这些孩子自求多福。这明显违反了学校可能仍在执行的少数招生标准，为什么他们明知故犯？曼哈顿研究所（Manhattan Instituite）的詹姆斯·皮尔森（James Piereson）在2016年写道：“一切向钱看齐。”一语中的。事实上，“私立学校——至少低于精英水平的——都在不顾一切地招揽学生，只要有钱赚，哪怕多不合格的学生，他们也愿意录取”[4]。有些人能毕业，有些人毕不了业，但高校无论如何都能得到回报，而年轻人也能说，至少他／她读了“几年大学”。

就算没有财政上的压力，学校也还是会给大批尚未做好准备的学生放行，这也应该归因于美国流行的一种肯定和自我实现的文化，让孩子挂科是万万不行的。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在1995年写道：在美国文化中，“孩子被宠到根本不去想是不是自己蠢”。[5] 20年后，马里兰州的一位初中老师抓住了这个问题的精髓，2014年她在《华盛顿邮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她决定辞职。她说学校行政处给了她两个指示，在她看来，这两个指示是“公立教育的典型口号”。其一是学生不能不及格。另一句话则预示着高校的客户至上策略：“如果他们的成绩是D或者F，那一定是你没有教好。”[6]

我自己也无数次遇到这种问题，而且不仅存在于孩子或年轻的本科生当中，曾经还有我的研究生告诉我，如果他们在我的课上拿不到A，

那这个不好看的成绩就证明我教得不好。曾经还有学生在我的课上几乎挂科，他们就请我——有时候是要求我——推荐一个研究生课程或者职业学校。现在的大学生也许并不比30年前的大学生笨，但他们这种理所当然的意识和无来由的自信却是高度膨胀。

显然，家教很重要。过度保护孩子的家长已经造成太多干扰，以至于一个前斯坦福大学大一新生教务长用一整本书来阐述“直升机父母”正在毁掉一代孩子。孩子上高中和大学了，家长还是百般溺爱，帮他们做作业——斯坦福的教务长礼貌地称之为“过度帮忙”——还参与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7]还有更糟糕的情况：有些家长直接搬到孩子上大学的城市，这样孩子读书的时候就近方便照顾。这已经不只是“直升机父母”，俨然是“近距空中支援战斗机父母”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钱很充裕，这很悖谬。在很多父母和年轻人为了凑学费犯愁的时期，这句话听起来就有点儿饱汉不知饿汉饥了。但不可否认，现在能上高校的人的确比从前多了，大多是利用源源不断却害人不浅的贷款。有了政府担保的资金支持，加上高校急功近利的推广策略，来自美国各个社会阶层的青年几乎都能上大学，对他们来说，上大学就是购物，那感觉跟我们买车差不多。

购物都是先看再买，参观校园就是一个典型的购物仪式，让孩子出于各种原因选择一个学校，除了教育。每年春夏，高速公路上都是带着孩子的家长自驾去看学校，不是去看这些年轻顾客获得录取通知的学校，而是去看他们考虑申请的学校。这里不仅有参观常春藤联盟院校的有钱孩子，一些有孩子的朋友经常会告诉我他们上路去看一些我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小学院和州立学校。这些父母每年都会征询我的意见，每一年，我都会告诉他们这是个糟糕的主意。每一年，他们都谢谢我提供建议，然后还是一意孤行。到了最后，一家子都会变得很暴躁，筋疲力尽，至于这个学校究竟叫什么，似乎都是后话了。

通常情况下，大多数学校都会得到年轻人的喜爱，因为对于一个困在高中几年的青少年来说，所有高校看起来都是好去处。当然，有些选

择很快就从雷达上消失了。难看的小镇，邋遢的校园，破旧的宿舍，诸如此类。除此之外，学生们会爱上一所学校，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都像一个焦虑的求婚者一样坐卧不安，期待着他们刚过16岁生日时选择的学校会向他们投来邀请函，改变他们的人生轨迹。

青少年应该先想一想他们究竟为什么想去上大学，找到与自己的能力最匹配的学校，然后只申请这些，再去参观发给他们录取通知书的学校。但这种想法对很多家长和孩子来说已经变得很陌生。问一对家长为什么要开车带女儿跑遍美国去参观一些她根本无意去读或是达不到要求的学校，答案几乎是一成不变的：“嗯，她想去看看。”但他们很少会加一句：“而且我们也选择花这笔钱。”申请一所大学的费用是50美元或者更高，这不便宜，不过从阿默斯特（Amherst）开车到亚特兰大的成本就更高了。

这整个过程不仅意味着孩子说了算，而且他们还学会从一些角度来评估学校，考虑这个考虑那个，除了学校的教育。学校清楚这一点，它们也做好了万全准备。这就像本地的车行清楚知道怎么在展厅摆放一个新车型，或者一个赌场知道如何喷洒香水，好让顾客在踏进门的那一刻起就被打动，学校也会准备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和项目作为卖点，大多是在孩子关注的事情上挤掉对手。

为了争取青少年和他们的贷款学费，教育机构承诺的是一种体验，而不是教育。（我在这里不考虑营利性学校，那只能算是制造债务的工厂，而且我通常也把这类学校从“高等教育”的定义中排除。）打造一个美观的学生中心或提供大量活动，这都无可厚非，但有时候就显得本末倒置了，就好像病人选择一个医院做冠状动脉架桥术，全是因为这家医院的东西好吃。

在这件事情上，孩子和年轻人的自主权越来越大，部分原因是学生贷款项目把决定权从父母手中交到孩子手中。还有一个更广泛的趋势，几十年来，父母已经越来越对孩子放手。无论如何，彭博社（Bloomberg）的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通过观察

得出结论，对于申请学校这整件事的决定权已经从父母那里转移到孩子手中，可以预想，“学生比家长更关心的是自己在学校过得舒不舒心”[8]。对于这样的观点，我们很难不同意。

本科学府想方设法投学生所好。例如，每个高中生都会担心将来要与陌生人同住，一些学校就在试图迎合学生的需求，缓解他们的焦虑。过去，学会与室友同住是通往成熟的必经之路，还与父母同住的孩子会为此惊恐不安也是情有可原的。但今非昔比，亚利桑那州的一名教职员在2015年写道：

> 很多学校让新生通过社交媒体认识自己的室友，而且他们住在公寓一样豪华的宿舍里，这就保证了他们基本不需要和别人共享一个卧室或卫生间，甚至他们不想在食堂用餐也可以。以前的学生都是和学校随机分配的室友共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人，但就是要这么近距离共享空间，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学着与不同人相处并处理矛盾纠纷的地方。[9]

如果学生选择去亚利桑那州是因为他／她可以不用去食堂吃饭，正中下怀，那整件事就不对劲了。当然，很多年轻人因为一些更加愚蠢的原因做出了更糟糕的决定。

学生都很年轻，父母都很疼爱孩子。完全说得通。但是，当整个申请学校和入学的狂欢结束，学生们怀揣着和接受大学教育不着边际的期待走进教室，这就是教职员们要教的孩子。现如今可不是教授指导学生，反而是学生命令老师，他们似乎带着一种自然而然的威权。比如，2016年一帮耶鲁的学生要求英文系取消必修课程“英国主要诗人”，因为这门课太偏重欧洲白人男性：“我们已经表达过了，”他们在请愿书中写道，“我们正在发声。关注这个问题。”[10]一个精英学校的教授曾经这样对我说过：“有些时候，我感觉自己不像个老师，更像是一个高级精品店里的店员。”

怎么不可以这么说呢？从学走路开始，大人就教孩子直呼成人的名字。给孩子“打分”是为了提高他们的自尊，而不是为了激励他们进步成功。孩子可以像考察高尔夫球场附近的公寓楼一样考察高校，然后再升入大学。这也许只是成人对孩子小小的让步，但意义非凡，孩子的自尊自大侵蚀了学习能力，长期灌输下对成功的错觉和对知识的过度自信一直跟随他们到成年。

20世纪80年代我第一次到达特茅斯（Dartmouth）的时候，就听说了一个知名教师（当时还活着）的故事，也小小地说明了专家和教育者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著名天体物理学家罗伯特·贾斯特罗（Robert Jastrow）做了一场关于罗纳德·里根总统发展天基导弹防御计划的讲座，当然他是坚定支持这个计划的。一个本科生就在提问环节挑战贾斯特罗，据大家说贾斯特罗很耐心，但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且必要的。这个学生意识到一个重要大学的科学家是不会因为和一个大二学生争辩几分钟就改变主意的，最终耸耸肩放弃了。

“嗯，”学生说，“你的推测也不错，跟我一样。”

贾斯特罗打断年轻人。“不不不，”他断然说道，“我的推测比你的好得多。”

贾斯特罗教授已然逝世，我在汉诺威（Hanover）的时候都没有机会问问他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我猜他想给年轻人上一堂人生课：进入大学只是教育的开始，不是终点，尊重一个人的观点不等于同等尊重这个人的知识。但现在的大学生和普通民众却越来越抗拒这一点。国家导弹防御计划是不是一个明智之举仍有待商榷，但是有一点不变，那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天体物理学家和一个大二学生的推测不会是平分秋色的。

这可比一些常春藤盟校自以为是的学生嘲弄教授严重。举一个更生活化的例子，2013年有个年轻女子在社交媒体上求助课堂作业。（她住在哪里，在何处就读，这些信息不详，但她说自己将来要成为医生。）她的任务是研究致命化学物质沙林（Sarin），她在推特上向大家解释，

她之所以需要帮助，是因为要一边做作业一边照顾她的孩子。几分钟后，伦敦一家安全咨询公司的主管兼化学武器领域的顶尖专家丹·卡泽塔（Dan Kaszeta）主动提出帮助她。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很多读者跌破眼镜。［加州的一名武器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把网上的对话截图发出来。］“我找不到沙林气体（sarin gas，原文如此）的化学和物理性质，谁能帮帮我？”该学生发推文说。卡泽塔提供了帮助。他首先纠正了这个学生，提醒她沙林不是一种气体，另外sarin的首字母s应该大写。之后刘易斯挖苦地写道：“丹的帮忙让我们这位身陷困境的学生松了一口气。”

事实上，迎接丹的是一连串的脏话。学生的自尊心受挫，怒气如飓风袭来，对专家一顿教训：“是的，你这［脏话］就是气体，你这无知愚昧的［脏话］。沙林是一种液体，能蒸发……闭嘴［脏话］。”卡泽塔很明显错愕不已，再次尝试：“你去谷歌搜索我。我是沙林方面的专家。很抱歉想要帮忙。”一直到两人对话终止事情也没有好转。

一个自鸣得意的达特茅斯孩子和一个义愤填膺的推特用户可能算是表现异常的，这当然是应付学生的极端例子。但是课堂里和社交媒体上的教师更是常常碰到学生把纠错当成一种侮辱。名不副实的夸赞和徒有其表的成功让学生养成了一种脆弱、不堪一击的傲慢，如果有老师或雇主第一次打破那层幻想，他们就会猛烈还击，这样的习惯在成年后也是很难改变的。

我就给你发电邮不行吗

在当今的高校，把学生当客户、视专业知识为产品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一些细枝末节上也能看出来。比如电子邮件的影响，电邮让一些通常不敢在人前表现的学生也敢于做出各种各样古怪的事情。

就算我们暂且不论一些人在周末饮酒作乐后写了邮件然后点击“发送”这样偶然的失策，电子邮件还是让人错生出一种亲密感，腐蚀了有效教学所必不可少的界限。我们在下一章会看到，这是电子媒体互动的一个普遍特性，但是教师和学生之的交流如此不正式，便是又多了一个佐证，说明专家及其技能受到的尊重日衰，大学生活在其中是如何发挥了作用的。

电子邮件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校园开始流行，10年而已，教授们注意到即时通信已经带来了变化。2006年，《纽约时报》询问高校教育者与学生通电邮的感受，他们的挫败感非常明显。“这些天，”《时报》写道，“学生似乎认为［教职员］是随时待命的，源源不断地给他们发很随意或完全不妥的邮件。”一位乔治城的神学教授告诉《纽约时报》：“学生在电邮里的语气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我需要知道这个，你现在就要告诉我’，那种随意有时候已经到了咄咄逼人的地步了。”[11]

电邮就像社交媒体一样，把对话的人放到了同一个水平线上，让学生觉得给老师发电邮就像和客服部门交流一样，这种感觉让学生很自在。这就直接影响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因为这种模式让问问题的学生和回答问题的老师之间再无区别。正如《纽约时报》所提到的：

> 过去，教授可以指望学生顺从，但现在他们的专业知识似乎已经变成了另一种服务，而学生就像任何消费者一样正在花钱购买这

种服务。所以，学生可能就无惧冒犯老师，敢催促老师，甚至问出一个暴露自己判断力糟糕的问题。

弗吉尼亚州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的社会学教授凯思琳·E.詹金斯（Kathleen E. Jenkins）说过，她曾经收到一封学生的电邮，这个学生错过了她的课，找她要教学笔记的复印件。

面对教职员关于电邮的此类抱怨，一名阿默斯特的大二学生说："如果我和教授沟通的唯一方式就是去他们的办公室或是给他们打电话，那我就要好好权衡一下或是对事情分个主次了。这个问题到底值不值得去一趟办公室？"

对于这一点，教职员可能会回应说："问题就在这里。教授不是提供知识的贴身仆人或随时待命的笔友。他们的存在不是为了即刻解决学生的每一个问题——包括给学生建议该用活页夹还是分科目笔记本（一名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教授在报告中这样写过）。学生在高校本来就应该学会一件事——自立，但如果只需要敲几下键盘就能找教师解决问题，为何还要自己费心查找呢？"

教育的初衷本来是要治好学生身上的这些坏毛病，而不是加以怂恿。但出于诸多原因，包括怕丢了工作，教授有些时候不愿意负起责任，尤其是那些非终身教职员或助教。当然，他们当中有些人对学生平等相待，是因为他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学生真的是与他们相匹敌的人。教与学皆受这种错误观念所累。一些教育者甚至还重复一句老话："学生教会我的，与我教给学生的一样多！"（恕我直言，对于那些在教学生涯中把这句话挂在嘴边的同事们，我不得不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只能说你不是个好老师。）

要想阻止课堂里的角色逆转，就需要老师重申自己的权威。但这样一来，首先就需要推翻视教育为客服的整个观念。课堂的反革命运动恐怕不会受到以学费为中心的管理人员的欢迎，而且无论如何在客户中可能会相当不受待见。

多年来，詹姆斯·沙尔神父的政治哲学总是会在第一堂课上就让乔治城大学的学生感到震惊，他会分发一篇他写的文章，叫作“学生应该给予老师什么”。举个例子：

> 学生对老师有义务。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歪理邪说，但我们先把这句话搁在这里。
>
> 首要义务，尤其是在新学期的前几周要执行的，就是对老师的适度友好，对老师的信任，对老师有信心，愿意承认老师阅历丰富、洞悉事理，和学生不同，老师知道发展的方向。我在这里也不想忽略掉一些意识形态的教授，他们会把自己的意志观念强加于人，这样的危险的确存在。但做学生还是需要一点儿谦逊的。
>
> 所以，学生应该给予老师的是信任、顺从、努力和思考。[12]

沙尔多年来一直要求学生阅读这篇文章，直至退休。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今天的校园，你告诉学生他们需要更加努力，对自己的才能要有更多面的认识，要信任自己的老师，看看会引起怎样的反弹和愤怒。今天的很多教职员想必也是赞同沙尔的，但他们不能冒着激怒学生的风险，因为正如每个服务行业人士所知，客户永远是对的。

无论是否出于善意，学生与老师的才学和社会地位相当以及学生的观点可与教授的知识相匹敌这些想法可以说害人不浅，让学生的潜力不得开发。学校非但不去矫正年轻人的迷思，反而还常常加以鼓舞，结果人们就真的把自己想象得比实际聪明。正如社会心理学家戴维·邓宁所说：“过去我们对无知的理解就是知识匮乏，这让我们相信教育就是天然的解药。但是教育，就算我们拿捏得当，还是会让人产生不切实际的信心。”[13]

那如果教育实施不当，事情会变得多么艰难，可想而知。

一般大学

一个小学院——抱歉，一所“大学”——里的管理人员可能会读到这一章，并抗议说我这样指责生意人表现得像个生意人是不公平的。毕竟，高等教育也是个行业，如果这个行业里的企业互相竞争，也不是什么罪过。但是，如果学校没能交付出自己所承诺的产品——教育，那这个商业类比就失效了。

早在一个潜在的学生填申请的时候，游戏就开始了。尽管学院对自己的定位是学习强度较低的课程加上提升的生活水平以及丰富的非学术活动，它们还同时在努力粉饰自己的重要性、美化形象。我之前关于“大学”激增的评论，不是什么离奇的结论：这件事正在发生，而且至少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就从未停歇。就像现如今高等教育中的很多其他弊端一样，这个变化也是受金钱和地位的驱动的。

学生想要相信自己花钱上的是更高梯队的学校——地区或国家级“大学”，而不是一个地方学院，小学院变身大学就是为了吸引这些学生。[14]在即将上大学的高中生眼里，州立学院和社区学院比四年制大学的地位低一些。因此，很多学院试图更名为“大学”，从而让自己脱颖而出。

更名游戏背后还有一个更乏味的动机：把研究生课程引入小的学院，从而寻找新的资金来源。竞逐资金和随之而来的研究生课程激增已经迫使这些新“大学”加入学位授予的竞赛。校方不仅增加了专业学位的研究生课程，比如企业管理，还有很多学校往本科课程里填塞新修课程，好升成硕士学位。

各学校竞相模仿，面对同业压力，一些刚晋升为大学的学校就开始

升级游戏，增加博士课程。这些小学校想在现有领域设立博士课程还羽翼未满，就设立一些深奥难懂的跨学科领域，从而达到制造新文凭的目的。不难看出，这样制造出来的学历文凭并不能代表相称的知识水平。

这一切的行为几近学术渎职。学院开设研究生课程，却连本科教育都达不到尚可的水平，这是在欺骗研究生和本科生。小学院没有成规模的大学那样的资源——包括图书馆、研究设施和多元的项目——仅仅把前门的校名重绘一遍，并不能神奇地创造出那样的学术基础设施。把乡镇学院变成一般大学，信笺抬头也许看起来很美，但这一举动会把原本可能有用的地方学院推入新的境地——半吊子大学。

这种更名行为稀释了所有高等教育学位的价值。人人都上大学了，那在这些“大学毕业生”中挑选出真正有成就和专业知识的还真是难为人了。美国人扎进一堆文凭、证书和其他五花八门的认证里。有些人急切地想要误导周围的人，通常都会说自己接受了研究生教育，这样就不会被看轻。但还有一件事比发现他们在撒谎更让人沮丧，那就是发现他们说的是实话。

学生可能会反驳说，他们要满足专业的要求，比老师给个学分要费劲多了。可能是吧，但那也要看专业本身了。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学位，要求很高的外语或严格的人类学学位，和传播或视觉艺术专业——或政治科学（这样说让我很心痛）的要求会有天壤之别。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默认专业”，当一个学生不知道学什么就选这一类专业，或是一些学生在要求很高的课程上跟不上，认清了自己的能力后，就转到这些专业。

我冒着被人误解的风险，也要澄清几点。首先，哪怕最好的学校也有容易过的课程，学生只要是能正常呼吸的，几周时间就能通过，这一点对于我、对于高等教育界的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什么新闻。一个教授承认这一点或许让人大跌眼镜，但有一些容易或有趣的课程无可厚非。我还不得不说，至少有一些课程是必要的。就是应该有一些课是让学生体验一个学科，愉快地学习，并且因为学到东西而拿学分。

但是当所有课程都开始变成容易过的课，问题就来了。在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专业里，这样的课无处不在，而且就我个人判断而言，数目与日俱增。没有哪个领域得以幸免，综观美国很多课程给出的录取通知书——以及给学生的打分——都在昭示着一件事：过去只是个别教授的恶习，现在已经成了整个系的普遍作风。

我还要说一点，我不是说要把学院都缩编成只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加上少量英语或历史专业的规模。我强烈反对这样的论调，在我看来，这是对人文学科的侮辱。那些诋毁人文学科的人所倡导的往往是把学院变成职业技术学校。这种时候，艺术史专业总是会受到恶意中伤，很多人并不知道其实很多艺术史专业的人最后去了一些薪水相当丰厚的职业。无论如何，我不希望我所处的文明里没有艺术史专业，就这一点而言，还不能少了电影研究、哲学或社会学专业。

问题在于，这些专业里究竟有多少学生真的学到东西了，或者说，有没有必要让那么多学生在三流学校里学这些学科——尤其是花的还是纳税人的钱。毫无疑问，这些学生往往都是在浪费金钱，或者他们的受教育只是一种假象，因为所读课程或专业要么不应存在，要么即便存在也应限制招生人数，让少数真的志在于此的人去认真严格求索。当然，这一点也是教师缄口不提的其中一件事，因为对愤恨难填和满怀希望的学生来说，这些话听起来就像毫无根据的精英主义。

这可能算是精英主义，但不是毫无根据的。很多小学院过去叫“师范学院”，其宗旨是培养老师。它们的历史系或英文系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使命，培养了历史和英文老师。然而到了今天，这些微型“大学”还开设了人类学或科学哲学专业，就好像它们的学生将来还要去斯坦福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继续攻读研究生一样。设立这些专业，有时候是因为少数教授这门课的老师有此兴趣，有时候是校方借此来丰富专业的品类，不然可能在学术上显得单薄，不足以吸引为了追求个人发展或是追随天赐之福的潜在学生，只要你能负担得起，这都没什么问题。如果一个小学院的历史课程吸引你，无论如何，去读吧，可能会很精彩。但是，如果

学生选专业的时候都不怎么思考这个学校的水平，也不想想学校在这个专业上能提供什么样的学术资源，或者这个专业的毕业生去向如何，那最终离开校园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否完成学业顺利毕业），他们真正掌握的知识，远不及他们所以为的那样，当我们与那些对自己所受教育质量有很深误会的人做诸多无谓争论时，说来说去，核心不过如此。

更名后的大学开设专业或学位课程的时候，与那些知名大学并无二致，不仅在误导未来的学生，也在危害之后的学习。课程质量上的巨大差距，可能会触发一种怨恨：如果你和我都有大学历史学位，为什么你关于俄国革命的观点就比我的强？你的学位是顶尖院系颁发的，我的是只有一个老师的小专业课程颁发的，这一点怎么就那么重要？如果我是在一个地方州立学院学电影的，你是在南加大学习电影课程的，你凭什么就认为你比我懂得多？我们都有同样的学位，不是吗？

不同院校及旗下各种学位和课程会被拿来比较，至于此间差别，争论颇多，这很快就会让人深感困扰。被顶尖院校录取并拿到学位的学生心生怨恨，因为别人把他们和不知名的公立“大学”同专业的学生放在一起横向比较，让他们平起平坐。（如果所有学校都一样好，那为什么有些大学比其他大学难进？）而那些不舍昼夜努力学习拿到同样学位的学生也很生气，就因为非名校毕业，他或她的成就就矮人一截。（如果除了常春藤盟校，其他学校都是垃圾，为什么这些专业和课程还都能得到认可？）

这样的争论背后其实恶意满满，有点儿高人一等的意味。差学生上了好学校，还是个差学生；勤奋的学生从小机构毕业，虽然没有名校证书，依然是聪慧的。但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在一个地方学院听超负荷工作的助教讲课，和在一个顶尖大学听知名学者上课，往往还是有着云泥之别的。就算这么说是对的，但只要说出来，立刻就会让人怒火中烧，被人说成势利眼，然后不欢而散。

我们可能不喜欢这样比来比去，但比较也有重要的意义，能帮我们筛选出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不错，即使知名学府也会培养出彻头彻尾

的傻瓜。但是，那些准大学想要参与更加重量级的竞争，所图非善，为的却是市场推广、金钱和教职员的自尊心。最终，他们的所作所为对学生和社会都是伤害。专业相同，可能会让人有共同话题，能就一个学科展开进一步的讨论，但这并不会天然地让他们在才能学识上相匹敌。

学院和大学的分数膨胀也会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产生误会。压低标准，这样课业不会妨碍上大学的乐趣，能确保学生身心愉快，疏解教职员要挂掉某个学生的压力。彭博社的麦卡德尔（McArdle）曾写过，既然课堂里的座位是一种商品，而不是通过竞争赢得的特权，那学校努力减少上大学给客户带来的不愉快体验，也就不出人意料了。

> 看看大学里的漂流河与攀岩墙，还有越来越奢华的宿舍，就一目了然了，这些都是学校用来吸引学生的，但是这种转变并不局限于外部设施。让教授惊叹不已的是学生现在可以厚着脸皮要求老师不顾职业道德给高分，但正是因为学生把自己当成顾客，提供给他们的产品是文凭，而不是教育，那这一切可想而知了。

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凯瑟琳·兰佩尔（Catherine Rampell）所描述的，学院就是一种交易，在这场交易中，“学生交的学费越多，自然也会期待更多回馈——更优的服务，更好的设施，更高的分数”[15]。反而对学生的要求比几十年前低多了。作业变少了，三学期制和学季制都变短了，技术创新让上大学变得有趣有余而严谨不足。但学院变成了生意场，你不能让客户挂科了。

学院也不是只有攀岩和皮划艇，但毫无疑问的是，分数膨胀正导致学分贬值。芝加哥大学2011年的一项研究发现，“在当今的学院和大学中，想要拿到令人满意的学习成绩并不费劲”。

> 45%的学生说，整个第一学期下来，任何一门课的文字作业加起来不超过20页。32%的学生说他们没有一门课的周阅读量超过40页。难怪现在很多学院的学生决定把时间投入到其他校内活动中

去。[16]

“其他活动”，有些是高尚充实的，但还有很多是那种父母宁愿不知道的。

至于专家之死，不难看出，多少也是受到课业负担变轻和学分标准变松影响的，因为平均学分绩点高的毕业生不一定有相称的教育水平或学业成就。（再次声明，有些学位不在讨论范围内，我说的是当今美国的大多数专业。）“我是某某大学的成绩全优学生”，这句话在今天说出来，分量和1960年甚至1980年不可同日而语。一项对200所院校截至2009年的研究发现，A是最常给的分数；自从1960年起，得A的学生增加了将近30%；从1988年起，增加了超过10%。现如今，从所有科目的得分来看，得A和B的加起来占到80%以上，这样的趋势还会继续，热度不减。[17]

换句话说，现在所有的孩子都是平均水平以上。比如，2012年，哈佛最常打出的分数是成绩全优。耶鲁，给出的所有成绩里60%以上是A或A-。这种事情，偶尔出现在某个课堂里还是有可能的，但是放到整个大学里，在成绩分级的情况下，哪怕是最聪明的学生当中，也是几乎不可能的。

每个教育机构在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都习惯去指责周围的院校。当然，没有哪个大学或课程能够在对抗这种分数膨胀的时候不伤及自己的学生，这是问题所在。哪个教职员第一个站出来，给自己的学生降分，就会让自己的学生看起来比其他院校的学生能力差。兰佩尔对这一点的解读非常到位，这就是说学校的默认分数不再是20世纪50年代“为了照顾面子给的及格分数”，而是“照顾面子的A”，A不再是给优秀学生的奖励，而是完成课程应得的分数。

包括普林斯顿、韦尔斯利和哈佛在内的大学已经成立了委员会来调查分数膨胀的问题。2004年，普林斯顿采取了一个政策，试图限制教职

员给学生打A的权限，还不到10年，这个试验就被教职员自己推翻了。韦尔斯利的人文学科院系试图把平均分数上限设为B+，结果这些课程的招生人数减少了1/5，参与的院系损失了将近1/3的专业。

经验丰富的教育者已经和这个问题搏斗了很多年。我就是其中之一。和我的同事一样，我也没有找到解决方法。但是，分数膨胀的问题伴随着两个最重要的事实：一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二是这让学生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了无端的自信。在这场分数膨胀的合谋里，几乎每个高等教育机构都是共犯：一方面是迫于市场压力，要让大学变得有趣，让学生对雇主有吸引力，让弱势的教授不会被学生的不满怒火烧到；另一方面是由于学校对自尊在教育中的角色有着不负责任的看法。

请温柔地评价我

大学和学院还做了一件事，强化了学生是顾客的观念，降低了对专业知识的尊重，那就是鼓励学生给老师测评，就好像学生和站在讲台上的老师是平起平坐的。20世纪60年代之后，学生要求被重视、增加参与度的运动兴起，学生测评自此诞生，并延续至今。现如今，商业帝国，包括教育界，都对“度量”走火入魔，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应用得更多，甚至到了滥用的地步。

我其实支持有限度地采用学生测评。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从我第一天开始教书起，我一直表现很好——我在美国海战学院和哈佛继续教育学院都得过教学方面的奖——所以我没有什么私人恩怨，在这里绝不是别有用心。我也曾经在教务处工作过，既然监管一个院系，审阅学生给其他教职员的测评便是我的职责之一。那些年里，我看过数千份测评，出自不同年级的学生之手，如果处置得当，是很有价值的一个举措。但不管怎么说，测评这件事现在已经全盘失控，学生给男女教授写评价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写影评，或是在评价一双鞋子。

测评通常会落入一个灰色地带，大多数老师都是称职的，大多数学生一般都喜欢这个课程。测评最大的用处就是帮我们发现趋势：纵观多年度的测评，能帮我们找出最佳和最差的老师，如果看测评的人擅长解读学生写评价时的心思，那就尤其明显了。（比如，“她很无趣”通常就表示“她期待我去读她布置的书，而不是逗我开心”。）在我自己的课堂上，我会利用测评来发现这个课上的可取之处和无益之举，比如哪些书或讲座应该取消，哪些又应该保留，或是我对一个学期感觉特别良好或是比较不足的时候，帮我看清学生是否和我观感一致。

但是，无论如何，问一个学生他们有多喜欢自己所接受的教育，这

样的体系还是有问题的。学院不是一个餐馆。（我读学生的评价时，有时候会看到类似点评网站式的评价："这门统计学入门课上得有点儿凉，但内容很实在，我的搭档选了一门世界宗教概略，透着一丝辛香气息。"）评价老师造就了一种思维习惯：虽然外行对某个学科领域所知明显逊于专家，但还是习惯于评判专家。

学生测评还是一种高灵敏度的指示器，连一些最细枝末节和无关痛痒的事情都会影响到指针，从座椅的舒适度到上课时间。有些就直接忽略好了，有些就很奇怪，奇怪到教授们会把自己得到的最糟糕或最古怪的评价拿出来分享。比如，我的一个同事曾经主讲过英国海军历史，内容详细，而一个军事学生唯一的评语就是老师应该熨一熨衬衫了。我认识的一个顶尖历史学家在学生测评中常常被取笑个子矮。还有一个本科生曾经告诉我，说我是个出色的教授，但我需要减减肥（这一点很对）。另一个学生很不喜欢我，我不知道是男生还是女生，他／她在评语中写道，他们会为我祈祷的。

这些评语确实很好笑，但这都是在鼓励学生把自己视为裁判，可以任意评判老师的才能学识。当教育的意义在于确保顾客开心，学校对测评的依赖，迫使弱一些或缺乏保障的老师沦为跳舞的小熊，努力取悦学生，这样才能保住这个课（和教授的合约）能延续到下个学期。如此一来，就形成了老师迎合学生和分数膨胀的恶性循环，还很顽强。

学生的确应该更多地参与到自己的教育当中，而不只是当一个旁观者或信息接收器。参与和辩论是大学的生命线，学生对教授的思想和教学能力的批评，教授也不能置若罔闻。但是，教育的工业模式已经把上大学降级为一种商业交易，学生学着变成挑剔的顾客，而非有批判思维的人。专业知识也因此受到波及，对现有知识的攻击因而变得火力更猛，两相夹击之下，大学的办学宗旨碎了一地。

学院不是安全空间[18]

这些年轻的男孩女孩并不像我们想象中或有时候在媒体或流行文化中所描述的那么不负责任。我们看着校园喜剧电影发笑，天真地忆起我们做学生时不负责任的点滴，然后严肃地告诫孩子们不要像我们一样。如果我们喜欢学生发起的活动，就会为他们的激进主义喝彩；如果我们不赞同，就会强烈谴责。对于紧随其后的那一代人，成人总是容易变得吹毛求疵。

但这也不能成为学院容忍自己的校园变成马戏团的理由。美国人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会波及大学校园，这一点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不是高校低头的理由。不要误会：美国的校园不仅日益把知识权威拱手让给孩子，还让给了直接攻击自由探索传统的活动分子，这可是学术界本应捍卫的传统。

对于那些我认为是对自由探索的攻击，我有很多强烈的观点，但我不想在这里公开发表。有几十本书和许多文章都是讲高校如何沦为政治正确的安全港，师生中的理论家所实施的严苛法规如何压制了学术自由。我想我没有必要在此赘述。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还是很有必要思考一下，现在的校园风潮，包括“安全空间”和说话法则，是怎样腐蚀了高校，让高校无法培养出具备批判性思维的人。（记住，“批判性思维”不等于“肆无忌惮的批评”。）把上大学变成一种购物行为，教会青春男女在评估一个学校的时候，要考察各种因素，除了教育。同样，学校迎合年轻活动分子的方式，让他们再一次相信，一个大学生的使命是启迪老师，而不是老师启迪学生。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如果单指出某一所大学的某个政策或争议，还显得有失公允。这个问题在美国大学极为普遍，而且自从20世纪60年代起就反复上演，且每一波浪潮打过来的力道不一。今天这个浪潮的不同之处，尤其是在培养受教育公民这方面尤其令人担忧的一点，就是现代大学这种襁褓一样关爱的环境是如何让学生幼稚化，让他们缺失了进行有逻辑、有内涵的论证的能力。当感觉高于理性或事实，教育就注定成为商业。面对专业知识，情绪是一种无懈可击的攻防手段，当你用愤怒和怨恨筑起一道护城河，所有的推论和知识很快都会淹死在里面。当学生明白情绪压倒一切，他们就会把这个技巧运用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高校本应是一个平静的地方，受过教育的男性女性在这里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他们在这里学习学术探索的模式。然而，很多院校已经被学生绑架，学生要求自己的感觉高于一切。学生不疑有他，就是认定自己有权利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他们一直都是这样活着的，直到他们上大学，在他们生活的治愈系文化中，没有什么想法不可以表达，没有什么感觉会被忽视。

不过，学生的激进主义还是正常大学生活的一部分。青少年就应该是激情澎湃的，这是十几岁或二十几岁孩子的天性。我还是一个很老派的人，希望受过教育的人能够凭借自己的教育成为未来选民的领袖，所以我很赞成未来的选民能在辩论和讨论中锻炼他们的政治推理能力。

可惜，新的学生激进主义倒退回半个世纪前的样子：偏狭，教条，甚至还夹杂着威胁和暴力。学生正在动用极端的语言，越来越喜欢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不放，这一点儿很讽刺（或者可以说很悲哀）。婴儿潮的那一代人也许能辩解说他们破坏校园是为了和平，毕竟在1967年，的确有年轻人被征兵送到某个亚洲的丛林，这种情形让人情绪激动，也是可以理解的。还有，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少数群体的人才被法律认可为美国公民，所以他们觉得除了示威抗议之外，没有什么别的方式能引人瞩目，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不过示威抗议触发暴力终究是

不对的。

可是，在今天，一点儿子虚乌有的怠慢就能让学生爆发，这点儿小事和为民权斗争或送去战场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现在的学生喜欢小题大做，一点儿恶作剧就会让他们变得歇斯底里。他们还学会了有理就在声大，以为情绪和音量总是能打败说理和实质，所以他们筑起了一个堡垒，在未来的人生中，没有哪个老师、专家或知识分子能够打开一个缺口。

比如，2015年，耶鲁大学一个舍监的妻子贸然地说，如果少数族裔的学生觉得有些万圣节服装冒犯到自己，可以选择无视。整个校园都炸开了锅，甚至有学生用尖叫嘶吼着呵斥教授。“你身为舍监，”一个学生当面指着教授痛骂，“你的职责就是为学生营造一个舒适的空间，一个家一样的地方……你懂吗？！”

这名教授轻柔地说道：“不，我不同意。”这名学生就开始连珠炮一样攻击他：

> “那你［脏话］为什么要接受这个职位？！谁［脏话］雇了你？！你应该辞职！如果当舍监是像你想的那样，你就应该辞职！当舍监不是要营造一个知识空间！不是的！你明白吗？是要营造一个家。你没做到！”[19]

但是，耶鲁大学非但没有惩戒言论出格的学生，还向发起炮火攻击的学生道歉。这名舍监最终辞去了舍监的职务，只当一名普通的教职员，而他的妻子，辞去了教员的职务，彻底离开了大学讲台。

对于四面八方的教职员，这个教训是显著的：一个顶尖大学的校园不是探索知识的地方，而是一个奢华的家，租赁期4～6年，每次入住9个月，入住的都是精英家庭的孩子，他们冲着教职员吼叫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呵斥殖民时期豪宅里笨手笨脚的仆人。

当耶鲁大学的喧嚣过去一个月，密苏里大学爆发了一场示威，起因是一件很幼稚的事，有人用粪便在浴室的墙上画了个纳粹党党徽。对于这所密苏里州的一流公立大学来说，除了把墙洗干净，还能怎么做呢，但是无论如何，校园沸腾了。“你知道什么是有组织的压迫吗？！”一个学生对着狼狈的密苏里大学校长叫嚣着。“谷歌一下！”她大吼。有一次，有学生记者受到一名礼聘教授的骚扰和威胁，非常讽刺的是，这事就发生在新闻学院。在这些闹剧上演几天后，大学校长辞职。（示威发生后还拒绝取消上课的那个分校校长和一个教授也步了后尘。）

但是，密苏里大学不是耶鲁大学。无论如何，想进耶鲁大学的大有人在，密苏里大学就没这么硬气了。由于示威和辞职事件，密苏里大学接到的入学申请和捐赠都受到冲击。[20]几个月后，和学生发生冲突的新闻学院兼职教授被解雇了。当硝烟散去，学校的教职员、行政管理人员、申请人和捐赠都少了，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就是因为一帮学生，在一小撮教职员的推波助澜下，让一个大型公立大学里的授业者与学习者角色互换。

有意思的是，这个主题常常能把自由派和保守派的知识分子团结起来。英国学者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因为宗教方面的观点让保守派如鲠在喉，他对“安全空间”这整个想法很是困惑；美国学生要求安全空间，保护他们不受任何可能“触发不适”的政治表达的影响。道金斯完全不留情面：“一个大学不是一个‘安全空间’，”他在推特上这样写道，“如果你需要一个安全空间，走，回家去，抱着你的泰迪熊，吮吸你的大拇指，直到你准备好上大学。”

无独有偶，耶鲁和密苏里大学事件落幕后，《大西洋》（*Atlantic*）撰稿人康纳·弗里德斯多夫（Conor Friedersdorf）写道，“发生在耶鲁大学的事不会止步于此”，未来的精英正在内化的价值观，不是言论自由，而是十足的偏狭。“这些学生让人同情，”弗里德斯多夫后来这样写道（我不同情，但弗里德斯多夫比我更通情达理），“但是，如果一封关于万圣节服装的邮件就能让他们罢课，感觉崩溃，要么是他们需要接

受心理健康专家的帮助，要么就是他们被那些削弱人意志的意识形态观念给误导了；在他们习得的观念中，就包括他们应该为什么感到痛苦，这一点令人悲哀。”[21]

与此同时，一名自由派的专栏作家兼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assee）法学教授格伦·雷诺兹(Gelnn Reynolds)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解决方案。

> 要想成为一个选民，就必须能够参与成人的政治讨论。这就需要聆听反方的论点，甚至——就像我在这个专栏里所做的一样——在新证据出现的情况下改变主意。
>
> 所以，我们或许应该把投票年龄提高到25岁，唯愿这个年纪的人有一定的成熟度。要把大学生当孩子一样对待已经够糟心了，还要被这帮被宠坏的孩子接管，那就忍无可忍了。不能理性讨论万圣节服装的人，还不配在一个伟大国家的管理中扮演重要角色。[22]

我几乎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没有人会回应雷诺兹教授的修改宪法建议，但他的评论，和其他一些观察家的评论一样，直指这个怪异扭曲的悖论：大学生一方面要求管理学校，另一方面又要求学校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他们。

对此问题，我也还是无解，尤其是在学生上大学之前，无能为力。就像大多数教授一样——我希望——我能以清晰的标准管束我的学生。我期望他们学会如何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能够冷静、有逻辑地展开辩论。我依据他们在考试中答题的情况和书面作业的质量来打分，而不是依据他们的政治观点打分。我要求他们尊重同学，在课堂上交流思想和观点的时候不要夹杂个人情绪和人身攻击。

但是当学生离开我的课堂，我深感担忧，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再主持他们的辩论。我阻止不了他们拒不接受他人意见，阻止不了他们拒绝接受事实，阻止不了他们谴责善意的建议，也阻止不了他们强行把自己的

感受充当事实，要求别人接受。如果他们大学四年一直对自己的教授和学校如此不尊重，那就别指望他们以后会尊重其他公民。如果我们不能再指望大学毕业生在美国生活中引领理性辩论和讨论，分辨知识和感觉，那我们已经危机深重，专家亦无良策。

---

[1] Daniel W. Drezner, “A Clash between Administrators and Students at Yale Went Viral,”*Washington Post* online, November 9, 2015.

[2] 美国教育考试服务社（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管理美国大学生入学的学术能力测试（SAT）的机构，发现上大学井喷式发展并不会必然导致学生能力的提高。见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America’s Skills Challenge: Millennials and the Future*(Princeton, NJ: 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 2015)。

[3] Ben Casselman, “Shut Up about Harvard,” Five ThirtyEight.com, March 30, 2016.

[4] James Piereson and Naomi Schaefer Riley, “Remedial Finance: The Outsized Cost of Playing Academic Catch-Up,” *Weekly Standard* online, May 9, 2016.

[5] Robert Hughes, *Culture of Complaint* (New York: Time Warner, 1993), 68.

[6] Valerie Strauss, “I Would Love to Teach, But…” , *Washington Post* online, December, 31,2013.

[7] Emma Brown, “Former Stanford Dean Explains Why Helicopter Parenting Is Ruining a Generation of Children,”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16, 2015.

[8] Megan McArdle, “Sheltered Students Go to College, Avoid Education,” BloombergView.com, August 13, 2015.

[9] Jeffrey J. Selling, “Helicopter Parents Are Not the Only Problem. Colleges Coddle Students,Too,”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21, 2015.

[10] Robby Soave, “Yale Students Tell English Profs to Stop Teaching English: Too Many White Male Poets,” Reaason.com, June 1, 2016.

[11] Jonathan D. Glater, “To: professor@University.edu Subject: Why It’s All about Me,” *NewYork Times* online, February 22, 2006.

[12] James V. Schall, Another Sort of Learning (San Francisco: Ignatius, 1988), 30-37.

[13]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d*online, October 27. 2014.

[14] 佛蒙特州一个小小的卡斯尔敦州立学院（Castletown State College），现在是“大学”了，是新英格兰地区众多学院改大学的例子中的一个。Lisa Rathke, “Switchingfrom a College to a University Could Mean More Money, More Students,” *Huffington* Post, July 12, 2015.

[15] Catherine Rampell, “The Rise of the ‘Gentleman’s A’and the GPA Arms Race,”*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rch 28, 2016

[16] Richard Arum, “College Graduates: Satisfied, but Adrift,”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a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68.

[17] 2016年的数据是斯图尔特·罗伊斯塔柴尔（Stuart Rojstaczer）教授和克里斯·希利（Chris Healy）教授之前所做研究的延伸，两人在2010年和2012年就这个主题写了论文之后，继续收集分析数据。他们把数据保存在www.gradeinflation.com的数据库里。

[18] 安全空间，指的是在大学校园内被排斥、被边缘化的人群（特别是少数族裔人群、性少数人群等）聚集在一起创造的“安全空间”。这意味着如果受邀演讲者的演讲主题有争议，那么这个演讲会被取消；如果课堂上的内容或观点有可能冒犯部分学生的话，教授需要提前告知，让学生有选择回避的权利。——译者注

[19] 来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众多报告和反应中的两份，见Katy Waldman,“Yale Students Erupt in Anger over Administrators Caring More about Free Speech Than Safe Spaces,” Slate, November 7, 2015; and Shoshanna Weismann, “How Babies Are Made,” *Weekly Standard*, November 10, 2015。

[20] Mará Rose Williams, “Race Protests at Mizzou Could Stunt Freshmen Enrollment,” *KansasCity Star* online, January 13, 2016.

[21] Conor Friedersdorf, “The New Intolerance of Student Activism,” *Atlantic* online, November 9, 2015.

[22] Glenn Reynolds, “After Yale, Mizzou, raise the voting age——to 25,” *USA today* online,November 16, 2015.

第四章

我来帮你“谷歌”一下

——无限的信息是如何把我们变愚蠢的

网络上的信息传播就像高速移动的粒子流，而我的大脑现在只会被动接受这样的信息。我曾经是个在语言之海中深潜的潜水员，而今我却像个玩喷气式滑水板的家伙似的在海面上风驰电掣。

——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

也许互联网是能让我们所有人变聪明的，但实际上它却让我们很多人变愚蠢了，因为互联网不仅是好奇者的吸铁石，还是轻信者的落水坑。互联网把每个人都变成了即时专家。你有学位？呵呵，我有谷歌搜索！

——弗兰克·布鲁尼（Frank Bruni）

不要在互联网上看到什么都相信，尤其是名人名言。

——亚伯拉罕·林肯（或许是吧）

史特金定律[1]的回归

你问任何一个职业人士或专家，是什么导致专家之死，大多数人会立刻指向同一个罪魁祸首——互联网。过去人们需要咨询某个领域的专家的建议，现在只需要在浏览器输入关键词，几秒钟之内就能得到答案。如果你能靠自己获取信息，那又何必去依赖那些比你有更多教育和经验的人——或者更坏的情况，还得预约？

胸痛？问问你的电脑。“我胸痛是为什么？”在0.52秒之内就会搜出超过1 100万条结果（至少在我用的搜索引擎上是这样的）。一连串信息充斥在你的屏幕上，各种忠告纷至沓来，来源参差不齐，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到其他没那么声名显赫的机构。有些网址还会草率地给潜在病人做个诊断。你的医生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以为他是谁啊，怎么能和你面前热情洋溢的屏幕争个高低，屏幕不到一秒就能回答你的问题。

事实上，谁也别想和谁争辩。在信息时代，没有什么观点是屹立不倒的。我们现在随身携带的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里储存的信息比整个亚历山大图书馆（Library of Alexandria）[2]的馆藏还要多。在这本书的前文，我提到了经典情景喜剧《欢喜酒吧》里的人物克里夫·克莱文，一个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本地人，平日里就喜欢在一个波士顿酒吧给其他常客普及知识，天南地北，什么都谈。但是，放到今天，克里夫不可能存在：他一说开场白“众所周知”，酒吧里的所有人都会掏出手机，证实（更多情况下是证伪）克里夫的任何言论。

换句话说，技术创造一个世界：我们人人都是克里夫。然而这就是问题所在。

尽管恼怒，但专业人士可能会认为，他们的专业知识受到挑战，互联网不是首要原因。与其说是互联网导致专家和外行之间的沟通崩塌，不如说是互联网加速了这个进程，因为在通往学识渊博的道路上，互联网提供了一条捷径。网络上有源源不断的事实可供搜索，人们以为这些事实堆砌起来就是专业知识，就沉浸在这样的幻想中，以为照葫芦画瓢，就可以拥有良好的知识素养。

专家都知道，事实不等于知识和能力。在互联网上，“事实”有时候还不是事实。在抵制现有知识的运动中，有各种各样的小规模战斗，而互联网就像是炮火增援：持续不断的随意轰炸，互不相干的信息像雨点一般砸在专家和老百姓身上，震耳欲聋，任何想要进行理性探讨的念头都在枪林弹雨中灰飞烟灭。

互联网用户创造了很多幽默的法则和推论来描述电子世界的讨论。不管辩什么话题都要带上纳粹德国，就是高德温法则（Godwin’s Law）[3]和希特勒归谬法（reductio ad Hitlerum）[4]的灵感来源。网友的观点往往都根深蒂固且无法改变，这就是珀梅尔定律（Pommer’s Law）的根基，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想法会被他 / 她在互联网上浏览的信息所改变，那这种改变本质上都是从没有观点到持有一个错误观点。还有很多其他的法则，包括我个人的最爱，斯凯特法则（Skitt’s Law）：“任何试图指责纠正另一个帖子拼写或语法错误的帖子，本身必定含有拼写或语法错误。”[5]

但是谈到专家之死，浮现在我脑海里的是一个早在个人电脑还没有问世时就已经存在的法则——史特金定律，是由传奇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Theodore Sturgeon）提出的。在20世纪50年代初，品味高雅的批评家贬低通俗文学的质量，尤其针对美国的科幻小说。他们认为科幻和奇幻写作是文学贫民窟，他们对此嗤之以鼻，说大多数都是毫无价值的。史特金愤怒地回应，说这些评论家把标准定得太高。他说，大多数领域的大多数作品，质量都低，包括当时人们眼中的严肃作品。“任何事物，90%，”史特金宣判，“都是垃圾。”

放到互联网领域，史特金的90%定律可能还是虚报低价。整个互联网的规模和容量之大，以及互联网无法自动区分有意义的知识和无聊的噪声，都意味着优质信息总是会被冗余数据和不着边际的奇谈怪论淹没掉。更糟糕的是，无法跟上互联网的发展变化，就算有任何团体或机构想尝试，也是无路可寻。1994年，线上网站不到3 000个。到了2014年，网站数量超过了10亿。[6]其中大多数都是可以搜到的，而且会在几秒钟内就呈现在你眼前，至于质量如何暂且不论。

好消息就是，就算史特金定律成立，那也还是有1亿个优质网站。这就包括世界上所有的大型新闻报刊（很多都是网站比印刷版的更普及），智库、大学和研究机构的主页，还有大批科学、文化、政治界要人的网站。当然，坏消息就是，只有在海量冗余信息的暴风雪中栉风沐雨、砥砺前行，方能重见天日，找到这样的信息。至于那些或无用或误人子弟的冗余信息，人人都贡献了一分力量，从用心良苦的祖母，到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lamic State）的杀手。这个地球上最聪明的一些人在互联网上拥有一席之地，但是，同一个星球上最愚蠢的一些人也在互联网落户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鼠标点击下一页或下一个链接。

在互联网上停靠着无数大型垃圾装卸车，这是史特金定律的梦魇。人们要在几十个电视新闻频道中进行选择、获取信息，已经是左右为难了，现在又要面对成百万个网页，而且成立网站没有门槛，只要你愿意付费就行。互联网持续地改善我们的生活，因为它让更多人能够更多地获取信息，彼此交换信息，这是前所未有的，就这一点而言，互联网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成就。但是互联网也有阴暗面，它对人们获取知识的方式和对待专业知识的态度造成了重大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最显而易见的问题就是，人们可以在网上自由发布任何东西，这就让公共空间充斥着不良信息和半桶水的见解，泛滥成灾。互联网让百花齐放，但大多数花却散发着臭味，包括一些随心所欲的博主在那痴人说梦，天马行空的阴谋论，还有团体和政府精心策划的运动，内里包裹的却是虚假信息。互联网上有些信息是错的，因为看上去就凌乱马虎；有

些是错的，因为好心人就是不太懂事；还有一些是错的，因为发布信息的人就是出于贪婪或纯粹的恶意。而媒介本身，没有评论或加以编辑，会以同样的速度把这些信息奉上。互联网是一个容器，不是一个推荐人。

而这恰恰就是纸媒那个基本悖论的升级版。正如撰稿人尼古拉斯·卡尔所指出的那样，15世纪古滕堡的发明让早期的人文学者“咬牙切齿”，他们担心“印刷书和大报[7]会破坏宗教的权威，让学者和作家的作品贬值，煽动暴乱和道德败坏”[8]。

那些中世纪的摇头族也不完全是错的。这些印刷厂大规模印制了《圣经》，教人们阅读，最终提高了识字率，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的自由。当然，也有人利用印刷品来宣传疯狂的东西，比如《锡安长老会纪要》(*Protocols of the Elders of Zion*)[9]，引导人们把言论和事实混为一谈，支持极权统治者的宣传作品，破坏人类的自由。互联网就是以光速运行的印刷厂。

除了助推虚假信息的洪流，互联网还削弱了普通人和学者进行基础研究的能力，这种技巧本来能够帮助每个人在杂草丛生的信息荒野里去芜存菁。这句话从一个学术界的人口中说出来，听着有些奇怪，因为我欣然承认，互联网的存在让我的写作轻松了许多。在20世纪80年代，我要想整理写出一篇论文来，得随身抱着一大捆书和文章。现如今，我只要把各种可读的电子版文章存到浏览器的书签和文件夹里，一切都触手可及。这不是比在一个图书馆的复印机前花几个小时看到眼快瞎了强吗？

从某些角度来说，互联网的便利性是莫大的福利，但仅限于接受过调研训练、明白自己在找什么的人。订阅电子版的《外交》（*Foreign Affairs*）或《国际安全》（*Interntaional Security*）比在图书馆埋头查阅或不耐烦地查看办公室信箱容易多了。可惜，这对学生或未受训练的普通人来说毫无益处，他们没有学过怎么判断信息的出处或作者的可信

度。

而图书馆，或者至少里面的索引和学术期刊，是你摒除各种干扰和喧嚣的第一个切入口。去图书馆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尤其是当一个读者还会花时间去向图书管理员求助。但互联网就不像图书馆。互联网就是一个巨大的仓库，任何人都可以往里面丢任何东西，从第一对开本到伪造的照片，从科学论文到色情文学，从短公告到毫无意义的电子涂鸦。这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监管的环境，敞开大门，来者不拒，受市场或政治驱使的内容，老百姓不明就里决定发布的内容，没有专家把关，统统可以进来。

猫王（Elvis Presley）的5 000万粉丝真的会错吗？当然会了。

具体来说，当你搜索某个信息，出来的结果是由这个搜索引擎的算法决定的，搜索引擎的背后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公司，使用的标准往往都是对用户不透明的。一个年轻人对“二战”时期的坦克充满好奇心，于是到互联网去搜索，结果出来的很有可能是电视名人比尔·奥莱利(Bill O’Reilly)愚蠢的——但最畅销的——《刺杀巴顿》（*Killing Patton*），而非20世纪最优秀的军事历史学家的著作，虽然难啃，但更为精确。很遗憾，互联网世界和现实生活一样，金钱和名气很重要。

在浏览窗口输入关键词不是调研，那只是在向一个由程序控制的机器提问，而机器本身是无法理解人类的。真正的调研是很难的，而且当人们在成长的环境中不时会受到电子产品的刺激，调研也是很枯燥的。调研需要人们有能力找到真实的信息，总结，分析，整理成文，呈现给他人看。这不是科学家和学者专属的，而是高中教育应该传授的一组基本技能，教会每个毕业生，因为在很多工作和职业中，调研都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面前的屏幕已经有答案，只消搜索一下，几秒钟之内就能生成数百万个答案，挂在五彩缤纷、看起来很权威的网站上，排版漂亮，那又何必费劲去做枯燥乏味的调研呢？

这里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互联网正在切实地改变我们阅读的方式，推理的方式，甚至思考的方式，最倒霉的情况就是都没逃过。我们

期望信息是即时提供的。我们希望信息被拆解之后，以赏心悦目的方式呈现出来——不再是字体小、易破损的纸质书，拜托——我们希望信息的内容是我们想看到的内容。人们不再做那么多的“调研”，因为他们“只需要花费最少的力气，用最短的时间，就能在网上搜索出漂亮的网页，给出的答案还是他们喜欢的”。搜索出来的海量信息，往往质量参差不齐，有时候看似合情合理，从表象上看，似乎这就是知识，让人们误以为自己知道了什么，其实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有一句老话说得对：真正会让你受伤的，不是你不了解的那些事，而是事实并非你了解的那样。

最后，可能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就是互联网让我们变得更刻薄和浮躁，无法进行对彼此有益的讨论。即时通信的主要问题就是即时二字。互联网让更多人能够彼此对话，前所未有——这是一种全新的历史条件——每个人都能即时地和别人对话，但这也许并不总是件好事。有时候，人们需要暂停，反思，给自己时间来接收信息，咀嚼消化。然而，在互联网的平台上，人们可以不假思索地做出反应，结果他们又得花精力去替自己的直觉反应辩护，而不是接收新的信息或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指出错误的人学识更高或经验更丰富，那这情形就更明显。

互联网上哪些是假的？一切

要把互联网上的不良信息全都收录进一本书，根本做不到。神奇疗法、阴谋论、伪造的文件、张冠李戴的引言，还有更多，都是在全球知识花园里野蛮生长的顽强杂草。至于优质一些但没那么顽强的花草，根本没希望存活。

比如，在时间的长河里屹立不倒的古老都市传说和阴谋论经过修修补补，在网络上重获新生。我们都听说过下水道的鳄鱼，名人的离奇死亡，还有图书馆倒塌是因为没有人计算过书的重量，这些故事口耳相传。在互联网上，这些故事经过精美的编排，还配上图片。它们通过邮件和社交媒体迅速传播，现在就有了一些团体，比如令人钦佩的Snope.com[10]网站和其他的事实核查组织，它们就做一件事，扑灭知识垃圾篓里烧不尽的野火。

可惜，它们是在与大势为敌。人们上网，不是为了让自己的不良信息得到纠正，或让自己珍视的理论被推翻。他们想让这个电子数据库来肯定他们的无知。2015年，《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凯特琳·杜威（Caitlin Dewey）就表达过自己的担忧，她担心事实核查永远无法打败谬论和骗局，因为“没人有时间或认知能力去推理出所有明显的微妙差别和差异”[11]。最后，她叹气道：“揭穿他们也于事无补啊。”

在她写下这些话的两个月后，杜威和《华盛顿邮报》放弃了，停掉了每周专栏《互联网上哪些是假的》。这样的疯狂，谁能与之俱进，而且一旦骗子搞清楚怎么通过传播谬论来骗取点击量，以此捞钱，那就更是追不上他们的步伐了。“坦白说，”杜威告诉自己的读者，“这个专栏本来也不是为了解决当下的困局。这种形式根本行不通。”而杜威与专

业研究员的对话就更令人警醒，研究员告诉她："当下制度不信任感极高，认知偏见总是非常强，以至于那些相信假新闻的人常常只有意消费与自己观点一致的资讯——即便这些资讯明显是假的。"[12]杜威和《华盛顿邮报》对抗互联网，互联网赢了。

很多无稽之谈，尤其是政治上的传说，一搭上互联网就开始风靡，而且还长盛不衰。一个固执的怪人团体可能至今还相信地球是平的，或者美国人从来没登上过月球，但对其他人来说，所有从太空传回来的照片已足够证明一切了。至于一些都市传说，像巴拉克·奥巴马出生在非洲，"9·11"恐怖袭击其实是乔治·W.布什精心策划的，美国财政部密谋把美元换成一种世界货币，就算连带着摄像机的宇航员也帮不上忙了。社交媒体、网站和聊天室把从"朋友的朋友"那听来的传说和故事以及谣言变成"事实"。

英国作家达米安·汤普森（Damian Thompson）曾经这样解释，即时通信刚好让那些整天想入非非的人和团体称心了，他们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还是相当危险的。汤普森称之为"反知识"，因为它就在科学的面前张牙舞爪，对证据无动于衷。

> 现在，由于互联网的存在……一个关于反基督者的谣言能在几秒钟之内从瑞典哥特人中飞窜到澳大利亚极传统的天主教徒当中。少数群体越来越包容彼此的怪异信条。几十年前，黑人种族主义者与白人种族主义者尝试着开始接触，现在这两个群体因为交换阴谋论故事，交往十分活跃。[13]

在一个节奏更慢、彼此联系没那么紧密的世界，这种团体不可能会因为网上有其他极端分子即时予以肯定而更坚定自己的信念。思想的自由流动，的确大大推动了民主，但也裹挟着风险，因为无知或邪恶的人会变通利用大众传播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宣传谎言和谬论，哪个专家出手也消灭不掉。

更糟糕的是，不良信息能在网上留存数年。和昨天的报纸不同，网上的资讯是持久的，而且只要出现过一次，就会在后续的搜索中跳出来。即使原始出处把虚假消息或谬误删除，它们还会在别的地方存档，继而出现。如果这些故事像病毒般扩散，那在网络世界哪怕只传播几天、几小时，甚至几分钟，要想纠错，也是无力回天了。

举个例子，2015年，保守派的讨厌鬼艾伦·韦斯特（Allen West）就发布了一个虚假的独家新闻，新闻说奥巴马总统强迫美军像穆斯林一样为斋月祈祷。[14]韦斯特的网站把一个耸人听闻的标题——“看看我们的军队正在被迫做什么”——和一张美国士兵在跪垫上跪拜叩头的图片并列放在一起。这样的视觉效果很惊人，故事在社交媒体上飞速传播。

其实根本没有这回事。韦斯特是利用了数年前拍摄的一张照片，照片上是真正的穆斯林在美国军队做祷告。即使有反对的声音指出照片误导人（包括我也反对），韦斯特并没有撤掉这个故事。当然这也不重要了，因为这个故事已经被别的博客或网址保存了。网民既没接受过相关训练，也没有时间去核实信息的出处，他们从现在开始不仅会偶然看到原始的故事，还会看到成千上万的转载和传播，而他们永远不会知道整件事都是胡编乱造的。

现如今，人们无须再被挑剔的事实核查员或坚决的编辑搞得灰心丧气了。过去，人们看到一本装订精美的书，可能就会误信里面的内容是权威的，同样，现在华而不实的网站从视觉上迷惑人，让人觉得网站内容是可靠真实的，不明就里的读者就会迅速传播这些不良信息，其速度超过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15]能想到的任何大标题。当专家和其他职业人士还在坚守枯燥严苛的逻辑和事实准确性，一个机器就能用1 600万像素的显示屏给出迎合读者口味的答案，人实在是无法与机器抗衡。

当然是安全的，我都谷歌过了

互联网上现在充斥着华而不实的自制网站和躲都躲不掉的脸书帖文和网络迷因（memes）[16]，先撇开这些不说，人们想要迅速找到答案的心理，就是在给这个向大众兜售不良思想还要让大众为获取错误信息买单的产业推波助澜。我这里说的不是网络新闻业——那是下一章的内容——我说的是很多给大众出谋划策意图排挤和取代专家专业知识的网站，通常是由名人代言的。

你是个担心生育健康的女性吗？我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我认识的那些女性告诉我，定期去看妇科医生不是什么让人愉悦的事情。不过，既然现在有互联网了，女性有了除专业医生之外的信息来源：女演员格温妮丝·帕特洛(Gwyneth Paltrow)有自己的“生活时尚杂志”，GOOP.com，她可以和你讨论很多保持妇科健康的方法，包括阴道熏蒸，你可以选择在你家里这种私密的环境聊，也可以通过电话聊。

如果你还不熟悉这种操作，帕特洛女士倾情向你推荐。“你坐在一个迷你的座位上，”她在2014年说过，“红外线结合艾蒿熏蒸帮你清洁子宫，以及其他地方。这是一种能量释放——不仅做到熏蒸灌洗，还能帮你平衡雌性激素的水平。如果你在［洛杉矶］，你得这么做。”

但是，实际上妇科医生并不推荐洛杉矶或任何地方的女性熏蒸身体中间段的任何地方。一个叫珍·甘特（Jen Gunter）的妇科医生建了自己的网站（明显网站没有那么炫），给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建议：

> 熏蒸无法通过你的阴道进入子宫，除非你用一种辅助工具加压之类的，而且，千万不要这么做。艾蒿或苦艾或其他用来熏蒸的东西，无论是用在阴道还是外阴，都无法平衡生育激素，调整你的生

理期，治疗抑郁，或治疗不孕症。就算用雌性激素来熏蒸也做不到。

如果你想放松自己，做一次好的按摩。

如果你想放松自己的阴道，来一次性高潮。[17]

但是，帕特洛的网站就是流行的缩影，至少对某一类人是如此。讽刺作家劳拉·胡珀·贝克（Laura Hooper Beck）完美地诠释了帕特洛粉丝的那种盲从："基本上来说，如果一个医生让我这么做，我还很难过心理上这一关，但是，如果一个戴着难看的假发、纤瘦的金发美女告诉我，朝着我的阴道吹热气，能治愈我承受的所有痛苦，包括我和母亲的关系不合，怎么说呢，嗯，我会听格温妮丝·帕特洛的话，因为闺蜜懂科学。"[18]

当然了，取笑没内涵的名人很容易，太容易了，我知道。因为帕特洛和她的健康建议更多都是关系到熏蒸和阴道的，和我职业生涯中的研究关系不大，暂且放到一边。但不管怎么说，互联网上的这个现象对专家之死还是有很重要的影响。早些时候，一个有头脑的美国女性得发挥多大的能动性才能搞清楚一个好莱坞女演员是怎么熏蒸阴道的。现在，任何问题——从时尚到子宫癌——都到网上找答案的一个女人，在网上看GOOP（一个女性购物网站）的时间，竟然比见自己的医生还多。

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互联网会放大这个效应。我们可能会对金·凯瑞那些反疫苗的激昂演说置之不理，只当这是一个喜剧明星独特个性的延伸，但是，有些名气更大的人也会深陷电子奇幻屋，不可自拔。

2015年，《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兰克·布鲁尼接到小罗伯特·F.肯尼迪—1968年被刺杀的参议员兼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的电话。肯尼迪告诉布鲁尼，他们的会面很重要。肯尼迪坚持要纠正布鲁尼在疫苗问题上的观念。肯尼迪和很多其他美国人一样，因为对疫苗

的浅薄认知，被妄想症困住，认为疫苗正在掀起美国儿童中间的“一场大屠杀”。（事实上，布鲁尼注意到凯瑞“已经明显入了小罗伯特·肯尼迪的坑”。）布鲁尼后来回忆这次见面：“我是支持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美国儿科学会（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卫生研究院和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但］肯尼迪已经了解很多了。”[19]

肯尼迪、凯瑞和其他人做了一件很多美国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做的事：他们先入为主地下了定论，再去互联网找资料支撑自己的观点。就像布鲁尼指出的：“反疫苗斗士总是能找到一个变节的研究员或随意的‘研究’来支持自己。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博学之道：你就一直上网浏览，直到你得出你想要的结论。你用点击最终求得了证实，认为有一个网站这么说就代表这个观点是合理的，这两者是不可混为一谈的。”

在互联网世界走马观花——被普通人误解成“调研”——让民众和专家、专业人士之间的互动变得很艰巨。证实性偏见又成了罪魁祸首：虽然网络上的很多故事都是假的或不准确的，但10亿个故事里，总有一次谷歌是对的，而专家是错的，这样的故事就会像病毒一样疯狂传播。比如，2015年有一个悲剧性的案例，一个英国青少年被医生误诊，医生还跟她说：“不要再去谷歌你的症状了。”[20]这名病人坚称自己罹患一种罕见的癌症，但可能性被医生否定了。结果，她是对的，医生错了，而她，死了。

这名英国少女的故事轰动一时，一个罕见的错误或许让许许多多人相信自己可以给自己看病。当然，有人用电脑把自己的心脏病误诊为消化不良死了，这样的故事永远成不了头条新闻。但这不重要。这种大卫和歌利亚式的故事[21]（一个少女怼上她的医生团队）刚好往大众证实性偏见的无底洞里填点儿料，助长了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愤世嫉俗，也巩固了他们的错误信念，以为解决问题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

曾几何时，书籍至少还算是错误信息迅速传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障

碍，因为出书是很耗费时间的，还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和出版商的评判。“我在书里读到过”说明“这件事可能不是疯了，因为一个公司肯花钱把它印到封皮里面出版”。当然，这也并不总是对的，有些书确实是经过仔细的事实核查、同行评审、编辑，但还有一些书却是风风火火地印出来，匆匆忙忙地送到书店。

不管怎么说，有信誉的出版社出的书至少还是会走一些基本的流程，作者与编辑、审稿人、发行人之间会进行协商，你们现在读的这本书就是这样问世的。但是，评论家和读者就看不上一些自费出版的书，这是合情合理的。可是，今天的互联网就等于成千上万个自费出书的出版社，任何人，无论想法多愚蠢或多邪恶，只要有键盘在手，都可以把想说的话变成粗制滥造的作品。［就像《国家杂志》（*National Journal*）的罗恩·福尼尔（Ron Fournier）说的，在互联网时代，“每个偏执狂都是个出版商”。］网上也确实隐藏着相当数量的智慧和资讯，但都逃不过史特金定律。

当一个主题摆在面前，上网搜索反而会让人变愚蠢，还不如什么都不搜。搜索信息的行为让人们以为自己学到了东西，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浸泡在自己不理解的数据中。花费大量时间浏览网页后，人们分不清哪些是在眼前一闪而过的，哪些又是他们真正知道的。

在屏幕上看见一些单词不代表阅读或理解了它们。耶鲁大学的一个实验心理学家小组调查了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他们发现，“人们在网上搜索信息的时候，对自己究竟知道多少，包括和他们谷歌的主题不相关的内容，都会产生膨胀的错觉”[22]。这就是网络版的达克效应，在上网的时候，越是能力差的人越难意识到自己其实什么都没学到。

当人们上网去搜索信息，比如找“化石燃料”的资料，翻网页的时候，可能好多都是讲相关主题的，比如“恐龙化石”。一个个网站从眼前掠过，翻到一定程度时，他们已经意识不到，刚刚读到的关于任一主题的内容，他们在上网搜索前并不知道。结果呢，他们还以为自己知道恐龙和柴油燃料的相关信息，因为他们就是那么聪明。上个网查个资料，

就觉得自己很聪明，就好像在暴风雨中穿行打湿了衣服，就觉得自己是游泳健将。

耶鲁那个团队阐述这个问题的时候比较委婉，说这是“误把外包的知识当作内化的知识”。更直接的表述就是，当人们不停点击鼠标走马观花地看，他们记不住看过的绝大多数内容。正如作家汤姆·雅各布斯（Tom　Jacobs）所说的，搜索“似乎会让人对自己的知识产生莫名其妙的自信——鉴于人们越来越养成一个习惯，就是碰到任何现实中的问题都本能地去网上找答案，这就有点儿让人心惊了”[23]。

让人心惊，那是有可能；让人心烦，那就是一定的了。对自己获取的知识有错误的判断，会让专家的工作很难开展。如果人们相信自己花一个早上的时间去搜索，就能掌握别人花10年学到的知识，这样的人是没办法开窍的。和外行说上三言两语，就能让一个专家的心沉下去，比如听到他们说“我已经上网搜索了一下”。

如果是在网络世界的耳濡目染下接触到这么多信息，怎么就不能好歹提高一下基本的知识水平呢？人们看的那么多，记住的怎么就那么少？答案很简单：很少有人认真看自己找到的内容。

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London）的一项研究发现，人们在网上搜索的时候，并不会认真看他们找到的文章，他们只会扫一下标题或头几句话，然后就跳过去看别的了。研究员指出，互联网用户“在网上看东西的时候，用的不是传统阅读方式，有迹象显示，现在出现了一种新型‘阅读’方式，也就是用户‘快速浏览’标题、目录和摘要，以达到速成。似乎他们上网就是为了避免传统的阅读方式”[24]。这实际上是与阅读对立的，目的不是学习，而是赢得辩论，或者证实一个先入为主的观点。

孩子和年轻人尤其易受这种倾向影响。伦敦大学学院的研究表明，这是因为他们“对互联网还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没领悟到原来集结在互联网上的资源都来自四面八方，出自不同人之手”，所以他们几乎不

花时间去认真“评估信息的相关性、准确性或权威性”。这些年轻人“没法凭直觉在图书馆找到需要的资料，所以就用谷歌或雅虎了！”因为这些搜索引擎的服务“提供了一种熟悉但更简单化的方法，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老师和专家也难以抵挡同样的诱惑。“快速浏览和查看，”据研究表明，“似乎适用于所有人。摘要在上了年纪的研究员当中的流行程度，也是相当暴露问题的。”

“社会，”伦敦大学学院的作者们总结道，“正在粗鄙化。”

这个问题看起来已经很严峻了，实际上更严峻。互联网用户会被一切排在搜索第一位的结果所吸引，进而去相信，大多不会去考虑这个结果的出处。毕竟，如果搜索引擎把它排得那么靠前，就是一种信任，那就一定有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想在互联网上推广的人，都在想方设法让自己的产品出现在搜索结果页面更好的位置：如果你是卖汤的，你就要竭尽所能去发动搜索引擎，这样人们在搜煲汤菜谱的时候，跳出来的却是你们那个品牌靓汤的优惠券。

但是，如果你兜售的东西比汤重要，比如政治候选人呢？至少搜索引擎排名的蛛丝马迹能改变人们对政治现实的理解。2014年，两名心理学家完成了一项研究，叫作“搜索引擎操作效应”，并且断言他们的测试显示，“一次搜索过程就能把支持某个候选人的民众比例提高37%～63%”，这有可能构成对“民主政府系统的严重威胁”[25]。现在就下结论说搜索引擎在破坏民主还为时过早，至少现在还没有，但有一个事实无可争辩，那就是大多数普通民众都不再能够区分真实信息和搜索引擎顶起来的信息。

大众的集体智慧

显然，外行不会总是错的，专家也不会总是对的。曾经就有过那么一个甚为罕见的情况，一个青少年是对的，一个医生团队却错了。专家是很重要，但是没有教授、知识分子和其他饱学之士的建议，普通人每天也还是在努力生活着。互联网，只要应用得当，是能帮外行们相互补充基本信息的，这些信息如果从专业人士那里获取，要么成本高，要么很费劲。事实上，互联网就像股票市场和其他需要集合大众关于一个复杂事物的猜测和预感的机制一样，在某些时刻，普通人的表现会胜过专家。

大量错误的猜测汇总到一起，却脱胎换骨成一个很正确的猜测，这是一个被广为接受的现象。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James Surowiecki）曾经提过一个合理的概念叫“集体的智慧”，另外还有一个匪夷所思的概念，指大众是智慧的，因为这群乌合之众里的个体也是智慧的，遗憾的是，人们认为互联网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平台，其实就是在混淆这两个概念。

有些时候，一大群没有任何专业知识的人一起对某件事的猜测，可能比其中任何一个人的猜测要准确。尤其是当你把许多的猜测汇总起来，由此得出的一个整体结果可能比任何一个专家的观点还要高明。索罗维基讲述过1906年英国一个乡村集市的故事，集市上大家都要猜一头公牛的重量。大家猜的结果得出的平均值，比任何一个人的猜测都要准确，而且和真正的重量相差无几。[26]类似的，大体上而言，世界上股票的总体交易情况，是比任何一个股票分析师更好的股票风向标。

集体的猜测胜过个人，是有很多原因的，比如一大群人做出猜测，猜测的总量就很庞大，有助于消除一定程度的证实性偏见、误解或若干

其他的错误。而且这样一来，只有片面信息的人还能为这个问题略尽绵薄之力，帮助解决问题，这就像1 000个人能完成一个巨大的拼图一样，尽管每个人手中只有几块拼图。

举个例子，群众公正的眼光，就曾让美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丢了饭碗。2004年，美国大选达到高潮之际，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的老牌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和他的制片人播出了一个关于在任总统乔治·W.布什从军记录的一个新闻。CBS声称握有20世纪70年代初的文件，证明布什逃过一个空中国民警卫队部队的兵役，并且从来没有完成自己的服役任务。布什，美国的三军总司令，把美国拖入两场大规模战争，而他的竞选对手参议员约翰·克里（John Kerry），是一个授勋的战争英雄，当时的竞选主要聚焦在军事议题上，所以这样的指控可谓群情沸腾。

布什的支持者提出反对，说消息来源可疑，报道草率，但最终打倒这个故事的不是愤怒的忠贞分子，而是普通网民。民众没有新闻报道的经验，但花了大量时间在电脑上，结果发现文件的前面和微软Word软件生成的文件非常接近。显然，1971年空军用的是打字机。微软及其旗下的软件在那个时候还不存在。这个文件是伪造的。

面对民众集思广益的挑战，CBS下令调查这篇新闻报道。最终电视网否定了文件和报道。这个节目的制片人被解雇，而丹·拉瑟至今还相信自己是对的，其他人都是错的，离职之后起诉了自己的老东家，最终败诉。

所以，谁需要专家呀？如果我们反复追问同一个问题，或是安排足够多的人手去应付一个主题，为什么不靠着他们集体的智慧，还要去向一小撮自封的智者寻求有瑕疵或有偏颇的意见？如果一个人是聪明的，那100个人就更聪明，能即时进行交流的10亿人一定智商爆表了。

网络百科全书维基百科的粉丝和其他人都说过，未来得靠这种集体知识，而非专家对参考资料和信息的审查。理论上来说，一个公共开放的百科全书，谁都能上去出点儿力，每个条目都有很多人看过，就凭这

庞大的人群基数，应该就能剔除错误和偏颇。如此看来，这些条目的编纂应该会迎合普通人的好奇心，而非一部分学者或编辑的个人趣味。条目的准确度会稳步上升，而且内容也会真正贴近读者，而不是一堆深奥知识的系统总结，虽然全面有条理，但没什么用。

可惜，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维基百科很好地示范了借力互联网取代专家的局限性。事实证明，要围绕很多复杂的主题编写条目，比猜一头牛的重量要难多了。虽然很多人完全是出于好心到维基百科上编辑条目，贡献了自己的时间，但是，也有人是受雇于企业和名人公关公司，所以他们是别有用心的，会让百科全书上的条目以他们想要的样子呈现给大众。（维基百科的撰稿人十个里面有九个是男性，如果读者知道这一点的话，也有可能引起读者的警觉。）

外行和专家之间有一点区别往往被人忽视：志愿者做事情凭兴趣，时间不受限制，而专家每天都在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所以即便初衷再好，像维基百科这样众筹点子的项目也会因此掣肘的。兴趣不同于职业。有一句话应该是英国作家阿拉斯泰尔·库克（Alastair Cooke）说的："专业就是即便你不喜欢也会尽全力去做。"业余爱好者的热情是不稳定的，无法取代专家的判断。

维基百科最初也因为质量不稳定和缺乏监督而饱受困扰，不过集体做的家庭作业不就是这样吗？有一名研究员研究了这些趋势，建议2007年之后的维基百科应该更新座右铭，从"任何人都可以编辑的百科全书"，改为"任何理解词条规范，适应社交方式，能接受半自动化的系统警告和拒绝通知，依旧愿意贡献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人可以编辑词条"[27]。

最终，维基百科会施加更严格的编辑控制措施，但是那些限制反过来又打消了新用户的积极性。麻省理工《技术评论》（*Technology Review*）2013年的一篇文章指出，打造维基百科并且"必须捍卫它不受破坏和恶意篡改"的志愿者人数，"自2007年起，已经缩水超过1/3，并且仍在萎缩"。即便如此，维基百科在维持自身品质方面还是显得捉襟见

肘，即便按照它自己的标准来看也是如此：

> 另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是偏颇的词条，比如维基百科上关于宠物小精灵和女艳星的条目是综合全面的，而关于女性小说家和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条目，则是粗略的。一些条目甚至仍然是难理解的、简略的，甚至是过时的。其中的1 000条志愿者编纂的词条，组成了维基百科的核心，而其他大多数的词条，甚至没有达到维基百科自己要求的合格标准。[28]

维基百科也有一些“特色条目”，必须是“精心编写的”“全面的”“研究透彻的”，“对相关文献做过彻底和有代表性的调查”，提出的主张已经通过“优质可靠的资源”的验证。

换句话说，维基百科真正想要的，其实是让它的精选条目像经过同行互审的知识学问——只是没有用到真的同行。同行互审还是头难驯服的野兽，就算创造一个最佳的环境，也改变不了其本质，编辑要努力分配好监督任务，把监督发挥到极致，还要避免专业人士之间的竞争和其他利益冲突。在一个百万人参与却只有极少监督的项目中，要把同行互审揉进去，这是个异想天开的目标。给维基百科做同行互审，真要实践起来，那这个世界上每个主题的专家都得愿意像保姆照顾婴儿一样去照拂每个条目。

当然，如果从读者角度衡量的话，维基百科还是可圈可点的。在一些条目上，维基百科是一个很有用的信息源。就像麻省理工的文章所指出的，维基百科的词条倾向于“西方的科学技术，以男性感兴趣的内容为主”，所以在一些确切的——更重要的是，无争议的——信息上，维基百科成功地以稳定可信赖的格式汇总了大量资讯。（就我个人而言，我喜欢维基百科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想了解几乎任何一部电影的剧情，都可以去查维基百科，无论内容多简短，或是介绍多模糊。）如果你想知道是谁发现了锶，谁参加了2015年的华盛顿海军大会，或是对去年诺

贝尔奖的简介，维基百科优于其他搜索引擎。

一旦牵扯到政治，事情就变得不那么确定了。比如说，维基百科上化学武器沙林的词条就成了一个角斗场，对叙利亚政府是否对自己的人民使用了沙林持不同观点的人在上面混战。就连基础科学都受到了攻击。身处伦敦的分析师丹·卡泽塔——我在上一章提到的沙林专家，因为帮助一个大学生而吸取了沉痛的教训——在2015年末告诉我：

> 如果谁想要借助现在的维基百科来获取关于化学战争毒剂沙林的信息，他们看到的会是半真半假的内容和大量模糊的表述，而且没有文献的支撑，从而被误导。维基页面上的有些信息，从技术上来讲，是正确的，但措辞方式很有迷惑性，有些表述还是错误的。

卡泽塔还补充说："在叙利亚2013年使用沙林之后，我花了很多时间来纠正大家对沙林的误解，误解从何而来，毫无疑问，很多都要归咎于维基百科相关页面上的错误和半真半假的表述。"

人们对维基百科和其他网络资源以及大众的智慧有误解，以为知识就是把一盒看似正确的信息组装起来，或是进行掷硬币式的预测，其实不然，知识远不止这样。事实不会替自己说话。像维基百科这样的信息来源，作为一个实时更新的年鉴，提供基本资讯，还是很有价值的，但是在更为复杂的问题上，并无太多建树。

集体的智慧是存在的。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大众的选票说了算。互联网制造了一种假象，让人觉得很多人的观点就等于"事实"。病毒是怎么从一个人身上传播到另一个人身上，和猜一猜玻璃桶里有多少软糖，完全是两码事。喜剧演员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曾经抱怨过，你不需要就一个事实搜集别人的观点："你不妨在民调中问问：'15和5，哪个数字更大？'或者'这个世界上有猫头鹰吗？'或者'世界上有帽子吗？'"

同样，公共政策也不是玩预测的室内游戏，而是对成本和各种选项

进行深思熟虑后的长远选择。就一个具体的事件提出问题，让大众像掷飞镖一样地选答案，在政策这个高难度水域很难行得通。回答“叙利亚的巴沙尔·阿萨德会在2013年使用化学武器吗”这样的问题，就像把一个筹码放到轮盘赌的一个颜色上，输赢对半。这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到了某一时刻，你要么赌赢了，要么赌输了。这跟“巴沙尔·阿萨德为什么会使用化学武器”完全不同，和“如果巴沙尔·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美国应该怎么做”这样的困境，差了几光年的距离。但是互联网会把这三个问题合并到一起，把每一个复杂的问题变成民调式的问题，配上一个单选按钮，点击一下，就能迅速给出答案。

人们可以不费力地参与这些问题，甚至有时候普通人的预测是对的，而专家可能还是错的，对于本就抵制专家观点的普通人，这就等于给他们添了一层反智的盔甲。

解除好友关系

学习新事物需要耐心和倾听。但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让我们少了友善，多了敌意和戾气。网络上和生活中一样，人们会把自己归入到小小的“回音室”[29]，只和那些观点一致的人讨论。作家比尔·毕晓普在2008年的著作中把这种现象称为“大归类”，指出美国人现在有一种选群行为，只在同声相求、志同道合的小圈子里生活、工作和社交。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互联网上。

我们不只是和意气相投的人交往，我们还主动和其他人断交，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2014年皮尤的一项调查研究发现，自由主义者比保守主义者更容易屏蔽或删除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但主要还是因为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社交圈子里很少出现观点对立的人。（或者就像《华盛顿邮报》评论这个研究的时候所说的，“在保守主义者的网络生态系统中，意识形态多样性比较低”。[30]）自由主义者在现实生活中因为政治原因而终结一段友谊的可能性也比保守主义者高，但总的来说，意识形态的隔离还是在网络上比较盛行，因为人们不用面对面交流，只要点一下鼠标就能删除好友。

不愿意倾听，不仅让我们彼此相处得更不愉快，也让我们在犯错误的时候，无力去思考，说不出有说服力的话，不愿意接受别人的纠正。在网上忍受一连串的推理只需要点击几下鼠标，当我们连这都无法忍受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容忍有人对我们的信念或想法提出一丁点儿的挑战。这是危险的，因为这不仅破坏了知识和专业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也侵蚀了人们在民主社会相处的基本能力。

这种坏脾气的背后，其实是对平等的错觉，以及社交媒体即时性所

营造出来的平等主义幻象。我有推特账号和脸书专页，你也有，所以我们是平起平坐的，不是吗？毕竟，如果一个大报的金牌记者，一个肯尼迪学院的外交官，一个研究型医院的科学家，和里诺（美国著名的“离婚城市”）的婶婶罗斯，都是活跃在网络上的，那他们的所有观点都是从你眼前闪过的一大堆信息。这个观点和某个主页上的上一条帖文又有什么好坏之分。

在社交媒体的时代，使用互联网的人都会假设每个人在线上都是同样聪明的，或是见识相当的。就像《纽约时报》影评人A.O.斯科特（A.O.Scott）所说的：

> 在网络上，人人都是评论家——利用Yelp（美版大众点评）打击侵权的艺术家，亚马逊奖学金获得者，在社交媒体上点赞和分享的啦啦队长。这些自我膨胀的人，常常质疑像我这样跟油墨打交道的人，他们已经在数字世界的混乱中获得了平等。如果有一个友好的算法根据你之前的购买记录告诉你，有些东西是你可能会喜欢的，还有脸书的好友大军肯定你做出的选择是明智的，你哪还需要一个絮絮叨叨的怪人。[31]

社交媒体的匿名特性会诱使用户在争论的时候假设每个参与者都是一样的，是一群水平相当的人，有着同样的背景和教育水平。很少有人会在现实生活中这样想，但在网络上，任意的评论者对自己的才学都是自恋的，这一法则取代了面对面交流时的一切惯例。

在社交媒体上，彼此好像很远，又好像很近，这种距离和亲密的奇怪结合毒害了对话。理性辩论需要参与者坦诚相待、心存善意。在现实中的近距离有助于建立信任和理解。我们的大脑不只是处理不同数据碎片的容器，我们会倾听别人的话，而且我们还会通过视觉和听觉的线索获取信息，而不只是看着一串词语在眼前飘过。老师格外明白这一点，同样的内容，远程或网络教学的效果和面对面互动的教学效果是不一样

的；面对面的时候，学生能提问，会皱眉，或是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远程和匿名的特性，让耐心和善意在网络上荡然无存。在网络上，信息是快速便捷的，人是可以只说不听的，再加上“键盘上的勇气”，会让人们说出一些当面永远不会说的话，结果不欢而散。就像作家安德鲁·沙利文（Andrew Sullivan）所指出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在网络上没有什么是决定性的，所以辩论中的每一个参与者都要求获得平等和认真地对待。

> 这种现象背后的主要推手，恰好就是建国先贤们对民主文化的担忧：感觉、情绪和自恋取代了理性、经验主义和公益精神。线上辩论只要一开始，就会变得很个人、情绪化和不可解决。当然，偶尔也会有理性的观点来回穿梭，但鲜少有精英权威人士来一锤定音，说出其中哪些观点的确是对的或有效的或重要相关的。[32]

推特、脸书、红迪网和其他网站是可以成为有见地的讨论平台，但是，我们在这些场所里看到的，往往只是一连串的断言、笃定、才疏学浅和谩骂，而非真正的交流。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互联网，有些人可能一辈子也不会遇见彼此，互联网促进了他们之间的谈话。内向的人可能会辩解说，像红迪网这样的平台或是一个网络日志的评论版块为很多人打开了一扇大门，让以前可能不愿意参与公共讨论的人也有了互动的场所。可惜啊，允许任何人发表观点也就意味着几乎人人都会发表一个观点，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出版物，从《多伦多太阳报》（*Toronto Sun*）到《每日野兽》（*Daily Beast*），都关闭了线上评论版块。

这些互动对于松绑外行对错误信息的迷恋毫无用处。实际上，问题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有些人在遇到铁证说明他们是错的时候，并不会接受自己犯了错误，反而会更加坚定原来的判断。这就是“逆火效应”，也就是说，无论有多么清晰的迹象显示他们是错的，他们还是会

加倍努力地维持自己内在叙事的前后一致。[33]

就像戴维·邓宁所指出的，互联网在很多方面强化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当你想反驳一个愚蠢的想法时，你在对话中至少要重复一次。这就给教师和其他专家制造了一个雷区，当你承认这个错误的存在时，其实反而可能会让这个错误更深入人心。

>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错误信息满天飞，而且和实体课堂不一样，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这样的地方是很难控制的。在互联网的狂野西部，最好完全不要去重复大家共有的错误观念。告诉人们巴拉克·奥巴马不是穆斯林不会改变多数人的观念，因为他们时常会记住听到的一切——除了关键限定词“不”。[34]

有些专家试图去对抗这种固执的无知，他们以为自己在帮忙，其实他们所做的只是等于用水扑灭油火，不但不起作用，反而会让伤害四处飞溅。

互联网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匿名媒介。由于互联网的存在，远程辩论成为可能，平等蒙上一层廉价感，这些正在侵蚀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专家和平民都不能幸免。互联网，在键盘前面孤零零的，里面却充斥着各种网站、新闻和致力于确认一切想法的网络社群，从政治上和智识上把数百万美国人陷于自身偏见的泥淖里。而像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放大了这个回音室。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在2016年写道：“即使我们没有刻意屏蔽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脸书也会有选择地给我们推送内容，这样我们会看到更多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喜欢’什么？当然是与我们志同道合的人和帖文啊。”[35]

尤其是现在，脸书和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成了众多美国人新闻和资讯的主要来源，那就危险了。有些专家还试图突破这层政治偏狭和自信无知的外壳，但这样无异于引火自焚。你和一个理解错误的人争论已经够难了，如果这个人还收集了大量网站作为“证据”，整编了一支趣味相

投的社交媒体匿名朋友大军，这帮朋友一样持着无知的观点予以支持，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同时，有学者和专家如果坚持有逻辑和扎实的知识，坚守来源的基本规则，可能就会受到21世纪的网民的谴责，说他们不过是精英分子，不懂信息时代的神奇。

网站和互联网调查也许不可靠，但记者可以从中挖掘事实真相，而不是被拖入旋涡。记者仍然可以利用调查、寻找出处和事实核查这样谨慎的工具，在这团嘈杂纷扰中担当权威人士。

又或者，到下一章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或许是另一番景象。

---

[1] 史特金定律（Sturgeon’s Law），是由科幻作家西奥多·史特金提出的。此定律认为：任何事物（特别是用户创造的内容）90%都是垃圾。引申到目前的社区网站的内容，意思是：社区所有的作品中，90%以上的作品都是垃圾。因此要有能力去芜存菁。一般而言，社区中只有1%的人在贡献，10%的人参与评价，而90%是大多数的沉默者。——译者注

[2] 亚历山大图书馆，始建于托勒密一世（约公元前367—公元前283年）时期，盛于托勒密二世、三世时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图书馆之一。馆内收藏了贯穿公元前400—公元前300年时期的手稿，拥有最丰富的古籍收藏，曾经同亚历山大灯塔一样驰名于世。可惜的是，这座举世闻名的古代文化中心，却于3世纪末全部毁于战火。——译者注

[3] 高德温法则，是指在互联网文化中，1990年由麦克·高德温（Mike Godwin）首倡的一句格言：“在在线讨论不断变长的情况下，把用户或其言行与纳粹主义或希特勒类比的概率会趋于一（100%）。”这句格言源于互联网上很多人看到自己不喜欢的人或物就拿希特勒来类比。——译者注

[4] 希特勒归谬法，是一种诉诸人身谬误，即宣称某个像希特勒般邪恶的人或团体也支持某主张，因此这个主张无效。希特勒归谬法算是一种诉诸负面权威，是诉诸权威的反向运用。例一，希特勒既吃素又爱家，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不该吃素或爱家。例二，纳粹和其他威权政府拥有死刑，他们利用死刑来排除异议分子，对人民的权利危害甚大，因此死刑是罪恶的，我们不该支持死刑。例三，希特勒对烟酒持坚决反对态度，而他是邪恶的，所以我们应该吸烟酗酒。——译者注

[5] 斯凯特定律，墨菲定律的网络版。墨菲定律是一句流传甚广的格言：假如你写任何关于批评编辑或校对的文章，那么你的文章中必定会存在某种形式的错误。后来在网络上衍变成了斯凯特定律。——译者注

[6] Adrienne LaFrance, “Raiders of the Lost Internet,” *Atlantic* online, October 14, 2015.

[7] 大报，是各类报刊尺寸中最大的一种形式，为规范长度的纵向版式（通常在559毫米以上）。这个词源于15—18世纪在欧洲以及新大陆大街上出售的一种便宜的图文结合的单面印刷

物。大报形式的印刷品通常为一个宽版纸张，包含有从叙事到政治讽刺的各种内容在街头发售。——译者注

[8] Nicholas Carr, “Is Google Making Us Stupid?,” *Atlantic* online, July/August 2008.

[9] 《锡安长老会纪要》，是1903年在俄国首度出版的一本反犹太主题的书，原始语言为俄语，作者不详，其内容为描述所谓“犹太人征服世界”阴谋的具体计划。——译者注

[10] Snopes.com，是美国一家专门核查并揭穿谣言和传闻的网站，创办者是一对美国中年夫妇，针对这些问题，网站会验证各种说法的真实性，并且毫不留情地揭穿那些彻头彻尾的谎言，网站会用“真/假/不确定”的可信度评定。——译者注

[11] Caitlin Dewey, “What Was Fake on the Internet This Week: Why Do We Even Bother,Honestly?,”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30, 2015.

[12] Caitlin Dewey, “What Was Fake on the Internet This Week: Why This Is the Final Column,”*Washington Post* online, December 18, 2015.

[13] Damian Thompson, *Counterknowledge* (New York: W. W. Norton, 2008), 11.

[14] Allen West, “Obama’s America: Look What Our Troops Are Being FORCED to Do for Islam’s Holy Month,” allenbwest.com, June 29, 2015.

[15] 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美国报纸发行人。继承父亲的产业，于1887年接办旧金山《考察人》报；1895年购买《纽约晨报》，改名《美国人日报》后重新发行。由于经营有方，降低售价，增插图和彩色专页，登载迎合读者口味的文章，尤其是增强有官能刺激的“黄色新闻”以及鼓吹战争的煽动性文章，报纸销路大增，发展成庞大的报业托拉斯。——译者注

[16] 网络迷因，就是在网络上像病毒般衍生复制传播，迅速扩散的内容。这样的信息有点儿类似于“圈内笑话”，也就是只有大批互联网用户知晓的、最前沿的、引人关注的信息。网络迷因通常以超链接的形式通过电邮、博客、社交网站、即时信息等途径传播。网络迷因的内容可以是个笑话、一句引语、传言或某个事实、图像、一段视频，甚至可以是某个网站。——译者注

[17] Michael Miller, “Gwyneth Paltrow’s No Vagina Expert, Doctors Say,” *People* online,January 29, 2015. Dr. Gunter’s blog is at drjengunter,wordpress.com.

[18] Laura Hooper Beck, “I Went to a Spa for My Uterus and This is My Story,” FastCompany.com, January 27, 2015.

[19] Frank Bruni, “California, Camelot and Vaccines,” *New York Times* online, July 4, 2015.

[20] “ ‘Stop Googling Your Symptomss,’ Teenage Cancer Victim Told before Death,” *Daily* Telegraph, June 16, 2015.

[21] 歌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最后，牧童大卫用投石弹弓打中歌利亚的脑袋，并割下他的首级。大卫日后统一以色列，成为著名的大卫王。——

译者注

[22] Matthew Fisher et al., “Searching for Explanations: How the Internet Inflates Estimates of Internet Knowledge,”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144(3), June 2015, 674-687.

[23] Tom Jacobs, “Searching the Internet Creates an Illusion of Knowledge,” *Pacific Standard* online, April 1, 2015.

[24] 这里和接下来的参考文献都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CIBER Briefing Paper: “The Google Generation: The information Behaviour of the Researcher of the Future,” January 11, 2008。

[25] Robert Epstein，“How Google Could Rig the 2016 Election,” *Politico*, August 19, 2015.

[26] 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New York, Anchor, 2005), xii-xiii.

[27] Quoted in Tom Simonite, “The Decline of Wikipedia,” *MIT Technology Review*, October 22, 2013.

[28] Ibid.

[29] 回音室，回音室效应在媒体上是指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一些意见相近的声音不断重复，并以夸张或其他扭曲形式重复，令处于相对封闭环境中的大多数人认为这些扭曲的故事就是事实的全部。在社交媒体中，人们以社交对象作为信息来源。他们在选择信息来源的同时，也就进行了信息的过滤。此外，社交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人群的分化。人们因社交圈以及自身的立场态度的影响，常常会固守在符合自己偏好的信息与意见的圈子里，各种圈子之间相互隔绝甚至对立。因此，在社交媒体中更容易形成“回音室效应”。——译者注

[30] Andrea Peterson, “Liberals Are More Likely to Unfriend You over Politics —— Online and Off,” *Washington Post* online, October 21, 2014.

[31] A. O. Scott, “Everybody’s a Critic. And That’s How It Should Be,” *New York TimesSunday Review* online, January 30, 2016.

[32]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 2014.

[33] 一名达特茅斯学院的研究员布伦丹·尼汉（Brendan Nyhan）和其他人数年来一直在调查研究人们在被证明是错的时候为什么更加坚信自己的观点。Joe Keohane,“How Facts Backfire: Researchers Discover a Surprising Threat to Democracy: Our Brains,” *Boston Globe* online, July 11, 2010.

[34] David Dunning, “We Are All Confident Idiots,” *Pacific Standar* online, October 27, 2014.

[35] Megan McArdle, “Your Assessment of the Election Is Way Off,” *Forbes* online, April 14,2016.

第五章

“新”新新闻学的种种

查理：妈妈，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地方，你每次提到《世界新闻周刊》（Weekly World News）的时候，说的都是“报纸”。报纸上讲的是事实。

梅：这个报纸讲的是事实。这个报纸在全球发行量第八。对吧？大量的事实。“怀孕的男人生孩子。”这个就是事实。

——《蜜月危险期》（So I Married an Axe Murderer）

我在报纸上看到过

你知道巧克力能帮你减肥吗？你当然知道，你在报纸上看到过。实际上，你可能在好几种报纸上读到过，然后不管碰到什么专家，包括医生，你都要悲叹一下，因为他们告诉你的可能恰恰相反。毕竟，世界上最美味的东西还有这么神奇的减肥功效，他们竟然藏着掖着不说，正好是专家会做的事。谢天谢地，一个德国科学家，饮食健康研究所的约翰尼斯·博汉农（Johannes Bohannon）写了一篇论文，登在杂志上，被全世界媒体满心欢喜地报道。他证实了我们所有人一直以来的怀疑：巧克力对你真的有好处。

但是，约翰尼斯·博汉农这个人并不存在，饮食健康研究所也不存在。登载这篇论文的杂志是真的，但显然在同行评审和编辑方面一点儿都不严谨。“约翰尼斯·博汉农”实际上是一个名叫约翰·博汉农的记者，他属于（用博汉农的话说）“一群疯狂的记者和一个医生组成的一个团队”，这个团队的人想“证明把膳食风尚背后的伪科学变成新闻头条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1]

所以，巧克力不会让你变瘦。但是，你知道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位于以色列国土两侧，是被以色列控制的巴勒斯坦地区，被一座桥连接起来，以色列有时候会故意利用这座桥来限制巴勒斯坦的交通。你可能也是在“新闻里”看到过。2014年，网络媒体Vox——一家标榜自己是向大众解释复杂问题的媒体——列出了“了解以色列——加沙危机的11个关键事实”，其中排在第一位的就包括加沙——西岸大桥。

它并不存在。

在评论员好一番嘲笑了Vox之后，Vox修正了自己的错误——作者

声称他看过一篇文章说拟建这座桥，却没有意识到这座桥没有建。正如作家莫莉·海明威（Mollie Hemingway）所指，记者难免偶尔会犯错，谁也无法成为所有领域的专家，但“通往加沙的桥”可不是“把一个名字搞错了或者不知道一些隐秘的细节”这样的错误，会犯这种错的人一定是“完全不了解这个领域”。[2]

这一类批评对Vox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批评都不是空穴来风。2016年初，Vox出了一个标题是这样的：“黑豹党人做的最激进的事是给孩子免费早餐”。黑豹党是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一个激进组织，融合了黑人民族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牵扯到多起暴力和谋杀案件，包括与警察枪战。他们绝对不是日托中心的友好员工。Vox的这个标题立刻引起《每日野兽》专栏作家迈克尔·莫伊尼汉（Michael Moynihan）的吐槽，他发推特说：“还记得‘解释’作者们什么时候真正了解自己正在解释的内容吗？我是不记得。”

所以巧克力不是减肥神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之间也没有桥。黑豹党人也许比我们印象中还要粗暴一些。但是，你或许还没有认识到复活节对基督徒的真正意义是什么，那就是庆祝耶稣基督直接升天。这是《纽约时报》在2013年说的。现在，福音书里首先多少都会提及耶稣四处走动，这可能是当地的教区牧师每年夏天都会讲述的版本。这些神职人员可能是聪明的，其中有些人可能还拥有神学学位，但他们凭什么和《纽约时报》争辩呢？

世界上有超过10亿基督徒，而且令人称奇的是，很少有人发现这个错误。《纽约时报》后来悄悄做了一份新闻史上最低调的修正：“之前的文章曲解了基督徒的复活节含义。复活节是庆祝耶稣从死里复生，而不是复活升天。”[3]这个版本更加准确，但是有些读《纽约时报》的人并不是会怀疑一切的人，或者不了解源自《新约全书》的一些文化意象，《新约全书》中耶稣在复活节星期日出现，而不是乘着直梯上了顶层。

如果追赶的尽是错误信息让你筋疲力尽，你可以去看一些优秀的文

献，或者读一读伊夫林·沃（Evelyn Waugh）伟大小说中的一本。毕竟沃在2016年被《时代》列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100位女性作家”之一，所以“她”的作品还是值得一看的。

除了一点，伊夫林·沃（1966年逝世）是男性。

这种滑稽可笑的错误不只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比如说，30多年前，《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报道就把爱尔兰说成北约（NATO）成员，众所周知爱尔兰人民是中立的，所以这样的报道不仅会让爱尔兰人大为震惊，也会让苏联和美国瞠目结舌。每个人都会犯错，专家、记者、编辑和事实核查员也不例外。这是常有的事。

但遗憾的是，这种错误在21世纪的新闻世界里频繁得多。更糟糕的是，由于互联网的存在，错误信息传播更为迅速，逗留时间也更久。在信息源源不断的世界，新闻产出快，一天24小时滚动播出，所以在这个时代，新闻业有时候不是专家的捍卫者，更多是专家之死的催命符。

我知道，这样抱怨信息时代带给我们的新闻和资讯盛宴似乎有些失礼，但我还是要抱怨。新闻业的改变，就像互联网和大学教育变得更加普及一样，已经对外行和专家的关系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坏影响。21世纪的新闻资讯所传递的大多数内容，并没有增加人们的见识，反而让外行——有些时候连专家也不能幸免——变得更加困惑和暴躁。

专家面临着一个让人沮丧的挑战：新闻资讯变多了，可人们似乎变得更无知了，这样的趋势可以回溯到至少25年前。这个问题并没有逐渐消散，反而愈演愈烈，颇为矛盾。虽然资讯比从前更容易获取，但人们却越来越不了解周围的世界，甚至还在流失对世界的兴趣。

比如早在1990年的时候，皮尤信托（Pew Trust）做的一项研究警告世人，脱离重要的公共问题实际上在30岁以下的人群中更为严重，这些人原本应该最能接受当时兴起的像有线电视和电子媒体这样的信息来源。就像皮尤研究指出的，这在美国公民文化中是一个显著的变化：

> 在过去的50年里，大部分时候，年轻公民和老人的见识至少是相当的。1990年，情况变了……30岁以下的人比过去的同龄人懂得少。他们不再对周围世界发生的事情感兴趣。社会科学家和民调专家早就意识到年轻人多少都不太熟悉政治和严肃问题。但问题是差距已经严重拉大了。[4]

接受调查的这些人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他们的孩子也好不到哪里去。2011年芝加哥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美国大学毕业生“在大学四年里没能培养出批判性思维和复杂推理的能力”，但更让人忧虑的是，他们“也没有养成公民参与的思维习惯”。[5]和他们的父母一样，这些年轻人不仅比我们预想的还要见识浅薄，而且还不情愿去实践他们所了解的那一丁点儿公民责任。

所以，当外行用“我在报纸上看到过”或者“我在新闻上看到的”这样的话来回击专家，其实意义不大。事实上，这些资讯也许根本就不是来自“新闻”或“报纸”，只是看起来像新闻来源的东西。更有可能的是什么呢？这样的回答意味着“我从我喜欢的资讯来源看到了一些内容，恰好这些内容是我愿意知道的”。这样的讨论就寸步难行了。当你首先费劲去理清到底是哪条错误信息驱使了这场对话，那原本的问题就已经被淹没或迷失了。

怎么会这样？在一个事实和知识像潮水一样涌来的世界，人们怎么会对事实和知识如此抗拒呢？就新闻业而言，简短来说，其实就是技术与资本主义的碰撞，让人们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哪怕对他们没什么好处，这个解释放到很多现代创新上都说得通。

我发现，指责新闻业与现代新闻媒体会让我置身于破坏专家金科玉律的风险之中，那就是永远不要对其他专家指手画脚。不过，我虽然不是新闻业的专家，却是新闻产品的用户。无论是作为教师还是政策分析师，我自己的职业也部分依赖新闻。任何专家在向外行传递复杂事件和思想的时候都会面临障碍，这也是我每天要应付的困境。我的工作是帮

助人们理解这个复杂的世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现代媒体让我的工作变得比20年前更艰涩。

过犹不及

现代新闻业给专家和专业知识制造的挑战，与折磨美国现代生活的问题，其实同宗同源，那就是一切都太多了。

21世纪的新闻来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由于电台、电视和互联网的存在，人们能够轻易获取这些来源，并且通过电子手段来分享；由于教育的普及，相较于过去，有更多人读得懂新闻，还能讨论。这是一场资讯的盛宴，把资讯盛在许多大盘子里，装点着五花八门的配菜端上来。既然如此，人们为什么还这么坚定地走无知浅薄的路线，拒绝新闻，拒绝专家的意见和建议，即便一切都几乎毫不费力地摆在他们面前，也不为所动？因为资讯太多了，而且和娱乐相互渗透，密不可分。

现如今，只要是能用上电的人，谁都是在四面八方涌来的信息海洋里忙得不可开交。美国的大多数报纸和电视台都有即时的电子版发布和定期更新。只要是家里有卫星电视或有线电视的客户，那也就是说几乎发达世界的每一个人，都能在世界各地许许多多的新闻节目中自由选择。今天，无论你是什么口味和政治观点，总有一处新闻来源适合你，只是为了推高收视率和点击率，新闻和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被刻意模糊掉。

客观来说，1960年美国家庭平均能收到3个电视台和8个电台，可以订阅的报纸有1份，杂志3～4种。[6]到了2014年，尼尔森收视率调查组织估算美国家庭平均可以收看到189个电视频道（比2008年的时候多了60个），用户经常收看的大概有17个频道。除此之外，据圣迭戈超级计算机中心的一个研究员2015年估算，每个用户每天通过移动终端和家庭电脑获取的媒体数量相当于9个DVD容纳的数据量。要看或听这么多的

信息，平均会占用一个人每天15个小时。[7]

但量多不代表质优。（史特金定律放之四海皆准。）现在美国公民的新闻来源比以往多得多，说这话就像说他们比从前有更多的餐饮选择一样：话是没错，但并不意味着美国近30万家廉价连锁餐馆和快餐店提供的饮食选择让谁变得更健康了。

富足和技术降低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进入新闻业和创办新闻机构的门槛，那结果可想而知。媒体增多意味着竞争更激烈，竞争激烈意味着要明确划分受众群，把他们归到特定的政治和人口结构群体中。新闻业的机会多了，记者也就多了，至于他们有没有能力报道重要问题，似乎也没那么要紧了。这一切的竞争都是在回应美国消费者的需求，他们希望一切都变得更简单、快捷、美观和娱乐化。

40年前的媒体还是良心媒体，会小心地把“新闻”与其他内容区分开。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新闻”展示的并不是这个世界真实的全貌，而是精心策划和编辑过的信息流。广播电视网和新闻机构就那么几家，电视上分配给新闻的时间相对少得可怜，所以公众看到的世界其实是运营电视网的企业想呈现出来的样子。新闻机构要做的是尽可能覆盖到最广泛、最多的潜在受众，所以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新闻主播都秉持着近乎相同的风格，像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8]和哈里·里森纳（Harry Reasoner）这样冷静且有公信力的人物在报道最可怕的事件时，也会从容不迫，客观淡定。

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事情都称得上新闻。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新闻主要是控制在企业和精英的手中——但这并非完全是坏事。当每个电视网每天只有30分钟来报道一天的事件，那么苏联武器控制条约就比名人离婚更可能出现在屏幕上。电视网鲜少在正常节目中间插播新闻，除非有骇人听闻的“特别报道”，也就是一些大型灾难之类的。如果这个世界上发生了什么重要事件，每个美国人都要等报童——我在20世纪70年代初担任过这项庄严的童年要职——或者晚间新闻报道。

现在不但新闻变多了，与新闻的互动也变多了。美国人不再是报纸上写什么就读什么，也不再是被动地坐在电视机前接收被咀嚼过的新闻事件了。他们成了征询意见的对象，常常会获邀实时反馈对于接收到的信息有何感想。推特和脸书是新的新闻源头，信息渠道五花八门，报道新闻和传播流言都是一把好手。脱口秀和新闻播报——越来越难区分彼此——常常会请观众通过社交媒体或网站即时投票参与讨论，显然这是在预设观众是通过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或身边的笔记本电脑观看新闻的。

互动性也会影响故事的选取，这可能会让人怀念过去由新闻主编掌控的时代。《达拉斯新闻晨报》（*Dallas Morning News*）在2015年聘任新主编的时候，把目光投向了新闻网站538（FiveThirtyEight）的记者迈克·威尔逊（Mike Wilson），这家网站专注于“大数据驱动”的故事，而非重大新闻。“关于读者需要什么样的新闻，我想我们需要抛弃一些旧的观念了。”威尔逊在受雇后的采访中这样说道——

> 我们只是需要更多地照顾到观众的意愿。我认为，一直以来报纸的传统就是我们来确定主题，读者想看什么，我们说了算。我认为我们需要稍微放低一点儿姿态，问问民众的想法，多给民众一点儿机会参与对话。[9]

大报也赞同。“你怎么能说你不关心客户的想法呢？”负责监管《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网络新闻的艾伦·默里（Allan Murray）在2015年这样说道，“我们很关心读者的想法。但我们的读者也很在意编辑的判断。所以我们总是尽力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10]

尽管记者和他们的主编都对天发誓，不允许公众主导他们的选题和报道，但这话很难令人信服。《纽约时报》2010年的一篇报道在描述了《华盛顿邮报》和其他报纸如何密切监测网站流量后，还试图粉饰太平，文章说：“到目前为止，这项技术的存在并没有腐蚀新闻判断，因

为编辑并未就此去迎合读者最基本的趣味，而是就如何报道一个话题做出更精准的决定，从而让这个话题更吸引线上观众。”[11] 文章还自豪地指出，比起2010年英国大选，《华盛顿邮报》的读者对花园鞋（Crocs，由卡骆驰公司生产的一种难看的鞋子款式）更感兴趣，但邮报并未因此变更报道。这话听起来也许让人安心，实际上却是让人忧心的，因为连这么理所应当的事情还需要做出保证。

从公众对重大问题的意识来判断，读者需要的不是更有深度的报道，而是基本信息，包括一张临时地图，上面标注着“你在这里”。如果是在一个不那么拥挤、竞争没那么激烈的市场，我们很难想象一个媒体会以同样的方式询问读者想要什么，但在一个信息满天飞的市场，读者反客为主是迟早的事，记者会问读者想要读什么，而不是告知他们必须知道的事情。

娱乐、新闻、权威见解和公民参与的大融合制造的是一团混乱，让一知半解的民众产生幻觉，以为自己了解了很多。在无穷无尽的网页里穿梭，让人们以为自己在学习新的东西，同样，在电视屏幕前待上无数个小时，浏览了成百上千个滚动新闻标题，会让公众误以为自己理解了这些新闻。更糟糕的是，与众多媒体的日常互动，让他们不愿意去学习任何需要耗费太长时间或不够娱乐的东西。

信息过载不只是淹没了外行，其实所有人都被海量数据淹没了，包括专家，虽然他们积极关注新闻并且努力当有辨别能力的消费者，但也不例外。《国家杂志》2015年调查了被它称之为“华盛顿圈内人”的这样一群人，大多是国会职员、联邦政府官员和私营领域的公共事务专家，并询问他们如何获取资讯。调查结果显示，这些“圈内人”获取信息比以前容易，但“完全搞懂这些信息比以前难了”。华盛顿的这些政界人士和其他人一样，都被“排山倒海的信息”麻痹了，结果对“个人渠道和信息失去了信心”[12]。

如果连华盛顿那些专门的政策制定者和员工都无法透彻理解新闻，其他人如何做得到呢？谁有那么多时间去一一厘清？《国家杂志》的研

究还向时间压力“致敬”，特地加了注解说道，完整阅读这份研究需要45分钟，简单浏览仅需20分钟。讽刺意味明显，又让人忧心。

其实这样源源不断的新闻和量身定制的互动放送在互联网和有线电视之前就存在了，甚至还早于电视。电台是它的源头，更准确地说，电台是第一个把民众淹没在无尽的新闻和谈话中的媒体，一般看来，这个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被电视秒杀了之后，又在20世纪末焕发新生。

广播倒下，视频崛起

很多职业人士或专家觉得，之所以有那么多自称万事通的人在他们办公室里指手画脚，而且比比皆是，都是互联网造成的，其他人把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归为另一个罪魁祸首，在这样快速连轴转的新闻轰炸下，人们根本来不及吸收那些故事和事实。就人们对互联网的控诉而言，这些抱怨都是合情合理的。美国人现在看新闻的时候，都当自己在白宫战况室呢，紧跟每一条新的资讯，感觉他们接下来就要研判是不是要发动战争。（CNN为了迎合观众的虚荣心，甚至把下午的节目命名为“军情观察室”。）

但是这也解释不了为什么美国人还是误以为自己对屏幕上充斥的种种问题比专家还在行。为此，我们得更细致地研究一下20世纪70年代以后公众和媒体的关系是如何发展的。水门事件、滞胀和越战失败的那10年是一个分水岭，不仅是因为这10年是有线电视这样的新技术面世的当口，还因为新技术的发展刚好遇上美国人对政府和其他机构的信任崩塌。媒体新形态的发展和信任的陷落都与专家之死息息相关。

人们原以为电视会在20世纪50年代取代广播，成为大多数节目的载体。不管怎么说，AM调幅电台统领了音乐和体育节目，听众广泛，但只有微弱的单声道。这种低劣的音质无法抗衡一个很明显的问题，长了两只耳朵的人类更喜欢听立体声。FM调频电台就能提供更优的音质——就像斯迪·丹乐队（Steely Dan）的热门歌曲《FM》里面承诺的一样，“完全无杂音”——但FM电台广播的听众数直到1978年才超越AM。同时，电视因为在报道中添加了视觉效果，就取代广播成为新闻和其他美国人喜闻乐见的节目载体。

然而，广播未死。尤其是AM波段上的电台节目有着电视所没有的

优势：互动模式。相对来说，AM节目播出时间上没什么限制，而且节目制作成本低，谈话电台的想法很简单：给主持人一个麦克风，把听众电话接进来，让他们聊聊新闻和自己的观点。有些娱乐节目会受电视或音质更有层次的FM吸引，但对于想制作平价节目的电台来说，AM显然更适合它们。

谈话电台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同时也为之后社交媒体上对专业知识的攻击奠定了基础。要说是谁把谈话电台推到上风，没有人比得过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他在20世纪80年代改变了人们周日早晨通过电视掌握权威意见的常态。林博不是谈话电台第一人，至少从50年代起，谈话电台就遍布美国，只不过通常都被放逐到晚间和深夜的时段。但是，林博却独树一帜，把自己打造成对抗美国其他媒体、听众获取事实真相的一个源头。

在林博开始广播的头几年，全国有600多个电台可以听到他的节目。他告诉听众，媒体和国家电视网在一个自由派的回音室里密谋，尤其是那些坚定拥护比尔·克林顿总统新政府的人。这些指控并非全都公正，但也不是全错，林博能够从每天的媒体报道中挖掘到偏见的例子——其实有很多——然后加以运用。通过实实在在三个小时的不间断放送，林博的优势是在有线电视问世前电视所无法企及的。

因为允许听众打电话进来表达支持，林博和其他谈话电台主持人也建立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忠实听众群。这些热线电话是经过筛选的，据林博早期一个联播电台的经理说，这是因为林博认为自己不擅长辩论。不过辩论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在意见趋向一致的这群人当中营造出集体感和归属感。后来，抵制主流媒体的人通过互联网找到组织，不过这一现象其实始于电台。

电视网和纸媒意外地发现，不仅有数百万人收听电台节目，这些听众还调转矛头抵制传统新闻渠道。1970年，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指控媒体偏向自由派［由演讲稿撰写人威廉·萨菲尔（William Safire）执笔］：媒体充斥着“喋喋不休的否定者”。不过后来

他收回了这句经久不衰的名言。20年后，谈话电台做出了同样的指控，而且没有撤回。

当然，讽刺的是，林博和其他保守派的电台主持人很快也成了主流。到了21世纪初，广播电台市场再次低迷，但林博还是坐拥2 000万听众。2008年，他签下高达4亿美元的合约，仅次于谈话节目主持人“电台大嘴”霍华德·斯特恩（Howard Stern）与天狼星卫星广播签订的5亿美元合约。在电视问世初期，视频几乎把电台挤出市场，但很快，电视和谈话电台就成了互相补充的两种媒体，而非竞争关系，因为电台的顶级明星去了有线电视，反之亦然。

自由派的谈话电台在这个领域没什么竞争力，而且影响力也逊色很多。自由派人士可能会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堕落到竞争对手的地步。［进步电台主持人兰迪·罗兹（Randi Rhodes）2008年在进步的美国天空广播电台（Air America，现在已经不复存在）直播中说希拉里·克林顿是“大（脏话）婊子”，这说明至少有一些自由主义者还是愿意走到这一步的。］而保守派声称，在一个被自由派媒体主导的国家，自由派已经有很多发声的地方，所以根本不存在什么问题，那有没有自由派的谈话电台其实差别不大。不管什么原因吧，进步的电台主持人从来都没什么吸引力。比如，最受欢迎的进步电台主持人艾伦·科尔姆斯（Alan Colmes）也只是从林博或科尔姆斯前搭档肖恩·汉尼提（Sean Hannity，在电台和福克斯新闻都有节目）的听众群里分一杯羹。

公众本来就普遍认为现有的媒体是不诚实、不可靠的，谈话电台的崛起更是强化了这样的信念，从而更加威胁到专家的角色。电台主持人不仅攻击既有的政治信念，他们攻击一切，把听众拽入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主持人认证的事情才是事实，否则皆不可信。2011年，林博把“政府、学术圈、科学界和媒体”称为谎言的四角，这计划把除林博之外的所有人都涵盖进去了。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格伦·贝克（Glenn Beck）曾经告诉自己的听众，奥巴马政府的白宫科学顾问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提倡强

制堕胎。（其实霍尔德伦并没有，但这个说法仍在流传。）汉尼提和其他电台主持人还抓住一个流言不放，说埃及政府准备将恋尸癖合法化。（林博还问过谁可能会给这种情况提供避孕套。）据《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外记者丹·墨菲（Dan Murphy）说，这完全就是“胡说八道”，但又怎样。

有一种说法倒是合情合理：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电视与纸媒在政治上沾沾自喜，意识形态上单调乏味，而且太自我中心，对此现象，那个时期的谈话电台就是必要的解毒剂。正如阿格纽攻击媒体的一句名言所说，林博和他的效仿者并没有点燃美国中产阶级对媒体的怨恨和怀疑，这些电台主持人只是添了柴，让这把火烧得更旺了。最终，谈话电台也变成了它们口口声声要取代的文化：武断和片面，也许保守派电台主持人能提议进行一些往往会被主流电视网所忽略的辩论，但他们也会强化另一群人的声音，这群人认为一切皆是谎言，专家不比其他人聪明，甚至要虚伪得多。

美国被劫人质：第**15 000**天

如果不是因为有线电视和互联网，广播讨伐纸媒和电子媒体的声音最多也就在AM波段传播一下。有线电视和互联网，新闻的另一个来源——是攻击专业知识的平台——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互相巩固。林博涉足写作并登上了畅销书排行榜之后，甚至也有那么几年试图进入电视圈。以前窄窄的媒体之门现在大敞，足以让人蜂拥而至。一个媒体报道的故事很快就会出现在另一个媒体上，然后以更大的能量回到初始媒体，就像麦克风会把演讲者的声音变得震耳欲聋一样。

不过，讽刺的是，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开拓者既不是有线电视，也不是互联网。就这一点而言，我们可能要感谢伊朗已故最高领导人霍梅尼了。

1979年11月，伊朗革命延烧到美国驻德黑兰大使馆，几十名美国人被扣为人质。几乎实时观看到这一切发生的美国人被那个场面震惊了。伊朗人质事件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介乎战争与危机之间：越战是一场慢镜头灾难，拖了10年；古巴导弹危机仅持续两周，进展之快，让电视台和报纸都来不及全面报道。伊朗人质事件爆发得很快，发展得很慢，几天的暴力之后，就陷入了漫长的等待与担忧。

新闻媒体陷入困境。一方面，美国人在国外；另一方面又没什么实际的进展。就像喜剧演员吉维·蔡司（Chevy Chase）每周在《周六夜现场》（*Saturday Night Live*）中宣布西班牙的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仍然死亡一样，新闻网的主持人除了说人质仍然被劫持之外，也没什么能补充的了。

这个时候，美国广播公司（ABC）决定做新的尝试，把每天的伊朗

新闻快报挪到晚上。这也是一个市场决策：ABC没有深夜节目来对抗竞争对手全国广播公司（NBC）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的重量级脱口秀，而新闻节目的制作成本相对较低。ABC用一档全新的节目《晚间报道》填补这个时间，专门用来报道人质危机。每天晚上，ABC都会在屏幕上打出显眼的“美国被劫人质”几个字，接着就会显示劫持的天数。主持人［通常都是ABC的资深新闻主播泰德·科佩尔（Ted Koppel）］会在这个时段采访专家、记者和其他与危机事件有关联的人。

一年后，人质回家了，但科佩尔和《晚间报道》保留了下来，并且持续了很多年。有线电视为后来的模仿者解决了技术问题，但《晚间报道》提供了一个模板。“突发新闻”提醒和字幕——现在在新闻频道的屏幕下方滚动的新闻报道字幕条——都是起源于这个为了应对人质危机而匆忙筹备的节目。

“晚间报道”时代和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诞生的另一个产物就是专家在媒体上发表的意见贬值。陆军战争学院教授史蒂文·梅茨在2015年说的没错，在更早的时候，“公众愿意听从国家安全方面权威人士的话，作为选举出来的官员、军事领袖、获得政治任命的人、学者、媒体成员或智库分析师，他们通过经验和专业知识赢得了影响力”。但后来事情发生了改变：

> 辛苦得来的专业知识变得多余了，因为数小时的广播和电视放送或线上讨论板块可以填补这一块……这几十年，对权威的尊重已经在整个政坛日渐式微。资讯盛宴和通信技术给了以前尊重权威的人发言权和自信。[13]

“获取了一点儿资讯”，梅兹总结道，这些人“就对越来越多的问题发表意见”。制作人和记者也是背后推手，他们请这些自视专家的人就任何事情发表意见，很少有人能抗拒这样的诱惑。（我也属于难辞其咎

的这拨人。）

“晚间报道”成功了，但广播网还是没理由日夜播放新闻，毕竟观众除了新闻就不想看别的吗？观众其实愿意看没完没了的新闻，1980年企业家泰德·特纳（Ted Turner）抓住了这个机会，他的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上线。CNN被其他广播新闻网总裁笑称为“鸡面网”（Chicken Noodle Network），是把新闻头条和专题兑水搅拌的一锅粥。但特纳笑到了最后，因为CNN不仅成为有线电视的主宰，后来还造就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其中就包括在收视率上最终将超越它的福克斯新闻。

特纳没有让年长的白人男性用洪亮的声音读新闻，而是给了CNN一个光鲜亮丽的样子。1980年6月1日，39岁的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和他31岁的妻子洛伊斯·哈特（Lois Hart）主持了新成立的CNN的首播节目，报道的是总统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到医院看望民权领袖弗农·乔丹（Vernon Jordan）。新闻不再是听约翰·钱塞勒（John Chancellor）和弗兰克·雷诺兹（Frank Reynolds）这样让人心安的美国中年大叔说上半小时，而是更年轻、更有魅力的主播阵容全天候24小时持续播报。

24小时滚动新闻播报的模式已经开启，但在20世纪80年代却经历了一系列危机和灾难，直到90年代才俘获了一批观众。有人企图刺杀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一架飞机坠入华盛顿的波多马克河（Potomac River）、恐怖分子劫持环球航空公司（TWA）的一架航班等等，所有这些都证明美国人会把电视调到新闻频道，几个小时不换台。新闻没有了固定的时间档，人们无须在预定的时间观看，也不需要在听到惊心动魄的“我们插播一下”就冲到电视机前，新闻成了开放自助餐，观众可以随时享用。

1991年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Anita Hill）的证词和她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 Thomas）性骚扰的指控证明美国人不仅愿意看危机和灾难的新闻，也会专心留在电视机前观看政治和法庭的戏剧性事件——尤其是涉及性或谋杀的事件，最好是集两者于

一身的。1991年，司法裁决允许更多摄像师进入法庭后，法庭频道在有线电视上登陆。美国人看了没完没了的强奸、谋杀和其他各种欺诈案件后，就成了伪法律专家。

CNN的新闻已经超过了普通观众一天能消化的量了，而法律频道这样的有线电视频道激增简直成了专家的梦魇。《娱乐周刊》（*Entertainment Weekly*）在1991年对新闻网的一篇述评中称法庭频道是“有线卫星公共事物网络（C-span）和《周一足球夜》（*Monday Night Football*）的结合体”，只是这种说法可能对两者都不太厚道。而在1995年对O.J.辛普森谋杀案的世纪大审判结束时，数百万老百姓都对他们其实不懂的问题发展出了深刻的见解，从DNA测试的数据到鞋底图样的精确度等等，不一而足。这是收视率的宝库，而且还说明了一个问题：人们想从新闻网看到的不是数小时乏味的新闻，而是有张力的戏剧性事件。

CNN在1982年设立了一个头条新闻频道。这个专门的新闻频道原计划是要24小时不间断播出时长半小时的新闻节目。当然，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这也太枯燥了，果然，明星法官南希·格雷斯（Nancy Grace）很快就进驻了这个频道，后来更名为HLN。就像肯塔基州炸鸡（Kentucky Fried Chicken）更名为肯德基（KFC）来回避处理鸡的那个步骤——炸鸡——HLN明显也需要从名字里拿掉“新闻”（news）这个词。

HLN专门报道耸人听闻的事件，再配上格雷斯对司法的夸张控诉抨击。在2008年一个骇人的报道中，佛罗里达州一个名叫凯西·安东尼（Casey Anthony）的人被控杀害了自己两三岁的女儿。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故事，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辛普森审判的重演，数百万人迅速选边站。但是，HLN不只是报道一下安东尼的审判，格雷斯和其他工作人员把这个事件当成HLN“新闻”主菜，制作了500个相关报道。[14] 到了2011年安东尼无罪释放的时候，HLN的观众已经很熟悉佛罗里达州的谋杀法规了，可能还要超过对自己在美国宪法下权利的了解。

要想讨论新闻和专家之死的关系，就离不开以1996年福克斯新闻诞

生为代表的革命性变化。保守派媒体顾问罗杰·艾尔斯（Roger Ailes）一手打造的福克斯把新闻变得更迅速、更华而不实，同时因为有选美皇后加入新闻主播的阵营，也更“好看”。这是一个美国成功故事，具有这一类成功营销案例通常所具有的优点和缺点。（艾尔斯面临多项性骚扰指控，而他所缔造的媒体还进行了非常详尽的报道，于是他在2016年被迫离开福克斯，这样的退场方式仿佛是为电视量身定制的。）

不过，福克斯的历史以一种重要的方式与专家之死交织在一起：因为福克斯的诞生，可以看出人们在新的电子市场获取新闻的渠道，最终体现了党派分歧。林博试图通过电台和电视秀达成的目标，艾尔斯用一个电视网实现了。如果艾尔斯没有创立福克斯，也会有其他人去做，因为谈话电台已经证明了市场就摆在那里。就像保守派作者兼福克斯评论员查尔斯·克劳萨莫（Charles Krauthammer）打趣说的，艾尔斯“发现了一个小众市场——一半的美国人”。

从名义来说，新闻广播本应是对当天的事件进行无党派的梳理述评，而福克斯算是给这个定位最后的致命一击。保守派刊物《首要事务》（*First Things*）主编R.R.雷诺（R.R. Reno）在2016年写道，罗杰·艾尔斯“或许是上一代把政治娱乐化背后最有影响力的个人”，不过他也不是孤军奋战的：

> 不只是福克斯。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MSNBC）和其他电视网也开发了自己的政治辩论秀——口头版的世界广泛摔跤联盟比赛。镜头给出辩手头部特写，他们粗鲁地咆哮、插话或自娱自乐。观众愉快地看着这样的奇观。广告卖出去了。钱赚到了。[15]

福克斯的口号“公平公正”是对传统媒体的虚伪极大的讽刺，CNN也不例外，它们都把自己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福克斯与谈话电台主持人一样，视自己为主流媒体的替代者、一个监督者，声称自己不从属于任何一个集团，也不听命于任何人。

当然，所谓福克斯是与众不同的，或大电视网是没有政治立场的，总是假象。在每个场合，各种各样的媒体偏见都是存在的。福克斯和其他媒体网络一样，试图在硬新闻和观点节目之间画一条线，但也没逃过失败的命运。CNN、福克斯、MSBNC和其他主要的电视网都有优秀的新闻部门，但只要是为了让自己的节目迎合目标观众，它们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偏见。在观众争夺战中，只是把“新闻”放到电视上是不够的。

福克斯的影响力更大，是因为观众群庞大，但所有电视网现在都在节目表里列入了有政治立场的“资讯娱乐节目”。而所有主要电视网都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从新闻到娱乐的过渡几乎是无缝无痕的：从白天无关痛痒的内容到下午的最新消息和谈话节目，接着就是晚间的硬新闻，之后就转到名人节目，一切不过发生在几小时内。

先是谈话电台蓬勃发展，然后有线电视进入视线，随之互联网开始迅速发展壮大，不仅为专门的新闻机构提供了另一个平台，也为那些自称记者、想要打入传媒圈的人敞开了大门。互联网和新闻媒体的扩散对专家来说已经是个问题了，而现如今人们认为坐在地铁上盯着手机屏幕就等于紧跟世界大事，故而新闻和互联网的结合产生的协同作用，对于试图与普通人沟通的专家来说，堪比直布罗陀主权问题。

谁也不信

近30年来，在我执教的本科与研究生的每一堂课上，我的开场白几乎都是告诉学生，不论他们每天的安排是什么，都要抽出时间来一顿营养均衡的新闻餐。我告诉他们要关注主要的报纸，至少看两个电视台，订阅（在线或其他）至少一份与自己观点相左的期刊。

但在这一点上我有几分成功还真不好说。如果我的学生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他们就会去关注与他们立场一致的资讯来源。比如，皮尤2014年的一份调查中问美国人“最信任哪家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能提供准确的政治和时事资讯”。调查结果完全符合我们对一个分裂媒体市场的预期：人们还是会被立场一致的电视台所吸引。

对全美人民的调查显示，毋庸置疑的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以微弱优势胜出三大传统广播电视新闻［美国广播公司（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老牌夜间新闻］，成为“最受信赖的”媒体。CNN紧随其后，排第三。受访对象中，选择福克斯和CNN为“最受信赖”媒体的超过40%，但在自认的政治保守派人士中，不出意料，选择福克斯的占到48%。在自认的温和派人士中，选择传统广播电视新闻和CNN的不相上下（分别是25%和23%），福克斯和公共电视则分居第二和第三。在自认的自由派人士中，传统广播电视新闻以24%领先成为“最受信赖”媒体，CNN和公共电视分庭抗礼，各占16%和17%。

不过，这个调查最让人震惊的是《每日秀》（*Daily Show*）居然也榜上有名，位列“最受信赖的资讯来源”，这是脱口秀主持人乔恩·斯图尔德(Jon Steward)主持了多年的一档新闻讽刺栏目。在接受调查的人当中，17%的自由派人士选择了《每日秀》，这不仅让斯图尔特在排名上

与CNN以及公共电视台一争高下，还以7个百分点领先了MSNBC。MSNBC（某一段时间口号是“前倾”，不管是什么意思吧）是2014年最不受信赖的资讯来源：每个受访人群都把它排到最后，就连在保守派人士中，斯图尔德也还领先这个进步电视网1个百分点。

这里还有代沟作祟，年轻观众比年长观众更偏向非传统的资讯来源，不过从资讯转向娱乐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与人口结构无关。追踪资讯、洞悉时事成了一种冷嘲热讽的后现代操作，而“真相”与“资讯”这些字眼也是可以任人摆布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名教授埃利奥特·科恩（Eliot Cohen）在2016年曾经写道，一代人是从沃尔特·克朗凯特和戴维·布林克力（David Brinkley）那儿获取资讯，另一代人是从乔恩·斯图尔德以及他的同行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那儿获取资讯，这两代人之间的差别就好像是“与年轻爱讽刺的嬉皮士嬉笑怒骂还是听严肃的成人谆谆教诲”。[16]

当然，这种抱怨听起来像是一个脾气糟糕的中年人会说的话。不过其他批评家反驳说，正是因为电视新闻普遍存在的特质让年轻观众转向其他资讯来源。洛杉矶作家詹姆斯·普洛斯（James Poulos，属于X世代[17]较晚期），曾在2016年说：“婴儿潮一代如何从不相信任何30岁以下的人到相信任何一个穿着商务休闲装、脸部对称的白痴，真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斯图尔德也许是一名喜剧演员，但他的年轻观众可能还是要比那些完全不看新闻的同龄人懂得多。

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所有这些电视网和名人的存在，而是观众从中做出选择，并相信自己获取了资讯。现代媒体提供了如此之多的选择，且迎合各种特定立场，这就是证实性偏见的一场大型运动。这就意味着美国人不仅信息匮乏，还受到信息误导。

这两个问题有着天渊之别。伊利诺伊大学2000年就公共知识展开的一项研究发现，“未获取信息的公民一无所知，而被误导的公民所了解的信息与最佳证据和专家意见相左”，政治科学家安妮·普鲁塔（Anne Pluta）后来也指出了这一点。这些人不仅“利用现有的信仰体系来填充

自己知识库里的空白”，而且久而久之，这些信仰就“与切实数据融为一体”。当然，受到误导最严重的公民“可能是对自己的观点最自信的，也是某个党派的死忠支持者”[18]。

美国人几乎都不相信他们看到的那一丁点儿新闻或者类似新闻的节目，以上所述也是原因之一。太多人在看新闻的时候，内心其实已经认定自己熟谙这个话题。与其说他们在寻求资讯，不如说他们在求证，当接收到的讯息不合口味，他们就会转投符合自身立场的资讯来源，因为在他们看来，其他的观点要么是错的，要么是在撒谎。早些时候，要找其他的资讯渠道没那么容易，为数不多的几个媒体并不会特别迎合他们的偏见来定制新闻，他们不得不将就这些媒体，然后在内心做斗争。现如今，市面上有成百上千种媒体，哪怕是最狭隘的话题和偏见，也有媒体去迎合。

这样的心态，以及为之服务的市场，促使普通民众生出没来由的自信和强烈的怀疑，而这种思维习惯也让专家试图教育普通公民的不懈努力付之一炬。如果大多数人都认为自己知道问题的答案，那专家怎么回应这些问题都是无益的，如果那么多人都去否定——或者往好处想，忽略——信使，那专家也就无力传递信息了。人们不去关注新闻已经很糟糕了，结果他们还不相信自己读到的那一丁点儿新闻，非要四处寻觅，直到发现符合预期的内容，那更是雪上加霜了。

在某种程度上，美国人对媒体的不信任只是社会痼疾的一个症状，而这个痼疾就是美国人不再相信任何人，这种情况日益严重。他们蔑视一切机构，包括媒体。每个人都讨厌媒体——或者说，至少人人都声称自己讨厌媒体。据民调显示，新闻机构是美国最不受信任的机构之一，2014年的盖洛普民调显示只有四成美国人相信媒体报道的新闻是“全面、准确和公正的”，可以说是达到有史以来最低点了。[19]

当然，人们并不是真的讨厌媒体。他们讨厌的其实是媒体报道或传播的新闻不合心意或观点相左。2012年的一份皮尤调查注意到，2/3的美国人认为新闻机构大体上都“常常是不准确的”，但当问及他们“常用

的”媒体时，这个比例就掉到不足1/3。[20] 正如众多观察家这些年所指出的那样，虽然人人都声称自己讨厌国会，但其实他们真正不待见的是除了代表他们立场之外的所有国会成员，这与媒体界的情况没什么两样。讨厌“媒体”的人还是会看“新闻”或读“报纸”，前提就是这些“新闻”和“报纸”已经博取了他们的信任。

在一个民主社会，人们对媒体的高度不信任是有害的。所有公民，包括专家，都需要新闻。记者是传声筒，把周边世界发生的事件及其进展告知我们，他们提供的是一个事实的储备库，任我们很多人从中选取原材料来烹制各自的意见、观点和信念。我们须得仰仗他们的判断和客观性，因为他们的报道往往是我们这些非媒体人士与未知事件或事实的第一次接触。世界各地的记者们都在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常常还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然而，大多数美国人却不相信他们提供的资讯。

观众比专家更聪明？

观众和读者这样疑心重重是正确的吗？我也是一个专业人士，直觉告诉我，要相信记者和其他专业人士一样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总体而言，我相信大多数记者的报道和新闻稿。我也相信雇用他们的主编和制片人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不过，和其他人一样，我没有接受过新闻方面的培训，而我所读的那些新闻报道涉及方方面面的主题，对于大多数的主题，我也没有什么专业知识。

如果记者也缺乏这些主题的专业知识，那就涉及胜不胜任的问题了。毫无疑问，记者是可以成为专家的。一些驻外记者能讲流利的当地语言，且对当地文化也了如指掌。一些科学版记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或者接受过大量的科学培训。有些国会山记者解释起立法程序来，比一些国会议员还头头是道。

然而，也还有一些记者以为加沙地带有一座桥，或伊夫林·沃是个女人。此等肤浅并不是因为新闻业吸引才疏学浅之人，而是因为在一个新闻无处不在、人人皆可为记者的年代，标准不可避免地降低了。试想一个行业过去至少还有一些门槛，现如今却敞开大门，会怎么样？如果医学、司法、航空或考古行业也突然变成自助项目，想必结果也无二致。

究其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因为过去需要千锤百炼的一个职业现在却被“学院化”，而且在当今时代这种事情比比皆是。过去记者的职业轨迹里是有一段学徒时期的，他们要写讣告，报道无聊的市政会议，如今新闻和传播学成了本科的专业。这些学院和项目粗制滥造了一批对记者职业知之甚少的年轻人。他们是在象牙塔里学习，而不是在一个行业的习惯和常态中学习。当中很多人从高中时代就开始在网上发布自己

的深刻见解，却不懂“新闻报道”与“写博客”之间的区别。

与此同时，资深记者却被挤出新闻工作室，给懂得如何带来点击率的年轻人腾地方。《国家》（*The Nation*）杂志撰稿人戴尔·马哈瑞吉（Dale Maharidge）在2016年就曾这样描述过：

> 过去新闻工作是一门技艺，现如今是打造记者个人品牌，工作重心是大量炮制博客，把别人的劳动成果总结总结收为己用，保持在社交媒体上的曝光率，对于老牌记者来说，这些都很陌生。而记者的上司也怀有这种新兴的职业偏见。一个主要的国家级刊物主编，年纪40多，曾向我吐露心声说他不愿意雇用年长的记者，因为“他们还困在一周写一个报道的思维模式里”，而且不愿意使用社交媒体。[21]

形式压倒内容，全力比拼速度，再加上现代大学盛行的偏见，一环扣一环造就了错误信息的三连胜。难怪像乔尔·恩格尔（Joel Engel）这样的资深记者会缅怀过去，“那时候‘记者’只是单纯的‘报道者’，而且通常也只有高中毕业而已”，但那是美国更好的新闻时代。恩格尔是一名作家，也曾是《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记者。

很多人主要通过社交媒体来获取资讯，且数量相当可观，而他们能接触到什么样的信息，基本上是由一些新手记者说了算。比如，脸书就让新闻策展人来决定读者的脸书新闻推送内容。据Gizomodo.com[22]2016年披露的信息显示，脸书把这些记者当作低端合约工，却给了他们运作新闻的无边权力：

> ［脸书］热点新闻版块是由一群20多岁和30出头的人来运作的，他们当中大多毕业于常春藤院校以及像哥伦比亚大学和纽约大学这样的东岸私立大学。他们先前在《纽约每日新闻》（New York Daily News）、彭博社（Bloomberg）、MSNBC和英国《卫报》（Guardian）这样的媒体工作过。也有一些前新闻策展人离开了脸

书，去了《纽约客》、互联网新闻博客Marshable和天空体育台这样的机构工作。

据Gizmodo采访的前脸书新闻策展人透露，这一小群人手中握有生杀大权，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故事能上热点新闻，更重要的是，每个主题会链接到哪些新闻网站。“我们来定热点。”其中一个策展人说道，“至于哪些算得上新闻，哪些不算，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衡量标准，全由新闻策展人说了算。”[23]

这样看来，我们显然不能靠脸书来获取新闻资讯。遗憾的是，数百万人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人靠的是推特，然而推特的新闻推送还不成熟，用户数据流中会出现什么新闻，优先排序如何，这些算法还在试验阶段。

对这些年轻记者公平点儿来说，他们也是被市场的特性推到了一个无能为力的境地。正如网上时事评论杂志《名单》（*Slate*）的撰稿人威尔·萨尔坦（Will Saletan）告诉我的，比起制造点击量的即兴创作，复杂的故事需要花费的时间多得多。萨尔坦花了一年时间研究转基因食品安全，这种报道可能会超越那场围绕疫苗展开却让无知打败科学的辩论。[24]“这样的时间跨度现在大体是可以接受的，但你却无法让一个年轻人花这么长时间去梳理一个问题。”萨尔坦在完成报道后这样说——他的报道击碎了反对转基因背后的假科学——这句话出现在Slate网站。这种报道不仅需要时间，还需要坚定的意志去做研究并专注于枯燥的细节。正如萨尔坦所说：“你真的得够任性固执，才能坚持研究像［转基因］这样一个话题，因为当你深入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一切都太机械，太无聊，即便这个话题被政治化以后能激起一些热情，也改变不了这个问题的乏味本质。”

有些时候记者犯的错误既琐碎又搞笑。比如，在那个“巧克力能帮你减肥”的大骗局中，搞恶作剧的人从来没想过事情会发展到那个地步，他们以为“不精通科学的记者们”一旦去咨询真正的科学家，就会发

现这整个杜撰的报道就是个“荒唐站不住脚的新闻”。然而他们错了：没有人真的找科学家来核实这个报道。“关键是，”搞恶作剧的那个人之后说，“我们发现记者们都懒得出奇。如果你把信息处理得恰到好处，那你编辑过的报道看起来就像原创一样。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的情况，事实上很多记者只是复制和粘贴了我们的文本。”[25]

巧克力有助于减肥的骗局就是个愚蠢的报道，但不会伤害到太多人。（迷恋巧克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什么科学理由。）可是，如果报道的是更严肃的问题，记者们还对主题不清不楚，又被意识形态上的偏见所左右，那带来的就不只是错觉，而是困惑。几年前乔舒亚·福斯特（Joshua Foust）集中研究了外派记者到海外部队采访报道的情况，发现这些记者会产生错觉，自以为经验丰富，实际上对自己所处之地根本没什么概念：

> 太多记者对自己要去报道的地方一无所知：无论是格鲁吉亚还是阿富汗，媒体报道中连基本知识都严重匮乏［格鲁吉亚的一名自由撰稿记者告诉我，有在编记者问官员：“阿布哈兹（Abkhazia）[26]在哪里？”］个人经验告诉我，阿富汗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只是外派一周，”他们大概会想，“我不用做太多功课——我可以出发的时候再学。”[27]

没有扎实的基本功，年轻记者能仰仗的也就是在大学里所接受的新闻学教育，用乔尔·恩格尔的话说，那就是个“均质化过程”，“保证了一致性”，培养的年轻记者一旦出了学校大门，“眼里只能看到自己认同的东西”。

这种集体性的无知，甚至可以说是渎职，会对现实世界的人们和社区造成严重的伤害。比如，2014年《滚石》（*Rolling Stone*）就遭遇了一次新闻伦理的巨大失败，这个杂志发表了一篇关于弗吉尼亚大学轮奸案的报道，这篇报道现在已经声名狼藉。一个决心要找到美国精英校园

性侵案例的记者终于发现了一宗。她的主编帮她发表了这篇充斥着大量细节的报道。整篇报道掀起轩然大波，最终却被证实是个假新闻。结果《滚石》面临乌烟瘴气的诉讼，名声扫地。

《滚石》最终撤回了报道，并委托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进行调查。哥伦比亚大学调查员得出结论，记者塞布丽娜·厄德莉（Sabrina Erdeley）和她的编辑们打着报道轮奸案的旗号，甚至违反了基本的新闻准则，显然，这样的报道实在是太对读者口味，都没人加以核实。[28]这个案子后来持续发酵了几年，报道中指名道姓提到的弗吉尼亚大学一名女性行政负责人——报道中说她没有对强奸指控采取行动——以诽谤罪起诉了《滚石》并胜诉。

这篇报道部分是基于一些研究声称美国大学里1/4的女性（有时候报道说是1/5）遭遇过性侵。当支撑这些说法的数据和研究本身就应引人深思，那这一类说法就是促成《滚石》假新闻的帮凶。正如《名单》的艾米莉·约菲（Emily Yoffe）在2014年所写的："1/4的说法意味着美国大学年轻女性被强奸的比例与刚果差不多，在那个国家，强奸是被当作一种战争武器的。"[29]还有一项研究也是这条可怕报道的重要依据，可结果被发现研究里还囊括了"大学男性"，最年长的71岁，平均年龄超过26岁，而这些人都没有住在学校。不过不要紧：数据现在不再是提供事实，更多的是扮演口号，任何争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他们在新闻里看到过"，那也无可厚非了。

与"1/4"数据类似的是现在很普遍的一种说法，在美国媒体上也是一再被提起，那就是在两场重要战争的压力下，美国退伍军人的自杀率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程度。"一天22人"——也就是说每24小时就有22个退伍军人自杀——已经成了退伍机构以及反战组织的口头禅。从2013年开始，许多以退伍军人自杀"盛行"为主题的报道出现在电子媒体和纸媒上，各种版本都有，标题耸动，还配上一些自杀的年轻男女军人的图片。这些报道所指明确：战事扩大驱使美国士兵自杀，无情的政府视若无睹。

但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数据，我就有意去寻找其背后的研究。我每天都和军队官员打交道，他们当中很多人都目睹过战争。而且我在年轻的时候短期做过预防自杀咨询的志愿者，所以也曾经是认证的预防自杀顾问。作为一个在预防自杀方面略有经验的人，我很关心自杀的人；作为一个与军事人员共事的人，我很担心我的学生和朋友；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我被这个看起来并不可信的统计论证所困扰。

遗憾的是，媒体给的不是药，反而是问题催化剂。不可否认，21世纪退伍军人自杀率的确比之前高，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因为所有人群的整体自杀率变高了——至于原因何在，流行病学家还在争论——而退伍军人是所有人群中的一部分。更让人困惑的是，专注“退伍军人”自杀的研究把所有在军队服役过的人都囊括进来了，不论什么年龄什么岗位，从预备役到持续作战部队，统统都算进去。换句话说，一个刚从作战区回家的年轻人和一个30年前曾经在本地国民警卫队服役过几年的中年男子，只要在某个时间自杀了，都算是这种新“流行病”患者。

饱受批评的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不是美国最受欢迎的部门——试图指出2012年的一次大型研究表明，退伍军人自杀的情况自1999年起并没有那么耸人听闻的变化，但这样的努力也不过是徒劳无功。《纽约时报》恰当地报道了这份研究，标题是“美国自杀人数整体攀升，自杀退伍军人占比相对减少”。但《华盛顿邮报》的标题却暗含了一个相反的结论：“退伍军人管理局研究发现，自杀退伍军人增多”。这两个标题都是关于同一份研究的，而且严格来说，它们都是对的，真是不可思议。

媒体，或者说至少有一些媒体机构采访了撰写这份研究报告的科学家，他的回答没能左右媒体的表述。“有人认为现在退伍军人自杀成了流行病。我不认同。”开展这项研究的流行病学家罗伯特·博萨尔特（Robert Bossarte）说，“全国自杀率整体上升，而退伍军人只是其中一部分。”[30]大多数报道并没有引用这句话，也没有采纳重要的基准数据，比如美国整体自杀率或同龄的年轻退伍军人自杀率，或许是因为其

他人群——诸如医生或其他——自杀率相对较高的话，可能会降低这篇报道的紧迫感。

劣质报道没有中断，随之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平行报道，讲述2012年自杀的军人数量实际超过在战斗中牺牲的人数。当然，这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美国军人现在最大的敌人是自己，而不是敌军。这是一幅残酷的画面，但其中有一个小问题：从统计学上来说毫无意义。在任何年份，只要美国军队没有参与大规模的实际作战，那从定义来说，“自杀比战斗导致的死亡更多”这种说法就永远不会错。

在战斗不多的年月，你都可以玩这个数字把戏：比较20世纪50年代末的军人自杀数量和战斗中牺牲的人数。《时代》的一篇文章总算是做对了，甚至还用了这样一个标题，“军队自杀人数超过战斗死亡人数——不过只是因为战争正在结束”[31]，这一点值得赞赏。可是，这又不是什么晦涩的问题，任何人只要肯花一点儿时间想一想，就能理清了，《时代》或任何其他媒体一开始就应该按照这个思路来写报道。

重点在于，有些人是真的关心退伍军人和他们的自杀问题，但他们读完这些报道之后，对于当今退伍军人的现状并没有多了解几分，但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了，任何领域的专家要是对公众的愤怒提出质疑，或是想要更加细致入微地解释这个话题，那就自求多福吧。退伍军人就是会发疯自杀，就是这样。不管怎么说，我可是在报纸上读到的。

怎么办

到头来，我们还是面临一个问题：记者报道一个主题，能否就此成为这个主题的专家？如果不能，专家怎样才能更好地帮助记者？就我个人而言，除了希冀年轻记者无论如何也要了解自己报道主题的背景知识以外，不能也不会给出其他的建议。这是个通用的建议，而且对于其他职业人士如何做好自己的工作，我也只想说到这个份上。说出这些话的同时，我充分意识到，无论人类可以获取的信息多么优质，他们还是会对信息来源挑三拣四，没什么能阻止得了。

不过，我要给专家一个警告，给新闻用户若干个警告。

我想对专家说，要知道在什么时候说不。我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其中有一些就是年轻时造成的，那时候我还无法抗拒内心的冲动要给出意见。大多数时候，我认为自己比记者或读者懂得多，是没有错的，但这不是重点：我还发现有时候的孤立无援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公平点儿说，我发现记者还是会尊重和如实报道你的观点——偶尔会觉得自己像中了圈套或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但如果你严词拒绝，不希望太跑偏，他们还是会尊重你的。那么，什么时候严词拒绝，这个时间点由你来判断，这是你的义务，不是他们的。

新闻用户也有一些重要的义务。我对读者有四点建议，在获取新闻的时候，要谦恭虚己、混合吸收、少点儿偏激、多加辨别。

谦恭虚己。也就是说，至少一开始要假定撰写文章的人，无论他们有什么缺陷，对于这个主题都比你懂的多。至少要记住，在大多数情况下，撰写文章的人在这个问题上花的时间比你多。如果你在媒体上或任何资讯来源上接触到一个报道，都先认定自己对这个主题懂的和别人一

样多，那你关注这条新闻的整个行为就是在浪费时间。

混合吸收。饮食多样化。你不会整天都吃同样的东西，所以也不要整天都消费同一家媒体。当我在国家政治圈工作的时候，任何时候我都会订阅6份杂志，隶属于不同的政治派别。不要狭隘，试试其他国家的媒体，因为它们报道的故事或持有的观点往往是被美国人完全忽略的。别说你“没有时间”。你有。

少点儿偏激——或者说别那么愤世嫉俗。没有什么人是从一开始就故意欺骗你的，这种情况极其罕见。是的，撰写报道的人通常会有自己的计划，也总会有另一个塞布丽娜·厄德莉存在。是的，给你提供新闻大餐的记者，无论是纸媒的还是电视的，都会出错，而且往往自己还意识不到，真是让人瞠目结舌。没有哪个记者可以独享真相，但也不是所有记者都在撒谎。他们也在竭尽全力，凭着本能去做到最好，而且，如果他们知道你也在读其他来源的新闻和资讯来关注事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也是欣喜的。

多加辨别。如果你在一个大媒体看到的内容在你看来似乎不正确，那去找一些半吊子的网站并不能解决问题。有些网站，是为政治运动做宣传的，或者更糟糕的，是一些企业为了迎合狂热分子或白痴特别建立的，对于想要寻找更准确信息的人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真正的解决之道是，你在消费媒体的同时问自己几个问题：作者是谁？他们有没有主编？这是一个坚持自家报道的杂志或报纸，还是一场政治运动中的一分子？他们的说法是可以核查的吗？或者有没有其他媒体试图去证实或证伪他们的报道？

阴谋论者与假药掮客永远不会相信任何挑战他们观点的东西，但我们大多数人可以做得更好。而且记住：阅读和关注新闻是一种技能，就像其他技能一样，通过不断重复会越来越好的。要想成为一个好的新闻消费者，最好的办法就是定期消费新闻。

我批评美国人的基础知识薄弱，批判自恋和偏激阻碍了他们学习新知，批评大学产业没有治愈无知，反而还成了帮凶，批判媒体认为自己

的本职是娱乐大众，批评记者要么太懒，要么太嫩，总之没能做出正确的报道，在这一通批判中，我毫不留情。向着那些在我看来应为“专家之死”负起责任，在我们最需要专业知识的时候却一通诋毁破坏的大多数群体，我挥舞着拳头。

只有一个群体至今没有成为我批判的对象——专家。

当专家出错的时候，又该何去何从？谁来决定什么时候听从专家的，什么时候忽略专家的建议？我们会在下一章直面这些问题。

---

[1] Sarah Kaplan, “How, and Why, a Journalist Tricked News Outlets into Thinking Chocolate Makes You Thin,”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28, 2015.

[2] Mollie Hemingway, “*Vox*’s Motto Should Be ‘Explaining the News Incorrectly,Repeatedly,’” TheFederalist.com, July 17, 2014.

[3] Elisabetta Povoledo, “Pope Calls for ‘Peace in All the World’ in First Easter Message,”*New York Times* online, March 31, 2013.

[4]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Age of Indifference: A Study of Young Americans and How They View the News,” June 28, 1990, 1.

[5] Richard Arum, “College Graduates: Satisfied, but Adrift,”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eds., *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73.

[6] James E. Short, “How Much Media? Report on American Consumers.” 2013. Institute for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Management, Marshall School of Busines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http:// classic.marshall.usc.edu/assets/161/25995.pdf.

[7] Jan Zverina, “U.S. Media Consumption to Rise to 15.5 Hours a Day-Per Person-by 2015,”UC San Diego News Center, November 6, 2013.

[8] 沃尔特·克朗凯特（1916年11月4日—2009年7月17日），记者，冷战时期美国最负盛名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CBS的明星主播，被誉为“最值得信赖的美国人”。——译者注

[9] 引自Benjamin Mullen, “Buyouts Hit the *Dallas Morning News*,” Poynter.org, July 7, 2015。

[10] 引自Jeremy Peters, “Some Newspapers, Tracking Readers Online, Shift Coverage,” *NewYork Times* online, September 5, 2010。

[11] Peters, “Some Newspapers, Tracking Readers Online, Shift Coverage.”

[12] National Journal Group, *Washington in the Information Age*, 2015, Washington, DC.

[13] Steven Metz, “As Celebrity Pundits Rise, U.S.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Suffers,”

WorldPolitics Review, August 14, 2015.

[14] Mindich in Bauerlein and Bellow,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101.

[15] R. R. Reno, “Trumpageddon!” , *First Things* online, February 20, 2016.

[16] Eliot Cohen, “The Age of Trump,” *American Interest* online, February 26, 2016.

[17] X世代，专指1966—1980年出生的人。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传奇战地记者罗伯特·卡帕的相片特辑，他用来形容“二战”后出生的一代。——译者注

[18] Anne Pluta, “Trump Supporters Appear to Be Misinformed, Not Uninformed,”FiveThirtyEight.com, January 7, 2016.

[19] Justin McCarthy, “Trust in Mass Media Returns to All-Time Low,” gallup.com, September 17, 2014.

[20] Paul Farhi, “How Biased Are the Media, Really?,” *Washington Post* online, April 27, 2012.

[21] Dale Maharidge, “People’s Stories: What Happens When No One Wants to Print Their Words Anymore?” *Nation* online, March 2, 2016.

[22] Gizmodo.com，是一个报道消费电子产品相关消息的流行科技网志。——译者注

[23] Michael Nunez, “Want to Know What Facebook Really Thinks of Journalists?Here’s What Happened When It Hired Some,” gizmodo.com, May 3, 2016.

[24] Will Saletan, “Unhealthy Fixation,” slate.com, July 15, 2015.

[25] John Bohannon, “I Fooled Millions into Thinking Chocolate Helps Weight Loss. Here’s How,” io9.Gizmodo.com, May 27, 2015.

[26] 阿布哈兹，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地区。——译者注

[27] Joshua Foust, “The Birth (and Death) of a Meme: Embedded Reporters Don’t Always Get the Story,”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nline, September 10, 2008.

[28] Sheila Coronel, Steve Coll, and Derek Kravitz, “*Rolling Stone*’s Investigation: ‘A Failure That Was Avoidable,’” *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 online, Apprial 5, 2015.

[29] Emily Yoffe, “The College Rape Overcorrection,” slate.com, December 7, 2014.

[30] Quoted in Greg Jaffe, “VA Study Finds More Veterans Committing Suicide,” *WashingtonPost* online, February 1, 2013.

[31] Brandon Friedman, “Military Suicides Top Combat Deaths——But only Because the Wars Are Ending,” *Time* online, January 16, 2013.

第六章

当专家错了

即使所有的专家都一致赞同，他们也可能会错。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

不接受专家

2002年，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指出，“不接受爱尔兰人”的标语在19世纪的美国广为流传是谬见。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理查德·詹森（Richard Jensen）说，这个标语是杜撰的，“受害者的谬误”在爱尔兰移民当中代代相传，直到成了难以撼动的城市传说。10年来，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接受了詹森在这个话题上的学术研究。反对詹森论点的人被视作忠于政府的爱尔兰裔美国人而不予理睬——有时候被詹森自己忽视掉。

2015年的一个故事看起来就是专家之死的真实写照，一个八年级的学生丽贝卡·弗里德（Rebecca Fried）声称詹森是错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她用谷歌做过研究。她礼敬有加，但坚定不移。“在我出生前他就已经从事了几十年的学术研究工作，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对他和他的工作表现出任何不敬。”她之后这样说。这听起来又像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告诉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一位退休的历史学教授——他的作业没做好。

可是结果呢，她是对的，他是错的。这种标语的确存在，而且不难找到。

数年来，其他学者就和詹森的观点角力过，但他们的交锋从未跳出专业史料的丛林。同时，在学术界之外，詹森的主张很快被接受，爱尔兰裔美国人臆想自己受到不公待遇，而这恰好被当作一个例子被大肆宣扬。［当然，新媒体集团沃克斯（Vox）喜欢詹森的版本。］

然而，年轻的丽贝卡做了一件理性的事：她开始搜寻旧报纸资料库。她找到了这个标语，就像《每日野兽》之后报道的那样，“收集了少量的例子，之后是几十个，然后越来越多。她尽可能多地搜寻报纸资

料库。然后她就想，先前已有人发现了吧？”结果，显然詹森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费心做过这个基本的事实核查。

詹森随后进行了反击，试图反驳这个八年级学生的发现，他说自己是对的，但他之前或许应该表述得更准确一些。正如《史密森学会》（*Smithsonian*）后来所做，关于詹森论点的辩论“可能还会继续在很多网站的评论区火热进行”，但弗里德的努力证明“任何有着好奇心和灵敏嗅觉的人都可以挑战历史学现状”[1]。弗里德女士现在已经上高中了，她的论文刊登在《社会史杂志》（*Journal of Social Hitory*）上。

20世纪70年代，美国顶级营养学家告诉美国政府，鸡蛋和很多其他食物可能是致命的。把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应用到这里再简单不过了，有一条线从谷仓场院串到太平间。鸡蛋含有大量胆固醇，胆固醇会阻塞动脉，动脉阻塞会引发心脏病，心脏病会导致死亡。结论很明显：美国人需要在饮食中杜绝一切胆固醇。

他们也这么做了，然后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美国人体重大幅增加，开始死于其他食物。结果证明，鸡蛋没有那么糟糕，或者说至少没有其他食物那么糟糕。2015年，政府决定鸡蛋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说是健康的。政府专栏作家（生产鸡蛋的佛蒙特州居民）杰弗里·诺曼（Geoffrey Norman）那时候写道：

> 很多这样［肥胖］起来的人认为他们是在遵循政府认可的饮食结构。当政府把鸡蛋放到饮食黑名单上，鸡蛋的消费量下跌了30%以上。人们必须要吃东西，所以就会用其他食物替代鸡蛋，而这些食物却让他们变胖。结果证明，他们不吃的鸡蛋并不会阻塞动脉并致死。然而他们用来替代鸡蛋的食物很有可能是导致2型糖尿病甚至更糟糕疾病的元凶。[2]

鸡蛋恐慌是由一连串错误研究导致的，其中一些研究可以回溯到差不多半世纪前了。当然，想要避免食用鸡蛋的人或许还会这么做。事实

上，现在有研究显示，完全不吃早餐——长期以来科学家都在警告大家不要这么做——也没有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糟糕。[3]

1982年，一名研究苏联的顶级专家休厄林·比亚勒（Seweryn Bialer）向赫赫有名的《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发出严厉警告：苏联（USSR）比当时看起来的要强大多了。

> 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10年，苏联都不会遭受一场系统性危机的阵痛，因为苏联拥有强大的政治和社会稳定性，这份能量尚待使用，足以让苏联承受最深刻的困难。苏联的经济，就像任何一个由聪明老练的专业人才管理的大型经济体一样，不会破产。它也许会变得低效，也许会滞胀，也许会经历一两年的绝对衰退，但是，就像它的整体体系一样，经济体系也不会崩溃。[4]

一年后，比亚勒获得麦克阿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天才奖”。两年后，苏联共产党——很明显面临着系统性危机的阵痛——选择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作为新的领导人。比亚勒的厉声警告之后不到8年，苏联不复存在。

在苏联解体前的最后几个月当中，麻省理工的一个教授斯蒂芬·迈耶（Stephen Meyer）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做证。关注苏联的美国政治领袖担心苏联数千枚对准美国的核武器会带来安全问题。迈耶，作为他那一代研究苏联军事的顶级专家之一，告诉每个人要冷静：戈尔巴乔夫还能掌控大局。苏联“军事政变的迹象”，他向出席听证会的参议员保证，不过是一些“胡思乱想”。[5]

迈耶在1991年6月6日做证，9周后，戈尔巴乔夫在一次政变中被罢黜，发动政变的包括苏联国防部长和让人闻风丧胆的安全机构克格勃（KGB）[6]的领导。当坦克进驻到莫斯科大街的时候，场面一片混乱。但是，无论如何，苏联解体一年后，迈耶完全离开了俄罗斯和核武器的研究领域，转而研究生物多样性问题，为马萨诸塞州的渔业和野生

动物部门服务，直到他2006年突然离世。

比亚勒和迈耶这种情况不是少数。正如历史学家尼克·格沃斯德夫（Nick Gvosdev）在几年后的观察所得，关于苏联，很多苏联研究专家都没有“对实际情况进行批判性分析”，而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相信。两名国际关系学者注意到，其他每个人也都搞错了。“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学术］职业的表现真是令人尴尬，”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教授和托马斯·里斯·卡彭（Thomas Risse Kappen）教授在1995年写道，“现有的国际关系理论都没有认识到后来实际发生的改变是有发生的可能性的。”[7]

专家一直都是会犯错的。这种错误的后果有种种，有轻微令人尴尬的，也有浪费时间金钱的，极少数情况下，也会致人死亡，甚至带来国际性灾难。然而专家通常都会请民众相信他们的判断，要相信这样的错误只是偶然，专家会识别出错误并从中吸取教训。

日复一日，普罗大众别无选择，只能相信专家。我们生活在一个由社会机构和政府机构编织的巨网之中，这些机构的目的就是要确保职业人士能够各司其职。大学、评审机构、执照注册机构、认证机构、州检查员和其他机构的存在就是为了维护标准。总体而言，这些防护措施运作良好。比如，当我们读到一个不称职的医生害死一个病人的故事，我们感到震惊，那是因为在一个近百万医生日日安全行医的国家，这类故事实属不寻常。

然而，对职业人士的日常信任是一种平淡无奇的必然之事。这就像我们会信任日常生活中的其他人一样，包括我们会假定巴士司机没有醉驾，或者餐馆员工洗了手。当涉及公共政策，这里面的信任就不是一回事了：我们相信自己的医生会开出正确的药方，这不代表我们相信所有医药领域的职业人士能决定美国是否应该有一个全国医保体系；我们相信一个大学教授能教给儿子或女儿“二战”历史知识，不代表我们因此就相信所有历史学家能给美国总统提供战争与和平事务的建议。

做这些更宏观的决策是不需要执照或证书的，如果出错了也不用交罚款或停职。事实上，这里面几乎没有直接的问责制，所以普通人会担心专家的影响力，也在情理之中。在一个民主国家，由选举出来的官员接受——或拒绝——专家意见，这样就有问责制的成分了，这个话题我们留待下一章也就是最后一章讨论。不过，问责在事发之后。让某个人负责可能在道德上是令人满意的，但追究责任并不能修复损伤或恢复和平。总的来说，专家是如何犯错的呢？记者萨琳娜·齐托（Selena Zito）说过：“目睹专家不懂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真是让人‘叹为观止’。”对于普通人来说，那就不只是一点点不安了。当民众遭遇专家失灵了怎么办？他们怎样才能保持对专家们的信任？类似的，当专家犯了错误，需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专家如何修复与顾客——社会——的关系？

专家失灵的多种面孔

专家失灵有好几种。最无辜也是最常见的一种就是我们认为的普通的科学失败。个人甚至整个行业因为失误或领域自身的局限把重要的问题搞错了。他们观察一个现象，或是考察一个问题，想出理论和解决方案，然后进行检验。有时候他们做对了，有时候他们弄错了。整个过程里通常会遇到很多死胡同和失败的实验。有时候错误没有被发现，甚至被其他专家进一步加深。

这就是一代美国人是如何避免食用鸡蛋而增肥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第一次试射卫星以发射台的巨大爆炸而告终；这就是为什么外交政策的顶尖专家推测德国的和平统一在未来几十年都不太可能实现，却不得不在庆祝的烟火绽放在自由柏林的上空时重新审视自己的观点。

科学也是在实践中学习的。美国在1945年发明了核弹，但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研究员却花了10年时间进行爆炸测试才对电磁脉冲有了更好的理解。电磁脉冲是核爆炸引起的一种隐性影响，会破坏电子系统。而公众直到1962年才知道电磁脉冲的存在，美国在太平洋的一次测试导致数百公里外的夏威夷路灯灭掉，电话故障，科学家们已经猜想到会有这种效应，但影响范围还是超出了他们的预估。

绝大多数人，包括专家，对这种失灵都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这就是科学和学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普通人对模棱两可的东西感到不适，他们要的是答案，而非警告。但科学就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结论。科学主题本身就是要根据一套细致的规则不断进行测试，在这个过程中，现有的理论会被更优的理论替代。民众不能期待专家永远不犯错，如果专家能达到这般精准，他们一开始就无须搞研究和做实验了。如果政策专家能未卜先知或无所不知，那政府就不会陷入赤字，战争也只有在疯

子的煽动下才会爆发。

有时候，专家的失误也会带来有益的结果，但这种失误受到的对待与那些劳民伤财的错误却相去甚远。比如说，当科学家发明口服避孕药的时候，其实他们本来是要搞清楚如何帮助女性避免意外怀孕的。他们并没有想着要降低卵巢癌的风险——但很明显某些控制生育的药物达到了这个目的，而且效果显著。对某些女性来说，口服避孕药是有风险的，但对另一群女性来说，同样的药物或许能延长生命。当然，如果生育控制药物只会增加癌症风险，我们就会扼腕叹息又一次科学的失败，但这种积极的副作用在半个世纪前无人知晓，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

类似的，有专家预测20世纪50年代末会发生全面的国际核武器军备竞赛，他们错了。但他们之所以会错，至少有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低估了自己努力限制核武器扩散的效力。约翰·F.肯尼迪总统担心到20世纪70年代世界上会有多达25个核武国家。（到了2017年，只有10个国家跨过这道门槛，其中有一个国家——南非——还曾经声明放弃这种武器。）[8]肯尼迪的预测是基于最佳专家团队的建议，也不是不可能或不合常理的，但是，在这同一批专家所提倡的政策协助下，未来核武国家的数量降低了。

专家无法保证最终结果。他们无法承诺永远不犯错，也无法承诺不受人人皆有的缺陷所累，这些缺陷支配着一切人类研究。他们只能承诺制定规则和方法来减少犯错的概率，做到远低于普通人犯错的频率。如果我们接受专业人士的工作所带来的裨益，那也得接受不那么完美的事情，甚至可能是一定程度的风险。

然而，其他形式的专家失灵就更令人忧心了。比如，当专家试图把自己的专业知识从一个领域延伸到另一个领域，他们可能会犯错。这不仅是错误的触发器，也是令其他专家十分恼火的事情。有些情况下，当艺人——当然是他们那个领域的专家——把艺术和生活混为一谈，开始对一些复杂的问题发表看法，这就是明显的跨专业入侵了。

还有些时候界限没那么清晰，问题就变成了“相对专业”。一个生物学家不是医生，但总体而言，相较普通人，生物学家能更好地理解医学问题。当然，这也不是说生命科学领域的任何人对这个领域的任何问题总是比其他人更有见地。比如说，一个勤勉的人花时间阅读糖尿病相关资料，可能就比一个植物学家更精通糖尿病的课题。一个专业人士如果专业学识深入，但知识面窄，那在自身领域以外的问题上，也就未必比其他人更有才学。一个领域的教育和文凭并不能保证一个人精通所有领域。

然而，当专家留在自己的领域里，却不甘于诠释，开始预测，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强调预测就是在破坏科学的基本规则——科学的任务是解释，不是预测——而社会作为一个客户要求预测多过解释。更糟糕的是，普通人很容易认为预测失败就表示专业知识毫无价值。

就这一点而言，专家面临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无论学者强调过多少次，他们的目标是解释世界，而不是预测离散事件，民众和政策制定者还是青睐预测。（即便专家内心很明白，往往还是乐意效劳。）这就是专家和客户之间自然但无法克服的紧张关系，大多数人喜欢预测问题并加以避免，而不是事后解释。一个诊断的承诺，即便带有揣测性质，也总比验尸的绝对确定性要更受欢迎。

最后还有彻底的欺骗和渎职。这是最罕见但最危险的一种。在这种情况中，专家为了自己的目的（通常是野心家妄图捍卫自己的次品）刻意造假。他们一方面希望民众不会抓个现行，另一方面则希望同行不会注意到，或是把他们的欺骗归类到诚实的错误。

这种最极端的情况是最好应对的，所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

当专家存心不良

科学家在21世纪初经历了艰难的几年。科学期刊的论文撤回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比例。学术欺诈或行为不端现在看来都成了日常。

专家欺诈不难定义，但难以识别。如果有研究者或学者伪造研究成果或冒充专家的人谎称自己获得某个领域的资格证书或执照，那就是明显的行为不端了。［科学家用一个非常全面的缩写“FFP”来形容这种行为，意思是“伪造（fabrication）、篡改（falsification）或抄袭（plagiarism）”。］这种行为不端可能难以辨别，因为这需要其他专家找到线索，普通人不具备剖析科学研究的能力，最多也就是可能凑近墙上的文凭证书仔细看看是不是真的。

有时候专家不是专家。人们对自己的文凭撒谎，而且做得厚颜无耻。现实中的“超级伪装者”弗兰克·阿巴内尔（Frank Abagnale）在20世纪60年代完成过这种大胆华丽的造假［之后事迹被拍成电影《猫鼠游戏》（*Catch Me If You Can*）］，阿巴内尔的行为包括冒充飞机驾驶员和医生。还有一种更普遍但更微妙的欺诈，就是有些人的确是专家，但他们用伪造的荣誉或夸大其词来加强资历。他们也许会声称自己是某专业协会的成员，或参加过某专家小组或研讨会，或是受过勋或获过奖，或是其他伪造的修饰包装，这些人通常只有在一些契机导致其他人去查阅他们的记录时才会被抓包。

当真正的专家说谎，他们危害的不仅仅是自己的专业，还有客户——社会——的福祉。他们对专业知识的威胁有两种表现：一种就是欺骗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另一种就是当他们被识破时这种行为不端对社会信任的腐蚀。这就是为什么（除了对撒谎和欺诈的法律制裁以外）专业组织、学术基金会、智库、学术期刊和大学保留对这种恶意渎职的一些

最严厉惩罚。

出乎大众意料的是，这些惩罚的确存在。很多美国人都误以为研究员和大学教师不可能遭到解雇。这不是毫无根据的观念，因为解雇一名终身教授的确很难。虽然很多教授的合同里都有“反公德行为”条款，但21世纪的社会准则已经把标准降到很低，一个教授在课堂或私人生活中的行为几乎很难触及那条红线，以至于让学校终止任期。像对学生进行人身威胁或完全不出现在工作岗位上这种明显会导致解雇的过错可能还是会触发解聘的后果，但就个人行为而言，通常几乎所有情况都会被忽略掉。

然而，学术行为不端仍然是很多学校的红线。学术自由保障了人们有权表达不受欢迎或与众不同的观点，但这不是给制造马虎草率或刻意误导人的研究开绿灯。比如，科罗拉多大学解雇了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一个把纽约“9·11”恐怖袭击受害者比作纳粹的讲师——他们解雇他不是因为他是一个不近人情的蠢货，而是因为他的评论引发人们去关注他的“学术著作”，结果发现其中有部分抄袭。当然，丘吉尔声称自己是政治偏见的牺牲品。他把自己作为科罗拉多州雇员遭解职的事一直上诉到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最后输掉官司。

毫无疑问，丘吉尔的履历之所以会被仔细查阅，是因为他的政治观点。丘吉尔就解职事件提起上诉也是基于这一点，辩称他的抄袭是一些无心的过失，只是因为他持有争议的观点，才被大家发现。但这样的立场本身就令人震惊：一定要发生把双子塔遇难者称为“小阿道夫·艾希曼”（little Adolf Eichmann）这样的事，就像丘吉尔所为，才能去仔细查阅一个教授的学术著作？声称抄袭被发现只是因为这个大学讲师用令人作呕的言论来费力博取关注，这样辩解很苍白。

丘吉尔一案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独一无二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它受到公众的极大关注。大多数学术界渎职的案例都未被公众察觉。2014年的同性婚姻研究，包含了大规模数据造假，是一个特例，并且因为其结论的潜在政治影响力而受到大量关注。大多数学术研究都不会像

一个宣称可以说服人们走出恐同情绪的研究那么有趣，所以也不会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

不过，关注度低，不代表这些案例不严重。2011年，一名博士后研究者拿着美国政府的拨款在哥伦比亚大学开展研究，结果被发现在阿尔茨海默病相关的细胞生物学研究方面造假。这个研究者同意三年内不接受任何联邦政府拨款，但在他的不端行为被发现之前，他的文章已经被其他科学家引用了不下150次。2016年，一名西班牙研究员也因为其心血管疾病方面的研究涉嫌欺诈而遭到供职机构解雇。

还有更戏剧化的案例，一个名叫安德鲁·韦克菲尔德（Andrew Wakefield）的医生发表了一个把疫苗与自闭症联系起来的争议性研究，2010年在英国被吊销医生执照。英国医疗部门表示吊销韦克菲尔德的执照不是因为他支持了一个充满争议的主题，而是因为他违反了很多基本的科学行为准则。英国医学总会（UK General Medical Council）发现韦克菲尔德“曾经在未获得伦理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对儿童进行侵犯性研究，侵犯了儿童的临床利益，没有披露经济利益冲突和不当资金”。[9]

和沃德·丘吉尔一样，韦克菲尔德的支持者辩称他是猎巫行动[10]受害者。但败坏名誉的研究和行为不端不是一回事。比如，主要的艾滋病否定论者之一彼得·迪斯贝格（Peter Duesberg）虽然面临指控说他涉嫌学术行为不端，但还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校就这项指控在2010年对他展开了调查并驳回了指控。

然而，我们还是绕不过这个问题：大量出版的科学研究有问题，轻则不可靠，重则造假，而且数量多到不容忽视。说起来可能会对普通人聊可安慰，我们之所以知道这些行为不端在发生，是因为所有领域的科学家都供认不讳。2005年的一项调查问到科学家是否有过不诚实的研究行为，大约2%的科学家自认至少伪造、篡改或“修饰过”一次数据，14%的人说曾目睹同事有过此类行为。当被问及严重行为不端，但还没达到完全造假这样滔天大罪时，1/3的受访者承认他们涉及不那么明显但还是值得商榷的行为，比如忽略与自己观点冲突的发现。超过70%的人表

示曾在同事身上见过同样的行为。[11]

大多数学术行为不端对普通人来说都是不易察觉的，因为太无聊了。大多数学术期刊的文章撤回都是因为一些冷门话题研究中的不起眼错误或失实叙述，这与人们在《永不妥协》（*Erin Brockovich*）或《局内人》（*The Insider*）这样著名的电影里看到的大型欺诈的戏剧性故事不同。相对来说，自然科学似乎麻烦多多，但这可能是因为这些领域的研究更容易检测。

的确，自然科学家可能会说他们的文章撤回是职业责任和监督的表现。具有最高影响力的科学和医学期刊——例如《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文章撤回率较高。不过，谁也不确定是为什么。[12]可能是因为有更多人核查结果，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个振奋人心的趋势。也有可能是因为更多人走捷径渗入顶级期刊，如果是这样，那就是个令人沮丧的事实了。还有可能是在声名显赫的期刊上发表文章的效应：读者越多，越有可能被别人引用到研究中去，顺藤摸瓜，就会被人发现行为不端。

任何科学研究的黄金标准就是看能否被复制或至少被重构。这就是为什么学者会用注释：不是为了防止抄袭——虽然的确有这个作用——而是让同行能够跟随它们的脚步，看看他们能否得出同样的结论。如果科学家篡改数据，那他们的结论就很难被复制，因而会破坏，甚至伪造研究。

不过，这种查证首先要假设有人会费心去复制结论。普通的同行互审不包括重做实验，而是推荐人会在假定论文符合基本的研究标准和流程的情况下来阅读。他们主要是判断课题是否重要，数据的质量够不够高，文中的论据是否能支撑结论。

当然，像化学或物理这样的自然科学似乎更主张复制的要求，而像社会学和心理学这样的社会科学研究往往依靠的是受试者，因而也更难复制。至少自然科学家可以声称有更清晰的标准：如果有人说某种塑料

在100摄氏度融化，那其他任何人只要有同样的材料和一个本生灯，就可以查证这个发现。当100个学生志愿者受邀参与一项研究或训练时，事情就变得困难多了。研究结果可能是一个实时的概况，或是某个区域的印象，或是偏离了原来的方向。研究的设计本应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但唯一知道答案的方式就是试着复制实验。

这就是一个研究团队在心理学领域打算做的事。至少结果是让人意外的。正如《纽约时报》2015年所报道的，一项试图复制100项研究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其结果发表在三个顶尖的心理学期刊上，研究发现一半以上的结论都没能经受住重新检验。

> 这项分析是由心理学家完成的，其中很多人都是自愿花时间来复核他们认为重要的著作……经审核的研究被视为核心知识的一部分，科学家借此来理解性格、关系、学习和记忆的动态。治疗学家和教育者依靠这些发现来引导决策，但既然这么多研究自身都有问题，那这些著作背后的科学依据就不得不让人怀疑了。[13]

这样的结果令人担忧，但这算欺诈吗？差劲的研究不等于行为不端。在很多案例中，问题不在于在重做研究的时候导出了不同的结果，而是这些研究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可复制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结论也许是有用的，但其他研究者无法以同样的方式来重做这些人类调查。

事实上，心理学研究也许都不算是差劲的研究。另一群学者随后又检验了这个调查——毕竟科学就是这样运转的——并得出结论，用哈佛学者加里·金（Gary King）的话说，这就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甚至不负责任”。金指出，当复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应该让学者“魂牵梦萦”，“那要说所有社会心理学家都在胡编乱造就不对了”。[14]整个科学事业，包括对反驳的反驳，都在正轨上：在《科学》（*Science*）的扉页上，专家还可以继续评估所有的论据，并对其展开进一步分析。

那么，自然科学是不是比社会科学有更多的次品或赝品被揭露出

来？也许不是。当癌症研究者试图复制自身领域的研究，他们也遇到了心理学家和其他专家同样的问题。Slate网站撰稿人丹尼尔·恩贝在2016年报道了一组生物医药研究，这些研究出现了与心理学研究同样的“复制危机”。他指出，据估计“多达一半的研究结果是建立在不可靠的基础上，在其他实验室可能是无法复制的。这些癌症研究不仅没有找到治疗方法，甚至都没能提供任何有用的数据”。[15]就复制而言，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障碍与困扰社会学家的如出一辙：凌乱、时间推移、无法精确复制第一次实验时的条件等等。

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有欺骗性研究，也有只是粗制滥造的作品，这个主题太庞杂了，很难切入，但学术界“复制危机”的源头不是只有纯粹的欺诈，还有完美复制在物质和时间上存在的限制，以及其他问题，比如对拨款的监管不足，学术机构有发表作品的要求（无论多微不足道），这些给研究者造成了巨大压力，学者们的论文或研究一旦出版，往往就会把从前的作品打包装箱，扔到一边。

社会科学和人类学方面的研究尤其难复制，因为它不是基于实验流程，而是专家对独立作品和事件的解读。一本文艺评论的书就是书如其名——评论。它不是科学。不过，专家的判断则需要关于这个学科的深厚知识。同样，研究古巴导弹危机不同于自然科学实验。我们无法反复重演1962年10月发生的事情，所以一个作者检视了古巴导弹危机的后果并写出文章，呈现的是一个专家对一次历史事件的分析。这样的研究结论可能漏洞百出，但这只是给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素材，算不上职业行为不端。

在社会科学和人类学中还有一些引人瞩目的完完全全的学术诈骗案例。2000年，埃默里大学历史学家迈克尔·贝里尔因为一本名叫《武装美国》（*Arming America*）的书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享有盛名的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 Prize）。贝里尔在书中声称揭穿了一个关于拥枪思想的谬论，据他说，美国人拥枪的思想不是植根于早期殖民时代的经历，而是受近一个世纪后的其他影响形成的。这项研究认为私人拥有武器在

早期的美国并不常见，因此立即在读者中引起两极分化。

这个研究本来不会被人察觉，但因为探讨的主题是拥枪，控枪支持者和拥枪团体立刻就贝里尔的观点选边站，故而引来细致密切的审查。其他学者试图找到贝里尔研究所依托的信息来源，但他们的结论是贝里尔要么是误用了信息，要么是杜撰出来的。哥伦比亚大学撤回了班克罗夫特奖。埃默里大学也展开了调查，发现贝里尔的错误有一些可能是因为能力不足，但还有一些是学术诚信的问题，这一点无可回避。此后不久，贝里尔辞去了职位。最初合作的出版商也终止了这本书的出版，不过后来又被一家小型商业出版社重新发行了。

2012年，一个名叫戴维·巴顿（David Barton）的作者出版了一本关于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书。巴顿没有专业历史学背景，他之所以名噪一时，主要是因为他在福音运动中的声望。（2005年，《时代》称他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25个福音派传教士之一。）他的书赢得了保守派领袖的赞誉和支持，包括2012年总统参选人麦克·哈克比（Mike Huckabee）和由历史学家转型为政治人物的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

和贝里尔的枪支研究一样，巴顿的作品因为政治影响力和作者的声望受到相当大的关注。这本书的标题毫不隐晦——杰斐逊的谎言：揭露你一直相信的托马斯·杰斐逊。巴顿在书中说，现代历史学家不仅污蔑了杰斐逊的私生活，还忽视了他的很多思想其实是支持现代保守派观点的。考虑到杰斐逊是欣赏法国大革命的，而且他后来与自由主义者结盟（这与他的保守派死对头约翰·亚当斯正好相反），这个观点非常大胆。

大多数专业学者都不理会这本书，对他们来说，这本书就是一个业余历史学爱好者和一个非学术的宗教出版社的合作产物。无论如何，这本书的目标读者也不是学者，而是渴望读到这些内容的那群人。巴顿大获成功：《杰斐逊的谎言》登上了《纽约时报》畅销书榜。

这本书的准确性很快就受到质疑，提出质疑的不是某个研究型大学

的无神论自由主义者，而是宾夕法尼亚州一个小型基督教学校格罗夫城市学院的两名学者。经过仔细审查后，巴顿的很多主张都站不住脚。这本书后来被历史新闻网（History News Network）读者票选为“最不值得信赖的纸质书”，但更具毁灭性的是这本书的出版商认为这本书实在是漏洞百出，所以终止发行。《大西洋月刊》撰稿人兼法学教授加勒特·埃普斯（Garret Epps）对这一事件做出尖刻的批评，他说：“巴顿的书大多是自助出版的，永远不会被撤回。但是基督教学者和一家基督教出版社的斥责是他永远挥之不去的羞耻烙印。”[16]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欺骗和行为不端都被发现了。不过，普通人对于最后的清算并不太关心，这也合情合理。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各领域的研究是否可信。

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个错误的问题。一个课题的成败与否，几乎不会由一次研究决定。普通人不会去仰仗细胞研究的某一个项目的结果。如果有一组研究集结起来得到一种药物或一种治疗方法，而某一项研究隶属其中，这个研究本身也会触发一连串的研究来审视相关的安全性和效能。伪造一项研究还有可能，伪造数百项研究，并且制造出完全欺骗性或危险的结果，那就另当别论了。

同样，在公共政策方面，专家的权威不是靠一项研究确立的。即便一个学者因为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受到政策圈的关注，他/她的影响力也不是由科学复制作品的可能性决定的，而是由作品所提出的观点决定的。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一样，任何单项研究，如果没有其他专家的再次审查，鲜少会影响到普通公民的生活。

然而，任何领域的欺骗都会浪费时间，推迟进展。就像一组复杂的方程式中如果早早埋下错误，后面的计算就会陷入困境，欺骗或行为不端会耽搁整个项目，直至有人发现是谁搞错——或刻意欺瞒——事实。当然，如果这样的事情公之于众，随之而来的就是行为不端的范围和影响这一类法律问题，尤其是当这些项目花的是公众的钱的时候。

我以为你是读医学预科的

除了恶意欺骗或令人错愕的无能，专家失灵还有其他原因。专家最常犯的其中一个错误是一种假设：假设专家在某些事情上比大多数人都聪明，那么他们在一切问题上也比任何人都聪明。他们视自己的专业知识为一种许可证，可以插手任何事情。（还是那句话，我不能在这里率先批评。）他们先进的教育和经验就成了一种总体性保证，保证他们心如明镜，无论在哪个领域，他们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这些专家就像是经典喜剧《动物屋》里的埃里克·斯特拉顿（Eric Stratton）一样。当他在学生法庭上挺身而出捍卫他那个不守规矩的大学兄弟会时，他的朋友问他，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放轻松，我是读法律预科的，”他向自己的兄弟保证。“我以为你是读医学预科的？”其中一个兄弟问道。“有什么区别？”斯特拉顿回答。

这种过度自信不仅使专家偏离自己的轨道，对自己专业相去甚远的问题发表看法，而且还会“夸大”自己在本专业内的能力和水平。专家和职业人士，就像其他岗位上的人一样，认为以前的成功和成果就能证明他们学识出众，他们会把自己的界限往外推，而不是说出每个专家都讨厌的那几个字：“我不知道”。没有人愿意表现得无知或是被人发现个人知识上的缺漏。普通人和专家都一样，会对他们一无所知的事情振振有词，但专家应该做得更好。

跨专业入侵的原因有多种，从无心的失误到才学上的自负。不过，有时候动机很简单，就是名声会带来机会。艺人是最糟糕的入侵者。（是的，在演艺领域，他们是专家。表演学校又不是化学工程师开的。）他们的名气让他们很容易接触到各种问题和争议，真正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会与他们合作，就是因为人们会习惯性地接名人的电话。

然而，与名人聊天和教育名人是有云泥之别的。这会造就一种匪夷所思的场景：一个领域的专家——娱乐圈——竟然去研究其他领域的重要问题。这种奇特的现象在美国相对历史较短，但也是在名人能在推特或个人网站上随意发表高谈阔论之前就已经存在的了。

比如，1985年，一名加州众议院议员托尼·赛洛（Tony Coelho）邀请女演员简·方达（Jane Fonda）、西西·史派克（Sissy Spacek）和杰西卡·兰格（Jessica Lange）到众议院农业委员会就农场问题做证。她们有什么资格？她们在那10年里受欢迎的三部电影中扮演了农场主妻子。当然，这整件事就是个噱头，当被问及为何要这么做的时候，民主党议员赛洛朝共和党总统罗纳德·里根开火（Ronald Reagan）："她们可能比白宫里的那位演员更懂农业问题。"当时他是这么说的。[17]

可是，这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多年来，名人开始投身到自己知之甚少的纷争中。他们推波助澜，制造假警报，改变数百万言听计从的粉丝的日常习惯。

一名加拿大的卫生政策专家蒂莫西·考尔菲尔德就是众多受够了的专家之一。他写了一本书，谴责名人对专业知识的侵犯，还专门提到一个明星：《格温妮丝·帕特洛的观点是不是都错了？当名人文化和科学发生冲突》。（我在第四章讨论过帕特洛关于女性护理的一些建议——我也很无奈。）正如考尔菲尔德在2016年的采访中表述的：

如果你问别人：格温妮丝·帕特洛提供的乳腺癌风险的信息可不可靠？大多数人都会说不。营养科学？大多数人都会持怀疑态度。但是因为她有如此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因为她把这股力量打造成自己的品牌，人们还是会认同支持她。

> 这里还有一个有效性偏见：名人无处不在。事实很简单，他们无处不在，他们的影响力可见一斑。你会在想起《人物》杂志上帕特洛的一张照片时谈论无麸质，但是谈论的内容却与数据告诉我们的事实完全不符。名人就是这样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力。[18]

这并非无伤大雅。人们不愿意给孩子打疫苗，实际上就是因为《花花公子》的宠儿、女演员珍妮·麦卡锡（Jenny McCarthy）说她通过“谷歌大学”深入研究过疫苗。更多人会看到帕特洛和麦卡锡，而且接触她们那些愚蠢想法的概率，要多过我们去看——或者耐心听取——一个魅力逊色太多的肿瘤医师或流行病学专家。

行动主义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里每个人的权利。但是，行动主义和一个名人滥用自己的名气是大相径庭的。普通人的行动主义需要对专家的观点选边站，然后去支持自己青睐的政策。可是，当名人用自己的判断取代专家的判断——实际上是在要求人们因为名气而相信他们——这无异于一个微生物学家对现代艺术指指点点，或一个经济学家争论起药理学。

有些情况下，专家会把手伸到别的领域，是因为他们插手的那个专业领域和自己的非常接近，这样一来，专业判断的跨领域延伸看起来就是合乎情理的。已经在自身领域取得成就并获得赞誉的专家尤其如此。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但是，一个天才能通吃所有领域的想法已经越来越说不通了——幽默大师亚历山德拉·佩特里（Alexandra Petri）曾经写道：“你对一个人说‘你发明了火炉，那你对税收又有什么看法？’还能得到一个连贯合理的答复，本杰明·富兰克林是最后一人。”[19]

例如，诺贝尔奖得主化学家莱纳斯·鲍林（Linus Pauling）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相信维生素C是一种特效药。他提倡服用大剂量的维生素C来击退感冒和任何其他小病。鲍林的主张没有任何实际根据，但就因为鲍林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他关于维生素效用的结论在很多人看来就是将他的专业知识合理延伸到其他领域。

事实上，鲍林在倡导维生素的最初阶段并没有运用专业的科学标准。他最早服用维生素C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一个名叫欧文·斯通

（Irwin　Stone）的自称是医生的人建议他这么做。斯通告诉鲍林，如果他每天服用3 000毫克维生素C——建议每日服用量的50倍——那他就能多活25年。可是，斯通“医生”仅有的学位也就是一个未获认证的函授学校和一个脊骨神经医学院颁发的两个名誉学位。[20]

鲍林愿意相信这个概念，于是他开始贪食维生素。很快他就感受到神奇的效果。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可能会怀疑这是一种“安慰剂效应”——当你告诉别人某种药物能让他们感觉好一些，他们会真的感觉好一些，但因为鲍林对科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同事很重视他的话，并开始检验他的主张。

结果没有一个维生素C实验能证明鲍林的主张，但鲍林不听。正如儿科医师兼宾夕法尼亚大学传染病专家保罗·奥菲特（Paul　Offit）后来所写：“尽管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他是错的，鲍林还是不肯相信，继续在演讲、科普文章和著作中推广维生素C。当他偶尔在媒体面前看起来有明显感冒症状的时候，他就说自己是过敏。”

鲍林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一直宣传自己的主张。他认为维生素能治愈一切疾病，包括癌症、心脏病、麻风病和心理疾病，以及其他各种疾病。他后来还建议大家研究维生素C在对抗艾滋病方面的功效。维生素生产商当然乐见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成为他们的守护神。很快，维生素保健品（包括“抗氧化剂”，相当于那个时代的“无麸质”和“非转基因”）成了气候。

只不过，后来证明大剂量维生素其实是危险的，可能会增加患某些癌症和中风的概率。鲍林最终不仅损害了自己的名声，也损害了数百万人潜在的健康状况。如奥菲特所指，一个“赢得两次诺贝尔奖的人，他的正确是举世瞩目的”，“所以错也错得轰轰烈烈，以至于他可能算是世界头号庸医”。时至今日，尽管科学界按照恰当的方式检验并证明了鲍林的主张是错的，但是还有人认为吞下维生素的大药丸能击退疾病。

鲍林死于癌症，享年93岁。至于他是不是像斯通“医生”允诺他的那

样多活了25年，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有时候，专家会利用某个证书或成就的光环插手相去甚远的领域，从而影响重要的公共政策辩论。1983年秋天，纽约市电台播报了一个关于核军备竞赛的项目。20世纪80年代初期，冷战局势紧张，有几年情况最糟糕，而1983年就是其中之一。苏联击落了韩国的一架民航客机，美国和苏联在日内瓦就核武器展开的会谈失败；ABC制作了一部纪录片，讲述可能发生的核战争，名叫《浩劫之后》（*The Day After*），首播后成了那个时代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此外，大选年很快就到了。

我是当时的听众之一。那时我正在纽约读研究生，研究方向是苏联，准备在公共政策领域大展宏图。“如果罗纳德·里根再次当选，”我的电台里传来浓重的澳大利亚口音，“核战争是确定无疑的。”宣称核战争是无可逃避的，这话吸引了我的注意力，尤其是在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正式的预测说里根在1984年大选中会遇到威胁。是谁这么笃定——都到了“确定无疑”的程度——我们会走向大决战？

说出这话的是一名女性，海伦·考尔迪科特博士(Dr. Helen Caldicott)。她不是物理学博士，也不是政府或国际事务方面的博士，而是来自澳大利亚的儿科医师。她对核武器的忧虑，据她自己回忆，是源自她读到内维尔·舒特（Nevil Shute）1956年的末日类小说《世界就是这样结束的》（*On the Beach*）。她后来说，如果孩子们所处的世界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那她觉得治疗儿童疾病就没有意义了。她很快就成了武器控制和核政策辩论中一个有力的声音，尽管她几乎没有与这个主题相关的文凭或经验。

考尔迪科特习惯于对高度技术性的问题发表笃定的言论。她会就美国导弹发射井的响应力、民防措施和苏联外交政策机构的内部运作等议题侃侃而谈。她在美国居住了差不多10年，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代表反核运动团体发声。

1985年，她出版了《导弹嫉妒》（*Missile Envy*）这本书，至此她的跨专业影响力达到巅峰。这本书里充斥着医学词汇，比如“诊断”军备竞

赛。（章节包括“病原学”、“体格检查”和“个案研究”等。）书的标题就是个剧透：儿科医生在苏联和美国老年男性的灵魂里发现了冷战的心理学基础。她指出，美国的女人已经赢得了选举权，“手握选举权但实际上却无所作为”，像时任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这样的参政女性，考尔迪科特说，并不能“代表大多数理智聪明的女人身上的真实属性”。[21]（考尔迪科特在纽约电台里说的话就更直白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博士宣称，“不算女人。”）考尔迪科特在20世纪80年代末回到澳大利亚竞选政治职位，失败了。

专家界这样的例子也比比皆是。最著名的例子，至少按照全球公众影响力来衡量，就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诺姆·乔姆斯基（Norm Chomsky）教授，一个受到全球数百万读者崇敬的人物。如果计算起来，乔姆斯基应该是在世美国知识分子中被引用最广泛的人了，他在政治和外交政策方面著作等身。然而，乔姆斯基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岗位是语言学教授。乔姆斯基被视为他那个领域的先锋，甚至是巨人，但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造诣，也不比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22]在人类语言起源方面的造诣更深厚。无论如何，他为公众所熟知的，更多的是他政治方面的著作，而不是语言学领域的作品。的确，这些年来，我常常碰到一些熟悉乔姆斯基的大学生却不知道原来乔姆斯基是一个语言学教授。

然而就像鲍林与考尔迪科特一样，乔姆斯基回应了公共广场的一种需求。普通人往往觉得自己在挑战传统科学或社会主流思想方面处于劣势，这样一来，如果有一个直言不讳的人带着专家认证这样的光环出来发表看法，人们自然会团结到他／她周围。医生可能应该关注一下维生素在人类饮食中的作用。可以肯定的是，当国家正在重新思索核武器的角色，公众应该参与进来。但是一个拥有化学学位的人或一个儿科住院医师，自身领域的资历并不会让他们的主张比任何其他在深奥领域自学成才的人更可靠。

公众对这种越界的行为相当容忍，这本身就是个悖论：一些外行人不尊重专家在专业领域内的看法和观点，另一些人却认为专业知识和成

就是通用的，专家和知识分子可以对几乎一切事情发表权威看法。人们质疑家庭医生为其注射的疫苗安全性，却也会去买一本核武器方面的书，只因为作者的头衔里有一个有魔力的词——“医学博士”。

遗憾的是，当专家受邀对超出自身能力的问题发表看法时，很少有人会谦逊地记得自己有责任提出异议。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最终后悔不已。在一次扭曲的争执中，我已经坦白说我对现在受关注的这个问题认识有限，爱莫能助，但还有人坚持认为我完全有能力就这个话题发表评论。面对一个对我深信不疑的记者或学生，后者尤甚，我却要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如果我假装权威回答他们的问题，是很不负责任的，这种感觉很奇怪。承认自己不是全知全能让人不舒服，但我们唯愿语言学专家、儿科医师和其他各路专家也勇于承认这一点。

我预测！

20世纪60年代初，绰号“神奇的克里斯威尔”（The Amazing Criswell）的演员经常出现在各种电视节目和广播节目中。克里斯威尔的任务就是做出各种离谱的预测，还要用夸张的戏剧化的语气说出“我预测！”他宣称过很多事情，比如纽约将会在20世纪80年代沉入海底，佛蒙特州会在1981年遭遇核弹攻击，丹佛市将被1989年的自然灾难夷为平地……克里斯威尔纯粹是在哗众取宠，但观众还是听得津津有味。不过，他没预测到自己的事业会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跌入谷底，最终沦落到出演一些靠色情镜头博眼球的低成本电影里的小配角，电影导演还是他的朋友——传奇恐怖片导演埃德·D.伍德（Edward D. Wood）。[23]

对于专家来说，预测未来是个不小的麻烦。公众希望专家能给出预测，而专家却并不擅长此类事情。专家本来就不应该擅长预测未来。科学的目的在于解释，而不是预测。即便如此，有的专家还是会不自觉地被“预测未来”所吸引，就像有些专家喜欢越界指手画脚一样。

专家和外行都认为，既然专家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掌握一门学科，那他们也一定会在预测未来方面表现优异。这个想法在自然科学领域专家身上就更强烈一些，因为他们利用实验方法来决定实体世界在什么样的条件下能如他们所期望的那样运作。如果有意外发生，科学家就有了一个新的出发点来展开调查。正如已故科幻小说作家（生物化学教授）艾萨克·阿西莫夫所说，激发出最伟大的科学突破的词或许不是“我找到了！”而是“哎呀，有意思！”

然而，有些专家不但欣然给出预测，甚至还为此收取不菲的费用。比如说，民调员向政治候选人和媒体订阅用户出售自己的服务，而市场专家则为新的服务和产品试水。民调由来已久，1936年《文学文摘》

（*Literary Digest*）预测阿尔夫·兰登（Alf Landon）会打败富兰克林·罗斯福（主要是通过调查自己的读者得出）。如今，研究民意成了一门科学，出现了相应的专家和期刊。有一些民调员是有党派立场的，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刻意引导民调结果，但大多数还是有统计学和方法论的学术背景，使得他们大体上可以做出相当准确的判断。

可是，当民调和市场调研出错，就会错得很离谱。可口可乐公司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推出“新可乐”，这简直是个灾难，就连“新可乐”这个词也成了没能准确读取民意的迷因而广泛传播。最近，政治民调机构和专家在21世纪初的几次重要预测中都判断失误，包括2014年美国中期选举和2015年英国大选的结果。

事实上，对2015年民调员的调查发现，他们认为一连串的失误已经让自己名誉扫地。一些人觉得这是媒体偏见造成的（媒体喜欢报道失败，而不是成功），另一些人承认技术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让民调更具挑战性，想要做出准确民调更难了。“比起民调准确，民调出错会是一个更有意思的报道。”民调专家芭芭拉·卡瓦略（Barbara Carvalho）告诉新闻网站538（这个网站也做民调）。但民调专家马修·托尔里（Matthew Towery）在2015年承认：“显然，过去三年有几次备受瞩目的惨败。”[24]

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民调上——民调的准确度受制于人们的参与，而是人们期望从民调中看到什么。民调不是对未来结果的书面保证。很多事情，从不可预知的事件到广告，都会改变人们的想法。和其他各领域的专家一样，衡量一个人称不称职要看整体表现，要看专家能不能正视自己的失败。同样，伴随每一个“新可乐”的，还有成千上万成功的产品推出，以及准确的竞选预测。不过，事情总是这样，人们记住的还是那些错误的判断，尤其是当他们不喜欢这个结果的时候，对多如牛毛的成功案例却选择性失明。

人们对专家预测期待太高，但至少有一些专家愿意坚定地依靠自己的强大洞察力来出售预测。几十年来，政治科学教授布鲁斯·布恩诺·德·

梅斯奎塔（Bruce Bueno de Mesquita）利用“正当软件”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客户预测国际大事。这30年来，连美国中情局都成了他公司的客户。中情局在1993年的一次调查中说，在数百次预测中，梅斯奎塔有两次“正中靶心”，这也是中情局的分析员成功预测的概率。

其他专家无法验证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说法，因为他的方法和模型是一种商业产权，受到保护，不会在出版的研究中公开。《纽约时报》2009年刊登的一篇简介中写道：

> 布恩诺·德·梅斯奎塔已经在学术期刊发表了很多预测，绝大多数预测都是为企业或政府客户秘密完成的，没有哪个独立的学术机构可以进行验证。“我们不知道他是10次里面对了9次，还是100次里面对了9次，或者是1000次里面对了9次。”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说。
>
> 中情局的研究表明，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预测准确率有90%，但沃尔特并不讶异。“这是一个中情局中层官员在说，‘这是个有用的工具’，”沃尔特说，“这不像是让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25]说：‘说到布什政府时期，我们不会在不咨询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情况下就做出决策。’”[26]

尽管布恩诺·德·梅斯奎塔的准确性是不可知的，但更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预测有一个健康的市场。对于处在危急关头的组织来说——生命或金钱危在旦夕，或者两者皆有——在冒险之前自然会贪婪地搜寻一切信息。一个声称能窥探未来的专家，总是比一个只能提供有限意见的专家吃香。

像布恩诺·德·梅斯奎塔这样的民调专家和顾问受雇预测未来，他们工作的价值几何，由客户决定。可是其他专家和公共知识分子也做预测，而且很多失败的专家预测严重破坏了公众对学者和专家的信任。如果有人没预见到苏联的解体——或是有人承诺说和伊拉克的一场大战很

容易取胜——又去在一些生死攸关的大决策上出谋划策，公众的疑虑也是情理之中的。

如果我们先把“专家应不应该预测”的问题放到一边，我们就还剩下一个问题：他们的确在做预测，而且他们的预测往往差劲得令人咋舌。在一篇广为人知的关于“黑天鹅”事件——能改变历史进程的不可预知的事件——的研究报告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利布（Nassim Nicholas Taleb）描述了整个预测行业里表现出来的“认知傲慢”：

> 可是我们表现得好像我们能预测历史事件一样，或者更糟，好像我们能改变历史进程一样。我们预测30年后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殊不知我们连明年夏天的社会保险体系赤字和国际油价都猜不中。我们对政治和经济事件的错误预测堆积如山，简直荒谬，以至于我每次看到这些充满经验主义风格的预测，都要狠狠掐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在做梦。[27]

塔利布警告说未来是永恒不确定的，这个观察很重要，但是他主张我们要接受预测是无用的，这就不切实际了。人类不会两手一摊，放弃任何一个运用专业知识进行预测以对冲风险的机会。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专家是否应该参与预测，他们就是会做的。他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和统治这个世界的领袖，都会要求他们去预测。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家应该在何时预测，又该如何预测，以及在专家出错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2005年，学者菲利普·特劳克（Philip Tetlock）搜集了社会科学方面的专家预测数据，他发现了一个很多人心中的疑惑：“如果我们以半吊子预测爱好者、投掷飞镖的大猩猩和归类外推算法的表现为最低预测标准，并以此衡量专家的预测表现，也没有发现任何迹象显示，专业知识能转化成更强大的能力，从而做出‘精准’‘可靠’的预测。”[28]在预测未来方面，专家也没有比转动的轮盘赌强到哪里去。特劳克的发现让很多

外行人证实了自己的猜测——专家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不过，特劳克的研究触发的反应，就是典型的普通人误解专业知识的案例。特劳克自己也说："激进的怀疑主义者乐见这样的结果，但是当我们在一些预测正确的专家身上找到整体一致性时，他们就开始觉得不舒服了。激进怀疑主义者让我们不要有任何期待……但我的数据显示，专家的预测表现中，随机的成分少一点儿，整体一致性的成分更多。"[29]

实际上，特劳克没有把专家和世界上的其他人进行比较，而是和基本的标准来比较，尤其是其他专家的预测。他研究的问题不是专家是否比其他人更擅长预测，而是为什么有的专家似乎比其他专家更擅长预测。这两个问题有着天壤之别。或者如詹姆斯·索罗维斯（James Surowiecki，《群体智慧》的作者）所指出的，说"认知多样化"是重要的，也就是许多观点好过一个观点，但这并不是说如果"你集结一群形形色色但极其无知的人，他们的集体智慧就会超过一个专家"。[30]

特劳克真正的发现不是专家比随意猜测的普通人强，而是和同行相比，有些专家似乎更善于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假设性的推测之中。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指出"刺猬"和"狐狸"之间的区别，特劳克借此来区分知识广博的专家（"知道很多小事的狐狸"）和知识面较窄但深入的专家（"只知道一件大事的刺猬"）。有很多重要的作品是关于专家如何思考的，特劳克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值得通读。不过，总的来说，他还有一些更引人入胜的发现，其中有一条可以总结为：虽然专家在从解释科学转移阵地到预测未来的时候遇到不少麻烦，但"狐狸"往往比"刺猬"表现得好。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

比如说，"刺猬"会过于投入到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应用到专业领域之外的地方去，而"狐狸"却能够整合更多的信息，而且会在新的或更好的数据出现时改变想法。"'狐狸'懂得自我批评和换位思考，"特劳克发现，"这使得他们不会过度沉迷于自己的预测，而"刺猬"——尤其是

专业知识深厚的“刺猬”——容易深陷其中。”[31]

技术领域的专家是“刺猬”的最佳代表。他们不只在预测方面遭遇相当大挑战，在处理专业领域外的信息方面也是能力有限。深耕一个领域的人只会埋头在自己的专业里，所以他们会本能地想把自己的专业知识推广运用到其他问题上，不管他们的专业领域和亟待解决的课题之间多么不搭调。[32]有些专家自信满满，却往往给出错误预测，主要就是因为这些科学家像刺猬一样，专精于自己那个狭小但高度复杂的专业领域，很难接受和处理专业之外的信息。

人们从中也吸取了一些教训，不只是专家，还有那些评判甚至挑战专家预测的普通人。

最重要的是，失败的预测并不能成为我们评判一个专家的重要标准。专家在预测的同时也会给出警告（这是专家行事的一个重要特征），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不可预测之事，而且这些事会引发一连串的涟漪效应，像心脏病和飓风这样简单的偶然事件都有可能改写历史。无论这些警告多重要，普通人往往选择忽略，就像当地的天气预报说下雨的概率有70%，他们也会忽略掉。如果最后天晴了，应了那30%的可能性，他们就会认为天气预报是错的。

这样说不是替专家，尤其是专家这个圈子开脱，毕竟他们在很多事情上都预测失败。20世纪70年代，没有一个苏联专家预测到苏联到了1991年会解体，而持相反观点的专家——认为苏联解体几乎是不可能的——态度日益坚定，这是一次相当大的判断错误，应该让这个领域的专家痛定思痛。（遗憾的是，并没有。20年来，大多数研究俄罗斯的专家逃避检视彼此的错误。）

可是，预测失败并不会剥夺专家在知识上的立场，他们依然可以宣称比外行懂得多。普通人不应该妄下结论说，专家的一次判断失误就意味着所有人的观点都是同等重要的（或同样无意义的）。民调专家内特·西尔弗（Nate Silver）因为精准地预测2008年和2012年大选结果而声名

鹊起。西尔弗承认自己在2016年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预测是基于一些有问题的假设。[33]虽然特朗普的胜选让他和其他人大感意外，但西尔弗对其他竞选的分析预测依旧可靠。正如专栏作家诺亚·罗斯曼（Noah Rothman）后来所写："特朗普已经证明政治专家耗费毕生心血研究的种种规则在今天都失灵了。但是人们还是会坚持说'我们关于政治的一切认知都是错的'，也不肯说出'我对政治一无所知'这句话。"[34]

因为一些专家的预测比其他专家差，就要让他们为此负责，则是另一回事了。但是预测问题的措辞用简单的是非选择题，然后指出普通人和专家预测正确的概率是一样的，这是对专家角色的根本误解。事实上，问出这样无法分出高下的问题，也是在帮专家脱身。有一个关于英国公务员的老笑话，这个公务员在外交部度过了漫长的职业生涯，跨越20世纪的大半时间，然后退休了。"每天早上，"这位经验丰富的外交人员说，"我去见首相，然后向他保证今天不会发生世界战争，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我的40年职业生涯中，我只错过两次。"仅凭猜中和猜错的数量来看，这位老人的表现相当优秀。

专家提供建议和给出预测的目的不是为了在掷硬币中获胜，而是为了指导我们针对未来的各种可能性做出决策。如果在1980年提出这个问题：苏联在2000年之前会不会瓦解。这就是一个是非选择题。如果问题是"在2000年到来前的几十年里，如何最好地迎来苏联的和平解体，并且改变这件事的可能性（降低其他事件的概率）"，那就是截然不同的问题了。

鉴于我自己有研究俄罗斯（苏联）的背景，一个警惕的读者此时可能会想，我是不是也是预测错误的苏联问题专家之一？我是不是就是坐在教室后面随便说说而已呢？问得好。

我没有就苏联解体做出错误的预测，但那只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没有错的机会。我在1988年底完成研究生学业，那时候苏联解体的进程已经很清晰了。我等了10年，才做出一个关于俄罗斯政治的极大的错误预

测。我知道预测失败的危险，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我必须对此负责。

我在2000年初写道，一个新的俄罗斯领袖的崛起，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当初名不见经传的官员，可能会一路带领俄罗斯走向新时代。当然，我错了，而且大错特错。

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没那么重要，也不应该重要。当有人极力劝说我对普京做出一个判断（我们研究俄罗斯事务的很多人都面临这种状况），我交出了一个肯定的观点，而不是给出一个需要更大耐心但更无趣的看法：现在说还为时尚早。可是，在努力剖析今日俄罗斯的时候，我20年前的预测滑铁卢是否就贬低了我今日的分析和建议，使之无效呢？在探讨普京的动机时，我是不是不再能超越一个博闻广识的普通人了？

关于普京的认知，我错了，但有一个事实未变，普通人想要解释俄罗斯政局的复杂性，或者想要教一门相关的基础入门课程，还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和其他专家为什么会搞错是个重要的问题，不只是因为这让我们去回顾自己的推论，并且展开辩论和自我纠错，这是专家这个群体的义务。很多人对普京持悲观态度，但其中有些人不过是条件反射的恐俄心理，或者只是猜测，这两种对制定政策都没有帮助。一个不了解情况的判断，即便是对的，也不如一个虽然错了但条分缕析的观点有用，后者可以用来剖析、检验和纠正。

修复关系

专家预测失败的时候，专家和外行都有各自的责任。专业人士必须承认自己的错误并公之于众，然后努力纠正。外行人在要求专家做出预测时必须更加小心谨慎，而且搞清楚预测失败和学术欺诈之间的区别。

总的来说，专家会检讨自己的错误，但不是在公众可能会看到的地方进行。普通人不会去读医学期刊或一篇社会学文章的数据分析。坦白说，我怀疑大多数专家和学者或许宁愿普通人不去读，因为普通人不会明白他们读到的大部分内容，而他们努力关注专业辩论的行为，可能反而会对公众造成更多的困惑，而不是启迪民智。

这种时候就需要公共知识分子——为专家和外行搭建沟通桥梁的人——承担更多的责任。如果只有医生来解释新的医疗方法——让医生把专业知识转化成通俗语言是很难的，或者让记者来解释——记者没有科学背景，无法评估复杂的科学主张，那给公众的知情服务就很糟糕了。这样一来，就会给一些业余人士、唯利是图的人、江湖骗子和阴谋论者——通常是在互联网上——留下钻空子的机会。

公共知识分子常常会被讥讽为“负责科普的人”，这样的指称其实有几分道理。这个世界可能不需要第二个比尔·奈（Bill Nye，“科学人”）对全球气候变化指手画脚。就因为互联网的时间和流量都多的是，一些前官员或职位较低的退休军官也要去凑个热闹占个时段发表自己的深刻见解，外交政策圈已经不想再看到这样的事情了。但是，如果公众和专家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专家只能和专家对话，而那些将来会影响公众生活的决策，公众却无缘参与了。

说到这，公众要发挥一个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要了解与他们息

息相关的问题，还要了解帮他们出谋划策的那些人。举个例子，特劳克就提倡要仔细检查专家的履历，以此来督促他们给出更好的建议，这样专家们才会“有动力去比一比谁能提供更有价值的知识产品，而不只是去迎合那些志同道合的人”。[35]

可是，只有当人们愿意拨冗关注，翻出不良专家的履历才有意义。如果人们还是被动地接受电视屏幕上传来的信息，或者如果他们只会主动搜寻愿意相信的信息，其他都不重要了。普通人应该扪心自问，比如他们究竟想对这个主题了解多少？他们是否真的愿意去面对一个会毁掉自己信仰的事实？他们应该更用心地问问信息来源，他们必须考虑到给他们出主意的专家的背景。

如果一个普通人真的愿意相信维生素C可以治疗癌症，那无论专家的研究背景和预测多么纯正，都不如一个放出药品图片的网站有影响力。如果一些资讯匮乏的民众真的相信入侵一个国家（或与邻国之间建一堵墙）会解决美国的问题，大批的专家文章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普通人也必须为自己的知识——或无知——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们没有借口说这个世界太复杂了，信息来源太纷繁了，然后痛心疾首地说政策都是把控在那些藐视公众观点的不知名专家手中。

公众还需要带着一定程度的怀疑精神和谦逊态度去对待专家意见。正如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8年的文章中所写，外行人在评估专家观点的时候，必须充分调动起自己的缜密逻辑：

> 我所倡导的怀疑精神包含这些内容：（1）当你同意专家的观点时，并不能就确定相反则不对；（2）当你不同意专家的观点时，一个非专家也不能就此断定哪个观点是对的；（3）当专家们都认为现有的背景知识还不足以给出一个正面的观点，普通人最好也暂时不要做出判断。

只知道专家就什么内容达成一致还不够。同样重要的是，要接受这

个一致意见的局限性，不要去引出更多的结论，专家的观点只有这么大的支撑力度，超重就不行了。

另外，普通人还要接受一个事实：专家不是政策制定者。专家给国家领导人当顾问，他们的话语比普通人有影响力，但他们不是做出最终决策的人。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便是美国这样高度规范和制度化的国家，很少有专家是独立的决策者。只有政治人物，下至市议会，上至白宫，才对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决策——从毒品到威慑——有最终发言权。如果普通人拒绝认真履行自己的公民责任，也不去了解对自己来说重要的问题，民主将会变异成技术官僚制度。让普通人惶恐的专家统治将会变成现实。

普通人要运用专家的意见，要把专家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公仆，而不是主人，专家也要接受自己的局限性。如果人人都是专家，那民主便无法发挥作用。的确，专家有肆意膨胀的自负心理，认为即便他们忽视选民，也能管理好一个民主国家。可是，普通人也有一种无知愚昧的自恋心态，认为他们即便不听信知识水平更高、经验更丰富的专家意见，也能维护好一个庞大先进的国家。

如何找到平衡，并缓解当今社会专家和客户之间日益令人不安的抵触情绪，是下一章——最后一章的主题。

---

[1] Helen Thompson, “Teen Schools Professor on ‘No Irish Need Apply’ Signs,” Smithsonian.com, August 5, 2015.

[2] Geoffrey Norman, “Do I Dare to Eat an Egg,” *The Weekly Standard* online, march 16,2015.

[3] Peter Whoriskey, “The Science of Skipping Breakfast: How Government Nutritionists May Have Gotten It Wrong,” *Washington Post* online, August 10, 2015.

[4] Seweryn Bialer and Joan Afferica, “Reagan and Russia,”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821983, 263.

[5] Stephen M. Meyer, “Testimony before the 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 in Theodore Karasik, ed., *Russia and Eurasia Armed Forces Review Annual 15*, 1991(Gulf Breeze, FL: Academic International Press, 1999,) 348.

[6] 克格勃，全称“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КГБ，是1954年3月至1991年11月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译者注

[7] Richard Ned Lebow and Thomas Risse Kappen, “Introduction,” in Richard Neb Lebow and Thomas Risse Kappen,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5).

[8] 这10个国家是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以色列（未公开宣布）和南非（声明放弃）。当初制造核武器的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倒台的时候，南非就解除了核武器。

[9] W. Ian Lipkin, “Anti-Vaccination Lunacy Won’t Stop,” *Wall Street Journal* online, April 3,2016.

[10] 猎巫行动，原指搜捕女巫与巫师或施行巫术的证据将被指控的人带上宗教审判法庭。今日此类事件被视为一种道德恐慌及政治迫害。——译者注

[11] 见Richard Van Noorden，“Political Science’s Problem with Research Ethics,” *Nature* online, June 29, 2015; Brian C. Martinson, Melissa S. Anderson, and Raymond de Vries,“Scientists Behaving Badly,” *Nature* 43 (June 9, 2005): 737-738.

[12] Carl Zimmer, “A Sharp Rise in Retractions Prompts Calls for Reform,” *New York Times* online, April 16, 2012.

[13] Benedict Carey, “Many Psychology Findings Not as Strong as Claimed, Study Says,” *NewYork Times* online, August 27, 2015.

[14] Quoted in Rachel Gross, “Psychologists Call Out the Study That Called Out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Slate.com, March 3, 2016.

[15] Daniel Engber, “Cancer Research Is Broken,” Slate.com, April 19, 2016.

[16] Garret Epps, “Genuine Christian Scholars Smack Down an Unruly Colleague,” *Atlantic* online, August 10, 2012.

[17] “Actresses’ Role in Farm Issue Stirs Criticism,” *Los Angeles Times* online archive, May 3,1985.

[18] Jessica Goldstein, “Is Gwyneth Paltrow Wrong about Everything? This scientist Thinks So,”ThinkProgress.com, April 21, 2016.

[19] Alexandra Petri, “Dr. Carson, This Is Not Brain Surgery,” *Washington Post* online,November 5, 2015.

[20] 这段描述引用自Paul Offit, “The Vitamin Myth: Why We Think We Need Supplements,”*Atlantic* online, July 19, 2013。

[21] Helen Caldicott, *Missile Envy* (New York: Bantam, 1985), 235: Helen Caldicott, *If YouLove This Planet* (New York: W.W. Norton, 1992), 156.

[22] 乔治·凯南，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遏制政策始创人。——译者注

[23] 还有一种说法在各路文章中流传：这么多年来，克里斯威尔有一个预测竟准得让人毛骨悚然。他在1963年3月清楚地告诉电视主持人杰克·帕尔，肯尼迪总统不会参加1964年的总统竞选，因为1963年11月他的身上将发生一件事。不过，这可能又是一个城市传说，至少在有人翻出旧录像带或屏幕录像（如果有的话）之前，都当不了真。

[24] Carl Bialik, “Most Pollsters Say Their Reputations Have Worsened,” FiveThirtyEight.com,December 28, 2015.

[25] 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美军出身，曾在共和党的福特政府和老布什政府担任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助理。——译者注

[26] Clive Thompson, “Can Game Theory Pridict When Iran Will Get the Bomb?” *New YorkTimes* Magazine online, August 12, 2009.

[27] Nassim Nicholas Taleb, *The Black Swa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0), xxiv-xxv.

[28]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0.

[29]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20.

[30] James Surowiecki, *The Wisdom of Crowds* (New York: Anchor, 2005), 31.

[31]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21.

[32] 参见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101-103。

[33] 参见Tina Nguyen, “How Nate Silver Failed to Predict Trump,” *Vanity Fair*, February 1,2016.

[34] Noah Rothman, “Why They Think Trump Can Win in Nov?,” *Commentary* online, April 27, 2016.

[35] Tetlock，*Expert Political Judgement*，23.

结论

专家与民主

有意自己当家做主的人民，就必须用知识赋予的力量来武装自己。

——詹姆斯·麦迪逊

我保留无知的权利。那是西方的生活方式。

——《冷战谍魂》

（The Spy Who Came In from the Cold）

“专家很糟糕”

在2016年的“脱欧”辩论中，关于英国是否应该退出欧盟这个话题，主张脱欧的人特别指出专家是普通选民的敌人，因为大多数专家警告说脱欧是个糟糕的主意。英国脱欧运动的一个领袖，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说事实不如英国选民的感觉重要。“我认为这个国家的人民，”他嗤之以鼻地说，“已经受够专家了。”

不过，一个美国作家兼外交政策专家詹姆斯·特劳伯（James Traub）后来注意到戈夫的轻蔑态度：

> 当然，像戈夫这样一个从牛津毕业还在保守党政府里当了几年官员的人，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所以对于他／她这样的人来说，“专家”是一个带有轻蔑意味的词。戈夫真正想说的是，人们应该能够自由愉快地做梦，不被令人不快的事实所扰。[1]

英国本土主义的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Nigel Farage）甚至暗示说“专家们”实际上收了好处，是为英国政府工作的，或是收了欧盟的钱。[2]2016年7月，在全民公投中，52%的选民投票支持“脱欧”。

攻击专家其实是战略的一部分，因为相当一部分英国选民对政治知之甚少，而且本能地不信任那些强烈反对脱欧的精英知识分子，所以这些都可以转变成一种资本而加以利用。点票安全进行，几天后，脱欧派就承认，其实他们的很多说法要么夸大其词，要么是错的。“坦白说，”英国政治家、脱欧派人士丹尼尔·汉纳（Daniel Hannan）在英国的电视台上说，“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认为他们投了票，现在不会再有来自欧盟的移民了，他们会失望的。”汉纳的评论激起了选民的反弹，选

民显然认为自己选择的政策是零移民。“这的确会让一些人不快”，汉纳说，他之后就宣布“关闭推特一个月”。[3] 英国实际脱欧还得花上几年时间。但是，反智主义和随之而来的对专家的不信任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战中发挥了更加立竿见影和重要的作用。在2016年初威斯康星州的集会上，共和党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向专家发起了一波攻击。在早些时候的辩论中，特朗普在一些公共政策的基本问题上失言就被人抓包。“他们说，‘噢，特朗普没有专家，’”他对参加集会的人说，“要知道，我一直都想说这句话……专家太糟糕了。他们说，‘特朗普需要一个外交政策顾问’……但假设我以前没有顾问，是不是就比我们现在做的糟一些？”[4]

长期以来美国人对专家和知识分子都抱有一种想法，认为他们不仅在操纵普通人的生活，而且还做得很差劲，特朗普对专家的冷嘲热讽刚好利用了这一点。特朗普2016年的逆袭有很多因素，其中有一些（比如人口多的地方也是赢者通吃）纯粹是偶然事件。不过，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的最终胜利吹响了近期声量最大的一次号角，宣告专家之死将近。

特朗普的选战代表的是一人对抗建制派精英，我们可以看看他所动用的各种手段。他是要求奥巴马证明自己美国公民身份的几个“出生地质疑者”之一。他引用《国家询问报》（*National Enquirer*）作为消息来源。他与反疫苗斗士站在一边。他承认他获取外交资讯的渠道是周日早上的电视节目。他暗示2016年初自然死亡的最高法院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是死于谋杀。他还指控其中一个对手（泰德·克鲁兹）的父亲卷入了“阴谋论之母”——暗杀约翰·F.肯尼迪。

政治候选人的一大职业风险就是在竞选演说中犯下彻底的错误——就像任参议员时的巴拉克·奥巴马曾宣称到访过全部57个州，但特朗普在竞选时的无知是任性为之，且持之以恒。他不知道如何回答关于政策的基本问题，与其因为无知而被羞辱，倒不如纵情享受，这是特朗普的选择。被问到核三角——美国总统可以支配的大型战略武器——的时

候，特朗普说："遇到核问题的时候，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和小心。核力量会改变整个比赛。"他又围绕自己的核心思想补充道："我想——我想，对于我来说，核就是权力，毁灭对我来说很重要。"

这不是失误。后来，特朗普的一个发言人被要求澄清这些评论，就开始打太极，说这个问题无关紧要。卡特里娜·皮尔森（Katrina Pierson）告诉福克斯新闻，特朗普很强硬，这才是关键所在。"就算你有一个很好的核三角，你不敢用又有什么好处呢？"她问道。和皮尔森一起出席节目的嘉宾是律师兼政治评论员库尔特·斯雷科特（Kurt Schlichter），一位退休的陆军上校，拥有化学和核问题方面的专业军事知识，而且不管从什么角度衡量都是铁杆保守派。皮尔森的一席话明显让斯雷科特大跌眼镜，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核三角的重点就是要对这该死的东西心存畏惧。"

特朗普都挺过来了，拿到了共和党提名，最后胜选，那是因为他最终让某一类选民产生共鸣，这些人认为懂得美国核威慑这种事情不过是知识分子哗众取宠的场面话。

更糟糕的是，选民不仅不在乎特朗普的无知或错误，他们很可能都意识不到他的无知或错误。心理学家戴维·邓宁和同事贾斯汀·克鲁格一起发现了达克效应，根据达克效应，知识或能力越低的人越不可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或无能。邓宁认为，他们描述的这种动态分布在选民当中也适用，甚至可能对理解2016年大选的奇异现象至关重要：

> 很多评论员指出，是特朗普身上的自恋和自负，导致他满怀信心地犯错。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看不到错误的本质，让任何可能的自恋和自负不加节制地膨胀。
>
> 在选民身上，缺乏专业知识也许是可悲的，但如果他们能意识到自己在知识上的缺陷，或许也没那么让人忧心。如果他们意识到了，就可以修补。但达克效应告诉我们一个截然不同的现象，一些选民，尤其是在生活中遭遇重大不幸的那些人，或许会喜欢特朗普

说出来的一些话，但他们所知有限，无法让特朗普为自己的重大失言埋单。[5]

换句话说，当特朗普不假思索地说出最无知的话，不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在为他开脱，而是如邓宁所说，“选民没发现这些失言是他犯的错”。

特朗普在2016年大选中最忠实的支持者集中在那些教育水平低的人当中。“我爱那些没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特朗普在赢得内华达州党团会议后欣喜若狂，这种爱显然是得到了回报。[6]美国人认为暗处的势力正在摧毁他们的生活，一个国家领导人所具备的任何可见的智识能力，本身就是一种可疑的属性，他们把特朗普视为自己的捍卫者。但是，人们的这些想法究竟从何而来，比如认为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正在密谋对付他们？

人们萌生这些想法，有几分是因为观察政治精英及其智囊团的行为所得。比如说，在特朗普谴责专家无用的一个月后，奥巴马总统的一个顶尖外交顾问就坐实了这份疑虑，为人们攻击专家参与国家政策推波助澜。在向《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e*）描述奥巴马政府向国会和美国公众施压，希望他们接受美国与伊朗就伊核问题达成的协议时，美国副国安顾问本·罗兹（Ben Rohdes）说，政府知道杂志会把“脏话从长篇报道中剔除”。

罗兹接受了《时代》记者戴维·塞缪尔斯（David Samuels）的采访，塞缪尔斯的报道问世的时候，他的客观性（关于伊朗核协议以及文中提到的几个人）就值得商榷。[7]不过，罗兹的坦白直率令人咂舌：他自豪地点出了他认为帮助政府为协议施压的智库、专家和记者——

> “我们制造了一个回音室。”当我请他解释近期专家为协议发起的一轮猛烈造势时，他承认说，“他们在执行我们交给他们的任务，说我们让他们说的话，使之生效。”

当我问他，如果这种扭曲事实且影响深远的竞选是另一个政府操纵的，是不是会让他感到害怕，他承认会的。“我是说，我也倾向于有一场冷静理性的公共辩论，然后由国会议员思考并投票，”他耸耸肩说，“但这是天方夜谭。”[8]

一个高级政府官员会声称一些问题太过重要和复杂，尤其是关于国家安全的问题，故而不能交给资讯匮乏的公众辩论来决定，不是什么稀罕的事。通过秘密外交和活动来赢得民心，是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民主政府历史的重要部分。

不过，罗兹说的是另一回事，对专家和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更有危害性。其实这是他的一番吹嘘，意思是伊朗核协议是靠两件事达成的，一是歪曲专家之间的辩论，二是利用现在新媒体——尤其是接管全国报道的年轻记者——不明真相这一点。“我们对话的记者平均年龄是27岁，他们仅有的报道经历也就是与政治竞选相关的内容，”罗兹说道，“这是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他们简直一无所知。”

罗兹的暗示很明显。他不仅认为公众太笨，理解不了协议——这一点没错，只是罗兹并没有采取措施让公众变得聪明——还把包括国会在内的其他人也都当成傻瓜，认为他们参不透。对于罗兹来说，用错误信息来荼毒辩论，不过是为了创造更大的福祉，是牺牲小我成全大我。

特朗普和罗兹，采取的方法不同，但归根结底都是利用公众的无知来服务于自己的利益。他们只是在策略上有所不同：特朗普在2016年的选举中通过煽动最愤怒、最无知的选民来追逐权力，而罗兹在幕后操纵伊朗核协议的时候扔出了一个编造的故事供公众消费，暗地里却完全绕过选民，秘密地做着他和其他同伴认为最有利的事情。

这两种情况都是不能容忍的。已经有很多人诟病专业知识在美国人生活中的角色，指责其发挥的作用是危险的，本书也用了大量篇幅阐述这一点。专家，和教育者、记者、娱乐传媒公司和其他人一样，都在各司其职。可是，最终只有一个群体要为当前的事态负起根本责任，且只

有他们能改变事态走向——美利坚合众国的公民。

专家与民主：死亡螺旋

专家与政府彼此依赖，民主社会尤其如此。科技与经济的进步，让分工成为造福人民的必要条件，而分工就会造就不同的专业化职业。专业主义鼓励专家竭尽全力服务客户，尊重自己的界限，也要求别人尊重自己的界限，这是为最终客户——社会——提供全面服务的一环。

专制国家也要求专家提供这样的服务，但它们是通过威胁来榨取服务，通过命令来指挥专业知识的使用。这就是为什么专制社会比民主社会的效率低，就算有一个历史迷思，那就是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纳粹德国和其他类型政体营造出来的高效假象，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9]在民主社会中，专家给公众提供服务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公民把各种问题的决策权交到了当选代表及其专家顾问的手中，而专家则请公众带着信任去接受这些努力，实际上这些公众已经有足够的信息做出理性的判断。

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就像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关系一样，是建立在信任之上的。但信任崩塌，专家和外行就变成了敌对势力。发生这种情况的时候，民主社会就会进入一个死亡螺旋，也就意味着衰落近在咫尺，要么是陷入暴民统治，要么是走向精英技术官僚统治。无论哪种情况，都是一个专制主义的结果，都会威胁到今日的美国。

这就是为什么专家和民众的关系崩塌，就意味着民主社会停滞紊乱。美国公众在政治和通识上的贫乏是一切问题的根源。而其他的社会紊乱正是在这样的土壤生根成长，欣欣向荣，2016年大选只是最近期的一个呈现。正如作家丹尼尔·利比特（Daniel Libit）所描述的，这个国家的公共政策专家发现，“美国选民的无动于衷到了2016年美国大选的时

候已经能让人灰心丧气”。[10]只不过，这一警示信号远在那之前就已经出现。

作家苏珊·雅各比（Susan Jacoby）在2018年写道，在美国人朝着无知进发的时候，最让人忧心的不是“无知本身，而是无知还傲慢”——

> 问题不在于我们不知道某事［据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统计，有五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认为太阳绕着地球转］；问题在于有相当数量的美国人还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本来就不需要知道这些事……反理性主义和无知的毒液损害着从医疗保健到税收等各种话题的美国公共政策辩论。[11]

普通美国人也许从未喜欢过受过良好教育或专业人士的阶层，但直到最近，他们才如此大范围地把实际的学习当作一件坏事去鄙视。用“反理性”来形容或许还过于委婉了，这差不多可以算是逆进化，与经过验证的知识渐行渐远，朝着口口相传的民间智慧和神话倒退——只是有一点，现在是以电子的速度传播。

现在公民脱离公共政策已经形成恶性循环，而文化水平直线下降、固执的无知野蛮生长成了其中的一环。人们所知有限，对于自己是如何被管理的更是不甚关心，至于他们的经济、科学或政治结构实际上是如何运行的，也好像事不关己。但是，当所有这些过程变得越来越难以理解的时候，公众就会感到被疏远。故而公众备感挫折，不知所措，他们开始逃离教育和公民参与，转而去追求其他东西，这又会反过来削弱公众的能力，如此循环，渐次加强，尤其是当公众逃离的欲望很容易被任意数量的娱乐产业满足，就更严重了。

这是一个充斥着各种小玩意儿的便利时代，这一切在过去是无法想象的，美国人（公平点儿说，还有很多其他的西方人）拒绝学习足够的知识来管理自己或是引导影响自己生活的政策，在这一点上他们已经变得有点儿幼稚。这表示公民权利已经不复存在，而且还会引发一系列恶

劣的后果。

比如，如果公民都资讯贫乏，那知识更丰富的政府官员和精英知识分子就在事实上左右国家和社会的日常运作方向。西方保守派常常引用的一段话，也格外受到美国自由主义者的喜爱，那就是奥地利籍经济学家F.　A.哈耶克在1960年写下的：“对今日自由造成最大威胁的是现代政府中最必不可少、最有力量的那些人，这是一群高效率的专家行政人员，且一心扑在他们所认为的公益事业上。”[12]就连美国上下最卓尔不群的思想家也会赞同哈耶克的观点。很多领域的非民选官员和政策专家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可是，如今这种情况是默许形成的，而非刻意营造的。民粹主义实际上在强化精英主义，因为无知的欢愉无法发射通信卫星，协商海外美国公民的权利，或是提供有效的药物，这些都是艰巨的任务，即便最愚蠢的人现在也会要求这些东西，并且视之为理所当然的。面对这样无脑的公众，专家也不想与之接触，故而选择与同伴对话，不愿和外行人交谈。

与此同时，美国人对美国政治和经济体系所能提供的东西有着越来越不切实际的期待。当他们把这些东西视为应得的权利，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持续对“专家”感到愤怒，尤其是对“精英分子”。在现代美国社会，任何一个人，接受过任何领域的教育，又拒绝纵容公众的错误观念，都可以用“精英分子”这个词形容。当你告知美国人，终结贫困或预防恐怖主义比看起来的难多了，他们就会翻白眼。他们无法理解周围环境的复杂性，转而选择不去理解，还阴阳怪气地指责专家、政治领导人和官员控制了他们的生活。

知者与决策者

驱动民主与专业知识陷入这场死亡螺旋的还有另一个问题——民众不理解，或者说选择不去理解专家和民选决策者之间的区别——这个问题在此凸显出来。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所有精英都是一样的人，他们受过良好教育，有钱有权。这种想法显然很愚蠢。不是一切有钱的人都有权，也不是一切有权的人都有钱。知识分子和政策专家几乎都不是有钱有权的。（相信我。）

不管乔治·W.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其他方面是不是做错了，但有一点他做对了：他提醒美国人，他才是布什政府各种行动的“决策者”。专家只能提议，民选的领袖来决定。其实制定政策的专家和民选领袖从来都不是一样的人，也不能是一样的：即便是在一个市议会或一个小州，一个议员一天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掌握现代政策制定所要求的一切问题（总统的时间就更不够用了）。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制定者需要请专家——所谓知者——来担任顾问。

有时候，顾问和决策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会失败。专家搞错了，他们建议政治领袖采取的行动路径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批评专家作用的人拿越南战争这样的国家创伤来举例。后见之明的好处就是，话怎么说都可以，那些批评听起来就好像如果事先咨询普通民众的智慧，这种令人痛苦的选择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

可是，这种呼吁求助外行人的知识和德行的话，就是浪漫化的无稽之谈。记者、理查德·尼克松的传记作者伊万·托马斯（Evan Thomas）承认说，像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这种学术界“最优秀、最聪明的人”，以及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这样的“企业巨头”，“离完美都有很大距离”，他们“要为越南战争以及死在

那里的5.8万名美国士兵担负责任，更别提数百万越南人”。[13]但是正如托马斯指出的，还是这些专家和精英“让一个摇摇欲坠处在核战争边缘的世界秩序得到稳固。他们扩大贸易，强化联盟，承诺支付数十亿对外援助”。

这些政策本身可能并不会受欢迎，但它们帮助美国与西方世界挺过了冷战，迎来和平结局。更重要的是，非专家或民粹主义者会选择什么样的政策？托马斯挑战读者把“20世纪60年代的错误和美国政府让公众共识来决定外交政策的时代做对比”：

> 20世纪30年代末，国会关闭自由贸易来保护美国工业，听取选民的心声，缩减军队规模，降低军队开支，不缔结同盟。结果呢？斯穆特——霍利关税使得大萧条进一步恶化，国际联盟的失败导致法西斯主义抬头和世界大战。

这就彰显了很重要的一点：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美国人只有在出问题的时候才去思考宏观经济政策或外国援助这样的问题，其余时间里，只要国家事务照常进行，他们就开心生活，根本意识不到每天在运转的那些政策和流程的存在。

可是不管怎么说，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美国究竟需不需要所有这些专家，尤其是当专家的意见覆盖到这么多人，当灾难发生时，似乎无人负责。举个例子，安德鲁·巴切维奇（Andrew Bacevich）

曾经呼吁击溃现代专家阶层，至少在公共政策领域让专家消失：

> 政策知识分子——一群试图给实际竞选职位的普通人出谋划策的书呆子——给共和国蒙上阴影。就像一些侵略性物种一样，他们在今日的华盛顿大规模滋生，他们的存在扼杀了常识，让人们几乎丧失认识现实这么简单的能力。他们衣着光鲜地在国会做证，在报纸和电视上高谈阔论，甚至占据了行政机构里的关键职位，和善的

模样下掩盖着不良的影响。他们就像放到五大湖里游窜的亚洲鲤鱼。[14]

可是，讽刺的是巴切维奇自己就是个多产作家，一名前高级军官，退休的教授，定期给同一群普通人提供详细的指导意见。不过他说的有几分道理：在美国政府的高层官员中，我们看得见的是五六百个决策者，但在他们身后其实有数千名专家，这些人也许根本不擅长自己所从事的工作。

专家不能逃避自己的责任。知者不能每次出错的时候都只是躲在民选官员的背后，让公众不要来烦自己，只去惩罚决策者。专家搞砸的时候，代表公众听取他们建议的领导人需要宣布自己的失败，决定需要采取什么补救措施。

有些时候，修正专家的错误靠的就是历史悠久的蓝带小组及其建议。有时候答案就是解雇一些人。可是，菲利普·特劳克在他关于专业知识的经典作品中建议了其他方法，也许能对专家进行问责，而不是彻底毁掉专家与公众之间的关系。有很多的方式，包括提高透明度和竞争，让各个领域的专家不得不保存自己的工作记录，坦白交代自己对错的频率，还有期刊、大学和其他负责把关的人进行监督，让他们的同行难以逃避自己犯下的错误，为之负起责任。但这究竟起不起作用又是另一回事，特劳克也承认这种解决方案其实有很多障碍。

不过，最让人烦心的障碍就是公众的懒惰。如果普通公民都不在意，对这类事情根本没有兴趣，那追踪专家的记录，对他们评级打分的所有努力都没有意义。特劳克指出，遗憾的是，普通人通常并没有兴趣去找拥有优异记录的专家，他们大多只对那些不费力气就能接触到并且立场一致的专家感兴趣。特劳克说的对，“在纷繁的主张和反驳中，如果消费者不想当一个有判断力的裁判”，只是在“知识产品的供应者”身上推行问责制，是不够的。比起“消极追求真相”，这些消费者可能更愿意花力气去“支持自己的偏见”，在这种情况下，普通人会把专家当

成“体育场上的心理学家，而不是研讨会上的心理学家”。[15]

专家需要有自己的意见，并且要让彼此负责。无论有多少原因——泛滥的学位，公众对专家意兴阑珊，在信息时代跟不上知识的生产速度——可是说到底，他们身居要位，却没有履行好社会要求他们在这个位置上完成的职责。

专家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更好地履行责任的。不过，专家与公众的关系上还有其他问题是专家力所不能及的。普通人需要想一想，他们是怎样误解了专家意见在民主共和国中的作用。在公众对专家以及决策者的众多误解中，有五条尤其值得注意。

第一，专家不是操纵傀儡的人。他们无法控制领导人何时采纳他们的意见。即使一个民选政治领袖和一个专家顾问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也不代表专家的观念会得到全面的贯彻。无论是尼克松和基辛格，或是奥巴马和罗兹，领袖不是一个容器，去盛下专家的想法。

任何一名称职的专家都有在政策游戏中败下阵来的经历。多年前我是美国一名资深参议员的助理，这个参议员把我当作值得信赖的顾问，但是，在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天里，态势紧张，我们在一次立场明确的分歧中唇枪舌剑，他把我轰出了他的办公室。即便是政治领袖和专家员工之间往往有一致的利益和观点，决策者或民选官员身上也还有专家永远无法感受到的压力和责任，所以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第二，专家无法控制领袖如何去实施他们的建议。专家面临一种“猴爪”的问题。（读者可能会记得，“猴爪”是20世纪初期一个著名的故事，故事讲述了一个有魔力的法宝，以最坏的方式满足人的愿望：当故事的主角许下愿望，想要得到金钱，他要付出的代价是儿子的生命。）专家可以建议决策者去做什么，但他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建议没有用在正途上。比如，一个经济学家兼环境学家或许认为减税是个好主意，结果却发现自己的建议被采纳了——被想要降低汽油税的国会采纳了。

第三，一个政策从概念到实施，专家是不可能全程指导的，这个事实往往会让公众感到困惑和沮丧。这就是为什么政策分析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学术科目，尤其是在研究像政府和企业这样的大型机构时更是如此。这种现象就像一个大型的“传声筒”游戏，专家与决策者也许已经敲定了目标，但下面的机构可能会扭曲原本的政策，到了整个项目验收成果的时候，会发现政策在实施的过程中变成另一副模样，结果适得其反。

第四，对于自己的建议，专家无法控制领导人究竟会采纳几成。专家会提供建议，但政治领导人往往只听自己想听的部分，尤其是会受到各自选区欢迎的那部分。他们会动员专家去强调他们所青睐的信息。比如，有些专家也许提倡减税，还有些专家也许倡导增加从社会保障体系到国防等偏好型项目的开支。这两种立场——减税和增加开支——可能都有一个逻辑基础，但不可能同时采用。可是，专家无法控制一件事：政治家们可能会选择所有的选项，即便这些选项是彼此冲突的。（接着可能又要召集一批专家来解决大规模预算赤字的复杂问题。）

可惜，公众还是老样子。当营养学家把鸡蛋从饮食黑名单上拿下来，他们不是让人们每天早上点一份速食的鸡蛋三明治当作健康早餐。人们听到自己想听的话，然后就堵上了耳朵。当他们片面地吸收了专家的建议，然后导致了不良的结果，就会责怪专家不称职，因为每个人都要找个人来推卸责任。

第五，专家只能提供一些备选的选项。可是，他们不能做出有关价值观的选择。他们可以描述问题，但是究竟该如何解决那些问题，他们不能左右人们的想法，即使大多数人对那些问题的本质已经达成一致意见。

地球是否在经历气候变化？大多数专家认为是的，而且他们认为自己知道原因。他们那些已经推断出来几十年或者几百年的模型是否准确，是一个合理的辩题。专家无法回答的是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波士顿或上海或伦敦很可能再过50年就低于海平面了，但选民——有权犯错的

人——也很可能会选择让下一代人来承担这个问题，而不是现在就牺牲自己的就业（或舒适生活）。

专家可以告诉选民有可能发生什么，但选民必须了解这些问题，决定他们最看重的是什么，故而想要怎么做。让波士顿没入海里不是我想要的结果，但如果人们忽略专家，就这样让事情发生，那也不是专家的失败，而是公民参与的失败。如果波士顿要变成威尼斯，那也应该是选择的结果，而不是偶然的结果。如果选民还是不愿意去理解一些重要的问题，就因为这些问题太艰涩或太令人不安，那专家会放弃与之对话，转而依赖自己在政策界的位置来倡导自己的解决方案，也就不足为奇了。

专家有时候也会失手或犯错，但是无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相信什么，一个进步的社会和政府是不能没有专家的。忽略专家的意见是个不现实的选择，不仅是因为制定政策是很复杂的，而且还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免除了民众的责任，让他们无须去了解与自身福祉息息相关的问题。更有甚者，当公众不再去区分专家和决策者，而只是想在政策圈找个人为糟心的结果顶罪，最终换来的不会是日益精进的政策，而是专业知识的进一步政治化。政治家们不会停止依赖专家，而是会去仰仗那些专门挑他们爱听的话说的专家，而愤怒的普通民众就会砰砰砰地敲打他们办公室的门。

这是最糟糕的结果，因为民选领导人和他们的专家顾问都不想和无知的选民多费唇舌纠缠，所以民主和专业知识都被腐化了。到了这个节点上，专业知识就不再服务于公众的利益，而是服务于给公众把脉的政治派系的利益。现代美国已经离此不远，危在旦夕了。

谈共和国，首先要知道何谓共和国

专家问责的挑战因为一个事实而加重，那就是大多数美国人似乎并不理解本国的政府体系。美国是一个共和国，不是一个民主制度。人们似乎不再轻易听到“共和国”这个词，这也从细微之处反映出，现代美国人在多大程度上混淆了“民主”和“共和国”这两个词；“民主”是一个总体的政治理念，而“共和国”表达的是一种政府形式。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可能被问到正在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上将有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产生。“一个共和国，”富兰克林回答说，“前提是你能保持住。”今天，我们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就是找到一个知道共和国真实含义的人。

这一点很关键，因为普通人太容易忘记管理他们生活的这个共和国政府，原本的设计就不是让大众来决定复杂的问题，当然，也不是让一小撮技术官僚或专家来统治国家，而是提供一个媒介，让了解问题的选民——了解问题是关键词——有能力选择其他人来代表他们，并以他们的名义做出决定。

美国人经典的想法可能是根植于雅典人引以为傲的民主，但美国并不是，或者说也从来不想成为雅典那样。美国人对此应该心怀感激。因为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韦尔（Malcolm Gladwell）在2010年指出，大型机构不是通过调查每个人的意见来决策的，无论这个机构看起来多么“民主”：

> 汽车公司很聪明地把数百个供应商组织起来，变成一个供应商网，而不是设计自己的汽车。没人敢相信，一个连贯的设计理念的表达，是由一个庞大的、群龙无首的组织体系来完成的。这种供应商网没有一个集权的领导结构和清晰的权力线，他们在达成共识和

设定目标上的确面临困难。他们无法做出战略性思考，他们会习惯性地起冲突和犯错。

如果每个人都有平等的发言权，你又如何能就战略战术或理念方向做出艰难抉择呢？[16]

这是共和制政府创立之初意图解决的众多挑战之一。即便大多数人能够在自己胜任的领域尽职尽责，他们也无力把各自的决定凝聚成一致的公共政策，就像他们猜测一头公牛的体重或确定一只股票的目标价格那样。共和国的方法就是让少数人把公众那些无解的诉求汇聚起来，从而加以解决。

不过，当选民对手头上的任何问题都不甚了解，那确定公众真正想要什么，难度就是以指数级上升了。普通人抱怨专家的规则，他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到复杂的国家问题中去，但他们当中很多人只是表达愤怒，而且放弃了自己在整个流程中的重要角色——也就是保持耳聪目明，了解资讯，有足够的政治常识来挑选代表自己发声的人——然后再提出参与的诉求。用伊利娅·索明（Ilya Somin）的话说："当我们选举政府官员是建立在无知的基础上，这些官员统治的就不仅仅是投票支持他们的人，还有整个社会。当我们对其他人民行使权力的时候，我们有道德上的义务，至少不能蒙蔽人民，要让人民了解合理的信息。"[17]

本书不是为了深思美国这种代议制民主的模式，更何况现在还有很多《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副本。但专业知识的陨落以及相应的对知识的攻击从根本上破坏了共和国的政府体系。更糟糕的是，发起这些攻击的人是最没有能力代替现行体系的一群人。我们当中信息最匮乏的人，却最藐视专家，而且对他们根本不肯用心去了解一二的事务，却要求有最大的发言权。

人们对于自己想要什么其实没有定数，而是看自己支持的人是什么主张，就会随之改变自己的心意。喜剧演员吉米·基梅尔（Jimmy

Kimmel）一直爱开玩笑，这一次，他拦住街上的人，问他们更喜欢希拉里·克林顿还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税收计划。可是受访者不知道基梅尔对调了两人的方案细节。后来《国会山庄报》（*The Hill*）报道说，受访者的回答是基于自己支持谁："果不其然，当希拉里支持者发现自己认同的是希拉里竞争对手的提案时，个个都目瞪口呆。"有一个人，当被告知自己支持的是特朗普的方案，而不是希拉里的方案，决定孤注一掷："好吧，那我就支持唐纳德·特朗普吧。"[18]

基梅尔的狂欢实际上阐明了民调员和竞选活动专家早就了然于心的一个事实：比起候选人的想法或政策，选民往往对候选人本身及其性格更感兴趣。《赫芬顿邮报》的民调主任阿里尔·爱德华兹——利维（Ariel Edwards-Levy）这样说道：

> 美国人啊，无论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其实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没有一个坚定的立场，如果这个问题还很错综复杂或模棱两可，那他们就无所适从了。可想而知，人们很容易把党派当作线索——如果他们支持的政治人物主张某个议案，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这个议案不错，反之亦然。[19]

但爱德华兹——利维和她的同事也如法炮制了基梅尔的"伏击"，不过形式上更正规一些，他们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共和党内有些人在医疗保健和伊朗问题上与民主党观点大相径庭，但如果唐纳德·特朗普的政策立场与民主党的一样，那在共和党遇到的反对阻力就小多了。如果民主党派的政策与特朗普的立场一致，那民主党人士对自己党派立场的支持力度就小多了。

至少税收政策和医疗保健是切实存在的问题，且各党立场不同。2015年，一个叫公共政策调查的自由主义民调组织问共和党和民主党人士是否支持轰炸阿格拉巴（Agrabah）。近乎1/3的共和党受访者说会支持这个行动，只有13%的共和党人反对，其余不确定。民主党人就不太

倾向于军事行动，只有19%的民主党派人士支持轰炸，还有36%的民主党派人士坚决表示反对。

阿格拉巴并不存在，是1992年的迪士尼动画片《阿拉丁》（*Aladdin*）中虚构的一个国家。自由派人士得意地表示，这项民调证明了共和党人的无知和攻击性，而保守派人士反驳说，这只说明民主党人无论对形势了解多么不足，都会条件反射地反对军事行动。可是，对于专家来说，这个民调捕捉到了一个事实，就算是偶然也好，这个事实是绕不过去的：43%的共和党人和55%的民主党人对轰炸一部动画片里的地方都表达了实际确定的观点。[20]

有些游戏对公众来说是不公平的。普通人都在忙着自己的生活，不会去想自己是不是被民调员操纵了，或是被基梅尔这样的喜剧演员戏弄了［或是福克斯新闻的名主持杰西·沃特斯（Jesse Watters），他也曾做过类似的街头民意测试］。而且，如果媒体给选民呈现的是关于这些问题的“各方”观点，却不指明哪种观点更加权威，那公众就更加无所适从了。就像心理学家德里克·科勒（Derek Kohler）所说的：

> 政府行为有一部分是由民意引导的。民意有一部分是由专家的想法引导的。但是民意有可能是——而且通常是——背离专家观点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公众拒绝承认专家的合理性，而且还因为公众也没有能力辨别主流的专家观点是什么。[21]

比如说在一场脱口秀上，一个科学家说转基因是安全的，一个活动分子说转基因是危险的，这场脱口秀看起来就是“平衡的”，但事实上这种做法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差不多九成科学家都认为转基因食品对消费者来说是安全的。在争执不休中，某一刻，公众也只好放弃，回去依赖更简单的资讯来源，哪怕只是脸书上的迷因。

即便如此，公民的无知和脱节，也是无法开脱的，尤其是过度依附党派的情形，人们对一个政策改变心意，只是因为看谁来倡导这个政

策。如果公众不了解一个问题的实质，那他们投票的依据只能是看自己喜欢谁，而不是看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当决策者及其专家顾问自己也疑惑不解的时候，我们也很难去苛责他们。是人民挑选了自己的代表来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但如果人们自己都分不清阿格拉巴、乌克兰或叙利亚，一个共和国又如何能好好运转？

换句话说，如果公众声称自己被误导或被蒙在鼓里，专家和决策者除了问“你是怎么知道的”也别无他法。

当外行人漠视专业知识，宣称自己受够了所有事，受够了所有人，他们忘记了，他们选出来的代表还是每天有一大堆麻烦的问题要处理。这些官员可没有闲工夫去诅咒专家和民调，然后龟缩到自己的电视或电脑屏幕前，或是游戏世界里。他们还得做出各种承诺，有时候是生活上的承诺，但大多还是资金上的承诺，并保证会投入到从航行权到儿童保育等各色事务中去。这些决策及其实施方式会影响到所有公民的生活，不管你是对这些事务了如指掌，还是一无所知，无论你是积极参与，还是与世界脱节，都在其中。

在一个共和国，公众、专家和民选官员之间的信任破裂，会导致各种可能的结果。而公众尤其需要去信任领导人及其专家顾问。可是，当普通人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或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那三方的关系就很难维系了。

当信任破裂，公众的无知就可能被愤世嫉俗的人操纵，变成一种政治武器。反智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让民主短路的手段，因为在任何文化中，民主想要保持稳定，都需要公众切实理解自己的选择所带来的影响。大多数普通人已经对受过良好教育的阶层心存疑虑，只需要一点点刺激，就会把矛头对准专家，甚至有些时候这样的反叛是被其他知识分子处心积虑引导的。

1942年，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请电台听众去购买地图，这样他们就能跟上他讲述“二战”的思路了。全国的地图很快售罄。2006年，时间过去不到65年，一项全国调查发现，18—24岁之间的美国人（最有可

能会去参战的一群人）中有将近一半认为没有必要知道其他正在发生大新闻的国家的位置。[22] 10年后，2016年大选鸣锣开鼓，唐纳德·特朗普在阐述对中东地区恐怖分子的策略时，引发欢呼，他说："我会炸到他们屁滚尿流。我会炸掉他们的油管，炸飞他们的炼油厂，轰炸他们的每一寸土地，把那里夷为平地。"

这还是一个共和国吗？或者，这个共和国也许只存在于地图上。

我和你一样出色

最后也是最让人忧心忡忡的就是，西方民主社会的公民，尤其是美国人，不再理解民主的含义了。或许这才是腐蚀专家和民众关系的罪魁祸首。专家和民众的关系不是“民主式的”。所有人不是，也不可能是有同样天赋的，或有相同才智的。可是，民主社会总是引诱大家愤愤不平地去坚持这份平等，这其实是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无知。

可悲的是，现代美国就是如此。民众不再理解民主是意味着一种政治平等，在这种状态下，人人都有投票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美国人现在认为民主是一种实际上的平等，关于普天之下的任何话题，每个人的观点都是一样好的。感觉比事实重要：如果人们认为疫苗是有害的，或者如果他们认为美国一半的预算都投入对外援助了，而你反对他们的观点就是“不民主的”或者“精英主义的”。

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不是美国独有的问题。英国作家C.S.路易斯很久之前就提出过警示，当人们不再能区分政治平等与实际平等的时候，就会对民主造成威胁，这句话出自他1959年的一部非常生动的小说，他在这部小说中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文学形象——聪明而邪恶的魔鬼赛诸葛（Screwtape）。

赛诸葛是地狱最资深的官僚之一，地狱有一个培训新魔鬼的学校，赛诸葛受邀为毕业典礼致辞。在演讲中，赛诸葛没有谈在他看来很沉闷的诱惑个人灵魂之事，而是纵览全球格局。当他被人类的进步（包括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取消奴隶制等等）击退，他看到了巨大的希望——地狱的希望，而不是人类的希望，利用这样的时机扭曲民主的概念，让它远离原本高尚的内涵。

“民主这个词，你必须用它牵着人类的鼻子走”，赛诸葛兴高采烈地建议毕业生们，然后他承诺，只要把“民主”这个词“单纯当作咒语一样使用”，人类就很容易被愚弄，不仅会去相信一个很显而易见的谎言，还会把这个谎言视如珍宝，从而助长这个谎言的滋生：

> 我所说的这种感觉，当然是能触发一个人说出“我和你一样好”这种话的。
>
> 说出“我和你一样好”的人内心其实不是这样想的。如果他是这么想的，就不会说了。伯纳德从来不会对一只玩具狗说这句话，学者也不会对一个傻瓜说这句话，有工作能力的人也不会对一个流浪汉说这句话，漂亮的女人不会对相貌平平的人说这句话。除了严格的政治领域外，只有自我感觉在某些方面不如人的人才会声讨平等。这句话表达的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渴望、刺痛和扭曲的意识，明明知道自己不如别人，却不肯接受现实。
>
> 怨恨由此而生。是的，他们憎恨其他人身上任何的优越之处，对其加以诋毁，希望这种优越灰飞烟灭。[23]

何塞·奥尔特加·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在1930年写《大众的反叛》（*The Revolt of the Masses*）时就发出了同样的警告：“大众碾碎任何不一样的东西，只要是优秀、独特、合格以及出类拔萃的，大众都要毁灭。任何人，只要与众不同，思维方式独特，都有被消灭的风险。”[24]

“我和你一样好，”赛诸葛在演讲结尾大笑着说道，“是毁灭民主社会的有效手段。”

的确如此。当愤愤不平的普通人要求所有成就的标志，包括专业知识，都要以“民主”和“公平”之名实现平均和平等，那民主或公平就都无望了。一切都被观点绑架，所有观点都要以平等之名拉到最低的共同标准上去。因为无知的人不愿意给孩子注射疫苗，导致百日咳爆发，是包

容的迹象；因为狭隘的孤立主义者在地图上找不到其他国家，导致与外国同盟关系破裂，是平等主义的胜利。

民主，21世纪初在美国实施的时候，已经成了充满怨恨和愤怒的事业。自恋的大学生怀揣玻璃心，电台谈话节目的死忠粉丝在自我认同上感到愤懑不平、伤痕累累，玻璃心碰上了自我认同，这些人还都要求被其他人同等认真对待，无论他们的观点多么极端或无知。专家被当作精英主义者嘲弄，在大众的认知里，精英主义者就是压迫“我们人民”的众多团体中的一个，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人民”这个词现在已经被选民随意用来表示“我”自己。专家建议，或任何普通人眼中的精英在获取大量信息后所展开的思考——那就几乎是除了自己以外的所有人了——都要被拒绝，这是个原则性问题。民主不会是这个样子的。

专家的反抗

我无意用这么悲观的语调结束本书，但我不确定我有多大选择的余地。无知的很多成因都是可以克服的，前提是人们愿意去学习。不过，傲慢、自恋和怀疑的毒害是无可消弭的，而美国人现在恰恰就用这些东西全副武装起来对抗专家和专业人士的努力。

传统的解决方法不起作用了。教育没有打破继续学习的障碍，反而告诉年轻人他们的感觉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重要。对很多学生来说，“上大学”仅仅是自我确认的又一个练习。媒体面临四面八方的竞争，不再告诉消费者什么是重要的，而是征询消费者想要知道什么。互联网是个福祸参半的地方，相当一部分信息被反智主义毒害。

面对公众坚定的无知，专家败下阵来。“我们很多人都有一种无力感，”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劳工经济学家戴维·奥特尔（David Autor）说，“我们觉得我们能训练我们的学生，但我们的学生不是公众，我们不知道如何教育公众。”耶鲁大学教授丹·卡亨（Dan Kahan）更加悲观。“用知识轰炸民众没有用，”他在2015年这样说道，“向民众解释根本不起作用，但我就是这样在一遍一遍地解释事实。也许这是老天跟我开的玩笑。”[25]

有一个让人看到希望的迹象就是专家似乎在反抗民众对专业知识的攻击。比如说，詹姆斯·特劳布在谴责英国脱欧的结果时就直言不讳地说，是时候让经典西方自由主义的卫士“起来对抗无知的大众了”。[26]当然，这样做是有风险的，可能会被人无情地指责为“精英主义”，这样的指控在讲究平等主义的美国，比在欧洲或其他分阶层的社会文化中更有影响力。特劳布自己也认识到：“不得不说，人民是容易迷惑的，而

领导人的任务就是给他们解惑。这是‘精英主义者’吗？也许是吧，也许我们已经习惯于赞颂一切个人信仰都是真实可靠的，现在只有精英主义者在信奉理性、专业知识和历史的教训。”

无论如何，在很多国家，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似乎都受够了。说个趣闻吧，当我这篇《专家之死》的初稿流出时，美国以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科学家、医生、律师、教师和很多其他专业人士都联系了我，这让我大感意外。他们不仅给我讲述了自己的挫折，还有他们因为与病人、客户、学生的关系破裂而生发的愤怒和悲伤，甚至还有亲密友谊的降温，而这些都是因为他们最终提出要求，不想再继续对那些资讯匮乏的人耳提面命了。

尤其是医生，似乎真的是厌烦了。举个近期有趣的例子，2015年，基梅尔——没错，再一次——运作了一个讽刺公益广告，广告中真实的医生对着害怕注射疫苗的顽固病人破口大骂。“还记得你那时候得小儿麻痹症吗？”其中一位医生问道，“不，你不记得。因为你爸妈带你［咒骂语］注射疫苗了。”另一个医生说：“我就这一天不上班，还要来跟你这个白痴聊疫苗？”这时另一个医生插话说：“就是因为有些傻瓜读到了一封转发邮件，你还听信了这些傻瓜的话？”

基梅尔的广告疯狂传播，被主流媒体报道，单单在优兔（YouTube）上的播放次数（到本文撰写之时）就超过800万。当然，反疫苗的人旋即做出反应。像Infowars.com这样的网站和一些反疫苗博主称医生无知，是腐败系统的工具，当然还有其他常见的侮辱语言。但反疫苗的浪潮现在似乎达到顶峰，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专业人士及其支持者决定像阴谋论者那样利用媒体和互联网。

在媒体上的这种努力会挽救一些孩子的性命，但还不足以打败反对专业知识的运动，或扭转其对美国民主所造成的影响。最终，专家无法要求公民去关注周围的世界；他们不能坚持要求人们健康饮食或增加锻炼；他们不能拽着民众离开最新的真人秀节目而是去看看地图；他们不能通过强制命令来治愈民众的自恋。

可悲的是，我怀疑要解决这个问题，可能需要一场出乎预料的灾难：可能是一场战争，或是一次经济崩溃。（比起只有勇敢的美国志愿军参与的海外战争，我说的这种大型战争对美国的撼动力要大多了，或是一次真正的大萧条，而不是21世纪初的经济衰退。）可能是一次无知的煽动行为，这种事情正在美国和欧洲展开，或是技术官僚掌权，最后终于丧失耐心，因此把投票只当作一种走过场的形式。

在西方国家和美国想要创造出生机勃勃的知识和科学文化，需要民主和世俗的包容，没有这种美德，知识和进步都会受到意识形态、宗教和民粹的攻击。屈服于诱惑的国家已经承受了很多厄运，包括大规模镇压、文化和物质的贫乏，以及战争的失败。

我对美国制度仍然有信心，我也认为美国人还有能力脱掉自我和孤立的外衣，承担起公民的责任。他们在1941年做到过，又在越南战争和水门事件后的试炼中做到，到了“9·11”袭击后，他们又一次证明了自己，然后，每一次他们都会陷入自满，每一次他们都会把无知和愤懑的坑挖得更深。到了某一刻，他们也许就再也看不到天光了。

我们只能默默祈祷，在一切还来得及的时候，民众、专家和决策者会啃下这个硬骨头，讨论专家的作用和美国民主中的受教育精英（这样的辩论目前还是不受欢迎）。受到特朗普挺进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冲击，安德鲁·苏利文在2016年警告说：“精英分子在民主社会中仍然至关重要”——

> 他们重要不是因为他们是民主的敌人，而是因为他们是拯救民主的关键力量。政治体系可能会遭受打击，陷入低迷，顺从网络的算法，顺从一个天才煽动家的三言两语，但我们不应该轻言放弃，要继续努力把民主和精英责任相结合，打造出一个近乎独特且稳定的美国制度。
>
> 我们在这个民主时代需要精英——这样的主张似乎令人震惊，尤其是我们周围财富不均和精英失手的案例比比皆是。但我们的确

需要精英去保护珍贵的民主，以免民主的道路走过头儿出现动荡不安。[27]

路易斯创作的赛诸葛知道，民主代表一种政府体系，而不是实际的平等状态。民主社会中的每一张选票都是平等的，但观点不是；美国社会最好能迅速重建新的基本规则，让接受良好教育的精英与其服务的社会能进行卓有成效的互动，而且越快越好。

专家需要时刻谨记：他们是民主社会和共和国政府的公仆，而不是主人。可是，如果公民要当主人，不仅要用教育来武装自己，还要具备一种公民道德，让他们能时刻参与管理自己的国家。没有专家保驾护航，外行人是做不到的，他们必须抛弃积怨，接受这个事实。同样，专家也必须接受一个事实：他们的建议在自己眼中是显而易见和正确的，但在一个与他们关注点不同的民主社会中，不见得总是会被采纳。否则，当民主被理解为一种无止境的追求，追求的是给无根据的观点自然而然的尊重，那么一切皆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和共和国政府的终结。

这，至少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专家意见。我也可能是错的。

---

[1] 参见James Traub, “First, They Came for the Experts,” *Foreign Policy*, July 7, 2016。

[2] 引自Michael Deacon, “Michael Gove’s Guide to Britain’s Greatest Enemy…the Experts,”*Telegraph* online, June 10, 2016。

[3] 引自Stephen Castle, “Having Won, Some ‘Brexit’ Campaigners Begin Backpedaling,” *NewYork Times* online, June 26, 2016。

[4] 引自Nick Gass, “Trump: ‘The Experts Are Terrible,’” Politico.com, April 4, 2016。

[5] David Dunning, “The Psychological Quirk That Explains Why You Love Donald Trump,”Politico.com, May 25, 2016.

[6] 例如，参见Jennifer Kerr, “Educational Divide in GOP White House Race: What’s Behind It,” Associated Press, April 3, 2016; Max Ehrenfreund, “The Outlandish Conspiracy Theories Many of Donald Trump’s Supporters Believ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5,2016; Scott Clement, “Donald Trump Is Splitting the White Vote in Ways We’ve Never Seen Before,” *Washington Post* online, May 31, 2016。

[7] The Journalist Jeffrey Goldberg, for one, claimed that Samuels was using the piece to settle a personal score with him.参见Jeffrey Goldberg, “Ben Rhodes and the ‘Retailing’ of the Iran Deal,” *Atlantic* online, May 9, 2016。

[8] David Samuels, “The Aspiring Novelist Who Became Obama’s Foreign-Policy Guru,” *NewYork Times Sunday Magazine* online, May 5, 2016.

[9] 《星际迷航》原版系列的经典剧情，1968年首播，主要讲述一个善意的教授做出了一次误导方向的努力——试图在整个星球推行纳粹制度。最终以灾难收场，但是垂死的教授仍然称纳粹德国为“地球上有史以来最高效的国家”，这时候，这部剧的理性声音——斯波克插话说，“很对”。事实上，纳粹德国深度腐败和低效，很多顶尖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在1933年后逃离这个国家。可是，很多美国人仍然相信纳粹的效率神话。

[10] Daniel Libit, “How the Expert Class Got Trumped and Berned,” CNBC.com, May 12, 2016.

[11] Susan Jacoby, “The Dumbing of America,” *Washington Post* online, February 17, 2008.

[12] Friedrich Hayek, *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 The Definitive Edition*(Chicago: Universityof Chicago Press, 2011), 378.

[13] Evan Thomas, “Why We Need a Foreign Policy Elite,” *New York Times* online, May 8,2016.

[14] Andrew Bacevich, “Rationalizing Lunacy: The Intellectual as Servant of the State,”*Huffngton Post*, May 8, 2015.

[15] Philip E. Tetlock, *Expert Political Judgm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5), 231–232.

[16] Malcolm Gladwell, “Small Change: 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New* Yorker, October 4, 2010.

[17] Ilya Somin, “Political Ignorance in America,” in Mark Bauerlein and Adam Bellow, eds.,*The State of the American Mind* (West Conshohocken, PA: Templeton, 2015), 166.

[18] Neetzan Zimmerman, “Kimmel Fools Hillary Supporters into Backing Trump’s Tax Plan,”*The Hill*, September 30, 2015.

[19] Ariel Edwards-Levy, “Republicans Like Obama’s Ideas Better When They Think They’re Donald Trump’s,” *Huffpost Politics*, September1 ,2015.

[20] Nick Saffran, “Wipe That Grin Off Your Smug Faces, Progressive Pollsters,” TheFederalist.com, December 29, 2015.

[21] Derek Kohler, “Why People Are Confused about What Experts Really Think,” *New YorkTimes* online, February 14, 2016.

[22] Jacoby, “Dumbing of America.”

[23] C. S. Lewis, *The Screwtape Letters with Screwtape Proposes a Toast* (New York:

Image,1981), 136–139 (emphases in the original).

[24] José Ortega y Gasset, *The Revolt of the Masses* (New York: W. W. Norton, 1993), 18.

[25] 参见Libit, “How the Expert Class Got Trumped and Berned”; and Julie Beck, “Americans Believe in Science, Just Not Its Findings,” *Atlantic* online, January 29, 2015。

[26] James Traub, “It’s Time for the Elites to Rise Up against the Ignorant Masses,” *Foreign* Policy, June 28, 2016.

[27] Andrew Sullivan, “Democracies End When They Are Too Democratic,” NYMag.com, May 1, 2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美）托马斯·M.尼科尔斯著；舒琦译.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9.3
书名原文：The Death of Expertise
ISBN 978-7-5086-9690-4
Ⅰ . ①专… Ⅱ . ①托… ②舒… Ⅲ . ①文化研究－美国 Ⅳ . ① G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45686号

The Death of Expertise by Thomas M. Nichols
Copyright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The Death of Expertise was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English in 2017.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is solely responsible for this translation from the original work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hall have no
liability for any errors, omissions or inaccuracies or ambiguities in such translation or for any losses caused by reliance thereo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专家之死：反智主义的盛行及其影响
著者：［美］托马斯·M. 尼科尔斯（Thomas M. Nichols）
译者：舒琦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193千字
版次：2019年3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8-4354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9690-4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